

傳播研究與實踐

第1卷 第2期 2011 年7月

專題論文／論壇

文化Context與傳播研究

「異／譯」文化脈絡：在地知識與去穩定的人類學運用／林徐達
論跨文化傳播的脈絡性／陳國明

心理Context與傳播研究

情境、脈絡與心理學研究／葉光輝
脈絡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知與情境觀點／陶振超

社會Context與傳播研究

社會學實證研究中的脈絡效應／張苙雲
從達悟族的文化脈絡看惡靈信仰的傳播／郭良文

政治Context與傳播研究

媒體與社群：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劉正山
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策略：Teun A. van Dijk與Norman Fairclough的比較／倪炎元

時間Context與傳播研究

訊息與觀念互動的脈絡：以《時務報》為例／潘光哲
同／異之間：社會科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的對話之旅／張詠

經濟Context與傳播研究

經濟學理中的脈絡元素／黃登興
以組織同形理論探討大眾媒體中的跨組織模仿現象／李秀珠

研究論文

原住民部落自主傳播的媒介試驗：花蓮縣福音（Lohok）部落「村長麥克風」計畫／林福岳
舊聞新史：對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思考／黃順星
從語藝觀點探討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之認同策略／蔡鴻濱
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論述面向／牛隆光

典籍再現

時機與傳播情境：評介《語藝與時機：歷史、理論、實踐論文集》／沈錦惠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airiti
press.

「異／譯」文化脈絡： 在地知識與去穩定的人類學運用 *

Cultural Context: The Use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Destabilization

林徐達 **

Lin, Hsuta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壹、異文化脈絡的轉譯

想像一個場景：你如何向一位來自迥然不同文化的朋友介紹什麼是棒球？什麼是投手、全壘打、盜壘、犧牲觸擊、強迫取分，甚至防禦率、自責分、不死三振等專業術語？在這絞盡腦汁說明遊戲規則的處境中，介紹者突然發現，表明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一項球類運動，話語竟變得生澀而欠缺條理。該先說明棒球場地和四個壘包呢？還是攻守兩隊球員位置與球賽任務？或是三好球出局、四壞球保送等核心規則？如果這位朋友仍有興趣的話（或者你的口才確實不錯），介紹者才能稍稍寬心，接著陳述更為細節的攻防戰術和得分要領。

「那麼，這項運動有什麼樂趣呢？」當朋友如此詢問時，介紹者面臨的不再是棒球手套、球棒或比賽細節與規則的說明，而是棒球作為一項整體的球類運動，如何令人在不同的戰況中屏息、禱告、沮喪或欣喜若狂地投入。介紹者究竟該如何表達扣人心弦的分數拉鋸、逆轉勝的快感等比賽過程，或是電子看板廣告激發的群眾熱情、球賽中場歌曲帶來集體式的傳統認同，甚至涉及賭盤讓分、下注賠率等博弈知識與計算心理。又或者，棒球運動如何成為文化中個體生活的一

* 本文感謝馬昀甄和蔡欣齡協助文稿校勘。同時，筆者於本文撰寫期間，時值擔任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Fulbright 訪問學者，在此向兩機構表示謝意。

** Email: fieldworker@gmail.com

部分？甚至通過修辭，轉喻為一項人生寓意，猶如饒舌歌詞〈就在青春的九局下半〉、小說書名《愛情兩好三壞》，或日本《直球對決》的男子氣概。

詮釋人類學家 Geertz 生前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時，經常以上述情境作為文化詮釋之範例。Geertz 以為，棒球猶如我們身處的文化情境（一如峇里島的鬥雞活動！），元素（棒球）與整體（球賽）之間來回的理解，成就了「詮釋循環」的核心概念，而非依賴其中的一方達成「何謂棒球」的說明。Geertz 認為「詮釋循環」是用來理解文化整體的意義結構，以及特定文化行動的象徵形式之重要路徑：通過往返於「經由部分來領悟真實的全體」，以及「經由全體的掌握所突顯的部分」二者之間，以一種持續循環的理解練習，藉以彼此補充與辨明 (1973: 69)。由是，在上述棒球的「譯文化」情境示例中，涉及了異文化的語言轉譯（說明者必須以對方可以理解的語彙來解釋「什麼是棒球？」）、文化內容的描述（棒球怎麼玩？），以及整體文化的習得與浸納（何以棒球使人著迷？）。

用一種人類學觀點來說，這正是上一世紀現代人類學所崛起的使命：藉由地方知識的描繪、社會行動的說明、文化的形塑與感知等三項目標，共同完成人類學對於文化脈絡中行為意義的理解與闡明。文化脈絡下的在地知識一方面作為人的行為活動（儀式、衝突、展演、經濟交換、甚至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舉止）的意義基礎，二方面則再現該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的獨特性。依此，文化脈絡是一個傳遞意義的象徵體系，同時透過一種繼承概念的操作習得，促使人們形塑且持續發展有關生命態度之知識（見 Geertz, 1973: 89）。而人類學正是提供一種理解途徑，即作為異文化處境的在地翻譯，致使人們得以理解個人或群體行動在他者與我們自身文化脈絡下的相對意義。由是，詮釋人類學主張文化的意義是銘刻的、交由詮釋而尋獲的，而非與生俱來的。

特別的是，當現代社會學科持續增強對於文化的研究旨趣，人類學已不再維持這門專業訓練的專斷權，其中包括文化社會學、文化心理學、歷史學的新文化史研究範式等；或是在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研究的推波助瀾下，當代比較文學的文化解構主義和都會地理學的文化空間論述，皆成為新興並且愈趨重要的討論內容與方式。在研究方法上，部分的社會科學、教育學和社會工作領域已交由「質性研究」的調查取徑予以完成。其中借取自民族誌的田野工作範式、（已逐漸成為口號般的）深度訪談，以及綜合其他如個案研究、論述分析、紮根理論、行動研究等方法，強調研究步驟與驗證、田野調查的處境類型、訪談模式，以及主客體關係等應用（和應變）。就一種樂觀的期許角度看來，質性研究自身建立了一

套相對於量化研究的科學式論證方法和務實的操作手冊，藉以分析行動者的動機和理由，同時也提供了人類學訓練的練習機會和授課舞台。

然而，這卻帶來兩項人類學潛在的隱憂：一是跨學科應用逐漸稀釋了人類學作為一項獨特的異文化調查之學科訓練，恐怕簡化了這門學科的操作技術；同時，過往人類學強調不同社會的異文化調查任務，反而自我阻斷了針對當代自身社會議題的跨學科對話。二是當這些學科挪用人類學的文化脈絡概念時，卻忽略了這門學科在「異文化 vs. 譯文化」論述中，帶給自身社會文化的深刻反省與批判之努力，使得人類學淪為異地奇俗的翻譯記錄，相對形塑一項刻板知識論述之風險。基於上述兩項考量內容，本文透過詮釋人類學的文化闡釋，以「在地知識」與「去穩定」兩項主題，表達人類學就文化議題有別於其他學科的論述路徑：前項作為對他者文化脈絡的基本認識，後者則是針對自身社會的解構與批判，並依此視作當代人類學的另類職責。最後，本文說明人類學如何在上述獨特的研究旨趣中，傳遞「少數者聲音」的學科使命，期許在不同學術訓練中能彼此了解與對話。

貳、在地知識作為文化脈絡下的理解與辨識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田野工作」為人類學所奉行的操作練習，即使當代許多學科亦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此一訓練要求始終是人類學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的重要特徵：一是藉由長期「置身現場」的田野調查方式，獲得在地者自所處的文化脈絡所陳述之觀點（由是，相對保障了民族誌工作者的書寫職權）；二是民族誌書寫作為在地知識的呈現內容，以及異文化脈絡的轉譯和分析形式。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操作練習要求研究者長期投入異地觀察，並秉持文化相對性之教義，形塑了人類學得以具備細部微觀之能力。於是，田野工作所帶來無可置辯的學術規範，加上長期在他者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寂寞，和調查過程中的頹喪無助，使得這門技術變相地成為專業人類學家的必要門檻，同時增強了學院訓練的專業與權威。

然而，不同於質性研究將田野工作過於簡化為純粹的技術操作，1980 年代後的詮釋人類學反倒著眼於過往殖民主義式的介入姿態、書寫修辭上的道德疑慮，與無可避免的研究倫理等逐漸感到自我懷疑之議題（見林徐達，2011；Clifford, 1988；Geertz, 1984, 1988）。綜合來說，這類思考挑戰了田野工作的客觀性和民族誌知識權威，使得過往人類學追求「在地者觀點」之學術目標，轉向

「這究竟是誰的在地觀點？」之質問。於是地方知識的詮釋，由報導人敘說資料蒐集方法的「深度訪談」，轉變為民族誌作者的「深度描述」。就我看來，當代人類學論戰中，Sahlins 與 Obeyesekere 關於「庫克船長究竟怎麼死的？」成為此項思考的經典教材內容。

Obeyesekere 批評下述論斷：「1779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庫克船長登陸玻里尼西亞夏威夷，並被視為當地的神明 *Lono* 的回返。」他以為這是來自於 18 世紀歐洲的想像所創造出來的說法，並且奠基在一種神話模式之上。這其中的因素恐怕是由於庫克船長的形象已被塑造為一項歐洲的資產——他的航行成就了征服、殖民等目的和科學式的發現，賦予他在歐洲歷史上被視為一位令人尊崇的探險家和遞送西方文明的先鋒使者 (1992: 5)。Obeyesekere 試著從檔案文獻裡，揭露不同於啟蒙時代所認定的庫克船長，在《庫克船長的神化》書中提出一項細微的區辨：Obeyesekere 認為對土著而言，庫克船長像是 *Lono* 的化身 (avatar)，有別於 Sahlins 以為庫克船長對土著而言，正是 *Lono* 神的降臨 (同上引：21)。

究竟庫克船長被夏威夷土著「視為 *Lono*」，還是「視為像是 *Lono* 的化身」？兩者的差別在於土著對於神格 (divinity) 的識別。¹ 這種差別猶如廟會慶典中七爺、八爺的化身飾演者，與民間信仰中對七爺、八爺神格仰佩的差異。參與廟會活動的旁人感受到七爺、八爺的神威，卻不會當真把頂著七爺、八爺神像軀殼內的那位角色當成是七爺、八爺。而這正是在實踐理性上的不同，它給予了「識別」的能力，一如在起乩現場中，旁觀者可以輕易察別那位神明附身與乩童自身二者的不同。由是，神的「化身」，可以是那個喝醉酒自認為是神的人；可以是舞台上布幕揭開作為神的演員；可以是那位我們在咖啡廳遇見名為 *Lono* 的新朋友。那麼關於庫克船長的降臨，我們如何可以肯定土著果真把庫克船長當作就是 *Lono*？Obeyesekere 挪用 Geertz 的「對現實的模式」以及「為現實所應對出來的模式」 (model of reality; model for reality) 之論述，轉述為神話模式，藉以駁斥 Sahlins 的觀點乃建立在西方的神話建構之上 (mythmaking; 9-11)。Obeyesekere 認為，身處於現代社會的我們具備能力做出上述這類識別時，卻不應該帶有一種民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愚蠢地以為土著不具備如此能力。

1. Obeyesekere 援引 Weber 「務實理性」觀點指出，實踐理性並非考量「信仰」理性，而是一種思考的模態（而非思想的模態） (mode of thinking, not mode of thought)。當庫克船長率領兩艘大船抵達夏威夷，並且出現在土著的 Makahiki 慶典中，Obeyesekere 以為這會破壞並擾亂了當時夏威夷土著的常識認知 (commonsense)。雖然這正符合了歐洲人對於白種文明者的假設，但必須將土著的實踐理性納入考量。由是，「常識認知與實踐理性之間的分際變得模糊」，其判斷準則必須依據問題的情況，去決定該決定為何。見 Obeyesekere (1992: 21)。

此一著名的人類學論戰之收穫，並不是有關學術勝負的判別，而是開啟人們在文化或生活脈絡中，各自行為意義的深描可能性，從而增強對這類複雜處境的辨識能力。我以為這種可能性正是現代人類學的貢獻之處：不僅讓學界得以理解、進而詮釋遙遠民族의思想和認知，更期許通過異地文化脈絡的認識，在當代自身世界的周遭生活中，以文化並置的對照和拼貼方式，藉以增加「多樣性的想像力量」(Geertz, 2000: 87)。在底下的示範實例中，說明了這類的辨識能力，並非協助我們依此決定法律依據，或是道德標準下的是非善惡。恰是相反地，因為詮釋人類學式的在地情境理解，使得我們對於社會價值感到懷疑，從而阻止當下做出任何的立即判斷：

報導人的女兒（10 歲）和兩位姪女（12 歲和 5 歲）喜愛一款線上遊戲。玩家們可以在該遊戲裡扮演角色，於一個小島式王國裡飼養虛擬寵物，並且利用遊戲中提供的虛擬錢幣，購買飼料餵食各自的寵物。獲取這些虛擬錢幣不外乎兩種方式：以真實的金錢購買，或是前往遊戲王國的遊樂園中，透過類似賭博的遊戲機（按照報導人的話語：「玩電動玩具裡的電動玩具」），有時能獲得一些獎勵金幣，便可前往遊戲王國的虛擬商店購買包括飼料等物品。

某日，12 歲的表姊玩遊戲機時，突然獲得許多金幣，她前往虛擬商店中買了許多商品。一些留給自己之外，同時分送給兩位妹妹。幾天之後，就讀幼稚園的妹妹也像表姊一樣突然獲得許多金幣。姊妹三人於是高興地分享商店中所購買的虛擬獎品。隔日，姊妹三人再次上線玩該款遊戲時，卻發現三人的虛擬錢幣都無故消失。他們詢問線上的遊戲管理員後，回覆如下：玩家以不當的方式獲取錢幣，並大量購買虛擬商品，這是違法行為，所以收回尚未使用的虛擬錢幣之外，並要求玩家將購買的商品予以繳回，「否則將對玩家提起告訴」。

報導人知曉此件事情之後，詢問女兒當時在遊戲機中獲得異常數量的錢幣時，為何不覺奇怪：「怎麼沒有先問清楚就拿去買東西？」，女兒回答：「我們以為中了樂透呀！」，但相對已經懂事的表姊則因為「違法」而感到害怕，同時苦惱於這些虛擬商品不知如何歸還，因為虛擬商店沒有退貨機制的設計。報導人決定透過客服電話聯繫。客服人員在電話中指責家長不該只是讓小孩玩遊戲卻不教導他們是非對錯；報導人則是抨擊線上遊戲公司很明顯地將程式設計的瑕疵推諉為玩家

的過錯。客服人員則是以受害者的口吻表示，玩家（此三位小朋友）將這些不當獲取的金錢，「把虛擬商品的東西全都買光了」，造成其他玩家面臨沒有商品可以購買的窘境，讓他們很難處理。

報導人事後戲謔地埋怨，線上虛擬王國裡遊樂園的賭博性電玩，卻相對沒有設立「18歲禁止進入」的標誌，難道這是合法的嗎？「但問題是，這些小朋友都是各自選擇自己的角色扮演，進入遊戲王國，他們是合法地玩賭博性電玩！」報導人的友人在一旁補充。²

在報導人的故事中，關於「是非對錯」的判斷形塑一項「意義的危機」，其中包括了現實生活或虛擬世界皆需重視的道德常識（「怎麼沒有先問清楚就拿去買東西？」）、成人與小孩認知的差異（「我們以為中了樂透呀！」）、消費概念（購買虛擬寵物的飼料，卻苦於沒有退貨機制）、法律的界定（「否則對玩家提起告訴」），以及最後虛擬與真實的交雜——真實世界的虛擬化（餵食虛擬寵物）和網路世界的真實化（「把虛擬商品的東西全都買光了」），以及包含二者元素的特殊混雜（「玩電動玩具裡的電動玩具」，和小朋友在虛擬遊戲裡的成人角色）。在此例之中，文化脈絡的情境涉及對於線上遊戲的認識：我們若不知道線上遊戲是什麼，便無法理解這類角色扮演的互動遊戲，何以不同於過往對於電動玩具之認識與吸引力；於是也無法明白為什麼需要以虛擬的錢幣購買虛擬的寵物飼料，以及在定型化契約的概念下，遊戲管理員為何以法律字詞「提起告訴」來表達對被「盜竊」虛擬商品之損失。於是，這類「文化脈絡下的理解與辨識」開展了人類學知識論的重新省思，以便於幫助研究者在地方知識的建構過程中，察覺文化形塑的內在性，從而發展一項在方法論上的詮釋科學，一種強調「系統性且自我涉入的詮釋可能性」(Marcus & Cushman, 1982: 25-26)。

參、去穩定作為人類學研究的另類職責

人類學在人文科學中恐怕最常於自我提問「這門學科究竟是什麼？」，同時給予的答覆內容並非有關一門學科知識的描述，卻像是總體式的世界觀，或是類似信念的聲明 (Geertz, 1995: 97)。在這門學科所持續承諾和反對的信念中，人類學帶來一項關於尋找新文明、探求世界觀的學術期許，以便於描繪、揣摩、突顯

2. 此段記錄經報導人同意後，由筆者改述。

那一個遙遠邊緣族群的生活方式，並且與我們自身社會相互對照。在古典時期，這種比較自身社會與他處（here and there）的動機，或許來自西方世界對於認識異文化的渴望，其中部分充斥著宗教般的熱忱，好讓現代文明點燃啟蒙之光，以及來自一門新興學科對於自身研究主題含有若干浪漫冒險成分的天真抱負。帶有極大程度的諷刺意味兒——「或許這是一種醜行，又或者這正是此項學科訓練的長處」（同上引）——這門學科的職責正是破除原先認為理所當然、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或是阻擋自我中心式的偏見與誇耀。

然而，正因為民族誌異地研究的發現，今日的人類學相對於古典時期的職責，反倒扮演著逆向的先鋒角色，自我解構地撤除了西方對於自身理性、文明、信仰等原有認識：「世界並不單純區分為虔敬與迷信；叢林中存在著雕塑，沙漠中也有繪畫；政治秩序可以不需要中央集權，而原則正義也不見得需要編撰式的法典規則；理性規範並沒有固著於希臘時代，而道德演化也沒有在英國圓滿達成」（Geertz, 1984: 275）。今日人類學對於異文化的接觸認識，已經普遍地轉換為對於自身社會的了解並給予批判，它使我們所獲得的不是侷限於遙遠民族的生物性或社會性調查，或是部落文化的細緻說明；相反地，通過部落的地方知識，拓展了當代對於自身社會的認識（羅正心、林徐達，2008：3）。這或許正是當代詮釋人類學有別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另類職責：人類學的現代任務不僅是陳述異文化脈絡中的在地觀點，而是同時地去除了我們自身文化價值的穩定性（destabilization）。Geertz 以為這種去除原先穩固的理解常識之認識論，企圖「損害我們原有的自滿，並且自此刻的傲慢世界中直接釋放出來，使得我們不再如此自信與滿足。於是，人類學是一項帶有顛覆性質的行業：它所顛覆的不是道德層次上的問題，而是狂暴、執拗頑固的封閉經驗」（2003: 33）。

例如，人類學家 Boon 在〈為什麼博物館令我沮喪〉一文中表示，博物館成為單純仿效或收集片斷世界的地方，「而這些殘片自過去所奪取，然後被展示、分類，接著被賦予格言的意義」（1999: 126）。博物館成為一個透過物品陳列方式來觀看世界之處所；這些物品並不對外發售，除了一個地點之外——禮品部門。於是博物館便令 Boon 更加沮喪：一方面它抽離出一般正規的商品化模式，另一方面卻又加速機械再製的循環性（同上引：134）。如同一位自田野地將部落面具帶回都市的收藏者，強調「無價的文化瑰寶」的同時，卻諷刺地暗示一種沾沾自喜的商品化心態；文史工作者或部落族人以「博物館化」形式（museumification）展示一目瞭然的文化物質產品，強化每一件文物直覺式的理解感知，並保障其價值的確定性。於是，愈是被形塑定義的文化形貌，便愈是遠

離它自身文化脈絡的深度。來自過去時空的殘餘片斷，於博物館陳列展示中被敘說，並且被當成真實的文化內涵；而今日的觀光客從這些片段的敘說中，再次予以片斷化，更令人難過的是，這一切皆處於博物館的現場之中（同上引：135）。

由是，儘管在當代混雜社會的調查現實中，過往追求人類學式的「全貌觀」理想已愈趨困難，但某種意義上人類學仍著重於「整體意義」的思路取徑，特別是針對文化下的抽象概念——包括神秘莫測的巫術、宗教神話的制約力量、無法言明的社會規範，或是特殊的文化情緒等——拒絕封閉式的片面理解方式，或是某種高唱單一價值（卻因此往往過度評價）的地域主義。這使得現代人類學面對不規則、不明確、前後矛盾的社會現象時，不是提出解決衝突現象的核心方法，使得以恢復或重新建立一套明確規則的秩序體系，而是強調文化脈絡的意義結構，使其不再晦澀難懂。這賦予了人類學更深一層的教育職責，並且帶來的重要影響是重啓了民族誌修辭自 Malinowski 功能論解釋下，從而忽視有關生命本質的諷刺存有形式（同時見 Strathern, 1987: 266）。

然而，人類學並非是那種循序漸進地遵從系統性方法，或是藉自操作手冊加以培訓的學科知識 (Geertz, 1995: 97)，這種對於生命本質的感知能力，反倒相對來自長期沈浸於異文化思維下的理解與反省。這種「他者／自身」文化脈絡的並置經驗，帶來一種超現實主義式的啟發 (heuristics)：一方面「去穩定」瓦解了自身社會對於價值的固著定義，和基於刻板的文化認識作為對異文化他者的執拗判斷，於是這類關於遙遠部落的獵人頭習俗與西方定義下的暴力復仇、低賤之貧窮生活與中產階級的風雅品味，甚至特定的歷史經驗與想像中的懷舊情緒等彼此之間的相似或衝突，變得逐漸令人存疑。另一方面，通過文學閱讀與民族誌的書寫修辭，卻又發現有關人類生存的微妙相似性，於是《藍色蜘蛛網》般的通俗警世劇碼，不單純僅是灑狗血般的橋段，藉以誇張展現自我或社會矛盾，然而它的敘說形式接近亞里斯多德的悲劇詩，其內容也可能出現在《奧底帕斯》悲劇故事中；藝術美學亦不再是寓言式的博物館展示，卻可能接近部落的儀式性污穢，或是最為血肉的世俗生命。

是故，當前人類學面臨一系列有關「去穩定」的文化處境和知識氛圍：後殖民或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回擊、原住民自決意識下的入境（研究）許可、在地人類學觀點帶來的衝擊、流動社群的離散回應、大都會的城市記憶與毀滅、地球村與片散的世界 (world-in-pieces)、主體的混雜身分和混淆認同，或是網路傳播下「熟悉的陌生世界」等。這些圍繞於我們周遭的研究題材都具備一項相似的性質：所

有主題都以一種流動、不恆定的姿態，表達當前持續改變的「不確定性」。但是，如同前述棒球運動最迷人之處，正在於比賽結局的不確定性，當代人類學研究亦是如此。這類不確定的理解狀態或許顯得脆弱，但卻「比起正確（true）來得更為真實」（Augé, 2002: 66）：它不同於過往人類學知識表達相對純粹的文化結構，去蕪存菁地忽略那些讓人感到錯亂不安的干擾現象——依此稱之為「例外」，使得以維護原先穩定的理解模式——卻是更加珍視不確定性所帶給自身文化社會在批判思想上的刺激，因而賦予了懷疑的價值。

肆、結語：爭論的精細化

現代人類學是否已經擺脫「提供奇風異俗、世界真奇妙等增廣見聞」的業餘形象？表面上看來，這門需要極大執著意念的學問，幾近病態地運用艱澀難懂的修辭，來鞏固（甚至創造）有關異文化研究的學術專業。這換來的代價卻是導致了人類學的知識語彙疏離於自身的生活世界，而僅就民族誌的部分書寫豐富了讀者聊勝於無的異文化見識。這門學問的知識建構反倒因此落入一種「膚淺的窘境」；諷刺的是，人類學研究的目的原是為了避免生產任何刻板印象的可能性，結果卻成為自身所極力抵抗的對象？「明明是如此有趣的文化，為何民族誌到頭來總寫得這般無趣？」Pratt 在《文化的書寫》（1986）中如此提問。這類有關民族誌書寫的修辭旨趣與文脈表現等自我評論，表達了對人類學無以名狀的內在焦慮與學術期許。

但事實上人類學知識的生產形態和學科使命，賦予了這門學問相對於其他社會學科一項難得卻沈重的自省能力。其中包括了文化的意義詮釋、異文化調查的書寫職權、形上學式的研究倫理，和田野工作的實踐哲學等思考議題；它也向法律正義的行使、平等權與尊嚴的維護、文化永續的經營理念、社會福祉的規畫，或是多元文化融合等人類群體生存無可辯駁的基本訴求，就不同族群處境或是文化脈絡提出帶有某種必要勇氣的質疑。這些考量並非否認上述諸多理念、各門學科專業，或是人權和社福機構的論述主張，而是為了抵擋「形塑唯一價值」的思考模式。我們或許可以這般理解：人類學致力為少數族群或社群在大眾（主流）價值之下爭取文化庇護（cultural asylum）——從而捍衛獨特的思想觀點與習俗信仰，或是爬梳異文化衝突與矛盾，澄清表面上看來混亂，卻存在秩序與抽象概念的社會現象——從此在現代知識的追求中，恐怕注定了人類學家始終扮演著不受歡迎的少數意見者。這使得這門學問具備一項獨特的研究旨趣：人類學此一學

科的進展，並非為了達成全體意見一致這類完美目標，而是成就對爭論的精細化 (Geertz, 1973: 29)。

由是，本文藉由此一專題論壇之機會，說明人類學觀點下——至少是筆者所接受的詮釋人類學訓練——有關文化脈絡的核心概念與分析練習，並且期許與其他專業學門進行對話和論辯。對人類學來說，文化脈絡作為個人思想和行為特徵的背景認識，並提供族群或某一特定性質社群的共享價值與判斷基準之理解，它彰顯了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跡，或生命存有形式之下所寓含的意義與想像。Geertz 曾用「讀一首詩、聽懂一則笑話、重讀一次《馬克白》，或是看一場棒球」表達文化的領悟方式（見 1983: 69-70）：它不必然是一項條理分明的遵守原則，反倒是透過隱喻形式的人生哲學、幽默的運用、文學修辭，或是行為活動等元素，彰顯文化脈絡下的整體感受和體會，依此得以識別神明附身與乩童自身、虛擬遊戲中的成人角色與現實世界的小女孩之間的差別。這種詮釋循環式的理解開展了本文兩項主題：首先，現代人類學著重於異文化的在地知識研究，避免權威式的論斷形式和姿態，並依此增加有關他者心智活動的詮釋多樣性。其次，此一訓練經驗逆向成為翻譯自身文化脈絡的獨特模式，使得經由去穩定的文化解構過程中，顛覆了原先的刻板印象，獲得不同於過去僵固認識的文化評價。這種主題拓展的新觀點以及不確定性的質疑，將不僅挑戰自身學科訓練的研究範式，更是作為當代跨學科對話和反省的討論平台。

參考書目

- 林徐達（2011）。〈論地方知識的所有權與研究職權：從詮釋人類學省思 Lahuy 的「論文返鄉口試」〉，《臺灣人類學刊》，9（1）：147-185。
- 羅正心、林徐達（2008）。〈地方知識與田野工作〉，《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4）：1-11。
- Augé, M. (2002). *In the metro* (T. Conley,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oon, J. A. (1999). *Verging on extra-Vagance: Anthropology, history, religion, literature, arts...showbiz*.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2003). A strange romance: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rofession* 2003, 28-36.
-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guished lecture: Anti anti-relativ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 263-278.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rcus, G. E., & Cushman, D. (1982). Ethnography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25-69.
- Obeyesekere, G.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att, M. L.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27-5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rathern, M. (1987).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251-281.

論跨文化傳播的脈絡性^{*}

Theorizing Contextuali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陳國明^{**}

Chen, Guo-Ming

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Rhode Island, USA

壹、前言

「脈絡」(context) 這個概念的定義，就如定義什麼是「文化」一樣的眾說紛紜，在學者之間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傳統上，語言學領域是研究脈絡這個概念的重鎮，特別是在語用學(pragmatics)方面。半世紀來，隨著語言與脈絡之間關係研究的進展，對脈絡性言說的看法也變得更具互動與對話性。這主要是因為 Gumperz & Hymes (1972) 的推動所致。面對面的互動自 1960 年代，就開始從人類語言學的角度，強調語言在形成一個社會之日常生活的本土脈絡裡的建制功能。換句話說，語言的分析，不再局限於把語言認為是一個獨立與封閉的形式結構，而是與語言所在的文化與社會組織息息相關的。這一轉變，不僅使得脈絡的研究逐漸延伸到不同的學術領域，在脈絡理論的陳述方面，也變得相當多元。例如，Goodwin & Duranti (1992) 從八個角度說明了對脈絡理論的多元性有所貢獻的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與學說。

首先是以 Malinowski (1935, 1989) 為首的民族誌(ethnographic)的先驅研究。Malinowski 提出兩個重要論點：(一) 語言存在一個情境的脈絡(a context of situation)之中，(二) 必須把語言定義為一種實際的活動(practical action)，而非只是反映人們內在與抽象的思想。第二是從哲學角度把語言與行動合一的研究傳統，Wittgenstein (1961) 與 Austin (1962) 為這個研究路線的代表學者。這個

^{*}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跨文化交際學會 2011 研討會主題演說之題目。

^{**} Email: gmchen@uri.edu

傳統主張從事語言的分析，首先必須把語言放置於人類行動（human action）的多重脈絡之下；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人類才有可能從言說（talk）的過程製造可以理解的意義。第三是俄國對話（dialogical）理論對人類語言與認知的貢獻，Bakhtin (1982) 與 Vygotsky (1962) 兩位學者為這個路線的代表。前者沿襲了馬克思思想，提出了語言的對話組織（dialogic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論點，強調言說或語言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關聯性，亦即多元聲音與表達形態的相互滲透。後者著重在語言與認知的關係，強調語言與意識共同存在一個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y）的網絡裡；亦即語言與認知，或者所謂的自我中心的言說（egocentric speech）乃是深受所在的社會脈絡影響的。

第四個貢獻來自人類互動（human interaction）的研究，Bateson (1972)、Goffman (1961) 與 Schefflen (1973) 為這個研究領域的佼佼者。這一派以人類的互動作為脈絡分析的依據，主張面對面的互動提供了言說生成的根據地，因此面對面的互動建構了主要的脈絡。另外，人類互動乃是經由不同個人協力的過程而形成的，言說於是與這種社會互動的形式互不可分。這種把人類互動視為言說的主要脈絡，給語言分析帶來了活力與內涵的擴充。第五是言說的民族誌學（ethnography of speaking）。Hymes (1974) 與 Gumperz (1982) 的研究在這個方向具有指標意義。這個方向大大地擴充了對脈絡研究的範疇，不再把脈絡局限在對一組語言分析的特定基礎上，進而重視語言分析時或之前的文化基礎。也就是認定了影響互動本身的本土文化因素引導言說的分析，其對脈絡的文化特殊性之重視，由此可見。第六是來自民族誌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Cicourel (1964) 與 Garfinkel (1967) 為代表學者。這派思想從社會學的角度，主張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是社會成員協商與建立一個共同脈絡的基礎。這個相互主觀性與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的完成乃是建立在一步一步進行著的社交互動與認知的過程。換句話說，在這個過程社會成員彼此展示了他們對作為一個社會活動的事件的理解。因此分析社會成員如何成就社會秩序，必須對這個社會本身的環境與活動的深入研究才行。

第七是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研究的傳統，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三個學者為這個研究方向的健將。會話分析主要是源自民族誌方法學的傳統，認為語言分析不能只著眼在語言的結構本身，而必須以在一個特殊脈絡下的言說表達為基礎。另外，言說乃是雙重脈絡（doubly contextual）的產物，意味著言說的生成與詮釋不僅是建立在一個特殊脈絡的基礎，而且言說本身也是下一個活動脈絡的生產者。最後是來自 Foucault

(1972) 的影響。Foucault 主要是把權力 (power) 這個概念帶入了脈絡的研究。權力受到無意識性文化規則的制約，對互動的脈絡具有隱性的左右作用，直接影響了人們思想與溝通行為。Foucault 把知識的文化面向稱為「言說」(discourse)，作為一個符號與行動的文化複雜機制，言說制約了人們的社會生活。Foucault 提出的言說，在脈絡分析上聯結了人們主觀的經驗與客觀建制的限制。

傳播學門建立之初，正值脈絡研究轉型之時。作為一個雜糅不同學門研究內涵與理論的學科，脈絡自然成為傳播，尤其是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主要概念之一。本文的論述，聚焦在跨文化傳播的脈絡性。

貳、脈絡與跨文化傳播

跨文傳播學對脈絡的研究，同時受到以上各個研究方向的影響，其中以人類互動研究與言說的民族誌學兩個方面的影響最為顯著。可惜的是，至今尚無跨文化傳播學者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從事脈絡理論的建立。本文針對這個缺失，對跨文化傳播脈絡性做一個理論建立的初級嘗試。為了分析方便起見，本文把脈絡視為一個圍繞著可以從事適當分析的人們互動的架構 (frame; Goffman, 1974)，它同時指稱一個可觀察的焦點互動事件 (focal event) 與這個互動事件發生的場域 (Goodwin & Duranti, 1992)。

跨文化傳播研究一向以 Hall (1976) 的看法為指標，把文化視為跨文化傳播具有決定性的唯一或主要的脈絡；主張文化脈絡決定意義的製造，因為有了不同的文化脈絡，人們因此有了不同的認知方式，然後產生不同的信仰系統，接著發展出一套不同的價值觀，規範與制約著跨文化互動的過程。Hall 把人類社會的文化脈絡區分高脈絡與低脈絡兩種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es)，跨文化互動因為文化脈絡的差異，產生彼此誤解乃是必然之事。跨文化傳播學者把文化視為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的這種研究取向，不僅僵化了跨文化互動的動態性，更忽略了影響人類互動過程的其他元素。

雖然文化脈絡提供一個安全與穩定的場域，讓同一群體的成員能有效的執行語言交換與心智的活動 (Borden, 1991)；但在跨文化互動的場合，因為互動對方來自另一個不同的文化系統，文化脈絡所具有的安全穩定感以及所保護之語言或心智活動，隨時必須受到挑戰。文化脈絡的穩定性 (contextual stability) 因此受到衝擊，如何協商與重建己方文化脈絡的意願與能力乃成了跨文化傳播成

功與否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這說明了脈絡彈性或流動性（contextual flexibility or fluidity）在跨文化互動過程的重要性。堅守自己文化脈絡的堡壘，互動雙方的彼此理解難以達致。

文化脈絡的彈性／流動性，給互動者建構了一個具有文化間性（interculturality）的第三文化（third-culture）空間（Casmir, 1999; Dai, 2010）。在文化間性的場域裡，互動者可以相互協商與調整，建立一個互惠互補與共生共贏的跨文化關係，顯現了文化之間重疊、相似與互補的複雜關聯；也就是提供了互動者協商彼此之間文化的差異而發展出良性人際關係的第三文化的過程（陳國明、安然，2010）。因此，脈絡的彈性／流動性意味著對傳統跨文化傳播研究把文化視為自變項的一種挑戰，認為文化脈絡的邊際（boundary）並非銅牆鐵壁，而是互動雙方經由開放的溝通過程，可以有效的彼此滲透（interpenetration）、彼此融合（interfusion）、甚至彼此轉化（transformation）。

除了脈絡的彈性／流動性，跨文化傳播脈絡理論的建立，同時必須認清脈絡多元性（contextual multiplicity）的本質。也就是說，文化在跨文化互動的過程，並非是唯一存在或絕對重要的脈絡。Katriel (1995) 曾主張，跨文化傳播研究必須由單一脈絡（context）轉變為多重脈絡（contexts）的取向；這樣才不至於在跨文化傳播脈絡理論建立的時候，落入論述膚淺與範疇狹隘的窠臼。避免跨文化傳播脈絡研究單一化的方法，就是同時重視不同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在跨文化互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Malinowski 早在 1935 年就已提出語言分析必須同時注意到情境脈絡的影響；不幸的是，這個情境脈絡對跨文化傳播學者而言，似乎只是文化脈絡的代名詞而已。跨文化傳播研究忽略了除了文化脈絡，還有更具動態性的諸如時（temporal contingency）、位（spatial contingency）與心理（psychological）等多元情境脈絡的存在。這些高度動態多元的情境脈絡與文化脈絡，不僅同時影響著互動者之間的溝通行為（包括語言與非語言的使用），溝通行為受到不同脈絡的衝擊造成改變之後，也會逆向影響著脈絡機制的運行，而造成脈絡框架（frame）的伸縮。除此之外，文化脈絡與情境脈絡等不同脈絡之間，同時也存在著競合的關係。

在此以《易經》的論述為例，來試著闡釋脈絡對互動與脈絡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易經八卦的每一卦都象徵著大自然的一個重要屬性，而且搭配著固定的時間與空間。在時間方面，如震卦為清晨四點半到七點半，代表萬物始生或開始甦醒的時刻，也正是經由溝通互動人類關係發展的萌芽期；巽卦為早上七點半到十點半，代表如溫煦和風滲入萬物之象，雙方始有了接觸；離卦為早上十點半到

中午一點半，代表著明亮火焰附著萬物之象，雙方在心理與情感方面產生了相互依賴與扶持的慾望；坤卦為午時一點半到四點半，代表著溫柔大地承受萬物之象，雙方彼此接受了對方的感情；兌卦為傍晚四點半到七點半，代表著湖澤笑口逐開之象，雙方立下了海誓山盟；乾卦為夜間七點半到十點半，代表著天健壯穩碩之象，雙方在穩定中持續成長的感情達到了最高峰；坎卦為深夜十點半到一點半，代表著水滾動翻騰之象，雙方感情開始惡化；最後，艮卦為深夜一點半到凌晨四點半，代表著山止息不動之象，雙方關係的發展停滯不動（陳國明，2004；Chen, 2008, 2009）。

這八卦的運動，呈現的時間脈絡在人類溝通互動的過程所產生的影響，意味著時間脈絡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人際關係形態；也意味著在不同的時間脈絡階段，需求不同的互動方式。這個華人溝通互動的時間脈絡觀，讓我們了解到華人在人際關係發展過程所具有的細水長流性與和諧性，以及這兩個特性引伸出來的華人人際關係發展的特殊性、長期性、親內性、合禮性、以及公私重疊性等文化價值取向（Chen & Chung, 1994; Yum, 1988）。這也可以由每一卦的序位或空間脈絡進一步取得印證，如陳國明等人（付梓中）指出，

……每一卦都具有一個卦時然後以每一卦的時間特性，配合六爻之間建立在時間與空間兩個概念所生成的互動關係，來討論宏觀層次之天人整體和諧觀，以及在某個特定時空階段下可能產生之吉或凶的結果。也就是在這個層次《易傳》給 64 卦帶入了時間這個概念，激活了宏觀層次各卦爻之位（即空間）的活力，使得每卦六爻由下至上的位序之間產生了間承、乘、比、應等在不同時機所發生的不同變化，有了時間與空間兩個概念的交叉互動，天地陰陽兩氣在人事上的應用與相互關係的解釋有了更深入與具體的解釋（同上引）。

時間與空間的情境脈絡與文化脈絡之間的互競互存的關係，由此可見。若把其他空間脈絡所包含的如社會地位、性別、與權力（power）等概念納入脈絡與溝通互動分析（Chen, 2001; Fairclough, 2001; Murray & Sondhi, 1987），對動態多元的情境脈絡、文化脈絡、與溝通行為之間複雜的關係，定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脈絡多元化（contextual multiplicity）的認知對跨文化傳播研究所可能帶來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文化不再永遠是一個自變項，而是可以把它作為一個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加以處理，來觀察文化脈絡受到互動過程或其他情境脈絡

影響的情形。這種多元脈絡之間相互的評比、影響、與滲透，其實已超乎了脈絡多元性的範疇，而成為 Perry (1970) 所說的脈絡相對性 (contextual relativism) 的內涵。Bennett (1986) 更認為，對脈絡相對性的審核 (contextual evaluation) 能力，是達到有效的跨文化互動的重要元素之一。

參、脈絡與邊際博弈

Chen (2010a) 認為跨文化傳播是一個邊際博弈 (boundary game) 的過程。在整體的互動環境 (environment) 之下，雙方像隊友一樣，經由協商持續重新定義著彼此之間的邊際線 (boundary line)，然後逐漸擴展為一個邊界 (border)，再擴大成邊境區 (frontier)。從狹窄的邊際線發展到寬大的一片邊境區，代表著經由良性的互動過程，雙方彼此之間的跨文化理解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度的提升。研究跨文化傳播的脈絡性，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脈絡既然是互動發生的場域或架構，一方面它意味著互動雙方本來所具有之不同脈絡（如文化脈絡）之間的面對與推移，另一方面是多元脈絡之間的彼此競合與滲透。脈絡之間的邊際線區隔了互動雙方，在跨文化互動過程，因為不同文化體系的差異，這個脈絡的接觸之處顯示了高度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因此，跨文化傳播成就的基礎，可說是建立在對邊際擴展空間裡文化與情境脈絡差異的辨識與操控能力。跨文化傳播的理論建立，也可以它的脈絡性來進行。這個脈絡邊際線到邊境區的伸縮，不僅顯示了脈絡相對性的彼此滲透、彼此融合、以及彼此轉化的特徵，更展現了跨文化傳播過程諸如中心與邊緣 (center/periphery)、強勢與弱勢 (power/powerless)、以及真實與虛假 (authentic/inauthentic) 等相對勢力之間循環轉換的動態特性 (Cohen, 2000; Shils, 1975)。

由以上論述可以歸納出一個基本假設：做為不同脈絡裡互動的兩個文化實體，亦即溝通者雙方是相互依存的。雖然互動尚未產生之前，個別實體本身是一個自依自變的獨立與封閉系統，但本著孤陽不生，孤陰不長的太極之道（余敦康，2005），這兩個實體必須經由互動而產生了聯繫，才能體現出一個完整的跨文化傳播體系 (Chen, 2006)。這種互動者的特徵，同樣表現在他們所附身的情境與文化脈絡。換句話說，通過互動時的自我內部或脈絡的轉變，以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境界，顯現出兩個實體或脈絡間的綜合統一，就是跨文化溝通成功的保證。

這個因互動帶來的邊際區伸縮所形成的從孤立狀態變為聚合狀態的新的綜合統一場域或脈絡，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具有文化間性的第三文化空間，我們可以視

之為跨文化傳播的共同中心（co-center）。跨文化傳播的共同中心領域越大，代表著互動雙方彼此的理解越是深入，互依互利的跨文化傳播目的越容易實現。以脈絡與脈絡裡互動實體為主導的這種邊際博弈，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依據 Carse (1986) 的說法，持續不斷的博弈（infinite game）的目的不在求取勝過互動對方，而是在追求一個毫無止息的互動過程。為了持續擴大跨文化溝通的共同中心領域，Chen (2011) 提出了「邊際智慧」（boundary wisdom）這個概念。

肆、脈絡與邊際智慧

邊際智慧就是以開放之心，想像脈絡框架外之為異或反常的「殊方異物」，並培養「拓邊意識」的勇氣，開發與積累邊際博弈的知識與技巧，以便收編「異」或「反常」來擴展「常」之領域（亦即跨文化溝通的共同中心）的過程（林在勇，2000）。Chen & Starosta (2004) 與 Starosta & Chen (2005) 進一步指出，跨文化溝通的邊際智慧建立在大融和（great empathy）的能力之上。大融和的能力展現在人類多元性（human multiplicities）彼此之間的相互融合與相互滲透，也就是互動雙方經由自我伸縮的過程所達到的一種和諧性的相互滲透狀態。這個人類多元性當然包括了跨文化互動時的脈絡多元性。大融和的能力包含了敏覺力（sensitivity）與創造力（creativity）兩個要素：

作為大融和的雙目，敏覺力意指把多元（diversity）收斂成統一（unity），創造力則是從統一擴展為多元的能力。敏覺力給創造力提供了潛力發揮的場域，創造力提供了大融和實現的有力手段。敏覺力與創造力攜手並進，它們的光芒由互動者無止息的學習過程照射出來（Chen & Starosta, 2004, p. 13）。

創造力在這個意義上不僅代表脫離了文化與情境脈絡的差異所產生的局限，同時也認同了不同脈絡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創造力對脈絡彼此差異性的脫離與對脈絡之間相似性的認同，無疑地給跨文化互動帶來豐富的潛力與機會。因此在跨文化互動過程，創造力也在互動者或多元脈絡的邊際線，製造了相互融和與滲透的多樣可能性，然後逐漸拓展成第三文化或跨文化理解的邊界與邊境區。另一方面，敏覺力所帶來的區分和識別互動與脈絡多樣性的能

力，協助了互動者建立彼此之間可共同分享的溝通符號，並經由移情或同理心（empathy）能力的發揮，伸入了對方的思想和情感領域，解放了主體與客體，我與他兩造之間所築起來的相對孤立性的自我堡壘。這也意味著突破了互動者或脈絡之間因差異與誤解所形成的繭或牆，或解鎖了邊界線的緊箍咒的宿命性。

以邊際智慧的大融和所含具的敏覺力和創造力，來分析文化與情境等多元脈絡下的跨文化互動，提供了一個與既有研究不同的建立跨文化傳播，特別是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理論的新觀點。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學術取向為基礎，由功能主義或發現範式主導，試圖經由實證研究的過程，從情感（affective）、認知（cognitive）、與行為（behavioral）等面向，發覺出各面向不同的元素（Chen, 2010b; Chen & Starosta, 1996），較不重視理論的建立。把跨文化互動視為一個多元脈絡的邊際博弈過程，並從邊際智慧的角度來理解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建立理論，在研究上應該具有提供激發思考與貢獻文獻內涵的潛力。

伍、結論

本文探討跨文化傳播的脈絡性，提出五個主要的觀點。這些觀點可以歸納如下：

首先，對跨文化互動的分析，必須將它放置在與互動發生的脈絡之下進行審視，而非把跨文化互動，尤其是互動過程語言與非語言符號的分析，視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封閉系統。其次，必須突破傳統把文化脈絡視為跨文化互動具有決定性的唯一或主要的脈絡。本文主張跨文化互動的脈絡具有多元性，除了文化脈絡之外，還有其他諸如時間、空間、與心理等情境脈絡的存在。第三，跨文化互動的多元脈絡之間，具有高度動態的相互滲透、融和與轉換之關係。有效的處理多元脈絡之間的動態關係，則建立在脈絡彈性或流動性之脈絡相對性的基礎之上。第四，跨文化互動多元脈絡之間的動態關係，可視為一種邊際博弈的過程。脈絡邊際博弈的目的在追求永續的互動過程，而不是意在勝過或壓制互動對方。最後，達致跨文化脈絡邊際博弈之目標的有效手段，在於培養具有敏覺力與創造力的大融和能力之上。

參考書目

- 余敦康 (2005)。《易學今昔》。桂林，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林在勇 (2000)。《怪異：神乎其神的智慧》。臺北：林鬱文化。
- 陳國明 (2004)。〈易經八卦的人際關係發展模式〉，陳國明 (編)，《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 203-227。臺北：五南。
- 陳國明、安然 (2010)。《跨文化傳播學關鍵術語解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國明、尚小穗、韋路、李佩雯、劉雙、李美華 (付梓中)。《傳播理論》。臺北：五南。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Bakhtin, M. M. (1982).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Holquist, Ed.; C. Emerson & M. Holquist, Tra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Bennett, M. J. (1986).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training for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 179-196.
- Borden, G. A. (1991). *Cultural orientation: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Carase, J. P. (1986). *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 A vision of life as play and possibilit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Casimir, F. L. (1999).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 third-culture building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91-116.
- Chen, G.-M. (2011). Moving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Boundary wisdom as the key. In G. Wang (Ed.),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frameworks* (pp. 157-171). New York: Routledge.
- (2010a).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Hong Kong: China Review Academic.
- (2010b, December). *Theorizing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hai, China.

- (2009). Toward an *I Ch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5(3), 72-81.
- (2008). *Bian* (Change): A perpetual discourse of *I 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7(4), 7-16.
- (2006).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at and where to now. *The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6, 295-311.
- (2001). Toward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V. H. Milhouse, M. K. Asante, & P. O. Nwosu (Eds.), *Transcultural realit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pp. 55-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en, G.-M., & Chung, J. (1994).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 93-105.
- Chen, G.-M., & Starosta, W. J. (2004). Communication among cultural diversities: A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7, 3-16.
- (199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 353-383.
- Cicourel, A. V.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Cohen, A. P. (2000). Introduction: Discriminating relations -- Identity, boundary and authenticity. In A. P. Cohen (Ed.),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pp. 1-13). New York: Routledge.
- Dai, X.-D. (2010).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culturality: A conceptual link. *China Media Research*, 6(1), 12-19.
- Fairclough, N. (2001).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61).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 Goodwin, C., & Duranti, A. (1992). Rethinking context: An introduction. In A. Duranti &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pp. 1-4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mperz, J.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mperz, J. J., & Hymes, D. (Eds.). (1972).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atriel, T. (1995). From “context” to “context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271-28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linowski, B. (1989).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pp. 296-3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3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Murray, A., & Sondhi, R. (1987). Socio-political influences o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Notes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ontext. In K. Knapp, W. Enninger, & A. K. Knapp-Potthoff (Eds.), *Analyz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17-3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Perry, W. G. (1970).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acks, H., Schegloff, E. A., &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 Schefflen, A. E. (1973). *Communication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a psychotherapy transac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hils, E. (1975).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arosta, W. J., & Chen, G.-M. (2005). Intercultural listening: Collected reflections, collated refraction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8, 274-285.

Vygotsky, L. S.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E. Hanfmann & G. Vaker,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ttgenstein, L. (196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C. K. Ogden & F. P. Ramsey,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Yum, J. O. (1988).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East Asia.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 374-388.

情境、脈絡與心理學研究 Situation, Context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葉光輝 *

Yeh, Kuang-Hui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心理學是一門探討人類心理與行為的科學，許多心理學家花費大半生的精力與時間，企圖闡明人心理的運作機制與行為表現的原理原則。早期心理學家多半認為可以藉由了解個人內在的心理運作機制來預測其外顯行為表現，而一般人對心理學這一學門研究特色的想像也往往停留於此。然而，在心理學史的演進中，學者們逐漸留意到，當探討內在心理特徵對特定行為的影響效果時，實應參考該行為發生的情境或事件背景作為解釋脈絡。對於「內在心理特徵 vs. 外在情境事件」對外顯行為影響效果的相對重要性，歷來曾有過許多種看法，亦不乏極端強調任一影響來源的學者。若比較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兩位心理學家——Freud & Skinner——的主張觀點即可看出，Freud (1949) 認為個人的外顯行為模式主要取決於其內在的心理動機能量（如本能、生物驅力、潛意識等），是強調內在心理決定論的代表；而 Skinner (1974) 則持極端的外在環境決定論，認為人們只是被動接受外在情境或刺激事件的影響，然後逐漸形塑出特定的行為模式。當今心理學者在此議題上則傾向採取整合觀點，同時兼顧個體內在心理與外在情境線索的影響效果。

至於「脈絡」概念在心理學領域受到關注，甚至逐漸成為心理學知識建構的主軸之一，主要是受到以文化、社會結構制度對人類行為作用效果為研究焦點的其他學科知識（如人類學、社會學）所影響。此時，脈絡概念的意義指稱的是比簡單情境、事件涵蓋範圍更廣的周遭環境因素，一般習慣用「情境脈絡」來稱呼，

* Email: ykh01@gate.sinica.edu.tw

以與前述用以指稱特定研究主題（心理或行為）發生背景脈絡之情境、事件做出區隔。就心理學的研究典範與知識建構而言，「脈絡」及其影響至少有兩種不同的界定層次：一是涉及與心理學研究主題——人類心智運作歷程——相互交織影響的情境脈絡內容（其中可包含個人整體生活範疇所涵蓋的各種特定情境、個人所身處的特定生命階段，乃至於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其次則是在主流心理學強調探討基本心智運作歷程之普同性下，對於與心理學知識建構歷程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脈絡在研究上的意義所進行的反思。底下將針對這兩層次陸續討論說明脈絡與心理學研究之間的相互關係。

壹、動態交互影響歷程

儘管當代絕大多數心理學家都一致認同，必須同時考慮內在心理特徵與外在情境事件兩者對個人行為表現可能的影響效果，但這樣的說法仍相當籠統。具體來說，個人的行為並不是由各種內、外在可能影響因素的整體「加成」效果來說明，而是兩者「交互影響」的結果。然而，此處所謂的交互影響，並非統計學上交互作用效果（interaction effect）的意義。統計學上的交互作用只能反映出，在兩因素不同條件水準的交互組合下的靜態式影響效果，但實際作用在人身上的，卻是相當複雜的動態式交互影響歷程。更進一步來說，個體身上具有多種成分，諸如個人的集體潛意識、神經傳導物質、情緒感受、本能需求、特質、政治意識形態、信念、評估標準、目標或能力技巧等等，都可能是影響其後續行為表現的遠因與近因；然而這些內在因素是否扮演外顯行為的關鍵影響因素，則須視當時所處的情境因素而定。不過，所謂「當時的情境因素」，並不是指當時「客觀的」情境條件因素，而是由個體「主觀建構的」情境意義。假若強調的是「客觀的」情境條件因素，這又會讓問題的思考焦點落入行為主義論的窠臼——把人的內在心理系統當作毫無作用的「黑盒子」，而其行為只能被動地受情境中的賞罰條件因素所制約。但蔚為當代心理學主流的社會認知論學者卻認為，人至少能部分地「控制」自己的行為 (Bandura, 1986)。

社會認知論對人類行為的看法，強調以下兩項主要特徵：（一）人的思考推理歷程（或認知歷程）應該在心智系統分析中扮演核心角色；（二）思考推理歷程主要是在社會脈絡中運作，意即人是透過人際互動的場域來瞭解自己與周遭環境，並會為特定情境下的自己設定及調整出合宜的行為目標與期待，接續再做出對應的行為反應。社會認知論不僅批評行為主義的環境決定論觀點，也批評心

理分析論過度強調潛意識的心理決定論觀點，而認為學者應該更關注人們如何運用意識層面的認知能力去調控行為，並透過此種自我引導能力成為自己的主宰 (Bandura, 1997, 2001)。就社會認知論兼顧內、外在兩類因素對行為影響效果的觀點，其認為個人在不同情境間的行為表現是具變化性的，但此種變化並非完全取決於情境本身，而是相應於個人內在心理運作對特定情境或事件的主觀解讀或評估，例如：人們可能因為受個人興趣、專業能力等影響，而積極地投入某些工作，但對另一些工作卻十分懶散。這才是個體內在心智系統與行為表現之間的實際運作情形 (Mischel & Shoda, 2008)，也是個體具有適應不同環境能力的證明。

對於人類行為的決定原則，社會認知論的開創者 Bandura (1986) 提出了交互決定論 (reciprocal determinism) 來說明個體一般的行為運作原則。他主張個體本身、外顯行為，及其身處的情境三者間的因果關係，會隨時間演進兩兩不斷地交互影響。說得更清楚些，想像你正和一位你覺得還不錯的人聊天，你可能臉上掛著笑容、顯得很專心並且適時引導到對方感興趣的話題，以便讓他／她對你產生好印象。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前述現象證實了情境塑造外顯行為：互動對象的外表或內在優點使你以特定的行為方式與其交談、表現自己。這麼說或許沒錯，但還不夠完整。情境（互動對象）是你需要進行理解的對象，而你「獨特」的理解方式會受到你既有的信念及感受（亦即心理特徵的一部分）的影響。再者，如何讓對方產生好印象也需要根據你的社交技巧（另一項心理特徵）才能決定。此外，行為會改變情境的特徵，如果你有技巧地讓對方產生好印象，那麼對方的心情會變好、會喜歡你多一點，和你談話時也會較專注；換句話說，你能夠靠自己的行為營造出正向的情境。最後，如果目標達成，外在的成功也會連帶改變你內在的認知信念、情緒及自我感受，你的行為因而影響了你的心理特徵。在這樣的系統觀點分析下，若將任一方視為另一方的肇因皆嫌不足。所以個體本身、外顯行為及情境三者必須以兩兩彼此交互影響的方式來解讀。

整體而言，人確實會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但人們同時也會主動選擇喜歡的情境以及應對特定情境的方式。人是情境的反應者，同時也是主動建構及影響情境的行動者。社會認知論相當強調人選擇情境的能力，這些能力代表了人可以主動影響自身的發展。

貳、「若……則……」的行為表現模式

在交互決定論這一基本訴求方向下，另一位社會認知論大師 Mischel (1999) 接續提出認知情感處理系統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CAPS) 模型 (見圖 1)，詳細說明個體內在心智如何形成一個運作系統，並對情境的需求產生反應，繼而衍生出後續的外顯行為。CAPS 模型提出三點主要論點：(一) 個體的認知及情感成分彼此交互串連形成複雜的系統。所謂系統，它不僅指出其中所具有的各式成分內涵，更說明了成分彼此間交互串連的方式。擁有眾多組成成分的系統，即使每一成分相對簡單，但在系統內往往呈現出高度複雜且規律的組織型態。人的心理系統不只單純地擁有多元目標、能力、預期及評估標準等結構成分而已，它還進而將這些成分與不同的情緒感受相互連結。例如，不同的目標可能引發與不同技巧相關的想法，這些想法又會接續影響不同程度的自我效能感，以上這些成分又都會影響個人的自我評估及情緒感受。(二) 社會情境的不同面向 (或情境線索) 會激發心智系統中的不同認知與情感成分。例如，如果你正和某人聊上個禮拜他約會的情形，則與約會有關的目標及預期等次系統成分就會被激發。相反的，如果談論的主題是政治、運動或課業，則這些討論會激發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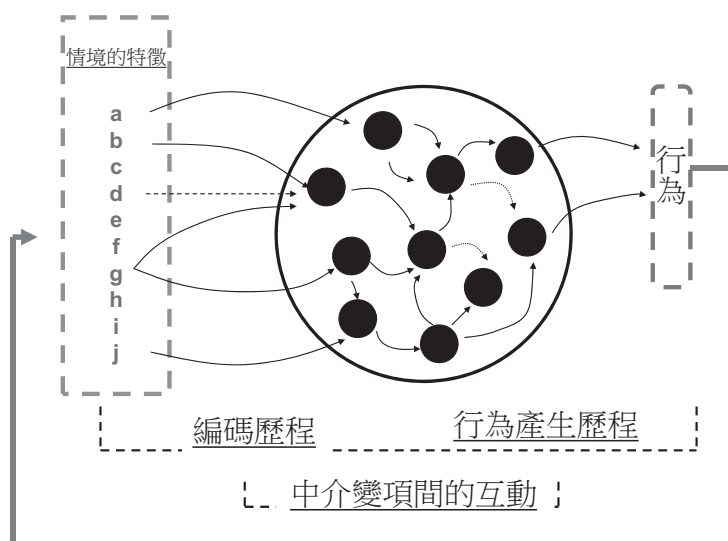


圖 1：Mischel & Shoda 的認知情感處理系統 (CAPS) 理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Mischel & Shoda (1995: 254)。

個體另外的目標、能力、預期與情感成分。(三)人的行為反應及表現是隨著不同情境線索的激發而對應調整及改變。假設某人的心智系統包含關於約會技巧的負面想法、感受、以及關於學業能力的正面想法感受，當情境有不同的線索（如約會或學業）時，個人也相對產生截然不同的正、負向情緒感受與行為。因此，雖然個體擁有穩定的心智系統，但是當不同的心智成分被不同的情境特徵所激發時，個人的經驗及行為便會隨情境特徵的差異而調整，此種對於「內在心智系統」與「外在情境線索」間會有個人獨特的對應整合關係，即為 CAPS 最主要的特色。

Mischel 及其同僚 (Shoda, Mischel, & Wright, 1994) 的研究結果就顯示：即使整體平均攻擊性相同的兩人，他們在引發攻擊的不同情境中，也可能產生迥異的行為組型（見圖 2）。當 Mischel et al. 以「若……則……」的方式分析資料，即以「『若』遇到某特定的情境，他／她『則』以某種方式反應」分析，發現不僅可以看到人們在特定情境與行為表現的對應關係相當穩定，而且也更能捕捉個人行為表現的獨特型態。

有趣的是，一般人（未受心理學專業訓練的人）似乎天生就能瞭解，「若……則……」這分析原則在解釋個人行為變化上的重要性。從 Kammrath, Mendoza-Denton, & Mischel (2005) 的系列研究結果指出，一般外行人並不預期人們在不同情境脈絡下，會表現出完全一致的行為模式；反之，他們同樣採用「若……則……」這一思考原則，並預期人們的實際行為會隨著情境不同而有所調整。在另一項實驗中，則描述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下迥然相異的行為表現，並詢問受試者有何想法。這些看似與個人穩定特質無法對應的行為描述，並未讓受試者感到困惑；反之，其推論人們在不同情境下會持有不同的動機，而這些不同動機恰可解釋人們實際行為的變異 (Kammrath et al.,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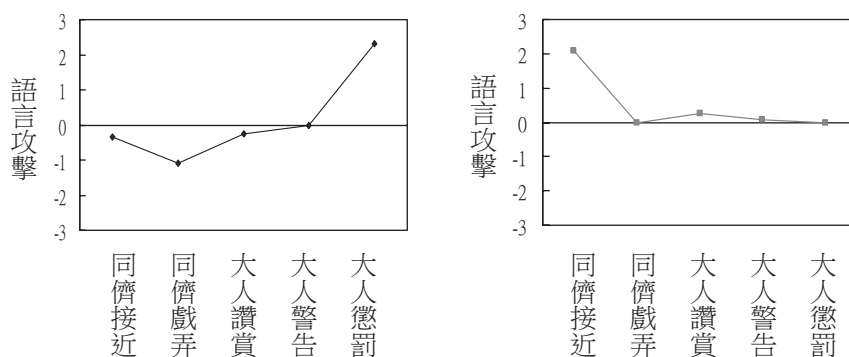


圖 2：兩個體在五種心理情境下的語言攻擊行為

資料來源：改繪自 Shoda, Mischel, & Wright (1994: 6)。

以社會認知論的專業術語而言，這種具個人獨特性的「情境 - 行為」關係圖被稱作行為簽章（behavioral signatures），「由此種行為簽章模式顯現的個體內在穩定性，似乎頗能幫助瞭解及掌握個體功能的獨特性」（Shoda et al., 1994, p. 683）。換言之，每個人會根據不同的情境線索對自己設定不同的目標或評估標準，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每個人根據自己所預期的各種外、內在結果，以及對於自己表現某些必要行為的自我效能感與要求標準，得以考慮各種可能的行為方案，並從中作出反應。一旦行為發生後，個人會透過外在回饋及內在自我評估來衡量自身的行為結果：若表現符合自己設定標準則會增強自我效能感，且可能變得較為鬆懈或再為自己設定更高的標準；若表現不合自己的標準，則可能導致放棄或持續努力以求成功，這端視該目標對個人的價值高低以及達成目標的自我效能感如何而定。

參、情境脈絡下的性格

前述 CAPS 模型說明了：當討論個體的心智內涵時，不該只考慮它跨越不同情境所顯現出的一致性或平均行為型態，還需同時考慮其會評估不同情境的變化，在行為上出現相應的調整。而社會認知論另一新興的「知識－評估性格構造」（knowledge-and-appraisal personality architecture, KAPA; Cervone, 2008; Cervone, Caldwell, & Orom, 2008）理論模型及其研究結果，除了可更清楚地說明人們會根據不同的情境線索對自己設定不同的目標或評估標準，以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外，它還進一步的提供說明為何有些人會將一些看似不相關的情境脈絡，以相雷同的行為模式來反應。所謂「性格構造」是指稱與性格運作相關的心智系統，「知識和評估」則表示要了解心智系統的運作，則須將人的思考區分為「知識」和「評估」二個層面來說明 (Lazarus, 1991)。知識指涉個人目前同時所擁有的各式各樣資訊：包括自身的性格特質、多元目標、他人的性格特質與重視的目標、世界中的物件、情境類型，以及生活周遭對於性格影響的基本知識。評估是指每個人會對於自身與特定情境的關係給予聯結及界定。我們在生活中總是不斷地評估週遭情境情況：它們是好是壞、我們是否有能力應付這些情境等等，這些評價會隨著時間和情境線索的變化不斷地調整。一位自認為富有競爭力的人，其心智系統中往往帶有許多關於競爭性的知識，其內容可能包括：為了要超越他人的各種堅定目標以及將自我視為競爭者的自我基模。每當面對一個情境時，此人很可能是先以競爭相關的知識來歸類情境，這習慣使得此人是以與他人競爭的想法來評估各

種情境的主要意義，因而雖處在不同情境中，但他／她都是以競爭的行為風格作出反應。這將使得此人表現出較高的跨情境一致性行為模式。

此處即以 Cervone (2004) 的相關研究中某位受試者的資料來說明信念、情境及行為三者間的關聯。在此位受試者的自我基模中，她相信自己是個「負責」的人，有趣的是，她對哪些情境與責任感有關的想法卻反映出個人極為獨特的風格，她某些選擇的情境確實與「負責」這個詞彙的傳統定義相符合（如：假如最近花錢太兇，就該把新買的衣服退還回去）。然而，對於「與看來聰明的人交朋友，好得到他們的課堂筆記」這種行為，一般人可能會解釋為負面、有心機的舉動，但此位受試者卻將之評估為「負責」的表現，由此推測，她可能常會做出此種「正面」行為。相對地，上課聽不懂時向教授發問，這原本應該屬於責任感的典型行為，卻被這位受試者判斷為與負責任無關的情境 (Cervone, 2004)，因此她恐怕不太可能做出發問的行為。

前述結果突顯出理解「情境脈絡下性格 (personality in context)」的重要性，意即某些人在某些特定情境脈絡下會被促發出特定的性格特徵，在另外的情境脈絡下則不會凸顯這樣的性格特徵。這關乎個人如何思考情境脈絡是影響其後續行為表現的關鍵要素。在物理學中，情境脈絡因素具有固定的特性：如果我們把不同的物質都加熱到攝氏 50 度並探討是否熔化，此時溫度的情境因素對不同物質的作用效果均相同；如果我們讓一系列物件從同一高處掉落以觀察何者掉得比較快，此時重力的作用對所有的物件是固定、相同的。在此，情境因素可以和情境中的物件區分開來，且情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固定的、不變的、對每個物件的作用都是一樣的。但在心理學中則大不相同，因為人們通常都會經過對情境線索的詮釋後才做出回應，而人們對情境意義的理解與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累積的知識及信念密切關聯。甚至年齡變項——可視為個人對生命僅存歲月多寡的知覺，對心智運作而言都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情境脈絡」。例如 Carstensen (1995) 曾提出社會情緒的選擇性理論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用以探討社會動機在生命不同階段過程中轉變的意義。其認為，人們會察覺到與生命全程中各個不同時間點有關的機會與限制。對年輕人而言，由於來日方長，其往往將心力投注於長期目標，好獲致相關訊息或技能，以便在未來數十年間可持續從中受益而達成個人發展。相對地，若個體已走到生命歷程的末端，則對事物投注長遠的目標就沒有太大意義，而是選擇將精力投注於少數一、兩個具立即正向效果的生活目標才較合理。研究結果誠如預期，老年人似乎將思考焦點集中在人際互動上的情緒特性，而較不在意與人會面是否可以獲得對未來有價值的資訊。相對地，年輕人

較不注重人們的情緒特性，較把焦點集中在認識新人物以獲得訊息的可能性上，而不論這些會面是否帶來正向情緒。有趣的是，後續研究在帶有愛滋病陽性反應的男性身上也發現相類似的結果；他們年紀雖然並不老，但這些男性正面臨生命有限的可能性，因而與老年人的思維十分相似，非常關注社會關係中具立即性的正向情緒回饋 (Carstensen & Fredricksen, 1998)。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許多情境並不具固定的意義，社會情境的關鍵特性即在於其對身在其中之人的意義是因人、因族群而異的。對你來說，在宴會上說笑話可能算是有趣的事；但對他人而言，這也許是項競爭比賽的場合；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或許會是個令人焦慮的社會技巧考驗，這意味著心智運作的機制與情境因素兩者不可二分，是動態交互影響的。個體既有的心智內涵部分決定了某情境對個體的意義為何，同時該情境相關線索也促發了個體心智系統中的部分內涵，經由這些線索與內涵的交互作用，個體的行為得以表現。換言之，個體心智系統的組織差異結合著特定情境線索所組合的「脈絡」會對個體的外顯行為產生作用。此時，脈絡是兼顧「情境」與個體內在心智運作系統交互作用以解釋人類心理與行為意涵的整體架構。「脈絡」比「情境」的範圍更廣，但當今學界使用它的確切定義不一而足，可以大至整體運作牽連複雜的文化、社會系統，也可以是小至僅由兩人互動所組成的特定情境。Cool (2001) 認為「脈絡是意義的架構，而情境只是一個動態環境，在此環境下意義的詮釋過程得以展開、轉換、或鞏固。它至少須包含某一情境要素，然而它通常是總合了多種情境因素（例如同時思考著過去、現在、及未來三種不同時間點的情境）所架構而成 (Sonnenwald, 1999)。脈絡強調的是從整體著眼，並從整體中找出問題的結構與真正意義，而不是單純地將脈絡視為主題的「背景」，然後找尋背景對主題所造成影響的表層答案。

肆、脈絡與知識構成的旨趣

因個人成長環境與經驗的差異，不同文化社會下的心理學者對於同一研究議題，自會有不同的關注面向與焦點，對於該議題所架構出的脈絡意義也就有所差異，而接續建構的研究概念與發展的理論訴求重點，自然有所不同。這恰是近二十多年來，非西方主流心理學家陸續倡導「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用意，藉以深切反省西方主流心理學理論的跨文化適用性。心理學（或涵括到更廣義的社會科學）本土化思維與運動風潮，連帶引出科學哲學探問中有關「知識構成之旨

趣 (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s)」的核心議題。德國當代哲學家 Habermas (1971) 指出，人類在建構知識的本質與過程中，研究者的認知旨趣 (cognitive interests) 取向大致決定了知識的對象、研究材料及事實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選取、信度與真理的判準、知識活動的意義及其評價。Habermas 區分出了人類過去建構知識的三大類旨趣：控制與預測的、溝通與瞭解的、批判與解放的。其中，（一）控制與預測的旨趣對於知識真理的判準，便在於能否對客觀化的世界現象做一適當的因果關係解釋，尋找出變數間的普遍通則，以對結果做有效的預測，因此衍生出所謂實徵分析的 (empirical-analytical) 科學知識；至於（二）溝通與瞭解的旨趣對於知識的判準，則在於能否透過溝通與意義的詮釋使更瞭解自己及現象，並與他人達成共識及默契，以促進人際間的相互瞭解，因此衍生出所謂詮釋與歷史的 (hermeneutic-historical) 科學知識；最後，（三）批判與解放的旨趣對於知識的判準，則在於能否對既存的意識型態及其造成的約束做出批判，使人們能從不必要的制約中解放出來，進而邁向自由、自主與負責的境界，因此衍生出所謂批判的 (critical) 科學知識。

就前述關於脈絡概念的討論，以及對當代心理學本土化運動訴求的說明，當今心理學研究的發展，似乎趨向於詮釋溝通旨趣方面的科學知識演進，而與既有主流心理學強調實徵分析旨趣知識的發展大相逕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就科學知識的發展來說，任何一門科學知識的發展都必須預設一些基本的溝通理解 (communicative understanding)，否則科學知識討論的基本規則無法建立，學術社群也不可能存在，科學典範及其進步也不可能發生。因此，唯有同領域學者們透過彼此的溝通瞭解建立規則，才能在彼此共識的規則下建構其理論與模型，學術社群的科學知識才得以開展。然而，科學討論的基本規則並無法經由對經驗材料的分析來加以證明或否證，而必須經由學術社群成員的溝通理解才得以成立。因此，即便是實徵分析旨趣知識的發展也不能沒有溝通與詮釋的知識作為基底；同樣的，詮釋溝通旨趣知識的發展，也不能僅停留於少數人之間的共識及默契，它仍需要透過實徵分析旨趣所建立的規律性知識，才能加以推廣及拓展。因此這兩種旨趣取向的知識不僅相輔相成，就知識整體的發展而言，兩者更是互補而不可分割的 (Habermas, 1971)。

事實上，從知識整體發展的角度來說，第三類批判解放旨趣的科學知識，也不是孤立的知識體系。在對既有知識進行批判時，它仍需要以經驗材料作為起點，只是它不將既有的事實經驗視為理所當然，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就有經驗材料進行新的詮釋 (高承恕, 1982)。因此，批判科學知識的運作，其探討的對象

及材料必然是經驗的，而批判論點能否成立或被社群成員接受，則必然要以詮釋溝通作為手段，才能達成。換言之，批判科學的知識必須同時是經驗的、詮釋的、批判反省的，三者缺一不可。

伍、總結

自 1960 年代以來，心理學領域中強調內在特質可主宰個體行為呈現出跨情境一致性的特質論屢遭批評，對此批評最深切的是 Mischel (1968)，其在《性格與衡鑑》（*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一書中回顧了過去各種相關研究證據，並得到以下結論：人們的行為在不同情境下時常有所變異——即不一致。他推測此種不一致性反映出人類基本的能力，那就是區辨各種不同情境，並根據不同情況中的回饋來改變自己的行動。除了 Mischel 外，還有其他學者也都注意到僅憑各種內在特質概念常無法有效預測行為 (Bandura, 1999; Pervin, 1994)，並延伸出 1970 至 1980 年代初期，有關「人與情境爭論」（person-situation controversy）的議題，且成為當時心理學專業領域中的主要研究課題。這一爭論議題也直接或間接地刺激社會認知論觀點的發展，並造就當今主流心理學普遍認定人類行為是由其心智系統與所處情境線索特徵兩者交織相互影響而產生的觀點，奠定了個人心智系統如何解讀情境線索所形成的穩定心理模式才是心理學研究的核心議題。

另一方面在 1980 年代本土心理學學術思潮及運動的衝擊下，心理學理論知識本質及其構成條件的議題被提出，並嚴格加以反省檢視，延續至今將情境特徵範圍擴大成為情境脈絡，進而可包含個人整體生活範疇所涵蓋的各種特定情境、身處的特定生命階段，乃至於社會、文化等因素對人的意義與作用。吾人相信當以人類整體知識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脈絡」概念在心理學研究上的意義時，只要歷史、社會、文化的潮流繼續往前推進，則所謂知識建構脈絡的意義也必然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改變。因此，心理學術社群對於任何既有理論知識的理解，應採取持續反省批判的態度，並設法從中提出新的詮釋觀點，然後不斷地將這項新的詮釋觀點與當代學術社群溝通互動，以取得或建立出一個互為主觀的暫時性共識，最後再將這一暫時性共識付之實徵分析，以期建立出新一代的規律或通則知識。至於脈絡在這一知識建構的辯證過程中，它勿寧是提供作為反省批判既有理論知識的一個視框，它既無固定的型式，也無固定的組成成分及內容。這或許是當年心理學從哲學領域獨立出來，並期許它自立成為一門成熟學科的終極目標吧！

參考書目

- 高承恕 (1982)。〈社會科學中國化之可能性及其意義〉，楊國樞、文崇一 (編)，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頁 31-5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26.
- (1999).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54-19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Carstensen, L. L. (1995). Evidence for a life-span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151-156.
- Carstensen, L. L., & Fredrickson, B. L. (1998). Influence of HIV status and age on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others. *Healthy Psychology*, 17, 494-503.
- Cervone, D. (2008). Explanatory models of personality: Social-cognitive theories and
the knowledge-and-appraisal model of personality architecture. In G. J. Boyle, G.
Matthews, & D. H. Saklofske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assessment: Personality theories and models* (pp. 80-100). London: Sage.
- (2004). The architectur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 183-204.
- Cervone, D., Caldwell, T. L., & Orom, H. (2008). Beyond person and situation
effects: Intra-individual personality archite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 In F. Rhodewalt (Ed.), *Fronti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 (pp. 9-4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Cool, C. (2001).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 M. Williams (Ed.),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IST, Vol. 35, pp. 5-42).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 Freud, S. (1949).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 Kammrath, L. K., Mendoza-Denton, R., & Mischel, W. (2005). Incorporating if ... then ... personality signatures in person perception: Beyond the person-situation dichotom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605-618.
- Lazarus, R. 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schel, W. (1999). Personality coherence and dispositions in a 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 (CAPS) approach. In D. Cervone & Y. Shoda (Eds.), *The coherence of personality: Social-cognitive bases of consistency, variability, and organization* (pp. 37-60).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Mischel, W., & Shoda, Y. (2008).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tegrating dispositions and processing dynamics within 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In O. P. John, R.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08-241).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246-268.
- Pervin, L. A. (1994).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urrent trait theory. *Psychological Inquiry*, 5, 103-113.
- Shoda, Y., Mischel, W., & Wright, J. C. (1994). Intraindividual st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patterning of behavior: Incorporating psychological situations into the idiographic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674-687.
- Skinner, B. F. (1974). *About behavior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onnenwald, D. H. (1999). Evolving perspectives of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Contexts, situ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horizons. In T. D. Wilson & D. K. Allen (Eds.), *Exploring the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needs* (pp. 176-190). London: Taylor Graham.

脈絡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認知與情境觀點

The Role of Context in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Cognitive versus Situated Perspectives

陶振超 *

Tao, Chen-Chao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ai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壹、前言

脈絡 (context) 的影響無所不在。實驗室研究 (laboratory research) 與實地研究 (field research) 出現不同的研究結果，常常被用來作為支持上述論點的證據。本文剖析與比較不同研究觀點如何探究脈絡。首先，探討脈絡的定義，並藉以區分認知觀點、以身體為基礎 (embodied) 觀點、情境 (situated) 觀點、及延伸心智 (extended mind) 觀點等四種不同取徑。其次，從內在心理機制的重要性、分析單位、及方法論等三方面，分析認知觀點與情境觀點的差異，並提出「多典範共存，而非典範取代」的主張。接著，介紹如何以新的研究方法（如眼球追蹤），結合適當理論觀點與研究設計檢視脈絡。最後，討論情緒研究最近也引入情境觀點，強調情緒不是對刺激物與環境的一種反應，而是對環境與刺激物所採取的一種行動。

貳、何謂脈絡？

從認知取徑的角度考量，脈絡是指刺激物（如媒介訊息、手持裝置、電視遊樂器等）與資訊處理者（information processor）或認知者（cognizer；即「人」）

* Email: taoc@mail.nctu.edu.tw

所處的環境。傳統上認知觀點將刺激物與心智之間的互動，視為符號處理的過程（symbolic processing），將環境排除在外。然而，這樣的觀點一旦放到複雜的真實世界、面對難以計數的資訊，並且隨著時間動態變化，尤其是人們的日常活動，其解釋與預測常常遭到質疑 (Norman, 1993)。即使單純如一個名詞，都會受到脈絡左右 (Yeh & Barsalou, 2006)。因此，當「置入情境中」（situated）由人機互動學者 (Suchman, 1987; Winograd & Flores, 1986)、教育心理學者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等提出後，脈絡這個概念迅速就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以下統稱為「情境觀點」）。

脈絡至少可分為實體（physical）、社會與文化等三個部分。實體方面，指環境中物件之間的關係 (Oliva & Torralba, 2007)。例如造訪一個電子商務網站，使用者會預期應該有商品分類、搜尋及購物車等功能（語意關係）；商品分類一般在左邊、搜尋在上方、購物車在右上方（空間關係）；而網頁左上方、提醒使用者位於網站中何處的麵包屑（breadcrumbs），通常左邊是較上層、較大的分類，右邊是較下層、較小的分類（位置關係）。社會方面，包含人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s）、隸屬團體（group memberships）、溝通語境（communicative context）等 (Smith & Conrey, 2009; Smith & Semin, 2007)。譬如在一個社交媒體（social media）與其他使用者互動，彼此間的親近度（closeness）不同（人際關係），分別屬於不同就學與就業階段認識的朋友（隸屬團體），留言因預期會被所描述的對象閱讀而出現語言偏差（linguistic bias；溝通語境，見 Semin, de Montes, & Valencia, 2003）。文化方面，區分各項活動之目標與程序所隱含的獨立性（independence）或相依性（interdependence；Kitayama & Imada, 2010; Markus & Kitayama, 1991）。前者鼓勵自我表現、促進個人成就，形塑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後者強調群我關係、促進團體和諧，形塑集體主義（collectivism；Oyserman, Sorensen, Reber, & Chen, 2009）。例如使用者在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可以從事的活動中，發文與回文主動張貼意見，獨立性較高；推文與噓文附和他人意見，相依性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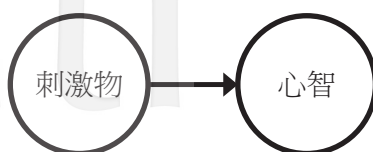
情境觀點促成「以身體為基礎」（embodied）概念的興起，並進一步發展為「延伸心智」假設（extended mind hypothesis）。以身體為基礎，指心智（mind）非獨立運作，而是受到大腦（brain）與身體（body）的影響；另外，心智不僅在大腦中運作，也可以在身體中運作 (Clark, 1997)。延伸心智假設則認為心智除了在大腦與身體中運作，也可以在環境中進行，造成「認知擴增」（cognitive augmentation；Clark & Chalmers, 1998; Wilson & Clark, 2009）。Hutchins (1995)

提出的分散認知 (distributed cognition) 亦有類似主張。舉例來說，人們玩體感遊戲時，在虛擬世界的表現常常受到身體的限制，心智無法改變；但是身體似乎也具備資訊處理的功能，知道特定的姿勢、動作，會產生最佳的結果，分擔心智工作（以身體為基礎）。更重要的，體感遊戲依賴控制器，將人們的姿勢、動作轉換進虛擬世界中（透過「科技資源」進行的延伸心智）。同時，體感遊戲還可以邀請在各地的朋友一起上線參與，扮演不同角色、共同達成任務（透過「社會文化資源」進行的延伸心智）。認知觀點、以身體為基礎觀點、情境觀點與延伸心智觀點之間的比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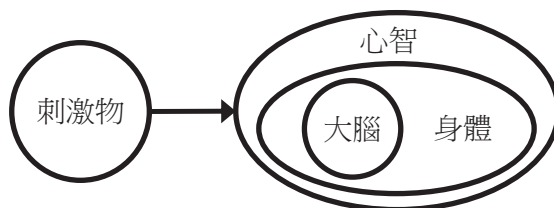
參、脈絡引發典範改變？

脈絡受到重視，至少產生三項議題。首先，內在心理機制的重要性。認知觀點認為，內在心理機制是研究焦點，是解釋與預測現象的根源，環境的影響有限；情境觀點認為，環境與人之間的互動是研究焦點，是解釋與預測現象的根源，內在心理機制的影響有限。這樣的差異，導致兩項觀點對「行動」(action) 在理論架構中所處的位置有不同看法。對認知觀點來說，內在心理機制及其內容決定了人類的行動 (Eysenck, 2007)；對情境觀點來說，環境決定了人類的行動，因為人類的行動需要適應環境，而內在心理機制及其內容則是用來達成上述目的 (Barrett, Mesquita, & Smith, 2010)。因此，行動有時不在認知觀點的考慮範圍內，但在情境觀點中則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變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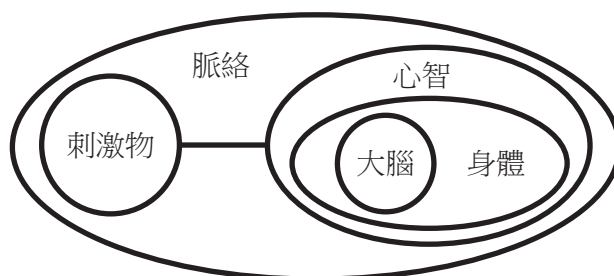
其次，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 為何。認知觀點著重符號處理的過程，個人是分析單位 (Lachman, Lachman, & Butterfield, 1979)；情境觀點著重行動進行的過程，活動 (activity) 是分析單位 (Nardi, 1996)。對認知觀點來說，最感興趣的現象是被操弄的刺激物如何被符號化為心理表徵 (mental representations)，並經一連串的資訊處理作業，使得結果變項 (outcome variables) 發生。而這些現象皆發生在人類的心智、大腦，所以個人是分析單位。對情境觀點來說，最感興趣的現象是人們的目標如何透過工具使用來實現，並促成一連串的行動，導致結果變項發生。而這些現象涉及個人、目標、工具與環境等之間的互動，所以活動是分析單位。認知觀點的分析單位針對人的內在結構，有越來越小的趨向；情境觀點的分析單位針對人的外在結構，有越來越大的趨向 (Matusov, 2007)。這樣的差異，導致兩項觀點對「工具」（如科技）在理論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看法。認知觀點認為工具是前因，其設計影響了內在心理機制的運作（陶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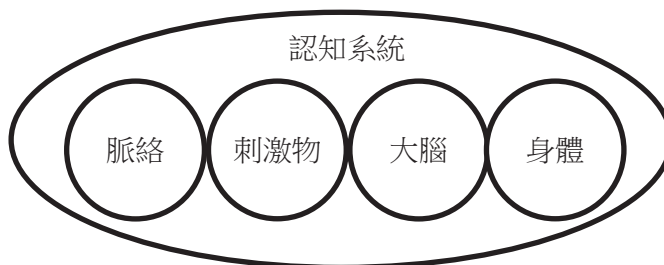
(1) 認知觀點



(2) 以身體為基礎 (embodied) 觀點



(3) 情境 (situated) 觀點



(4) 延伸心智 (extended mind) 觀點

圖 1：與脈絡相關之理論觀點的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011a)；情境觀點認為工具是中介（mediation），人們藉由操作工具以達成目標（Kuutti, 1996）。因此，人們的目標不一定出現在認知觀點的研究中，但在情境觀點中則是必要的研究變項。

最後，方法論（methodology）的差異。認知觀點多採在控制環境下進行的實驗法，情境觀點傾向在真實環境下進行的民族誌研究法（ethnomethodology）。認知觀點主張脈絡亦可被符號化，進入資訊處理作業（Vera & Simon, 1993）；或認為脈絡具備調節功能（moderation），不同脈絡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會改變。所以將所有因素視為變項，並建立因果關係的實驗法，適用於認知觀點。情境觀點主張脈絡無法被符號化，認為知覺與行動的協同運作（coordination）以適應環境才是重點（Clancey, 1993）。所以關注程序（procedures）的民族誌研究法，適用於情境觀點。這樣的差異，導致兩項觀點對研究問題的選擇與研究結果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認知觀點分析意義提取（retrieving），情境觀點探討意義形成（conceiving）。雖然都可以處理歷時性問題，但認知觀點以較短時間為主，情境觀點以較長時間為主（Nardi, 1996）。認知觀點強調通則性（generalizability），情境觀點多為個案研究（Olson & Olson, 2003）。甚至引發互相批評，認知觀點認為情境觀點隱含行為主義的主張（Carroll, 1997; Keijzer, 2005），情境觀點則批評認知觀點在一個簡化、虛構的環境中進行（Carroll, 1991）。

雖然有這些差異，學者一般仍認為脈絡所造成的爭議，導致多典範共存，而非典範取代。以人機互動為例，Rogers (2004) 從實務的角度考量，認為多典範實際上豐富了設計語言。Harrison, Tatar, & Sengers (2007) 亦指出不同典範，考慮不同的研究問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要求不同的研究證據、適用至不同的層次與範圍。簡言之，以不同理論觀點探究脈絡，無論研究或實務皆獲益。

肆、眼球追蹤：探討脈絡的不同研究方法

脈絡中實體部分（即環境中物件之間的關係）的影響，常常以眼球追蹤（eye tracking）進行實證檢驗。舉例來說，脈絡線索（contextual cueing）模式主張經由重複暴露，人們會以內隱的方式學習、記憶環境中物件之間的關係，如語意關係、空間關係及位置關係等，並引導視覺注意力（Chun, 2000）。實證研究發現，人們無須凝視脈絡中實體部分，就能偵測環境中物件之間的關係（Chun & Jian, 1998）；若搜尋的目標物與脈絡具備語意關係，人們可以較快看到，並且首次凝視時間（first fixation duration）較短（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9）。脈絡引導

(contextual guidance) 模式則認為除了脈絡這項整體 (global) 因素外，還需要考慮局部 (local) 因素，如刺激物特徵及人的目標、意向等，三項共同決定了眼球移動；另外，這些因素的整合發生在前注意歷程，能影響首次跳視 (saccade) 與凝視 (Torralba, Oliva, Castelhana, & Henderson, 2006)。他們讓實驗參與者執行三個搜尋任務，並同時追蹤實驗參與者的眼球移動，發現脈絡引導模式比單純考慮整體或局部因素能更準確預測跳視與凝視。

眼球追蹤也常被用來探討文化差異 (cultural differences) 與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文化差異是人們從小涉入各項被視為恰當的活動中，所逐漸內化的心理傾向 (Kitayama & Imada, 2010)。所謂「恰當」，東西方文化看法不同：東方文化強調相依性，西方文化著重獨立性 (Markus & Kitayama, 1991)。這樣的差異造成東方人較易受脈絡影響，知覺過程傾向全觀 (holistic)；西方人較不受脈絡影響，知覺過程傾向分析 (analytic；Nisbett & Miyamoto, 2005)。實證研究支持上述主張。Chua, Boland, & Nisbett (2005) 讓實驗參與者觀看 36 張由各式各樣物件（如動物與交通工具等）與不同背景所組成的照片，同時記錄眼球移動，之後並進行物件的再認 (recognition) 記憶測驗。實驗結果顯示，西方人比東方人較早凝視位於照片中央的物件，凝視時間也較長；若更改物件的背景（即剛剛看過的物件、但換全新的背景），東方人正確再認的比例較低。Masuda et al. (2008) 採用卡通圖形，中央有一個人、背景有數個人。所有人面部表情 (facial expression) 皆清晰：背景數人的面部表情都相同，與站在中央者的面部表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實驗參與者被要求判斷站在中央者的面部表情。實驗結果發現，背景數人的面部表情會影響東方人的判斷，但不會影響西方人的判斷；東方人凝視背景數人的時間也較西方人長。

伍、除了認知，情緒是否也受脈絡影響？

情境觀點也影響情緒研究，主張情緒不是個人特徵，而是存在於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之中。認知觀點與情境觀點對情緒研究至少有三點差異。首先，是情緒的定義。認知觀點認為，刺激物（如媒介訊息、脈絡、他人面部表情或肢體動作等），會引發情緒，並反應在生理、行為、及自我報告的經驗等方面 (Mauss, Levenson, McCarter, Wilhelm, & Gross, 2005)；情緒存在於個人層次，是內在狀態與心理機制。情境觀點完全不同，認為情緒是人與環境、他人形塑關係時，所採取的行為；這些行為多帶有目的，傳遞特定的社交信號；情緒存在於行動層次，

是外在過程 (Griffiths & Scarantino, 2009; Mesquita, 2010)。其次，是情緒的顯著性。認知觀點認為刺激物的內容特徵，決定了情緒的顯著性，是靜態的；然而情境觀點認為，情緒的顯著性是經由互動逐漸形成，是動態的 (Griffiths & Scarantino, 2009; Mesquita, 2010)。最後，是情緒的社會性。情緒是一個評估 (appraisal) 過程，認知與情境兩部分皆包含在內：認知過程發生的最早，一系列訊號傳遞發生在大腦與身體、及大腦各部位之間，致使情緒狀態 (emotional state) 發生；接著，脈絡介入，特別是社會規範 (social norm)，人們會表達適當的情緒 (陶振超, 2011b)。實證研究也發現，女性與男性暴露在情緒性內容時，眼球移動與心理生理訊號等反應皆一致，但自我報告的心情，特別是價向 (valence)，差異卻很大 (Tao, 2010)。女性與男性因脈絡對環境與他人採取不同的行為，是可能的原因。

比較電腦中介傳播能否如同面對面溝通一般傳遞情緒，最能彰顯情境觀點的特色。Derks, Fischer, & Bos (2008) 回顧 1990 年以來的情緒與電腦中介傳播相關研究，從「分享情緒」、「表達情緒」、「辨別情緒」等三項行為檢視電腦中介傳播與面對面溝通的異同。結果發現，無論電腦中介傳播或面對面溝通，皆有潛在的主題與目標存在，符合情境觀點的主張。而電腦中介傳播的低社會臨場感 (social presence) 與低能見度 (visibility)，使得人們認為原本一些會導致負面社會評價的情緒行為，在電腦中介傳播發生的可能性降低，可以無顧慮呈現。因此，電腦中介傳播比面對面溝通更易於分享、表達及辨別情緒。

陸、結論

傳播學者、甚至一般大眾皆知，人們接觸相同媒介訊息後，不一定會有相同反應、產生相同效果。認知觀點的解釋，是人們有個別差異存在，如性別、社經地位、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等，使得自變項 (如媒介訊息) 與依變項 (如媒體效果) 之間的關係不同。然而，情境觀點則認為，人們依據各自的目標、感知到的脈絡與刺激物，採取對應行動；接著再感知到環境的變化，採取對應行動，如此不斷循環。換句話說，認知觀點追求通則性，內在心理機制不因人而異，但因個別差異扮演調節變項 (moderators) 的角色，才造成「相同媒介訊息導致不同效果」的現象發生。情境觀點尋找差異性，視「相同媒介訊息導致不同效果」的現象為常態，並從一連串的行動中分析解釋。簡言之，情境觀點揭開過去較少碰觸的研究議題，豐富了研究典範。

參考書目

- 陶振超 (2011a)。〈媒介訊息如何獲得注意力：突出或相關？認知取徑媒體研究之觀點〉，《新聞學研究》，107：245-290。
- (2011b 年 7 月)。〈情緒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扮演的角色：認知取徑媒體研究之觀點〉，「2011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新竹。
- Barrett, L. F., Mesquita, B., & Smith, E. R. (2010). The context principle. In B. Mesquita, L. F. Barrett, & E. R. Smith (Eds.), *The mind in context* (pp. 1-22).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Brown, J. S., Collins, A., & Duguid, P. (1989).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 32-42.
- Carroll, J. M. (1997).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of desig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 61-83.
- (Ed.). (1991). *Designing interaction: Psychology at the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ua, H. F., Boland, J. E., & Nisbett, R. E. (2005). Cultural variation in eye movements during scene percep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 12629-12633.
- Chun, M. M. (2000). Contextual cueing of visual atten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 170-178.
- Chun, M. M., & Jian, Y. H. (1998). Contextual cueing: Implicit learning and memory of visual context guides spatial atten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36, 28-71.
- Clancey, W. J. (1993). Situated action: A neur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response to Vera and Simon. *Cognitive Science*, 17, 87-116.
- Clark, A. (1997).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lark, A., & Chalmers, D. J. (1998).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58, 7-19.
- Derks, D., Fischer, A. H., & Bos, A. E. R. (2008). The role of emo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 766-785.
- Eysenck, M. W. (2007). *Fundamentals of cogni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Griffiths, P. E., & Scarantino, A. (2009). Emotions in the wild: The situated perspective on emotion. In P. Robbins & M. Aydede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ituated cognition* (pp. 437-45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S., Tatar, D., & Sengers, P. (2007, April-May). *The three paradigms of HC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San Jose, CA.
- Henderson, J. M., & Hollingworth, A. (1999). High-level scene percep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0, 243-271.
- Hutchins, E. (1995).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Keijzer, F. (2005). Theoretical behaviorism meets embodied cognition: Two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behavior.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8, 123-143.
- Kitayama, S., & Imada, T. (2010). Implicit 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A cultural task analysis. In B. Mesquita, L. F. Barrett, & E. R. Smith (Eds.), *The mind in context* (pp. 174-200).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Kuutti, K. (1996). Activity theory as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research. In B. A. Nardi (Ed.), *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p. 17-4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achman, R., Lachman, J. L., & Butterfield, E. C. (1979).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 introduc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asuda, T., Ellsworth, P. C., Mesquita, B., Leu, J., Tanida, S., & Van de Veerdonk, E. (2008). Placing the face in 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facial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365-381.
- Matusov, E. (2007). In search of 'the appropriate' unit of analysis for sociocultural research. *Culture & Psychology*, 13, 307-333.
- Mauss, I. B., Levenson, R. W., McCarter, L., Wilhelm, F. H., & Gross, J. J. (2005). The tie that binds? Coherence among emotion experience,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Emotion*, 5, 175-190.
- Mesquita, B. (2010). Emoting: A contextualized process. In B. Mesquita, L. F. Barrett, & E. R. Smith (Eds.), *The mind in context* (pp. 83-104).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Nardi, B. A. (1996). Studying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activity theory, situated action models,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B. A. Nardi (Ed.), *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p. 69-101).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Nisbett, R. E., & Miyamoto, Y. (2005).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9, 467-473.
- Norman, D. A. (1993). Cognition in the head and in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ituated action. *Cognitive Science*, 17, 1-6.
- Oliva, A., & Torralba, A. (2007). The role of context in object re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 520-527.
- Olson, G. M., & Olson, J. S. (2003).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human use of comput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491-516.
- Oyserman, D., Sorensen, N., Reber, R., & Chen, S. X. (2009). Connecting and separating mind-sets: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217-235.
- Rogers, Y. (2004).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es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8, 87-143.
- Semin, G. R., de Montes, L. G., & Valencia, J. F. (2003). 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142-148.
- Smith, E. R., & Conrey, F. R. (2009).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gnition. In P. Robbins & M. Aydede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ituated cognition* (pp. 454-46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E. R., & Semin, G. R. (2007). Situated social cogni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132-135.
- Suchman, L. A. (1987).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s: The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o, C.-C. (2010, June). *Processing emotional stimuli: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for eye movements and att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ingapore.

- Torralba, A., Oliva, A., Castelhana, M. S., & Henderson, J. M. (2006). Contextual guidance of eye movements and attention in real-world scenes: The role of global features in object search. *Psychological Review*, 113, 766-786.
- Vera, A. H., & Simon, H. A. (1993). Situated action: A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Cognitive Science*, 17, 7-48.
- Wilson, R. A., & Clark, A. (2009). How to situate cognition: Letting nature take its course. In P. Robbins & M. Aydede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ituated cognition* (pp. 55-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ograd, T., & Flores, F. (1986). *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 Norwood, NJ: Ablex.
- Yeh, W.-C., & Barsalou, L. W. (2006). The situated nature of concep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9, 349-384.

社會學實證研究中的脈絡效應

Social Context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張荳雲*

Chang, Ly-Yun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壹、前言

人類行為深受到身在其中之外在環境的調節，乃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論點。個人生活的外在環境，可以大至國家社會，因此跨國／社會研究成為理所當然；個人生活的外在環境，亦可以聚焦在小團體、家庭、學校、工作場所、鄰里、志願組織、產業等等；當然，它且含有其不可忽略的時間面向。對社會學者而言，「外在環境」是個總稱性的概念。社會學理論文獻中關注的「外在環境」，大致包括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al）、文化（cultural）和工具（instrumental）等三類社會脈絡，各有不同的運作邏輯，導引出不同的研究假設，預測人們的行為走向。過去三十多年來，廣泛地引發許多實證研究，研究的焦點是放在這些社會脈絡如何影響個人的思維行為、生活方式、福祉、和身心理健康等。由於這些社會脈絡的核心論點、歷史發展、重要的研究假設以及中心人物，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日，透過網路搜尋，應該可以掌握其間的梗概，不需於此贅述。因此我把本篇文章的重點放在以實例說明理論觀點和實證證據之間的現況和落差，透過我個人近年來有關社會資本、健康不平等、幸福感和醫療照顧的研究，分享個人研究上的經驗和領悟。

* Email: sociochang@gmail.com

貳、社會結構、文化脈絡和工具脈絡

社會結構指涉的有如鉅觀層次的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或是中層理論層次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無論是在那一個層次，個人在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上的位置，影響一生在教育、職場、健康等等的各種生活面向的機遇。以我過去五年專注的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來說，從 50 年代開始，社會學的文獻就已記錄了社會經濟地位高（所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高的人，身心健康都比較好。實證研究上發現女性比男性自評健康差，但活得比較長；對健康而言，教育和所得，孰輕孰重？長期趨勢來看，教育對健康的影響，是越來越重要嗎？這些研究課題，本質上是描述性，是理論建構的第一步。其間的因果關係，例如，健康影響個人在學業和職場上的成就，還是學業和職場上的成就使得人們更健康，很自然地引起學者們的注意。當然，要確立因果方向的辯論涉及了是否有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以及有關因果關係的運作機制之理論推演。重要地是，社會階層為什麼以及透過什麼機制影響個人健康？是有益於健康的資源、資訊隨著社會階層而分布，居高階層者，享有較多資源和資訊，以致比較健康？是因為社會壓力是隨著社會階層而分布，因而居低階者，社會壓力大，以致比較不健康？其間運作機制所導出的相關假設，目標就是論證社會脈絡如何可能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與福祉。

有關幸福感與收入之間關係的研究，則是另一個社會結構脈絡的例子。直到如今，收入和幸福感之間都成正相關，當然幸福感亦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而有別，但收入愈高，自評幸福感愈強，在各國和不同時期的研究都有類似的發現。然而，70 年代以降跨國的比較結果，卻讓大家大吃一驚：平均所得愈高的國家，其民眾的自評幸福感卻不是愈強。個人層次幸福感對個人所得的反應，並無法跨越至不同的經濟體。三十年來各路人馬對於這個重大的發現，或者較正確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疑惑，是文獻中有名的 Easterlin Paradox (Easterlin, 1974)，仍持續探索。學者們提出如國家政治體制（民主與否）、社經狀況（如社會不平等）、經濟發展（已開發、新興國家或低度開發等）、鄰里效應（富人社區和窮人社區）等脈絡層次的因素，試圖解釋觀察到的跨國趨勢和時間趨勢。以社經狀況為例，其論點是，同時考慮個人層次的特徵時，社會不均的程度愈高，生活於其間的民眾，幸福感會愈低，貧富差異愈小的社會，民眾幸福感愈高。然而，這個言之成理的論點，在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的努力下，尚未得到足以服眾的定論，其他針對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或鄰里社區的研究亦然。橫在前面的挑戰

是，無論是那一種社會、政治或經濟脈絡，到底是那些機制，將脈絡的效應紮實地連結到個人的行為，影響了個人層次的幸福感。其間機制的探索，正是藉著幸福感與所得之間關係的研究，得以建構「社會影響個人」社會學理論的必要手段。

再論到個人在由人與人往來關係的強度、方向和內容所構成的人際網絡，有些網絡內互連的密度很高，有些則稀稀疏疏。有的像蜘蛛網，有的則像一串粽子。網內，有人居於邊陲，有人居於中心。居於網絡中心位置的人，是資訊的交換中樞所在。社會網絡和求職的相關文獻一步指出，不一定在最高的位置，可以發揮槓桿效果，而是居位關鍵位置的人，因著暢通豐富的訊息和影響力，更能成為他人的幫助。個人在網絡中的位置，是發展的契機，也是限制。我個人早期的研究在組織間所形成的組織網絡，探討個別組織於身在其中的網絡中的位置，如何影響彼此間合作的可能性。

文獻中對於社會網絡衍生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孩子們的學習，是教育社會學界從上個世紀延伸至今的辯論。辯論的起源是，大眾皆瞭解家庭背景影響孩子的學習成就，就這點而言，並無新意。研究者所面對的挑戰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家庭背景對孩子的學習成就產生影響。社會學者 Coleman 和他的同事指出，美國天主教學校的學生之所以比公立學校的學生成績好，是因為天主教學校的社會資本高 (Coleman & Hoffer, 1987)。他所謂的社會資本，是蘊含在學生家長之間往來互動所構成的人際關係網。也就是學生的爸爸媽媽彼此認識，且有來往。來往形成的關係網愈緊密，孩子們因為父母間訊息的交流而受益。Carbonaro 在 1998 刊登在 *Sociology of Education* 的論文以精緻的分析支持這個論點。然而，就在同一時間，Morgan & Sprensen (1999) 刊登於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的論文，批駁並推翻前述的說法。關鍵點有二：其一在於由社會網絡所產生的社會資本，是個人層次的條件（實證研究的語言是變項），還是學校層次的條件？Carbonaro 後來在 1999 年論辯中承認，當將社會資本操作為個人層次的變項時，的確會得到有助於學習的結果，然而由父母往來所形成學校層次的社會資本，並不能如 Coleman 所指，對孩子們的學習產生助益，反而有礙於學習。其二，與其間的機制有關。Coleman 的說法是，學校含有豐富的社會資本，也就是說，學生的父母們交流頻繁下，父母的理念可以有效地傳遞給子女，大家一起唸書上進，因而成績表現比較好。實證上應該可以觀察到社會資本高的學校，學生成績較好；而 Morgan 他們則認為，所謂社會資本高的學校，其實是網絡較封閉的學校，封閉的環境中不利於學習，導致學生成績不好，因而實證上應觀察到社會資本高的學生成績較差。Morgan 他們的論點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這個辯論給我們

的啟示是，「由父母之間往來的頻率和方式所形成的網絡，對孩子們的學習有什麼影響」與「父母和孩子朋友的父母交往的頻率和方式，對孩子的學習有什麼影響」誠然是不同的研究問題。前者是脈絡的效應，後者則帶有多變的個人異質性（individual heterogeneity）。後者雖然可能依性別、年齡、家庭社經或是城鄉有別，但其背後的機制，仍有待驗證。

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的美國的兩個重要社會學刊物分別刊出對後來三十多年研究取向產生影響的論文。其一是 Hannan & Freeman (1977) 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出版的論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何以有這麼多形式的組織（organizational forms）？」受到早年人口區位學洞見的啟發，這篇論文的兩位作者針對何以組織成立、存活的頻率會隨著時間、地區或產業而出現先升後降的走向，提出的說法，是為組織人口區位學的研究軸線。兩位作者引用近百年的鉅觀資料，陳列了組織家數的變化走向，先是組織的家數緩緩增加（也就是密度緩升），組織家數開始加速增加，到了某一點後，出現轉折，然後組織家數開始下降，且加速下滑。他們對產業密度和組織新設率之間是一個先正向後負向的非線性關係，這是組織生態學「密度相干假設」（density dependence hypothesis）的基本論點。他們指出適法性（legitimacy）和淘汰與競爭（selection and competition）是組織家數長期走勢的根本機制。新組織形式出現之所以陣亡率高，與尚未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接受，逐漸認可的歷程中，提高了該組織形式的存活率，也吸引更多類似組織形式的成立，因此組織家數會增加且加速增加。及至某個程度，高密度導致競爭加遽，淘汰導致陣亡率增加，組織家數開始下滑。於底層調節這些組織形式成立和存活機會的力量，來自於它們身處環境中的人口動態（population dynamics），此處之人口指的是組織所構成的場域。人口動態是社會結構的一環。

與前述組織人口區位學關切的問題相關，但有不同的切入角度的另一篇論文，在同一時間，也導出了社會學在文化脈絡研究的蓬勃發展。1977 年兩位社會學者 Meyer & Rowan 針對長期懸而未解的現象，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提出理論上的答案。他們觀察到有些組織形式少見到競爭淘汰，更少見到關閉。以學校為例，許多學校表現並不好，且在學校活動和經費分配上，不盡然與學生學習有關，但是，很少聽到學校如同商場公司行號一般，會倒閉關門。他們提出更有趣的觀察是，為什麼學校都長得很像？（同樣的問題也可問其他類型的組織，如醫院為什麼長得那麼像？）他們點出關鍵之處在於各個學校的組織形式和活動內涵已經取得社會的認可，足以獲得必要的資源預算，因此

儘管各類教學活動有如儀式般地進行，宣示味道十足，很多時候並未帶出實質教學效果，縱或學校表現不佳，因著社會的認可，仍然繼續拿到政府預算，繼續運作。組織間是有競爭，必需競逐資源，然而，不同於組織人口區位學的觀點，他們認為組織更根本的求生之道，乃是透過模仿、規範以及強制，接受、學習並表現出制度環境的要求，以取得存活的正當性。個人或組織行動者透過認知過程，解讀身處環境所釋出的理念、信仰、價值和知識，為要得到社會認可「正當性」的壓力，表現出「有為者亦若是」或「循規蹈矩」，以致帶出制度同型（isomorphism）的效果（DiMaggio & Powell, 1983）。愈被蘊含在制度環境中的「文化」接受的組織類型，成功存活的機會愈高，也會刺激此類型組織出現更多的出現。這些長像類似的組織，其特點即是與它們身在其中的外在制度環境，有著密合的關係。除了人口動態外，制度環境是更關鍵的社會脈絡，影響組織的存活機會。

我個人對臺灣醫療產業發展歷程的研究，即採取同樣的切入點。我的研究觀察到醫院的運作模式和營運績效，受到身處的社會文化慣行脈絡中，三種不同的力道，交錯影響著：其一是成功典範的模仿和學習，例如長庚的醫管模式學習模仿；其二，影響具監督和規範性的規約訂定並能「及時」順從。政府醫療政策和保險制度構成了制度環境的主體，它「利誘」的設計刺激各醫療組織競相歸順於制度環境的要求，對醫療產業產生了立即明顯的影響；其三，是在社會結構脈絡下的醫療產業即有階層結構，前述的制度性力量於即有的產業階層上，為各組織物種形構且強化了特定的機會結構，從而反映在產業生態環境的變化上。

其實針對文化脈絡所進行的研究，其精采和豐富遠超過組織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成果，例如 1992 年對於法、美中上階級的金錢、倫理和儀態的研究、1994 年 Heinz 和 Laumann 對芝加哥律師樓的研究、2003 年及 2010 年 Fryer 和 Torelli 對於「學白人」（acting white）等等，不能於本文盡述。接納，歸順、身份認同及其他文化動態中，正當性的取得是這個脈絡研究的核心概念。

最後，有關工具脈絡，做決定、選擇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許多決定和選擇，是在「想都不想」的情況下，無聲地進行；有些則會收集資訊、反覆思量、與人磋商後，再下決心；有些決定下得篤定，有些則下得膽戰心驚。Simon 提出決策過程中人們之所以無法全然「理性」，因為人們在做決定時，受限於自身掌握資訊的能力、認知能力、以及時間限制，因而人的行為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人們決策過程背後的脈絡結構，左右著人們決定和選擇，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無論是理性選擇、game theory、交易成本理論等，處理囚犯困境或是 principal-agent 的難題等，這條軸線的研究，社會脈絡的本質是工具性的，

可以簡略地標示為工具脈絡，主力是經濟學者和心理學者。政治學者廣泛應用在選舉行為、政黨合縱連橫等主題的研究上。

臺灣醫療界常將病人的求醫視為不理性的逛醫師，如同逛大街、貨比三家的購物心態，多以負面責之。本人 1998 的研究詳細記錄病人在各醫院診所的處理方式、病情是否緩解等的求醫歷程，發現病人從基層醫療的診所開始，可能最後落腳在大醫院，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錯誤、和選擇，轉折的求醫歷程中，反映的是企求問題之得以紓解。我觀察到的是醫療人員和醫院診所共同架構的醫療照顧的慣行，深深地影響到民眾的求醫行為。民眾在有限資訊的限制下，呈現出的求醫行為，就其個人而言，是理性的，我將之稱為釋惑的求醫邏輯。同樣思路的研究發現亦出現在「一人生病、全家住院」的研究上。生病住院，沒有家人在旁照顧是不行的。住院時的家人照顧，一般將之看為華人家庭主義的延伸，是不放心陌生人而產生的因應行為，有文化的元素。然而，2001 年本人分析了 70 位住院病人、家人照顧的時間點和安排細節，以及付費看護的雇用等等細緻的資料，駁斥了文化和性別的假設。住院病人和他們的家人表現出來的住院照顧的形態，反映的是在自保的原則，以及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和家人的工作形態的條件下，針對醫院醫療照顧的務實反映。個人行為表現，受制於他在決策過程中資訊、能力和時間所架構起的脈絡。就住院照顧而言，我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醫療照顧的提供者主導了決策的脈絡。

參、小結

近年有關社會脈絡效應，因著統計分析方法的發展以及多層次資料的收集，愈來愈多實證研究得以直接估計驗證脈絡效應，有助於釐清若干理論上的挑戰和研究分析方法的精進。這篇短文中所引用的實例，用以說明何謂「社會脈絡」以及三類我所熟習的脈絡結構。舉例的目的為的是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網搜尋出處，於本文中就不一一註明。在舉例說明的過程中，必然受限於作者收集資訊的能力、時間、和個人認知能力，也受限於個人研究偏好，呈現出來的不是社會學研究中社會脈絡的全貌，用以分享和就教於學界同仁。

參考書目

- Carbonaro, W. J. (1999). Opening the debate on closure and schooling outcomes: Comment on Morgan and Sørens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682-686.
- (1998).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295-313.
- Coleman, J. S., & Hoffer T. (1987). *Public and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In P. A. David & M.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ur of Moses Abramovitz* (pp.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nnan, M. T., & Freeman, J.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929-964.
-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363.
- Morgan, S. L., & Sørensen, A. B. (1999). Parental networks, social closur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 test of Coleman's social capital explanation of school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661-681.

從達悟族的文化脈絡看惡靈信仰的傳播^{*}

Communicating Evil Spirits: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Tao's Belief System

郭良文^{**}

Kuo, Liangwen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傳播研究與實踐》本期專題論壇以「脈絡與傳播研究」為內容，雖然傳播研究幾乎脫離不了對脈絡（context）的掌握與探討，但由於這個議題並不常被討論，相關的文獻論述少。本文對脈絡與傳播研究的探討，因而屬於一種初探性的嘗試。為了說明並彰顯脈絡與傳播研究之間的關聯，本文以案例研究作為輔助，分析達悟族（或稱雅美族）的文化脈絡、惡靈信仰以及傳播模式。為什麼惡靈信仰在達悟社會中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蘭嶼的惡靈信仰是如何傳播的呢？為什麼傳統信仰所形成的認知體系至今仍牢不可破呢？為了了解蘭嶼獨特的信仰與文化，本文從較為宏觀層面的文化脈絡（達悟文化脈絡下的歷史與社會型態）、較為微觀層面的語藝脈絡（語言與論述所形構的語藝脈絡）來思考，並從信仰的結構面（傳說與禁忌充斥的信仰結構）與信仰的建構面（惡靈信仰的建構與傳播）來著手進行分析。

壹、傳播研究與脈絡

「脈絡」在新聞或傳播研究與實踐的領域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美國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在 1940 年代末即已提出研究傳播行為的 5W 模式，

* 本文有關蘭嶼惡靈信仰之部分內容，曾於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1 年 5 月所舉辦的「臺灣海洋文化研討會」中發表。有關蘭嶼宗教傳播研究之進行，最早起源於 2008 年輔仁大學「思恒獎」之贊助。後又獲得國科會「蘭嶼文物與生態影像數位典藏計畫」（NSC 99-2631-H-009 -003）與交通大學人社中心之經費補助。

** Email: lwkuo@mail.nctu.edu.tw

主要探討「誰」(Who)、「說什麼」(Says What)、「透過什麼通道」(In Which Channel)、向誰(To Whom)、與「產生什麼樣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在新聞的研究或報導當中，對於人、事、時、地、物的掌握是最基本的要求，新聞學研究也相當重視新聞事情發生當時的人物、情境與結果。約在同一時期，加拿大學者殷尼斯(Harold A. Innis)與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也從社會文化與技術變遷的觀點審視口語文化(oral culture)轉變到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之發展，在在強調歷史脈絡對傳播發展的影響。以上這些研究都要求重視脈絡、檢視脈絡，並從脈絡中去了解現象、解釋事件、進而掌握所觀察的傳播議題。

一、結構與建構的雙元性

傳播史研究重視脈絡，質化研究角度的傳播研究也是如此。意義的解釋必須考慮脈絡的背景，這是所有民族誌學、現象學、論述分析與敘事分析等取向所強調的重點。脈絡同時是一種結構性(structural)與建構性(constructive)的，一方面是一種內容框架與既存架構，另一方面脈絡更是一種關係性與動態化的過程。Fetzer (2010) 提到脈絡與傳播研究的關係時提出這樣的解釋：

脈絡先被認為是設定內容的框架(frame)，常用於認知、心理學、心理語言學、以及自然語言的傳播研究中。其次，脈絡被視為是一種動態的建構，在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 以及俗民方法論式的對話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conversation analysis) 領域中尤其受到重視。此觀點認為意義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關係性的，是語言表達的一種鑲嵌與互賴，是一種與周遭相關聯的傳播行動。第三點，脈絡被視為是一種既存的(given)、事前預設的取向，以及背景資訊。包括傳播行動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傳播行動的指涉性(indexicality)、以及傳播行動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等面向之探討在內(同上引：3-4)。

在定義脈絡時，Van Dijk 接受上述討論的「結構與建構的雙元性」。不過，他的定義也強調參與者的社會特性。「脈絡被直覺性的概念化，傾向存在於一些傳播情境特性中，這些情境包括說話者的性別、年齡、階級或族群」(2009:

217)。此外，Van Dijk 還將自我、主觀以及文化特殊性、差異性納入他的討論範疇之中。

在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一書中，Van Dijk (2009: 16-22) 對脈絡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列舉出許多面向，本文摘要其中幾個面向說明如下：（一）脈絡是「主觀參與者的建構」（subjective participant constructs），或可稱為是一種互動的、傳播情境的主觀定義；（二）脈絡是一些獨特的經驗；（三）脈絡模式是一種基模（schematic）式的，運用大家分享的、文化基礎的、以及傳統類別的基模來不斷進行傳播事件的詮釋；（四）脈絡控制了論述的生產與理解，創造了重要的溝通情境；（五）脈絡的結構與建構明顯奠基於社會性的基礎、是一種社會情境的理論，如分享的社會認知（shared social cognitions），如知識、態度、意識型態、文法、規則、規範與價值；（六）脈絡是動態的，隨著互動情境與其他思想的發展而改變；（七）脈絡是以自我（ego-centric）以及我的世界為中心的（center of my/our world）；以及（八）脈絡因文化而有所不同，脈絡基模與類別可能因為文化差異而不同。

Van Dijk 所提出的這些項目，其中第（三）項與認知基模有關、第（四）和（五）項與論述生產的社會基礎與限制相關、以及第（八）項與不同文化的脈絡基模差異性相關，這些都屬於結構性的脈絡分析。而建構性的脈絡分析則體現在第（一）、（二）、（六）項的主觀定義、獨特經驗與自我中心的觀點，以及第（六）項強調脈絡是因時、因地制宜的動態建構。

強調建構面向的理論，如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往往從宏觀的角度將論述的內容連結到更廣的社會脈絡之中，諸如政治、經濟、階級、性別與族群等，同時也強調主體性與能動性的重要性。現象學（phenomenology）重視「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與典型化（typifications）建構，挑戰人們視之為當然的世界，並以「瞭悟法」（verstehen）去理解行動者的意義，從社會行動的文化脈絡去解讀被研究者之行為。Mosco 在其 1996 年出版的《傳播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一書中，提出三個重要的概念，即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structuration），皆強調動態的發展過程。其中結構化的概念事實上是一種建構與能動性，是閱聽人與行動者意圖改變狀況，挑戰因傳播商品化與媒介集中化所形成的結構與不良影響。

二、宏觀與微觀兩層面的區分

在既有文獻中，專篇探討脈絡與傳播研究之間關聯的文章很少。從一些相關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嘗試區分出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宏觀的分析，研究者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傳播史、社會變遷、與跨文化傳播等面向。微觀的分析從語言、文本、認知或行動出發，針對語言溝通、論述分析、認知心理、跨文化傳播的語言使用、以及社會互動的內容進行思考。

探討傳播史及理論性研究常採取宏觀的角度分析。如殷尼斯從歷史變遷角度進行政治與傳播的分析，他的著作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 一書說明媒體型態對政治體制形成、崩解的影響力。另一本書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 則說明如石刻的「時間偏向」(time-bias) 媒介與如報紙、電視的「空間偏向」(space-bias) 媒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力。麥克魯漢更進一步依歷史階段之不同將媒介區分為聽覺、視覺、電子等類型，1960 年代初期出版的 *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 與 *Understanding media* (1964) 等書說明了不同時期的媒體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對人類文化發展的重大影響，殷尼斯與麥克魯漢的觀點被稱為是多倫多政經學派，著重的是媒介變遷的理論分析。

脈絡在跨文化傳播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研究傳統中處於核心地位，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同時擁有宏觀 (文化傳播) 與微觀 (語言結構) 兩個層面。異文化之間的相遇與溝通，都必須在比較文化與語言異同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進行。Katriel (1995) 指出以論述為中心 (discourse-centered) 的研究特注重脈絡的意義。他說「在語言結構、俗民文化、以及自然情境中的說話研究上，脈絡是跨文化傳播事件討論的關注點」(同上引：271)。

同時，尋找「脈絡化線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 對傳播意義的詮釋是很重要的，無論是跨國溝通、族群研究、與相異群體之間的對話分析均需要尋找脈絡線索。Katriel 認為脈絡不是單一的概念、更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跨文化傳播中，「脈絡應該要從一種單數 (context) 的概念轉換成為是一種複數的 (contexts) 認知」(Katriel, 1995: 283)，可見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脈絡需要經歷一種多重的、交錯的意義建構。

從微觀的層面來看，溝通互動、論述敘事、以及意義建構是關注的重心。1960 年代初期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提出的「互動論」(interactionism) 與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Asylums* 以及 *Stigma* 等著作，將具有傳播與意義建構特質的「互動」，視為是個人對社會脈絡的回應，這些社會脈絡包括制度

對他們的要求、社會價值、以及社會標籤等（轉引自 Attewell, 1974: 180），傳播研究方面則強調「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應用。

在論述分析方面，可用 Van Dijk 的案例來看脈絡的意義。他針對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演講進行分析，提出「文本與對話的產製涵蓋了一個傳統上稱為『脈絡』的核心概念，內容包括參與者的認同與角色、地點、時間、組織制度、政治行動與政治知識、以及其他類目」（Van Dijk, 2009: 3）。而「脈絡性理解」（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是了解這些政治發展的必要作法。換句話說，了解論述是指了解在脈絡中的文本與談話（text/talk-in context），因此論述分析與對話分析需要清楚地說明脈絡是什麼、以及脈絡與文本／談話的具體關係該如何被解釋（Van Dijk, 2009: 3）。

Bensing, Van Dulmen, & Tate (2003: 27) 從另一種微觀的角度探討醫生與病人的醫療傳播現象，說明其中存在著四種與脈絡相關的因素，包括：醫病間互動的目標、時間與醫療次數、醫院組織政策與醫療團隊特性、以及醫病等各方面人員之需求、期待、知識、態度、經驗與技能等。Bensing et al. 在此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啟示是，研究者要以一個更廣的脈絡來看醫療傳播中的醫病關係，這樣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起來進行理解。同時，他們所提出的一句話，也可以為本節討論脈絡與傳播關係的一個結語：「傳播不會憑空產生，而是受到所發生的脈絡所影響」（2003: 28）。

有關以上本節所討論的脈絡與傳播研究的關係，相關的理論或觀點可以從宏觀視野、微觀視野、結構角度、以及建構角度等四個向度來了解，見表 1。

面向	宏觀視野	微觀視野
結構角度	傳播史研究 媒介變遷理論（多倫多學派） 跨文化傳播（文化傳播）	論述分析 對話分析 跨文化傳播（語言結構）
建構角度	批判性論述分析 現象學 傳播政治經濟學（結構化）	符號互動理論 俗民方法論 俗民方法論對話分析

表 1：脈絡與傳播研究的四個向度與相關理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達悟族的文化脈絡與惡靈信仰的傳播

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源自對脈絡的無法掌握與不理解。這個通常發生在當兩個相異文化的人初次接觸對方時所產生的衝突、驚訝與迷惑。研究者進行

國科會「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多年，在與當地人互動以及親身觀察之下，發現蘭嶼原住民的宗教與神靈信仰很特殊。在更進一步的接觸與了解之後，發現達悟人的信仰混雜了初民社會的傳統信仰與西方社會的神觀，而漢人的信仰對當地原住民幾乎沒有影響力。達悟族所擁有的獨特文化傳統與知識體系，與西方或漢人的知識典範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性令人感到震撼。

本文選擇蘭嶼原住民作為分析案例，基本的原因是：原住民與漢人、以及原始信仰與基督宗教的互動本身就是跨文化傳播的一個現象，從這個現象來了解傳播與脈絡的關係是不錯的起點。另一方面，蘭嶼原住民惡靈信仰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案例，能藉此說明脈絡對於了解當地社會的重要性。簡單來說，本文欲探討蘭嶼原住民的脈絡與惡靈信仰的傳播。

一、神與鬼的拔河——傳統惡靈信仰與西方宗教

「不要被 anito 聽到，否則牠會來找麻煩……」（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09.04.20）。在蘭嶼中學工作、住在椰油部落的王桂清告訴我，「在蘭嶼，許多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不能聲張、不要大刺刺地說出來，否則會被 anito 聽到」（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09.04.20）。漁人部落的夏曼·賈巴度，當地國小的退休教師，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到：「部落大船下水的計畫是不會講的，沒有把握的事不能說，說出來怕做不到。下水典禮的時間不到確定可以舉辦前是不會說的，因為如果太張揚的話，船家會怕 anito 來破壞」（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10.06.16）。

這個所謂的 anito 就是蘭嶼人俗稱的惡靈，席蓀·嘉斐弄（2009）認為用「evil spirits」來解釋這個概念最為適切。達悟人或當地作家也會稱呼 anito 為鬼（ghost）或魔鬼（demon）。在蘭嶼，惡靈存在於日常生活，充塞在物理與心理空間之中，是一個無所不在、被擬人化的存在體。

蘭嶼從 1950 年代之後，無論在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居住型態、人際關係、以及生產方式都有很大的轉變，許多達悟青年人都曾經到臺灣工作或接受漢人教育，島上原住民多數人也接受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雖然文明與現代化在蘭嶼迅速地發展，漢人政府在蘭嶼長期推動國語化與漢化政策，而且島上大多數原住民接受了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但很弔詭的，即使在這種強大的漢化與西化雙重影響之下，時至今日，多數住在島上的達悟人，仍相信有 anito 的存在，在日常生活與傳統儀式中，也會遵守傳統文化、依循惡靈信仰的禁忌。小小的島上雖然設

立了十幾座教堂，但上教堂的當地人多數也同時參與原住民傳統儀式，初民社會型態的惡靈信仰雖不如以往強大，但仍屹立不搖，與代表現代性的基督信仰在蘭嶼島上共生共存、相互牽制與拔河。

二、惡靈信仰的傳播

為什麼惡靈信仰在達悟社會中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蘭嶼的惡靈信仰是如何建構出來、如何進行傳播的呢？為什麼傳統信仰所形成的社會結構與知識體系至今仍牢不可破呢？延續上節本文針對文獻重點的對話，為了了解蘭嶼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就必須同時從較為宏觀層面的文化脈絡（如歷史與社會型態）以及較為微觀層面的語藝脈絡（如論述與語言溝通）來思考，並從信仰的結構面（如神話與禁忌）與信仰的建構面（如惡靈思想傳播）來著手進行分析。不過，由於此案例扮演一種工具性的目的，旨在說明脈絡與傳播研究的關係，而非分析蘭嶼惡靈信仰的全貌，所以無法探討過多細節，也無法呈現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

（一）達悟文化脈絡下的歷史與社會型態

從歷史與社會型態來看，達悟族相傳是幾百年前從菲律賓巴丹群島划船到此定居的民族，所以他們的文化屬於南島語系文化，所使用的達悟語至今仍與菲律賓巴丹島所使用的語言有高達 60% 是一樣的，所以達悟人到巴丹島，感覺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反倒是漢人文化，對蘭嶼而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文化。

日本統治蘭嶼時期，蘭嶼是管制地區，外人不得進入。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離開，由國民黨政府接手，始對外開放。基督教在 1948 年時傳入蘭嶼，天主教於 1954 年由瑞士籍神父紀守常帶進蘭嶼。剛開始時達悟人並不相信這些宗教，許多當地人上教堂是為了教會所發放的各種救濟品¹。蘭嶼是一個地處偏僻的小海島，山多地稠，居民於是以海為生，捕魚成為最重要的求生本能與經濟活動，於是慢慢成為一個海洋民族。達悟族相信天地間有神、人靈（pahad）與惡靈的存在，每年 11 月間所舉辦的祭神儀式（Pazos），會祈求至高無上的「祖父神」（Akey do langarahren）保佑族人出海捕魚能安全返航。依據前人的研

1. 漁人部落基督教長教會董森永牧師提到，「在基督宗教傳進蘭嶼的初期，基督教與天主教雙方都會用救濟品來搶信徒，教友常因為救濟品而從天主教改信基督教，或由基督教改信天主教」（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09.10.27）。甚至有一些家庭為了能取得兩邊教會的發放物資，家中一人信天主教、另一人信基督教，這樣就不會錯過各種機會了。所以初期達悟人信教是因為經濟的需要，並不是真正為了信仰。謝永泉紀錄部分朗島村民改信天主教的原因，提到：「達悟男性老人改信天主教的動機很單純，不是為了信仰，是為了衣物」（謝永泉，2004b：26）。

究，達悟的神可以分成很多層次，如 Arundel Del Re 在 1951 年出版的書指出，達悟人將宇宙分為八層，其中神、人、鬼各有其一定居住的層界。衛惠林等人在 1972 年出版的《臺灣省通志稿》卷八當中，提出達悟族有 3 個天界的看法（轉引自席蓓·嘉斐弄，2009：67）。而董森永在 1997 年調查漁人部落的歲時祭儀時，發現了 14 個達悟族的神名（轉引自席蓓·嘉斐弄，2009：69）。在自然界裡，天神、海神、與飛魚神等抽象的神祉，常常會出現在歌謠與文學作品當中。

然而，達悟族雖然相信有神，但這些神在達悟人的心中是模糊的、不具體的，而且離人們生活的距離是遙遠的，不像 *anito*，卻與活著的人似遠實近。天主教傳道人謝永泉指出：「對世間的精靈和亡魂，即達悟族所通稱的 *anito*（亡靈），其信仰卻是無比的深刻與具體。這些精靈、亡魂在人的生活空間中，牠們與人是暗與明的時空對峙，人在明處，亡魂則在暗處」（謝永泉，2004a：113）。因此達悟人相信，亡魂也和人一樣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有屬於牠們的食物、動物，而且是居住在另一個距離不遠、隨時會相遇的世界。換句話說，達悟人的生活世界中，*anito* 是無所不在的。

人死、身體腐朽之後的意識（consciousness）是否能一直永久存在，這是屬於「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最根本的問題（Frazer, 1994a: 26）。衛惠林等人指出達悟人相信靈主要有頭靈與肩靈（左肩、右肩）共三個靈，而且「當人死後屍體埋入墓穴時，頭部魂即刻離開 [飛走遠處]……而肩部魂會留在墓地，會念念不忘家園，甚至有時候會回來引誘家人的生靈離開肉體去跟他作伴，並視之為一切疾病與死亡的原因」（轉引自席蓓·嘉斐弄，2009：73）。達悟人因此要切斷 *anito* 以及牠們所可能帶來的噩運、災難。

達悟族的喪葬儀式如同驅鬼儀式，當天（晚上過世者隔天）必須下葬，由男性家屬所組成的送葬部隊全副武裝、戴藤帽、握長劍，送葬隊伍行進時又吶喊、又舞劍、又敲打，趕走惡靈，希望死者亡魂不要再來叨擾家屬與部落的人²。喪禮儀式主要在驅除亡魂、斷絕與亡魂的關係，所以墳墓沒有立碑，與大自然一起埋葬，喪禮結束後，家屬必須忘記亡魂，依傳統不能再提及他們的名字，也永遠不會再到墓地去祭拜，這與漢人、西方文化有極大差異。從以上這些說明可以大致了解惡靈信仰在達悟社會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2. 這樣的惡靈信仰不只是發生在達悟族居住的蘭嶼島，許多其他初民部落與社會也有類似的文化發展。如在太平洋上的 Gilbert 島，人死去後連續三個晚上，部落的人無論與死者是否為親戚，會舉行一種稱為「*bo-maki*」的儀式。所有人手持木棍與椰子樹葉，聚集在聚落最南端、連成一條東西線往北前進，不講一句話，沿途敲打地面與樹木。目的是鼓勵靈魂遠離屍體的鄰近週遭、並驅趕任何可能會附在屍體上的惡靈（Frazer, 1994b: 12）。

（二）語言與論述所形構的語藝脈絡

蘭嶼總共有六個達悟族部落，屬於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和臺灣其他原住民族一樣，達悟族並沒有文字，部落中的傳播主要以口語相傳的方式進行，透過聲音傳播訊息、表達情感，透過人與人直接的相遇、分享，強有力的達成溝通的目的。這種沒有文字的傳播方式，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更緊密結合，形成部落傳播網路（孫大川，1996：2）。以下舉歌謠與笑話作為語藝論述的內容範例。

達悟族的歌謠和生活密不可分，

生活大部分是漁撈、耕植水芋和山羊的放牧，沒有獵人頭的習俗或戰爭，故此許多的歌曲都與上述的活動有關，大都屬於漁撈、漁船落水禮、情歌、搖籃曲、歌頌祖先功績等，他們沒有樂器，僅以胸部喉嚨發出自由變化聲音，當他們舉行粟祭時只用杵臼來打拍子。今尚保持原始的小音域組織，以獨唱、領唱、眾唱、對唱或多聲異音眾唱，口傳給子子孫孫（蘭恩通訊，1996）。

他們的歌謠也是相當特殊、與眾不同的，既是古典文學，也往往擁有新詩一般的意境與隱喻，因此要了解達悟歌謠的內容，必須大量的分析相關的脈絡才能捕捉到正確的解釋，如必須了解場合、唱者與聽者、以及前後文內容中的典故與歷史事件等。呂鈺秀、郭健平（2007：33-37）分析達悟歌謠時，提出歌詞內涵常常出現古語、隱喻、雙關語、以及反喻等，脈絡性的理解是解讀達悟歌謠的必要過程。

林素蓮紀錄了一段海上行船與鬼的歌謠內容，與蘭嶼的捕魚活動密切相關。船被閃電擊倒的原因是因為有鬼魂跟著他們，因此他們的船開始崩解，也就是歸因鬼所帶來的厄運（呂鈺秀、郭健平，2007）：

jinozan na sira ta ano alinadnaden kano manganito meytotonas

砸倒、擊倒 他們 當 跟隨 被 鬼魂 降臨到

jimo aziazimakmaken

你（指船）分解（同上引：230）

死亡與喪葬的場合都會出現大量的歌謠，但因為是一種文化禁忌，所以大家避而不談，只有現場的參與者才知道，顯少有文字記錄³。劉斌雄（1959）曾在〈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文章中提到一段野銀部落的驅魔咒語：

Jamayalas dzi-mu-wan! Kalai dzi-mu-wan!

刺 你在的地方 離開 你在的地方

o, ou! kalai mu! kalai mu!

哦 哦 離開 你 離開 你

palama dg-ina mu! ajani-mayap sia.

交媾 母 你的 真的 捉 他（同上引：146）

這段咒語大意是：我要用石頭（或木槍）向死者拋（或刺）過去。並令亡魂走開、不要回顧活人的聚落。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媽的！你把這個人抓去了」（劉斌雄，1959：146）。這樣的內容意涵必須放回到蘭嶼惡靈信仰的脈絡中才能真正進行解讀——即亡靈就是必須被驅趕、離開生人的惡靈。

另外，以一則當地流傳的「水泉裡趕惡鬼」（Mamozaw soanito doranom）的笑話為例，所發生的地點在漁人部落，發生的時間為 1962 年，笑話內容透過口語傳播在部落間流傳，內容如下：

有一天，漁人部落的幼稚園老師帶領小朋友到水泉去提水。老師依照達悟族的文化習俗告訴小朋友，不能直接下去水泉裡提水，因為水泉裡住著魔鬼的惡靈會害人，所以必須先丟幾個石頭到水裡，把惡靈驅走後才可以下去提水。後來小朋友們到水泉時都會遵守老師教導的祖先習俗，先丟幾個石頭驅離魔鬼後再下去提水。有一次放學後，幾個小朋友要幫家裡提水而來到水泉邊，每個人都先丟幾個石頭到水泉裡。有好幾個石頭正好打到在水泉裡洗澡的一位老人頭上，他痛得大叫起來，指著這些小朋友們大罵。小朋友們看到水中忽然有一位滿臉流著血不像人樣的老人出現，嚇得大叫：「魔鬼出來了！魔鬼出來了！」

3. 在一次訪談中。漁人部落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董森永說：「喪葬的事是絕對的禁忌，不能問的。為了進行採訪紀錄，有一次在教友家，問了一位熱心的婦人有關喪葬的事，結果被同為教友的先生很生氣的叫我不在他家裡談論這種事情……全蘭嶼只有我一個人曾經用照相機拍下喪葬的過

每個小朋友都害怕地衝回家，再也不敢到水泉提水（董森永，2010：64）。

從這則笑話可以知道，蘭嶼的 *anito* 是無所不在的，*anito* 觀念的傳播往往透過日常生活的趣聞，用口語相傳、論述形成的方式來加以強化。

（三）傳說與禁忌充斥的信仰結構

在達悟族的許多神話故事與傳說中，充斥著惡靈的身影，*anito* 的故事透過口語文化在部落裡代代相傳著。為什麼魔鬼常搞破壞、這麼可怕？研究者當然必須進入達悟族的文化脈絡中才能理解到這些不斷傳遞的故事。在鍾鳳地主編的《雅美文化的故事》中〈魔鬼的洩憤〉內容中提到：

有兩個兄弟，划著獨木舟到小蘭嶼去釣魚，當他們到達小蘭嶼海岸時，看見一隻又肥又大的狐狸，兄弟倆拼命的追趕，終於抓到了那隻大狐狸，然後把牠綁在船裡。正要回航忽聞一群魔鬼吼聲，從山上傳了下來：「喂！把那隻狐狸留下！那是我們所養的豬。」兄弟倆沒命地快跑，趕緊把船划向大海，那群魔鬼也搭上另一艘船由後面緊追不捨，他們更拼命地划，終於抵達了岸邊，全村的人都為他們擔心。到了家他們大喊：「開門！」父親開門讓兄弟倆進來，問到：「怎麼回事？」兄弟倆把經過的情形說給父親聽。當他們把狐狸交給父親時，發現狐狸的尾巴已經斷了，忽然屋頂一陣騷動，接著像雨點般的石子落了下來！他們非常害怕，第二天早上，他們出來看個究竟，屋頂上布滿石頭，屋子也突然倒塌，村人都說：「那是魔鬼幹的！」（轉引自達西烏拉彎·畢馬，2003：285）。

故事裏的所說的狐狸，事實上不是狐狸而是白鼻心（因為蘭嶼沒有狐狸），牠們是 *anito* 世界中的魔鬼所畜養的豬，在魔鬼世界舉辦各種典禮的時候（如 *anito* 的新屋落成），白鼻心就成為殺豬祭祀的犧牲品。以上故事說明有兩位兄弟到小蘭

程，因為我是牧師幫忙亡魂祈禱，所以才有這種可能，否則依習俗連照相機都必須要被丟棄。我跟死者家屬說我是信奉神的，所以我和你們不一樣，我並不害怕。但因為我這樣做，違反傳統，所以很多當地人都在看，看我會不會有災難降臨，或家人會不會遭到惡運」（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09.10.27）。

嶼島附近釣魚，「結果他們抓到了一隻大狐狸，回航的時候一群魔鬼追趕著他們，因為他們偷走了魔鬼的豬。魔鬼非常生氣，在他們家屋頂降下大石頭洩憤。可見達悟人對於魔鬼的認知也以為牠們與人類一樣具有七情六慾」（達西烏拉鸞·畢馬，2003：286）。這些故事的傳播，強化了一種達悟族對惡靈世界「擬人化的存在觀」，建構出惡靈世界和人的世界同樣會舉辦各種慶典、同樣需要殺豬祭祀，以及同樣會有悲歡離合。

周宗經（1993）提到一則跟魔鬼有關的故事：

好久以前，野銀部落曾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經常上山伐木的樵夫，他的遭遇是這樣的……樵夫快走到山頂時，就聽到山頂上有跳舞的聲音，他停了一下側耳傾聽聲音的來源，並自言自語的說：「怪事，怎麼會有跳舞的聲音，是否出現了怪事」……山頂的平原上有十幾個婦女身上掛著珠寶在跳舞，那些人都是天上的魔鬼，下凡間來跳舞玩樂……當他回家的時候，魔鬼找到他，在偏僻的角落裡奪走一部分珠寶，這位樵夫並未發現，仍繼續趕路，走到半路時，魔鬼又拿走一部分，他還是沒有發覺，一路走回家。等他回到家裡時，才發現珠寶少了一半（同上引：52）……

周宗經（1999）也提到一項禁忌、驅魔的傳說：

父母親上山工作或下海捕魚，不可以到有洞或大樹下，尤其榕樹等險疑的地方，這地方是魔鬼的住處。亦不可砍漆樹，不能削去樹枝頭，不能吃鮑魚、九孔等貝類。這些都會危及到孩子的性命。每到晚上，孩子住的房間，一定要生火及關門，以防魔鬼進屋來攪擾。火焰有可以驅走魔鬼於千里的功能。孩子的搖籃，前後須吊著拒鬼刀或剪刀、鋸子等武器。住屋簷下立長矛以驅趕鬼（同上引：第2版）。

達悟族為了要確保民族的延續、社會的平衡、以及經濟的安全保障，建立了一個充滿禁忌的飛魚文化，透過傳統祭典儀式的進行來再現原始信仰。儀式的舉行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親身傳播媒介，祭典、服裝、器具、供品、儀式與集體行為等，都是符號象徵與文化再現的體系。飛魚召魚祭、大船（五對槳）下水典禮、新屋落成典禮等慶典常舉辦儀式驅除惡靈。惡靈信仰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與 anito 所衍生的相關禁忌有很大關係。

（四）惡靈信仰的建構與傳播

過去，達悟族人使用語言來編織傳統故事、創造各種傳說來傳遞祖先文化與禁忌、使用歌謠搭配祭典活動與捕捉日常生活的點滴，以及運用笑話來達到社會交際的目的……等等。歌謠吟唱是達悟文化中最特殊的一種文化內涵，在各種祭典中一定有歌謠的現身。此外，神話故事、傳說與笑話等內容的口語相傳，在透過儀式傳播、口語傳播與親身傳播建構出屬於達悟族惡靈信仰的「口語文化」（oral culture），這也是初民社會的最基本傳播模式。

達悟人透過各種慶典與儀式的舉行，建立行為規範，創造禁忌，進而建立起處處有惡靈、時時趕惡靈的文化生活方式。然而，惡靈信仰的傳播，受到漢化與西方宗教的影響，有關宗教傳播的發展脈絡因此成為了解惡靈信仰變化的重要內涵。基督信仰進蘭嶼後的在地化確實發揮了效應，許多達悟人都成為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雖然神的信仰以及與漢人的接觸逐漸改變了達悟人傳統的生死觀念，一些達悟族牧師、神職人員或教友不再那麼懼怕 anito，也有部分人不再深信一些傳統禁忌。但是，達悟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仍然維繫著，即使是神職人員也會參與傳統儀式，如在大船下水典禮時，當地的牧師、傳道士也都會搖身一變，穿著丁字褲參與「蠻阿威」、拋船的活動。惡靈的信仰仍然廣泛地存在於達悟社會當中，其中的喪葬文化更是牢不可破，難以鬆動。

基督宗教進入蘭嶼後「在地化」的努力相當明顯，教堂的彩繪、壁畫、雕刻或祭壇的設計許多都與當地文化內涵有關。在這個方面，天主教的教堂特別明顯。漁人部落天主教會傳道人謝加水說：「我們的教堂結合了達悟圖騰，用水泥做的拼板舟當作祭台。牆壁上有我畫的聖經故事，講聖經、傳道時會加入我們達悟族的故事」（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09.04.01）。教堂當中，紅頭聖保羅天主教教堂的壁畫美輪美奐，約在 1960 年代由達悟人創作完成的，他們將達悟文化、紅頭部落傳說故事、以及日常生活的內涵表現地淋漓盡致。圖 1 是紅頭部落聖保羅天主教教堂一景，教堂內壁畫充斥著達悟文化與生活的景象。圖中間的十字架是由達悟圖騰所組成，兩邊的金箔吊飾是達悟族的神聖文物、最高地位象徵。壁畫右邊抱著嬰兒坐在地上的母親象徵著「達悟族的聖母瑪麗亞」。壁畫中充滿了符號意義，必須有大量的在地知識並了解其脈絡，才能正確解讀其傳播與認同意涵。

葛德是瑞士籍天主教神父，每個月會固定巡迴到蘭嶼講道，他說：「有一次復活節的時候，我請教友在家裡的宗柱上面貼上死去親戚的名字，以懷念他們。」



圖 1：紅頭天主教堂充斥著達悟圖騰的壁畫

下一個月我又來島上的時候，問大家有沒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這件事，結果沒有人敢做，我無法改變他們這個想法」（郭良文，非正式訪談內容，2010.06.21）。簡鴻模（2004）用「雙軌並行制」的概念來描述達悟人基督與惡靈信仰並存的現象。他寫說：「在祭典儀式上是教會與傳統雙軌並行……達悟尚未發展出天主教的殯葬儀式，甚至教友死亡教會也找不到著力點介入」（同上引：180）。因此，即使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仍然有許多人深受惡靈文化的影響，沒有改變對傳統達悟的信仰。西方宗教信仰並不能完全改變當地人的觀念，達悟人自己建構出一套適應這種「雙軌並行信仰」的心理認知與行為模式。不變的是，達悟人對亡魂的恐懼至今依舊存在，惡靈信仰透過各種儀式行為持續地建構與被建構。

參、結語：從脈絡的爬梳來解讀傳播意義

表 2：從多元脈絡、脈絡化線索與脈絡性理解分析惡靈信仰是從文獻討論中得到的多元脈絡（contexts）、脈絡化線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與脈絡性理解（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等概念所組成的一種分析範例。以蘭嶼惡靈信仰為例，分別從大船下水典禮（儀式傳播）、喪葬儀式中歌謠（口語傳播）、魔鬼的豬傳統故事（親身傳播）、以及教堂中的達悟壁畫與圖騰（圖文傳播）等內容進行說明，有關脈絡與意涵的分析，詳見表 2 內容。

項目	多元脈絡	脈絡化線索	脈絡性理解
大船下水典禮 (儀式傳播)	海洋文化、以捕魚為主的經濟型態、部落合作主義	造船不能太張揚、船主資歷要夠，否則會禍及後代、牧師與傳道士參與傳統儀式	造大船是飛魚文化的神聖象徵、提防惡靈破壞、遵守禁忌以維持社會秩序
喪葬儀式中歌謠 (口語傳播)	達悟文化精髓、古典文學、正式場合之互動溝通媒介、屍體當日埋葬且不立碑	隱喻與反喻的使用、不得稱呼死者姓名、不得記錄喪葬活動、墓地為穢地禁入	含親屬在內的亡魂皆為惡靈，人與鬼的生活空間要劃清界線、惡靈需要驅趕
魔鬼的豬傳統故事 (親身傳播)	口語文化、傳統儀式慶典、惡靈信仰、神話與敘事體系	魔鬼(惡靈)有屬於自己的豬、魔鬼在陰界舉辦落成典禮	鬼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並存、鬼的活動比照人的活動、惡靈信仰充斥生活周遭
教堂中壁畫與圖騰 (圖文傳播)	傳統部落的原始圖騰信仰、西方宗教的引進、當地人進行教會的壁畫創作	教會與部落同時進行儀式、壁畫充滿圖騰、教友喪葬儀式不採用基督教模式	信仰雙軌制、達悟人所相信的並非純粹西方信仰、惡靈信仰的韌性仍然強大

表 2：從多元脈絡、脈絡化線索與脈絡性理解分析惡靈信仰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脈絡是一種社會結構，制約人們的行動與思想。脈絡同時也是一種建構、一種動態發展的過程，因此並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範與禁忌。現代化、漢化與西方化的浪潮不斷衝擊處於邊緣社會位置的蘭嶼島，惡靈信仰當然也會受到影響而經歷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不過，從達悟民族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去了解時，卻發現達悟族人發展出一種「信仰雙軌制」的模式，使基督與惡靈信仰可以並存。達悟人一方面上教堂、且絕大多數島上原住民已受洗成為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但另一方面仍大量保存了數百年來傳統的惡靈信仰。即使到今天，達悟人的惡靈信仰依舊存在，教友們所相信的並非純粹的西方基督宗教。這樣的現象很特殊、也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才能理解。換句話說，無論是與達悟族惡靈信仰相關的儀式傳播、口語傳播、親身傳播、與圖文傳播的意涵，都必須放在蘭嶼文化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脈絡中去了解，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達悟族的社會現象與事實。

參考書目

- 呂鈺秀、郭健平(2007)。《蘭嶼音樂夜宴：達悟族的拍手歌會》。臺北：南天。
- 周宗經(1999)。〈生命的光圈〉，《蘭嶼雙週刊》，263，第2版。
- (1993)。〈伐木記〉，《私立蘭恩幼稚園雅美文化教材(二)》，頁52-53。臺東：蘭恩文教基金會。

- 孫大川（1996）。〈從言說到書寫——臺灣原住民的文字創作、文獻整理及其傳播經驗——以「山海文化」為例〉，「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席蒨·嘉斐弄（2009）。《達悟族宗教變遷與民族發展》。臺北：南天。
- 董森永主編（2010）。《董牧師說笑話——傳統與文明相遇下的達悟趣聞》。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 達西烏拉彎·畢馬（2003）。《達悟族神話與傳說》。臺中：晨星。
- 劉斌雄（1959）。〈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143-183。
- 謝永泉（2004a）。〈傳統達悟神觀與基督宗教神觀的比較〉，簡鴻模等（編），《當達悟遇上基督：天主教傳入蘭嶼五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2-141。臺北：輔仁大學。
- （2004b）。《蘭嶼之父：紀守常神父》。臺東：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
- 簡鴻模（2004）。〈對達悟天主教本地化的初步觀察〉，簡鴻模等（編），《當達悟遇上基督：天主教傳入蘭嶼五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4-181。臺北：輔仁大學。
- 蘭恩通訊（1996）。《蘭恩通訊》，92。
- Attewell, P. (1974). Ethnomethodology since Garfinkel. *Theory and Society*, 1, 179-210.
- Bensing, J., Van Dulmen, S., & Tate, K. (2003).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New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50, 27-32.
- Fetzer, A. (2010, September). The dynamics of context: Importing and invoking contex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One-day Workshop on Pragmatics, Fuji Women's University, Sapporo, Japan.
- Frazer, J. G. (1994a).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and the worship of the dead* (Vol. 10). London: Routledge.
- (1994b). *The fear of the dead in primitive religion* (Vol. 21).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riel, T. (1995). From "context" to "context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271-284). London: Sage.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London: Sage.
- Van Dijk, T. A. (2009).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媒體與社群：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ow a Political Scientist Comprehends the Concept of Context

劉正山 *

Liu, Frank C. S.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壹、「脈絡」的內涵

依據 Collins Cobuild 字典 (2007) 的定義，「脈絡」(context) 這個字範圍很廣，幾乎無所不包。所有與要探討的對象有關、對其會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都可稱作脈絡 (If something is seen in context or if it is put into context, it i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all the factors that relate to it.)。從這個定義來看，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會處理到脈絡。這兩種科學都以解釋 (explain) 現象作為研究活動的重要目的。研究者除了尋找導致現象、事件或概念背後發生的因素之外，也可以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所要探討的現象、事件或概念。因此，凡是能被稱作脈絡的現象或概念，一定要與被解釋的對象有經驗上、理論上、或是邏輯上的關係。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除了解釋現象之外，還包括了描述 (describe)、預測 (predict) 及詮釋 (interpret) 等活動，並非所有的研究活動都強調使用脈絡這個概念。所謂描述型的研究指的是將經驗上或理論上的問題據實地勾畫出來；經驗上的問題例如地方派系的運作模式，理論上的問題例如政府規範市場失靈。預測型的研究依據概念模型對未來事件作出推導，例如推測集權政體的接班過程。詮釋型的研究則是從研究者本身出發、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為研究對象並賦與（或重新賦與）意義，例如亞洲各國如何理解崛起中的中國。描述型的研究比解釋型

* Email: csliau@mail.nsysu.edu.tw

的研究風格更加強調脈絡的重要性，因為這類研究往往是單一個案的研究或是以深度探討為出發點的研究，所以需要的就不只是找到與被研究對象直接相關的因素而已。好的個案研究往往也需要論及間接因素的影響¹。

預測與詮釋型的研究，相對於解釋與描述型的研究來說，比較不在意脈絡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預測型研究來說，預測根據的是個簡化過後的概念模型，而非依據全體脈絡。換言之，用來預測的模型都是從經驗或概念世界中篩選出來的變數（或稱變項，variables）所組成，因此脈絡在這類型的研究中扮演的是間接、輔助的角色²。至於詮釋型的研究，目的是「賦與意義」，因此有的會強調脈絡（例如「制度如何傷人」），有的則關注於討論概念本身（如「正義」、「自由」、「臺北國」等的意義）。

政治學門繽紛多彩，若從政治學者從事的活動來看，囊括了以上四種類型的研究，若從次領域來看，由於政治學的次學門眾多（依美國政治學會的資料，正式註冊的次學門或學群達 42 個；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1），學者在研究途徑的選擇上十分自由，政治學者對脈絡或解釋變數的理解或重要性認知不一，常出現學門內部次學門之間的辯論。次學門之間甚至會出現方法論上（methodology），乃至知識論上（epistemology）無法對話的窘境 (Grant, 2005)。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隨意選兩位政治學者，他們對於脈絡的認知和強調的程度可能就截然不同。例如對於著眼於政府／國家／國際層次的政治學者而言，能夠影響菁英或國家決策的國內外環境、自身資源、政治制度、甚至是領導人的成長背景等都是脈絡的一部分；而對於著眼於組織、群眾、個人層次的政治學者來說，政黨認同、人際關係、家庭與學校、乃至個人的成長歷程等可能會是比制度更需要處理的脈絡。因此，對不同的政治學者而言，「脈絡是什麼」，仍然要端看他的研究對象而定。

1. 描述型的研究與以說故事為目標的新聞報導不同。新聞報導重視的是一個事件的歷史性與事實性的敘述，而描述型的研究除了說故事之外，仍然帶有為理論發展或釐清事件來龍去脈的目的。
2. 預測型的研究與解釋型的研究兩者並不容易被二分，因為這些研究中的模型都是依據理論或邏輯所構成，這種模型既可以用於解釋，也可以用作推測。「這兩類型研究不是那麼重視脈絡」，並不是說脈絡變得不重要，而是說在這兩個類型的研究中，以簡馭繁（用簡化後的模型來解釋／預測繁複的社會／經濟／政治現象）才是研究者最在乎的事。在這個以簡馭繁的目的之下，脈絡將無法（也沒有必要）被完整的說出。

貳、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

「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個跨政治學與傳播學，也同時得到兩個學門認可的研究領域³。政治學者與傳播學者同樣關注媒體與政治現象的關係，但兩者關注的主題並不完全相同：傳播學門裡的政治傳播學者著重的是媒體對政治過程的影響；而政治學門裡的傳播學者，則著重政治過程中的選民處理政治資訊的模式及這些資訊對他們偏好形成的影響。因此，除了研究對象不同之外，即使是在這個次學門裡，研究者對脈絡的理解仍然會隨著上述的研究目的（解釋、描述、預測或詮釋）而有所不同。以下僅從一個著重選民層次，以及以解釋現象為目的的研究者的角度來討論「脈絡」的意義。

一個選民的偏好形成，自身的政黨傾向或黨性(partisanship)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一個人的政黨傾向，無論外不外顯，都會影響他的議題立場以及政治行為（包括了投票投給誰、喜歡不喜歡執政者、對自己的政體有沒有信心等等）。近年政治學者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是：政黨傾向是個解釋變數(explanatory variable)，而會被其他變數影響的條件非常有限(Carsey & Layman, 2006)。換句話說，無論國內外，政治學者多從黨性及其強度的角度來研究選民行為。

這個自 1970 年代起盛行的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的觀點，並非沒有遭遇到挑戰和修正。畢竟，要說黨性是解釋選民偏好形成的「唯一」變數（雖然大家都承認它是最重要的一個），很難令學者滿足。此外，不見得所有選民的黨性都是長時間保持穩定（雖然絕大多數人的確如此）。因此，在 1990 年後期政治學界引領了一股風潮，從「社群」角度出發，試著挑戰或修正密西根學派的觀點。這個研究系列在 2000 年後得到許多政治學者的關注。有趣的是，這股風潮並非源起自 1990 年末，準確的說是它是 1940 年代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的復興(Zuckerman, 2005)。哥倫比亞學派強調選民的偏好，是受到他們最親近、最常互動的人所影響(Katz & Lazarsfeld, 1955;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

這波哥倫比亞學派觀點的復興，雖無法取代密西根學派近乎鐵律式的結論（選民的黨性與黨性強度是最能解釋其政治行為的變數），但紮紮實實地提醒了沈醉於密西根學派成果的學者，在心理學的解釋變數之外，「環境變數」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3. 更多資訊可參閱學門期刊或通訊：<http://www.politicalcommunication.org/newsletter.html> (Stroud, 2001)。

一個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來源不外乎「社群」(social networks)與「媒體」(news media)。所謂的「社群」在這裡指的是跟自己常常談論政治或新聞事件的對象所形成的網絡(networks of political discussion)。政治學界的政治傳播學者近年來反覆確定了「人以群分」的道理，也就是選民尋找的政治或新聞談論的對象多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而這些「自選」的談論政治對象跟自己的政治傾向多半相似(Roch, Scholz, & McGraw, 2000)。這樣的環境很可能會提高身處其中的政治意識、政治參與興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並且會使自己的投票偏好跟社群中的其他人相近(Lin, Wu, & Lee, 2006; MacKuen & Brown, 1987)。這個從哥倫比亞學派觀點來解釋選民的偏好為什麼會偏向穩定的研究成果，可視為近年對密西根學派強調個人黨性強弱這個觀點最重要的補充。

早期的社群的研究著重於同質性社群的影響，而近期的研究則轉向著眼於異質性社群(heterogeneous network)的影響。社群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可以說是近十年來研究民意形成和政治行為的政治學者眼中最重要的解釋變數：一個選民的偏好與行為，與他的社群組成與互動頻率息息相關(Eveland & Hively, 2009; Rojas, 2008)。工作場所可以說是使一個人的社群產生異質性的重要脈絡，在工作場所接觸到的不同意見可以提高選民的政治知識(Mutz & Mondak, 2006)，不過網路社群之中，我們看到的反而是它們的同質性高過異質性(Wojcieszak & Mutz, 2007)。異質性社群影響了選民對政治事件的興趣(提高)、不同意見的包容力(提高)，以及投票偏好的穩定度(降低)(Basinger & Lavine, 2005; Kwak, Williams, Wang, & Lee, 2005; Lin et al., 2006; Liu, in press)。學界目前最沒有共識的一項議題是：異質性高的社群是否真的會造成民眾投票意願下降(Eveland & Hively, 2009; Jang, 2009; Mutz, 2002)。我們可以預見，這個針對異質性社群如何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研究與討論，將會再持續數年。

除了社群之外，「媒體」是選民的政治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政治資訊來源。筆者將媒體與社群並列為探討選民產生偏好或行為時必須要考量的脈絡，是因為這兩者加起來已經包含了所有我們可以找到、可以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資訊來源。政治學者所談的「媒體」並不只是傳播業者(例如某報社、某電視台、某頻道)或資訊傳播載具(如雜誌、廣播、網路)之外，還觸及了把訊息提供給傳播業者或被傳播業者播送的「資訊源」，亦即提供具有新聞性的訊息的政黨、機關、政府官員、政黨領袖、意見領袖，以及其他被傳播業者報導而具有話語權的人或機關。從這個角度看來，傳播業者自身也可能被包含在內(傳播業者常常是資訊的生產者而不只是傳播者)。因此，在政治學者眼中，選民政治生活的每一

天中，不太可能直接接觸到上述的這些資訊源，所以他們若不是被社群中流動的資訊所影響，就是被媒體傳遞的訊息所影響。當然，更常見的情形是兩者同時影響著選民。分析這兩者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差異、程度與機制便成了政治傳播這個領域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任務⁴。我們可以想見，放眼所及的社會現象，或許都可以透過我們對於這兩者的了解，而得到解答。例如，媒體與社群是否出現極化（polarization）或對立現象，以及媒體或社群的極化現象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為何（Binder, Dalrymple, Brossard, & Scheufele, 2009; Liu, 2010），都可以是政治傳播學者責無旁貸的責任（這部分將會是屬於解釋型的研究）。當然，社會上許多其他現象（如媒體報導內容的淺碟化、民眾跟隨媒體新聞的從眾行為等）都是值得目前政治傳播學者進一步爬梳的主題（這部分將是屬於描述型的研究）。

參、脈絡與政治傳播研究

以上約略總結了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脈絡的內涵，用經驗政治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phenomena）的語言來說，脈絡就是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外生解釋變數（external explanatory variables），亦即外於選民自身的資訊來源：社群與媒體。像是黨性（partisanship）或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也是重要的解釋變數，且依定義，應要被視為是脈絡的一環。但是大多數政治學者並不視它們為「脈絡」，而是將它們視為內生解釋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政治學者認為這類解釋變數存在於民眾心智之內，所以它們扮演的角色與運作的機制，表面上並不像歷史、事件、制度、規範、社群、媒體那樣是「由外而內」產生影響力。

因此，若不看字典定義，筆者會毫不猶豫地說出脈絡就是社群與媒體。但若拉回「與要探討的對象有關、對其會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都可稱作脈絡的話，政黨認同應該也可以被稱作脈絡。所以，「脈絡」一詞的模糊性恐怕會造成誤會（confusion）。筆者個人的建議是，我們用更多經驗研究學者聽得懂、比較不容易誤會的「解釋變數」一詞來指涉這些重要而相關的因素。

筆者個人並不熱衷使用「脈絡」二字。但無論是要用「脈絡」還是用「解釋變數」，更重要的，還是得回歸到「研究本身的目的為何」以及「怎麼把問題問

4. 有興趣的讀者可從 Zaller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一書著手。它可視為這個領域解答這個問題最具原創性的作品。而「社群的存在是不是削弱了媒體對選民的影響」這個行之有數十年的辯論，最近也因為社群的研究再興而重新受到重視（Holbert, Garrett, & Gleason, 2010）。

對」這兩件事上。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與解釋，那麼毫無疑問研究者必須把「什麼事情這麼值得研究」、「什麼是這個事情背後重要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在理論上或邏輯上如何影響這件事情」交待清楚。只要這些問題被恰當回答，「脈絡」便自然而然在其中被交待清楚了。

如果研究目的是詮釋或預測，研究者的注意力便會集中在「我們該怎麼理解這件事」或是「依照理論、邏輯、或是過往經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些問題上。這些研究的讀者便可以依據這些問題，來評估這些研究者是否妥善處理了應該處理的脈絡。

筆者發現，已經有愈來愈多跨領域的學者期望解釋型的研究不要只著眼在「抽象概念的推導」（理論層次）上，而是要把理論放回到經驗世界來取得有效性（validity）。在這個趨勢下，脈絡二字必然會在許多學術場合反覆被提起，甚至是被拿來作為批判一個研究不合格的工具。我期望這篇文章，把研究的不同目的揭示之後，學者及批評者可以更精細地去思考談論脈絡的必要性（在研究的世界裡，它很重要，但非全然必要），讓解釋型的學者在認識到脈絡的重要性之後，仍可以安於理論層面的發展和討論。

說得再更白一些，筆者認為與其強調脈絡二字的重要，甚至將它塑造成為理論型研究的緊箍咒，不如反過來鼓勵學者（尤其是已經強調脈絡二字的學者）問出能得到更多跨學門學者迴響的問題。依筆者粗淺的觀察，國內大多數研究是方法或資料趨動的研究（method/data-driven research），也就是研究者掌握了什麼途徑的觀點、立場或變數之後，就從頭到尾以它為出發點來問問題，並要求其他學者也要達到或考量這些觀點、立場或變數。這是我們未來需要謹慎避免的現象。

從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的眼中來看，也許社群和新聞媒體是所有做選民偏好與行為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脈絡，但筆者並不期望也不贊成有人將它們強加成為其他研究領域「必須考慮」的變數。筆者的期望是，未來當有人問了一個好問題的時候，不同學門的學者可以貢獻出他們眼中「值得」的變數，供這位研究者來選擇。如果他已充分了解脈絡的意義和重要性，那麼即使他（決定）問的問題不需要考慮用脈絡來解答，我們應該要知道，那是不要緊的。

參考書目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1). APSA Organized Sections. Retrieved June 10, 2011, from http://www.apsanet.org/content_4596.cfm
- Basinger, S. J., & Lavine, H. (2005). Ambivalence, information, and electoral choi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169-184.
- Binder, A. R., Dalrymple, K. E., Brossard, D., & Scheufele, D. A. (2009). The soul of a polarized democracy testing theoretical linkages between talk and attitude extremity during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 315-340.
- Carsey, T. M., & Layman, G. C. (2006).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464-477.
- Collins Cobuild Intermediat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2007). Boston, MA: Heinle ELT.
- Eveland, W. P., Jr., & Hively, M. H. (2009). Political discussion frequency, network siz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as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 205-224.
- Grant, J. T. (2005). What divides us? The image and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8, 379-386.
- Holbert, R. L., Garrett, R. K., & Gleason, L. S. (2010). 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 A response to Bennett and Iyeng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 15-34.
- Jang, S.-J. (2009). Are diverse political networks always bad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difference,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7, 879-898.
-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wak, N., Williams, A. E., Wang, X., & Lee, H. (2005). Talking politics and engaging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features of political talk and discussion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87-111.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Liu, F. C. S. (in press). Perceived partisan heterogeneity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hanges in party choice in a national elec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2010). Polarized news med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elector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Life Research*, 1(1), 35-50.

Lin, T.-M., Wu, C.-E., & Lee, F.-Y. (2006). "Neighborhoo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Spatial regression with disjoint neighborhood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 35-46.

MacKuen, M., & Brown, C. (1987). Political context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71-490.

Mutz, D.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838-855.

Mutz, D. C., & Mondak, J. J. (2006). The workplace as a context for cross-cut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 140-155.

Roch, C. H., Scholz, J. T., & McGraw, K. M. (2000).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 response to leg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777-791.

Rojas, H. (2008). Strategy versus understanding: How orientations towards political conversation influence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452-480.

Stroud, N. J. (2011, June). Welcome.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port*, 21(2). Retrived July 1, 2011, from <http://www.politicalcommunication.org/newsletter.html>

Wojcieszak, M. E., & Mutz, D. C. (2007, June).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Does the internet facilitate exposur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BA, San Francisco, CA.

Zaller, J.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uckerman, A. S. (Ed.). (2005).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策略：Teun A. van Dijk 與 Norman Fairclough 的比較

Contextualized Strategie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eun A. van Dijk and Norman Fairclough

倪炎元 *

Ni, Yen-Yuan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所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壹、前言

在處理文本分析的途徑中，「批判論述分析」或許是倡議者之間觀點最分歧、也最缺乏共識的一種途徑。曾經為論述分析編過分析指南的 Taylor 曾以「無所不包卻又抓不住」（wide-ranging and slippery）來形容論述分析途徑的這種狀況 (Taylor, 2001: 8)，儘管近幾年這個途徑的倡議者們之間曾不斷在進行對話，也有不少學者嘗試整合他們的論點，但迄今為止，這個途徑大體上還是停留在「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之階段，這種「各自表述」的局面，對若干想要應用此一途徑的研究者而言，無疑是個很大的「進入障礙」。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他們所採取的觀點各有所本之外，另一個因素就是若干針對他們理論進行引介或評述的文字，大多偏重就理論重疊的部分進行整合，卻忽略對他們彼此間立論差異的梳理，甚至倡議者本身也吝於交待彼此的歧異，這種論述的缺乏，除了造成批判論述分析容易被「誤讀」或「誤用」之外，也造成其在應用推廣上的困難。當然，在立場歧異的理論間進行「對比」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工作，畢竟要讓這種對比得以有效進行，就必須要有適當的切入點，而本論文所嘗試選擇的切入點，就是試圖從倡議者怎麼處理他們的「脈絡」（context）入手。

* Email: yyni@mail.mcu.edu.tw

在理論建構上，批判論述分析多半是從解析語言文本出發的研究途徑，除了建基於特定的語言學分析外，各個途徑的倡議者都選擇了不同學科的理論資源進行整合，例如 Fairclough 選擇批判社會學理論 (1992)、Bell 選擇文學研究中的敘事學理論 (1991)、Van Dijk 選擇認知心理學理論 (2008)、Wodak 選擇歷史社會學理論 (Reisigl & Wodak, 2009: 87-121) 等，這種理論資源的選擇造成了他們在理論建構上的差異。而針對這些理論資源的選擇與構連所進行之討論，則已超越了文本層面之外，邁入了「脈絡」層面的討論。換言之，透過批判論述分析倡議者如何處理「脈絡」，或許可以有效掌握不同批判論述分析途徑間的差異。本論文所嘗試要比較的對象，是當代兩位倡議批判論述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學者，Fairclough 與 Van Dijk 在理論建構上的差異。他們兩人在這個研究領域上都發表過相當多的著述，也是當代談論這個課題時最常被引述的兩位學者。他們的理論架構在形式上甚至還有些類似（都區分為總體與微體層面），但在實質理論建構上，他們兩人所提示的分析策略卻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他們兩人論點差異最主要的部分，正就是在「脈絡建構」上。

本論文稍後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循理論溯源的方式，分別梳理 Fairclough 與 Van Dijk 在其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中對「脈絡」所提示的建構策略，除了交待他們所各自建基的語言學理論外，也將特別針對他們選擇何種理論資源來建構脈絡，並透過這個層面上的對比，進一步梳理這兩位學者在批判論述分析策略上的差異。

貳、文本／脈絡與論述分析

長久以來，「脈絡」一直是語言學研究的核心關懷之一，但所引發的爭議也最多。一方面，語言本身被許多論者認為可以是一組完全自足的符號系統；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論者認為語言的使用與社會環境存在著千絲萬縷、甚至盤根錯結的關係，因而該怎麼處理語言之外那些看不著、也摸不著的「脈絡」，一直都是語言學家過去幾十年來持續爭議的焦點之一。畢竟脈絡既然不是現成存在那裡供人自由取用，那麼在複雜的社會情境中究竟有那些因素可以被視為是語言文本的脈絡，不同的語言學者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因而在語言學發展的進程中，也就在對「脈絡」的不同見解上出現分途（許力生，2006：158-159）。

以開啟現代符號語言學研究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為例，他將語言研究劃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個部分，「語言」

主要指的是內在形式的符號系統，「言語」則是個別語言的應用（De Saussure, 1965 / 弘文館譯，1985）。索緒爾認為只有前者才是語言學家的工作，其它所有涉及語言使用、社會環境等非語言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稍後到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57 / 謝石譯，1989）所提出的生成文法（Generative Grammar）則是走得更遠，語言所有的問題幾乎都在封閉的語法系統中解決，這已是走到完全擺脫脈絡（context-free）的境界，只剩下那些不確定、非系統性的因素才丟到脈絡層面，脈絡在這裡僅只是垃圾桶（wastebasket）的功能，甚至根本是不需要加以討論的（Wodak & Krzyzanowski, 2008: 10）；另一方面，語言學界也有一些流派特別重視脈絡的層面，例如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將若干社會學的變數如年齡、性別、階級背景等因素納為影響語言使用的脈絡；語用學（Pragmatics）則是將發話者、受話者的溝通交際情境視為脈絡；而功能語言學則主張脈絡與語言是在「功能」的連繫下互為前提，相互影響（許力生，2006：160-163；Wodak & Krzyzanowski, 2008: 10）。這兩種對「脈絡」不同的立場，在邁入對論述分析途徑的討論時，所涉及的問題就更複雜了。

在文本分析類型中，論述分析與批判論述分析之間的區別，除了有無加掛「批判」的預設外，兩者間最大的分際，還是在於是否要納入「脈絡」。狹義的論述分析隸屬語言學領域，它主要是針對言談對話中較大單位的篇章段落（paragraphs），就其中句子如何組合連結而構成更大的意義單位進行解析，這其中所要解析處理的包括字裡行間（字與字之間、句與句之間）、段落乃至全篇的文句連貫（cohesion）以及邏輯連貫（coherence）等的課題。在語言學的發展中，「論述分析」最大的貢獻，就是它超越了以往只拘泥在小單位的語法、語音、字彙與語意等的研究，能夠進一步處理較大單位句子間的結構與因果關係。儘管如此，傳統論述分析依舊停留在純粹的語言學層次，它即便是處理「脈絡」，也只是字句之間的「上下文」，與語言外的社會情境是完全無涉，也可以說，論述分析其實是「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相對的，批判論述分析則是經過「脈絡化」之後的論述分析。

然而，批判論述分析的觀點與流派之所以會有那麼龐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對「脈絡」的不同處理上。本來在語言學的領域裡，脈絡（或稱語境）就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不同的語言學家各自從實際的環境中，選取與語言存有千絲萬縷連繫的相關面向，做為脈絡的構成要素，從而建構了不同的分析策略。講直接一點，語言學家對脈絡的處理，就是一種「理論建構」（theoretical construct），因而如何建構脈絡也就成為如何有效解讀文本的關鍵。只不過，語言學家所集中

關注的脈絡，主要還是特定文句與語辭在上下文乃至段落間的連繫與界定，批判論述分析則將這種關懷進一步推進到心理、文化、歷史、社會與政治的層面。換言之，不同批判論述分析途徑所呈現的不同分析策略，主要就是不同學者針對環繞論述或文本的「脈絡」，所提示的不同理論建構。

對一個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倡議者而言，要建構一個解讀論述的「脈絡」理論，至少得回答兩個問題：首先，就是圍繞於論述周邊的情境，究竟該有那些要素，該被視為與論述有關聯的？其次，那些被認定為脈絡的要素，又是循何種方式與文本或論述形成脈絡上的關聯（斐文，2000：10）？然而，要回答上述的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畢竟環繞於語言乃至論述之外的脈絡，原本就複雜而難以掌握，英國從事語言學民族誌研究學者 Hervey 就認為脈絡存有著若干不好處理的難題，以那些要素該被列入脈絡為例，理論工作者就很容易陷入所謂「霍布森的選擇」（Hobson's choice），即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選擇」，他必須被迫從無窮境的變數當中去做武斷的化約（between an infinity of variables and arbitrary reductionism），而最終究竟是那些要素能夠或不能夠成為脈絡的一部分，其實就是理論家「說了就算」，並沒有客觀評斷的標準。也因為這樣，即便是藉由武斷的方式選定了組成脈絡的要素，它的範圍組成依舊是永遠開放的，隨時可能面臨添加或刪減的（Hervey, 1999: 65）。當然，文本／脈絡之間所牽扯還不只是脈絡建構中的「選擇」問題，還有文本與脈絡之間的區隔與邊界問題，亦即文本從那裡結束，脈絡從那裡開始，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不可判定性等（White, 1987／董立河譯，2005：250）。可以說，「選擇」與「分際」是研究者比較不同脈絡的重要進路。

批判論述分析途徑倡議者回答上述兩個問題的方式，即是他們究竟選擇何種語言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資源進行整合，而所謂批判論述分析的流派與理論分途，正就是這種選擇性的理論整合策略出發。只不過，過往純粹從「脈絡」的角度切入討論批判論述分析的文字很少，誠如任教比利時 Ghent 大學的 Blommaert 所指出的，在脈絡中選擇什麼來對論述進行框架，是論述分析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但學界卻從不探索這個課題（2001: 15）。本論文的撰寫，很大一部分也是基於此一旨趣而來。而本論文會刻意選擇 Fairclough 與 Van Dijk 進行比較，除了他們在理論建構上都提出重要創見外，也是因為他們在「脈絡建構」上，恰好好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參、批判社會學的進路：Fairclough 的建構策略

要掌握 Fairclough 在他的理論架構中如何處理「脈絡」建構的問題，得要從 Fairclough 所動員的語言學理論入手。而影響 Fairclough 建構脈絡的重要理論來源，一個是 Halliday (1985 / 彭宣維、趙秀鳳、張征譯，2000) 的功能語言學，另一個則是受到巴赫汀 (Bakhtin) 所謂「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 理論所啟發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理論 (Fairclough, 1992)。

功能語言學處理「脈絡」的基本觀點，主要是認為語言文本與脈絡是藉由「功能」建立有機的連繫，文本中不同措辭 (wording) 的配置選擇，主要是為履行社會脈絡中的某種功能，而文本與脈絡就是藉由這種功能的連繫，進而形成的互為影響、互為制約、互為前提等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這種處理語言文本的方式，相當程度影響了 Fairclough 早期處理論述分析的策略。Fairclough 在他早期的著作就是透空間向度 (dimensions) 的方式來處理文本與脈絡的關係。他將其分析架構區分為三個向度，分別為文本 (texts)、論述實踐 (discourse practices) 與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s)。在這裡 Fairclough 將論述界定為是透過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運用，它與社會結構間所呈現是一種辯證 (dialectical) 的關係，一方面論述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制約，另一方面論述對社會結構的相關面向，也有建構 (socially constitutive) 的作用 (Fairclough, 1992: 64)。也可以說，對 Fairclough 而言，論述與脈絡的關係，並不只是如何從複雜多變的脈絡中，掌握若干關鍵要素，達成對論述充分的解析；而是還要進一步的追問論述與社會脈絡之間，存在怎樣複雜的關聯性。在這裡 Fairclough 不再用「功能」來掌握論述與脈絡的連繫，而是改用「實踐」的概念，他不僅將論述視為一組待分析的語言文本，同樣也是深嵌在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一種社會實踐，Fairclough 稱之為論述實踐；而批判論述分析即是在追問這種論述實踐是否有助社會再現，乃至有助社會轉型。

在這裡我們不難看出 Fairclough 對文本／脈絡關係的特殊觀點。一方面透過論述實踐對社會實踐的連結，促成對文本的詮釋與描述，另一方面藉由文本／論述的實踐，促成社會文化的變遷。換言之，文本與脈絡的關係除了循不同層次的脈絡達成對文本的詮釋外，文本也同樣能發揮主動改變脈絡的功能。對 Fairclough 而言，隸屬脈絡的是論述實踐與社會文化實踐的兩個向度，它們與文本分析是辯證的交融在一起，文本分析與社會實踐分析主要是透過論述實踐分析居中加以連結 (link; Fairclough, 1998: 144)。在這裡 Fairclough 將論述實踐分

析的焦點置於互文性分析上，主要處理其它文本如何參與生產或詮釋某一特定文本，而被納入分析的一定就是那些對文本生產與詮釋有相關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資源 (Fairclough, 1998: 145)，也可以說，論述實踐分析與社會文化分析在這裡已經混同在一起了。Fairclough 在說明他的分析架構時，曾表示一個待分析的文本其實是包含了兩個系統，一個是純粹語言學的系統，另一個則是所謂「論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 的系統(即是脈絡)。在這裡「論述秩序」所指的就是「附屬於特定社會領域的一組文類與論述所組成的結構化邏聚體」(a structured configuration of genres and discourses associated with given social domain)，人們可以透過論述秩序辨識不同論述實踐之間的組成、關係及其疆界 (Fairclough, 1998: 145)。也可以說，要理解 Fairclough 對脈絡的觀點，透過他對「論述秩序」的處理，即可以充分掌握。

在這裡不妨再進一步討論 Fairclough 對互文性分析與脈絡間的關係。互文性理論處理「脈絡」的基本觀點，即是將納入脈絡的所有元素「文本化」，一切與文本發生互涉關係的其它文本，不論是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亦或是歷史的情境因素，都成為與文本交錯的互文本，脈絡分析在這裡已經轉化成了所謂跨文本的分析。在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中，互文性分析 (intertextual analysis) 是介於文本與社會結構中介的論述實踐向度，這個向度所要處理的主要是文本如何被生產、配置與消費的過程；換言之，這個過程也就是探索多樣化的論述間進行支配、競逐、重組、吸納、與再配置的過程。它從文本中覓出不同論述實踐運作的軌跡，進一步檢視不同類屬的論述究竟如何在文本中被加以構連 (Fairclough, 1995: 76-78)。

Fairclough 的互文性分析總共提示了三個分析策略：首先是「論述再現」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檢視主導再現者的論述與被再現者的論述 (representing and represented discourse) 之間的邊界如何被維繫與調整。例如報導者與被報導者之間聲明與立場的分際，不同的被報導者之個別立場、意見與辯駁是否有機會被完整呈現，是被突出還是被刪減淡化，是被直接引述，還是被間接融入報導者的論述中。Fairclough 認為所有宣稱客觀平衡的報導，都巧妙的利用這種邊界的操作，隱藏其政治偏好與立場 (Fairclough, 1995: 79-84)。第二個分析策略為論述類型的文類分析 (generic analysis of discourse types)。處理各個類型的論述在文本中如何被配置，如在新聞報導中，那些被配置在標題、導言、段落、附屬段落與結論中，那些內容作為故事形成敘事 (narrative) 部分，那些部分另納入說明 (exposition) 部分；作為敘事內容的部分，那些被配置為背景、情節安排如何，當事人是被安排為主角或配角等 (Fairclough, 1995: 85-93)。

第三個分析策略則是就文本中的論述加以分析（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texts）。它處理文本中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特別是關乎意識型態部分的配置。例如檢視報導中那些是現場經歷的具體記述，那些是屬於報導者刻意延伸，挾帶立場或觀點，支配論述與對立論述在文本中又是以什麼形式構連等，那些立場與觀點是明示亦或是暗示的等 (Fairclough, 1995: 94-102)。

Fairclough 在 2006 年出版了一本討論實際個案的著作《語言與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在這部著作中 Fairclough 又進一步擴大他對脈絡建構的範圍。以互文性分析為基礎的「論述秩序」系統被納入更宏觀的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的架構中，這個理論主張經濟過程不僅是嵌在政治條件中受到制約，也同樣是嵌在文化條件中受到制約，因而所有的經濟制度與政府形式都取決於一時一地特定的意義、價值觀與態度。Fairclough 嘗試將這種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他自己的理論架構連結（combining）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將批判論述分析與文化政治經濟學加以結盟（alliance）。接著 Fairclough 開始修訂他原先的三向度分析模型，發展出一組新的理論架構。原先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的三向度分析，改成從具體到抽象階梯遞升之社會事件／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三層次（levels）的分析。這中間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s）指的是長期的社會條件，而社會事件（social events）則是指社會生活的具體事例，社會實踐則是行事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sed way of doing thing），這三個層次均各自有其「符號化的時機」（semiotic moments），並各自建構了其論述面向（discursive aspect），這些面向彼此之間又是辯證的相互關連（dialectically related）。這其中「文本」建構了社會事件的符號化時機，至於屬於脈絡的「論述次序」（orders of discourse）則是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語言的符號化時機，它是由不同論述、不同文類與不同風格所形成相對穩定的邏聚體（relatively stabilized configuration）所組成。不同的社會代理人（如個人、團體、國家）是從各個論述次序中生產特定文本，而這個文本的生產是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文本被 Fairclough 形容成是一個「論述交鋒雜交混合物」（interdiscursively hybrid），不斷形成新的雜交混血的論述、文類與風格，並融入或混進既有的論述次序中 (Fairclough, 2006: 166-167)。這個理論分析架構與 Fairclough 在 1990 年代所發展的模型相較，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在這裡，Fairclough 已經將文本／脈絡的關係置入一個更龐雜的總體架構中，但基本分析策略依舊是互文性分析，只不過在分析操作上更複雜，文本與論述秩序的分際已經不存，所謂「文本」只是暫存在某一論述秩序的層次體上，以脈絡

化或再脈絡化過程交替轉換位置，在分析上就是處理文本在不同層次中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ation）的過程。亦即所有被他選取的文本，不論其隸屬何種文類、論述或風格，也不論其落點在那一個分析層次上，彼此間都存在著複雜交錯的辯證關係。在 Fairclough 看來，語言脈絡中所謂的「全球化」，是一種「層次體以及層次體之間的變遷」（Globalization as change in 'scale' and relation between the scale），換言之，全球化並不只是在概念上的一種「全球層次體的建構」，也是全球層次體與其它層次體之間的一種互動與變化關係，這種互動與變化導致各個層次體都啟動了「再脈絡化」的過程，亦就是在全新的脈絡下各個層次體都透過積極介入或再詮釋的實踐更動其指調框架（frame of reference）的過程（2006: 12）。可以說，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走到這個階段，已經不是處理文本的理論，而是社會學的理論了。

肆、社會認知心理學的進路：Van Dijk 的建構策略

Van Dijk 可以說是論述分析途徑倡議者中，唯一兩度以專書形式討論過「脈絡」的學者。1977 年他出版了《文本與脈絡：論述語意學與語用學之探究》（*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探究文本與溝通脈絡之間存在何種語用學上的關係，主張對論述進行的分析是將其置入言說行動的序列中（sequences of speech acts）。2008 年 Van Dijk 另外出版了《論述與脈絡：社會認知途徑》（*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在這部著作中 Van Dijk 一開始就指出他三十年前所出版的《文本與脈絡》一書大部分都在談文本，談脈絡的較少，而這本著作中則是討論脈絡的專著（2008: ix），而 Van Dijk 在這本著作最大理論開發，即是將社會認知理論帶入脈絡的討論中。

上述兩本討論「脈絡」的專書，恰恰好反映了 Van Dijk 不同時期思索「脈絡」問題的不同觀點。1977 年他的學術關懷還停留在語言學的領域，特別是針對語言論述意義解析的探討，研究領域則是遊走在語法學、語意學與語用學諸學科之間。依照 Van Dijk 在他的學術自傳中的說法，這個時期他在語言學上的耕耘，不是在脈絡理論，而是在文本理論，特別是「文本文法」（text grammar）理論；這其中針對一組語句的語法與語意關係上，Van Dijk 提出了一個重要創見，即是「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的概念。他認為特定語言文本中的一組句子間不僅存在著局部（local）與微觀（micro）的關係，而且在總體上也存在著一個「總體結構」，這個總體結構決定文本的整體連貫（global coherence）和組織，

這個總體結構包括意義的整體結構（global structure of meaning）和形式的整體結構（global structure of form）。為了加以區隔，Van Dijk 特別將涉及語法部分的形式整體結構稱之為「超結構」（superstructure），至於意義的整體結構部分，也成為 Van Dijk 日後發展他所謂新聞論述分析的基本架構（1988）。只不過這一部分的理論開發，並未觸及太多脈絡的課題。

儘管在 1977 年所出版的《文本與脈絡》一書的標題中，同時包括了文本與脈絡兩個概念，但 Van Dijk 卻花了大部分的篇幅處理文本的課題，僅用一章的篇幅討論脈絡的課題；而「脈絡」之所以被納入討論，主要是為了詮釋文本中局部（句子之間）和總體結構的連貫關係。Van Dijk 在這裡特別引進了語用學的觀點，主張句子之間的局部連貫應是建立在與「可能世界中的事實」（facts in a possible world）之間的指調關係上；例如某一文本中兩個先後排列的命題得以形成序列而具有連貫，並不是在抽象中形成的，而是由於某個溝通交際場景的論述參與者之間的關係而連貫（discourses are not coherent in the abstract, but coherent for discourse participants in some communicative situation；Van Dijk, 2004）。這種對「溝通交際場景中論述參與者」的強調，正是典型的語用學對脈絡的觀點。Van Dijk 既然將脈絡界定為溝通的情境，這種脈絡就不可能是靜態的，而是動態不居的，因而「脈絡」在這裡又被 Van Dijk 界定為「事件的路徑」（a course of events）；它包含初始的狀態、中途的狀態與終局的狀態等，可能被納入路徑進程（即脈絡）的狀態有很多組，但確定成為「脈絡」的部分則是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在對話過程中加以實現的（1977: 191）。然而，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又是如何界定彼此所共同理解的脈絡呢？Van Dijk 認為在這裡就走到語用學的拘限了（同上引：192）。而為了繼續追問脈絡是如何產生的，Van Dijk 開始轉而向心理學取經。

1988 年 Van Dijk 出版了《新聞做為論述》（*News as discourse*）一書，將他在先前有關論述分析研究的若干成果，應用到對新聞報導的分析上。在這本著作中，Van Dijk 除了將他對文本語法研究所提出的主要創見「總體結構」套用到新聞結構上進行分析外（第二章），也用了兩章的篇幅討論新聞的生產與理解，這一部分的討論當然就觸及到了脈絡層面。在 Van Dijk 看來，新聞生產的過程是記者從一系列的源文本（source texts）加工的過程；在這裡「源文本」指的是那些消息來源所有提供素材或訊息，如政治人物的聲明、相關部門發佈的報告、記者會新聞稿等。記者在取得這些源文本之後，必須藉由若干操作策略進行加工；這些策略包括選擇（selection）、複製（reproduction）、簡化（summarization）、

局部改寫 (local transformation)、風格與修辭的再表述 (stylistic and rhetorical reformation) 等 (1988: 114-118); 而主導這些加工策略的, Van Dijk 認為就是新聞價值, 它包括閱聽大眾的市場偏好、機構組織專業常規、以及其它如新奇性 (novelty)、即時性 (recency)、相關性 (relevance)、反面性 (deviance) 與反常性 (negativity) 等; 藉由這些新聞價值的指導, 記者得以將不同來源的源文本改寫成符合新聞稿格式的文本 (同上引: 121-123)。然而, 從源文本到新聞報導的加工過程, 究竟是怎麼完成的呢? 這就是 Van Dijk 在後續的著作中所要處理的課題了。

Van Dijk 在 2008 年所出版的《論述與脈絡》一書中, 更進一步的透過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對脈絡進行理論開發。他認為, 語言使用者在解讀或理解論述時, 會利用從文本和脈絡中所獲得的資訊, 或是同一時間內幾個不同層面 (語音、語法、語意和語用) 同步操作以解讀論述, 他將這個心理過程稱之為論述加工的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discourse processing)。而參與論述加工的, 除了屬於文本層面的語言學要素外, 就是脈絡了。換言之, 為了理解一個論述, 語言使用者需要預先假設大量的關於社會文化方面的「知識」; 沒有這些知識, 要確定句子間的連貫關係, 或是建構所謂「宏觀結構」, 都是不可能的, 於是「知識」就成為建構脈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Van Dijk, 2004)。

問題是, 離散在社會情境中的大量知識, 有那些部分會構成特定文本的脈絡呢? 在 Van Dijk 看來, 知識做為脈絡資產的一環, 被納入「脈絡化的過程」 (process of contextualization), 需要一個界面 (interface), 這個界面剛好介於文本與社會情境之間, 將社會情境中的知識建構成「脈絡」, 而履行這個界面的角色就是心理學上的認知 (cognition)。亦即所謂「脈絡」是參與者從社會情境中的相關知識所建構出來的, Van Dijk 稱之為「脈絡模型」 (context models)。在 Van Dijk 看來, 脈絡根本不是社會情境, 而是主觀的心靈模型 (a context is not a social situation but a subjective mental model), 它不追問社會情境中有那成分會影響論述的生產與理解, 而是追問在社會向度中如何進行主觀的詮釋與建構 (Van Dijk, 2003: 95)。

也可以說, Van Dijk 認為能夠讓一組語句形成局部或整體的連貫, 進而發展成一個論述, 同時這個論述又能為他人所理解, 都是經由居間充當脈絡的心靈模型發揮作用的結果。當然, 這個心靈模型既然是主觀的, 它必然是獨特且因人而異的, 它也必然是會受到客觀外在情境所制約的。因此, 當心靈模型在一個溝通對話情境中被啟動, 喚起的通常是那些普遍的、社會所共有的知識, 而其中更關

鍵的是心靈模型能夠回憶起多少這樣的知識。Van Dijk 認為，心靈模型的結構不是任意的，也非一成不變的，而是依照某種思維中的「基模」（schema）所組成的，這個基模隨著個人經驗與環境變化而不斷更新，也就是藉著這種基模的策略性操作，論述與整個互動交際的情境得以相適應。換言之，就是藉由脈絡模型的操作，社會、文化的普遍知識與個人結合，使得社會情境與論述得以構連 (2008: 99-101)。

可以這麼說，Van Dijk 認為脈絡模型的操作，直接掌控了論述的生產與理解。而這其中扮演關鍵機制的基模，只要碰到互動交際的情境就隨即啟動，在這裡基模所可能動員的類目包括當下時空情境（the current setting）、相關社會認同、新增知識、相關社會文化知識、社會態度與意識形態、意圖、情感、媒體內部的組織制約等，而這些與脈絡相關的類目（context-relevant categories），即是透過基模將其編組起來形成特定論述 (2008: 101-106)。而論述做為一種「結果」（consequences），可以透過分析的手段，將構成論述的相關類目再重建出來（同上引：108）。

伍、社會制約 vs. 心理建構：對話與比較

挺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有不少討論論述分析途徑的著作將 Fairclough 與 Van Dijk 兩人的理論並置，卻都沒有討論他們兩人論點的差異 (Hesmondhalgh, 2006; Philo, 2007)。而 Van Dijk 與 Fairclough 兩人的著作雖豐，但在自己著作中也鮮少提到對方的論點，即使提到也都刻意停留在引介層次，儘量不強調彼此在理論建構上的差異。然而，他們終究是批判論述分析途徑中被討論最多的兩位學者，因而也不能完全無視彼此的差異，而區隔他們兩人在理論建構上的異同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脈絡」的建構策略上，因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們兩人藉由迂迴的方式進行對話。

Fairclough 在 1995 年所出版的《媒介論述》（*Media discourse*）一書中，曾引介不同的論述分析途徑，這其中有特別提到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Fairclough 在引介 Van Dijk 理論之後，先特別稱許它在處理新聞論述上一個很有力的分析策略。但接下來他就指出這個架構在實踐上還是存有若干限制，包括首先，Fairclough 認為 Van Dijk 既然將分析焦點特別集中於新聞論述中的再現、社會關係與認同的課題上，何以完全忽略語言中的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的部分不論？其次，如果 Van Dijk 承認文本是藉由不同論述與文類所構築而成

的，何以他在分析上只著重單一文本的語言分析，卻忽略跨文本的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再其次，Van Dijk 將新聞產製視為靜態結構，形同複製了既得利益的支配關係 (Fairclough, 1995: 30)。這是在 Fairclough 的著作中，僅有的針對 Van Dijk 論點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很簡略，但也不能說不重，而他的立足點就是站在功能語言學與互文性分析的立場上進行批評。

相對的，Van Dijk 並沒有直接針對 Fairclough 的理論模型提出過批評。但他在 1997 年所出版的一篇討論論述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論文中，曾特別提到「建構脈絡」（constructing context）的兩個面向，其中一種脈絡他認為是固定（fixed）或既定（given）的，它或許具有彈性、會變化甚至需要協商，這種脈絡與論述間之關係是，一方面論述受脈絡條件制約，另一方面論述可以對脈絡發揮影響與建構的作用；換言之，論述是屬於脈絡中結構性的一環，它們相互建構，也相互影響 (15)。Van Dijk 雖然未言明，但這種對脈絡的建構策略，正就是 Fairclough 的立場。緊接著 Van Dijk 表示還有另外一種脈絡的觀點，完全不強調外在客觀社會事實的制約，而是強調參與者策略性的詮釋與選擇，在這裡所謂的脈絡就是一種心理建構（mental construct；同上引：16）。而 Van Dijk 宣稱他對脈絡的立場，就是後面的一種，這等於明示他與其他批判論述分析之間有所區隔。

僅僅是區隔當然還不夠。Van Dijk 在 2008 年所出版的《論述與脈絡》的一書中，特別花了一個章節的篇幅批判 Halliday 功能語言學對脈絡的觀點，而這個語言學立場正就是 Fairclough 理論架構所建基的基礎。在這個章節中，Van Dijk 認為 Halliday 將能力（competence）與知識的地位排除在外是明顯的盲點與偏見，他對文本與脈絡之間功能關係的討論也相當含糊，許多應該納入的功能他都未加以討論。在 Van Dijk 看來，功能語言學對脈絡的觀點，只強調社會情境與語言句法之間存有著「功能」上的連繫，卻將其中居關鍵位置的「心智」所扮演之角色排除在外，其實是不完整的脈絡理論；畢竟如果社會結構與社會情境可以直接影響語言論述的生產，那麼豈不意味，在相同的社會結構與情境下，應該產生完全一樣的論述？這中間如果抽離認知的因素，其實也將真正在發揮作用的脈絡給一併抽離掉了 (37-42)。在這個討論中，Van Dijk 並沒有直接批評 Fairclough 的理論，但他重話批判功能語言學對脈絡的觀點，也算是在間接批評了。

從 Van Dijk 與 Fairclough 之間迂迴而間接的對話看來，這兩位在當代同時倡議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家，各自選擇了不同的理論資源來建構他們對論述分析的脈絡理論。Fairclough 是從功能語言學出發，進一步與互文性分析的理論結合後，再整合其它的宏觀社會學理論；Van Dijk 則是從語用學的分析出發，進一步與社

會認知心理學結合後，再整合其它的學科。如果不從脈絡建構的角度切入，一般的研究者恐怕還不會意識到這兩位同樣列名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代表學者，在理論建構上的策略，竟會有那麼大的差異。

事實上，這兩位學者在分析策略上最大的差異，就是從一個「文本」出發之後，如何藉由不同的分析策略，完整的還原其背後之「脈絡」。畢竟提供脈絡建構所有可能的線索，都隱藏在文本裡，怎麼藉由分析技巧的拆解、重組以及再詮釋，讓「脈絡」得以浮現，就是兩位學者所發揮的重點了。在這裡 Fairclough 所選擇的主要是互文性的分析策略，藉由各種不同的文類、論述與風格在文本中如何配置與組合進行檢視；而 Van Dijk 所選擇的則是認知心理學的分析策略，處理各種源文本如何藉由心靈模型加以選擇、刪除與簡化等機制，來促成文本的生產與理解。換言之，他們都企圖在動態不居情境中，積極捕捉那些生產或理解「文本」上相關的「脈絡」；Fairclough 將待分析的文本，納入一個文本相互交錯的論述秩序中；Van Dijk 則是追問那些參與文本生產背後的源文本（或知識），是循怎樣的心理機制建構出來的。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挑選一個同樣的文本，分別交由 Fairclough 與 Van Dijk 進行分析，會得出怎樣不同的答案？透過前述的討論，其實不難推斷，就是因為他們處理「脈絡」的不同方式，可能會得出很不一樣的答案。Fairclough 會很重視文本與其它文本交叉互動的關係，而 Van Dijk 則更著重文本內部如何將知識轉化、編組為文本的心理過程。可以說，他們兩人所佈局的分析策略，一個往外開展，一個往內耕耘；一個處理與文本構成互文關係的「論述秩序」，一個處理建構文本的心理操作機制；一個走向社會學的進路，一個則走向心理學的進路了。

陸、結語

從近幾年針對若干「批判論述分析」為討論主題的著作看來，在可預見的未來，批判論述分析途徑或許將持續維持目前這種「眾聲喧嘩」的局面，不會走向整合趨同的方向 (Wodak & Meyer, 2009)。至少就本論文所處理的兩位學者 Fairclough 與 Van Dijk 為例，他們兩人都一直未停歇的在為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建構進行開發；但他們彼此間在理論風格上的差異也愈來愈大。對有意選擇他們的分析策略做為途徑方法的研究者而言，掌握他們在理論建構上的「差異」，比尋覓他們彼此間有那些共同點，恐怕更為重要。本論文所揭示的主要論點是，循著他們兩人如何「建構脈絡」的角度切入，是處理他們兩人理論差異的適當進路。

而透過他們兩人對「脈絡」理論建構上的對比，不難發現 Fairclough 對脈絡的處理，是愈來愈受互文性分析的風格影響；而 Van Dijk 對脈絡的處理，也愈來愈貼近認知心理學的角度。這兩種分析策略都能達成對文本的解析，但在實際處理上並不容易整合，研究者在決定選取那一種分析策略的時候，恐怕得要先追問自己的問題意識為何，再決定選擇那一種分析策略進行研究。

參考書目

- 弘文館譯（1985）。《普通語言學教程》。臺北：弘文館。（原書 De Saussure, F. [1965].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許力生（2006）。〈語言學研究的語境理論構建〉，《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4）：158-164。
- 彭宣維、趙秀鳳、張征譯（2000）。《功能語法導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原書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斐文（2000）。《現代英語語境學》。合肥，中國：安徽大學出版社。
- 董立河譯（2005）。《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北京：文津出版社。（原書 White, H.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謝石譯（1989）。《句法結構》，臺北：結構群（原書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Paris: Mouton.）
-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UK: Blackwell.
- Blommaert, J. (2001). Context is/as critiqu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1, 13-32.
-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1998).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edia: An analysis framework. In A. Bell and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142-162). Oxford, UK: Blackwell.
-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ervey, S. G. J. (1999). Context,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In R. Dille (Ed.), *The problem of context* (pp. 47-60). New York: Bergahn Books.

- Hesmondhalgh, D. (2006).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In M. Gillespie & J. Toynbee (Eds.), *Analysing media texts* (pp. 119-156).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hilo, G. (2007). News content studies, media group method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In E. Devereux (Ed.),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pp. 101-133). London: Sage.
- Reisigl, M., &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87-121). London: Sage.
- Taylor, S. (2001). Locating and constructing discourse analytic research.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 S. J. Yates (Eds.),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 (pp. 5-48). London: Sage.
- Van Dijk, T. A.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From text grammar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brief academic autobiography. Version 2.0*. Barcelona, Spain: Pompeu Fabra University.
- (2003).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pp. 85-10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1997). Discourse as interaction in society.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pp. 1-37). London: Sage.
-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Erlbaum.
- (1977).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 Wodak, R., & Krzyzanowski, M. (Eds.). (2008).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odak, R., & Meyer, M.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訊息與觀念互動的脈絡：以《時務報》為例^{*}

The Contextual Survey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 Case Study of *Shiwu bao* (*Chinese Progress*)

潘光哲^{**}

Pan, Kuang-Ch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壹、前言

1896 年 8 月 9 日，上海灘頭出現了一分新刊物：《時務報》¹。當它首度與大眾見面時，首先映入讀者眼簾的，便是梁啟超的論說：〈論報館有益於國事〉（1991），他不無激情地對心目中的理想報館應該涵括那些內容，自問自答：

報之例當如何？曰：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管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徑畫，與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辱；法律不講，為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跡，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同上引：6）。

在梁啟超的期許裡，報刊媒體承負的任務既繁且眾，它的讀者將進入的是一個可以無所不知的天地：既擁抱「五洲」、「全地」的世界，又可知悉「各省新政」、

* 筆者前撰〈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史林》，2006 年期 5（上海：2006 年 10 月）；本文即在是稿的基礎上，刪易而成，謹此說明。

** Email: mhkcpan@gate.sinica.edu.tw

1. 本文引用的《時務報》版本是《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景印〕，全 5 冊）；以下引用，除註明文章作者與篇名外，因各文單獨起頁，故另只註明景本總冊數與總頁碼。

「新法」的利益，也得以知曉「國體不立，受人嫚辱」的國族之恥，打造國族認同，還可以進入「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以外的「實學」的知識殿堂。

《時務報》是晚清「戊戌變法」時期最受矚目的期刊²，在當時讀書界引起的迴響，多元繁複³。從整體脈絡言之，報刊媒體做為近現代中國的「制度性傳播媒介」，影響深遠⁴；《時務報》的個例則可具體展示，「制度性傳播媒介」提供的訊息與當時觀念世界的互動，實是風華無限，樣態多重。如果取「制度性傳播媒介」提供的訊息與觀念世界的互動脈絡做為觀察視角，探討近代中國多重變動的歷史情境，當可精確深入的描繪歷史圖像的豐富樣態。本文撷拾《時務報》的若干例證，「野人獻曝」，期可提醒吾輩同好，相關課題的研究，仍有無限的天地。

貳、「宜廣譯錄」：找尋訊息的必要

自從 19 世紀中葉以降，東西海通交流大興，中國知識人對西方現代世界的諸般樣態，聞見愈多，知曉愈廣，報刊這等現代媒介的意義與作用，迅即廣泛地成為他們倡議大清帝國開展改革事業的參照要素。如改革派知識人先驅之一的鄭觀應即將「日報」看成是「泰西民政之樞紐」，並舉證歷歷地論說西方各國「報館」數目之眾，作用之大，「遠近各國之事，無不周知」，還具有深刻的政治效果：「是非眾著，隱聞胥彰」（鄭觀應，1988：345-346）。主張變法維新的康有為，亦將報館看成是足供「見聞日闢，可通時務」的工具，所以應該獎勵民間設立（康有為，1990a：96）；他更在可供為「知敵情」之資的脈絡下告訴清德宗：英國的《太晤士》與美國的《滴森》⁵是西方「著名佳報」裡「最著而有用者」，應該命令總理衙門「譯其政藝」，不但成為皇帝取讀之資，「可周知四海」，也該「多印副本，隨邸報同發，俾百寮咸通悉敵情」（康有為，1990b：180）。至於生平還

2. 《時務報》創刊於 1896 年 8 月 9 日，至 1898 年 7 月 26 日出版第 69 冊，宣告停刊。

3. 關於《時務報》的研究成果，專著部分最稱重要者，厥推閻小波《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1995）；其他一般中國新聞史的專著之述說，不詳舉例；關於《時務報》的兩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啟超與《時務報》之關聯的研究，更不可勝數，舉其要者，以廖梅對之汪康年之研究專著，最稱精審：《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2001）；餘例不一一詳舉。

4. 「制度性傳播媒介」是張灝教授提出的宏觀論說，他認為，從 1895 年至 1920 年初前後大約 25 年的時間，可名之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領域方面，也展現了突破性的巨變，報刊雜誌做為「制度性傳播媒介」的表現之一，不僅報導國內外的新聞，並具介紹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會意識的作用，影響深遠，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2004：37-60）。

5. 按，英之《太晤士》即 *The Times*；至於「美之《滴森》」，則尚莫知其詳。

莫知其詳的王覺任倡言「開儲材館」，即將「各國新報」列為應該繙譯的材料之一，而使進入「儲材館」的菁英能夠「以廣學識」（王覺任，1980：1330）。這些意見，展現了這樣的態勢：有意識地翻譯西方的資訊材料，做為汲引來自異域的知識／觀念／思想（乃至於「敵情」）的手段，並使之透過像報紙這樣的現代傳播媒介形式廣泛流布，儼然已蔚為社會共識。

從新聞實務的角度言之，晚清時期既存的報刊應當是促成這股社會共識的基礎。1871 年起，上海、香港與歐洲之間的有線電報接通，中國報紙開始刊登以電訊傳遞的新聞（方漢奇，1992：417）；《申報》則於 1882 年 2 月 23 日首先刊登利用中國的電訊傳遞的新聞稿（徐載平、徐瑞芳，1988：62），1884 年初問世於廣州，只存世不到一年的《述報》則引用日報所譯的西字報消息來報導「俄國深謀」（李磊，2002：120）。

這樣的社會共識，並得到了由中國知識人自身付諸實踐的嘗試。康有為等於 1895 年 8 月 17 日創設《萬國公報》於北京（湯志鈞，1993：22），就是維新派知識人邁出的第一步；隨後，北京強學會設立（1895 年 11 月中旬；同上引：27），又於 1895 年 12 月 16 日開始刊行《中外紀聞》，便將翻譯來自於西方的新聞資訊當成是這分刊物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外紀聞》的《凡例》即曰：

本局新印《中外紀聞》，冊首恭錄閣鈔，次全錄英國路透電報，次選譯外國各報，如《泰晤士報》、《水陸軍報》等類，次擇各省新報，如《直報》、《滬報》、《申報》、《新聞報》、《漢報》、《循環報》、《華字報》、《維新報》、《嶺南報》、《中西報》等類，次譯印西國格致有用諸書，次附論說（轉引自湯志鈞，1993：31）。

從知曉《英國路透電報》（即今日所謂「路透社（Reuters Telegram Company）新聞」）的存在，並且有意識地列為選譯之首，可以想見，在這群維新知識人的認知裡，「路透社新聞」占有的「權威」地位。蓋路透社確實可以說是大英帝國最關鍵的資訊掮客（the information broker；Potter, 2003: 88），它在 1889 年時便開始提供關於「中國與印度的特別服務」（Briggs & Burke, 2002: 138），《萬國公報》亦嘗譯載其消息⁶，信之尊之，良有以也⁷。迄 1896 年 1 月 12 日上海強學會又開

6. 例如：《萬國公報》，卷 83（1895）闕有「電書彙載」專欄，即刊有「倫敦路透總電報局致電上海云……」等訊息（見《萬國公報》，1968：15715）；至於《萬國公報》何時開始譯載路透社的新聞消息，不詳述（譯載其消息之專欄名稱，屢有不同，亦不詳述）。

7. 關於「路透社新聞」導入中國及其傳播情況的簡述，參見胡道靜〈報壇逸話·路透社在中國〉

始刊行《強學報》，它刊出的第一篇論說〈開設報館議〉也將「先開報館」視為強學會的首要工作，並以「譯外國報，敘外國政事地理風俗」列為這分刊物的六項主要內容之一，並認為這樣可以達成「士夫可通中外之故，識見日廣，人才日練」的「廣人才」之效（1991：4-5）。

《時務報》靈魂人物之一的汪康年，在 1894 年下半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因為當時上海報刊對於戰事的報導「附會神怪，妄誕不經，無一可信」，即萌生了辦報的念頭（汪詒年，1988：197-198），那時他想要辦的便是名稱為「譯報」的報紙（汪大燮函（七十二），1986：743）。他與各方友朋磋商，擬訂了招股細則，以集眾資而行己願，煞費心力⁸。迄乎汪康年與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在 1896 年初合流，攜手共進，準備開展《時務報》的共同事業（廖梅，2001：43-45），他們在 1896 年 6 月 22 日的《申報》上刊登即將〈新開時務報館〉（出版年代不詳）的廣告，把創辦的訊息將公之於世的時候，即宣稱：

今風會方開，人思發憤。宜廣譯錄，以資採擇。本館擬專發明政學要理，及翻各國報章，卷末並附新書。坐落上海石路南懷仁里。擇日開張，先此佈聞（同上引：340）。

《時務報》的實踐，也證明了自己確實做到了「宜廣譯錄」的自我宣稱⁹。

這樣看來，不論是在意識上或是行動上，中國知識人都肯認了翻譯西方資訊材料的必要性，並在自身創辦的現代傳播媒介上努力去做。

參、知曉「全地大局」及其反思

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1991）一文期許理想的報刊應當承負起「廣譯五洲近事」的職責，好讓讀者可以知曉「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然而，媒體提供的訊息不可能無所不包，媒體構成的關係網絡更是極其複雜。簡單的新聞傳播模式是：世界上發生了新聞，報紙（媒體）報導之，大眾消費之。然而，這個模式的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是更為複雜的。所謂有新聞，其實是透過如政

（1946：49-52）；其他新聞史著作的敘述（如：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1966：565-567），大多依胡道靜本文而裁剪成篇，不再一一徵引。

8. 汪康年當時的努力過程，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2001：30-33）。

9. 戈公振的觀察是《時務報》的「域外報譯獨占篇幅至二分之一而強」，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125）。

府、警方、股市，乃至於通訊社（the wire services）等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來源收集提供的。報紙的報導可見諸世眾，同樣是不同的從業員工作的結果。得有記者、編輯、印刷工人乃至於報童的「通力合作」（律師、會計師與市場行銷專家，也許同樣會插上一手）。消費新聞的大眾，則會由於性別、年齡層、種族、階級、收入、宗教信仰等等因素而顯現出零碎分散的樣態。好比說，《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關係作用之一就是以波士頓為根據地的美國職業棒球隊：紅襪隊（the Red Sox）藉以維繫它與球迷之間的關係（其他面向，則不多言）。從這個意義而言，報紙（媒體）就是物質性關係（material relationships）的聯合。除此之外，報紙還展現了另一種可稱之為再現關係（represented relationships）的關係網絡。何謂再現關係？往往即是報紙本身設定自己所要扮演的媒介角色。通常像是「報紙是人民的耳目」，「報紙是自由（liberty）的守護神」之類的「真理」，是這種再現關係的理想表現形式，讓報紙（媒介）可以說自己和公民的關係就是它是公民的鬥士，可以說自己和大眾或私人機構的關係就是它乃是它們的看門狗。這樣的再現關係，自然有助於物質性關係的運作（Barnhurst & Nerone, 2001: 2-3）。

由是觀之，《時務報》提供的訊息，絕對不可能涵括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的新聞消息，它們應該都是經過《時務報》的編者進行「篩選」工作的結果，它們反映的其實既是《時務報》的編者的關懷所在，也會受到訊息取材來源的制約。像是《時務報》正藉著異域之眼反觀自身，以外來的譯稿，為正在熾熱非常的變法維新運動張目，如從《倫敦東方報》譯出〈中國不能維新論〉，指陳變法維新的可能路向：

中國欲求維新之道，必自裁撤都察院及翰林館始。既撤，然後削總督之權，或逕除總督名目，僅設巡撫已可矣……若不維新，則凡遇不論如何凌辱之者，亦惟有耐受而已（張坤德譯，1991a：152-153）。

文末並有附語謂：

以上二篇皆英報之說，因照譯之，以見外人窺察我國之意。至其說之是否，閱者自能辨之，無待贅言（同上引）。

又如，《時務報》譯自上海《字林西報》的文稿，既聲言道「中國宜亟開民智」，並提出具體方案曰：「應廣佈淺近有用之學，如各國政治形勢之類，於考試時以之策士；而由國家編輯各種初學讀本，散佈民間」（孫超、王史譯，1991a：2933-2935），等於是為當時甚囂塵上的「開民智」運動¹⁰，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的入手方案。

《時務報》發刊期間，適值德國發動的「膠州灣事件」爆發（1897年11月），《時務報》即大量地刊出19篇與「膠州灣事件」的相關譯稿，甚至包括膠州灣形勢地圖（曾廣銓譯，1991a：3696），以及某位「現駐日本」的中國人的憤慨反應，把國遭此辱之源所在的批判矛頭指向了只知道「私妻子，保富貴，暖衣飽食」的「吾國家在位有司」（古城貞吉譯，1991a：3364-3365）。這樣，《時務報》提供的不僅僅是「膠州灣事件」發生的訊息而已，更帶給中國知識人許多震撼，激起讀者進一步的聯想與思考。如汪康年自身即撰有〈論膠州被佔事〉，申論因應之道，並批判曰：「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內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汪康年，1991：3527-3531）；他的批判意見，也得到讀者的迴響¹¹；一般知識人申論中國處境之危急，更引徵「膠州灣事件」為立論之一¹²。

《時務報》關於中國情勢的報導，五花八門，如翻譯了取材自《香港每日報》的資訊：

目前東方情形：其北界將為俄國所有；德既據有膠州，是山東已歸掌握；法之所占，必在福建。中國當另立新國，建都南京，以英為保助之國。然英亦必占據雲南、湖南、四川三省要隘云……（曾廣銓譯，1991b：3543-3544）。

類似中國國族瀕臨慘遭瓜分豆剖之命運的訊息，在《時務報》的篇章裡屢見不鮮。Anderson 指陳出版媒介在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報紙的被消費，正

10. 學界首倡研究「開民智」運動者當推李定一先生，見 Li, *The first cultural and social refor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1895-1898* (Abstract; 1970：279-283)；相關研究，如李昌華〈清季四川開民智運動之研究（1895-1911）〉（1980）；周麗潮〈湖南開民智運動之研究（1895-1911）〉（1982）。

11. 如夏曾佑讀此文後即謂：「尊處之謗政府亦云甚矣，不知政府見之，又作若何面目相向也」（夏曾佑，1986：1911），可見一斑。

12. 例如，尚莫詳作者與原來出處的文章即如是言之：「……德人強佔膠州，俄人思踞旅順，骨肉有限，剝削無已。天下大勢，岌岌可危。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此後事機益緊，發難愈速，將見海外各國效尤……」，見〈西人為患中國之由〉（1972：22A）。

是那個想像的世界根植於日常生活裡的絕佳例證（Anderson, 1983／吳叡人譯，1999：35-36）。對搏成中國國族的「想像共同體」而言，《時務報》刊布的消息，應亦可視為其動力來源之一。

肆、訊息與認識世界

在「西潮東漸」的背景下，晚清知識人的思想觀念得到了嬗變的空間，域外地理知識與現代地理學的導入，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與理解，逐漸擴大（郭雙林，2000；鄒振環，2000）。像《時務報》這等媒介提供了列國彼此交涉的大量資訊，也正是製造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憑藉。例如，《時務報》述說英、德之間往來交涉，彼此合縱連橫的錯綜複雜情勢（孫超、王史譯，1991b：2715-2716）；大量報導關於「美西戰爭」的情況¹³（甚至於附有〈美日戰場圖〉[1991：4327-4328]），便可能開啟了讓讀者瞭解世界列國彼此交涉樣態的資訊／知識空間。《時務報》供應這些文稿，有自身的特殊用意，如述說英國下議院議論英國應如何因應土耳其之內部動亂的文稿裡，《時務報》即特別添加按語曰：

土耳其之亂，各國恐震動全局，不敢干與其亂，遂無已時。各國為之牽制，此固歐洲之患，未始非東方維新圖治之候也，因詳譯之（張坤德譯，1991b：302）。

儼然提醒讀者注意世界局勢的變動，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藉著這些訊息，遂可讓中國知識人信筆立言，痛陳中國人好似「地理文盲」（geographical illiteracy；轉引自 Lewis & Wigen, 1997: x）一般，必然得遭受失地亡土的國族之恥：

若夫度數地圖之事，雖極淺近者，未嘗稍問津焉。然以帖括之故，得掇高科，而躋權要，則有以詞館之英，而問四川之近海與不近海，日本之在東在西者；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門在星架坡之外者；若親藩極貴，問安南在何處？與廣西近否？則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六千里之地與俄，可謂從古割地未有之事，而中朝若不知之，其它割黑頂子帕米爾於俄，分緬甸土司於法，剝野人山於英，皆茫然於其名，況於撫有其地哉（徐勤；1991：2842）？……

13. 《時務報》涉及「美西戰爭」的報導甚眾，不詳舉，述說其始末的譯稿是古城貞吉譯〈美西開戰始末〉（1991b：4337-4340）。

可以說，像《時務報》這樣的媒介製造／提供的資訊，儼然正是打造中國人對於「中國」乃是一個「地理體」（geo-body）¹⁴的泉源。

伍、結論：「制度性傳播媒介」與觀念的互動

新聞媒體傳播的內容與閱聽人的反應，向來錯綜複雜。可是，一旦「新聞做為公共知識」（news as public knowledge）的樣態問世，它便如音響的擴大機一樣，產生了不可思議的擴大作用，引發了公眾的注意¹⁵。《時務報》發刊的各等資訊，激起的迴響，固然不一而足，更儼然為大清帝國的變遷前景，在思想層域積蓄了無數的可能潛在動力。

當然，《時務報》提供的訊息，未必產生直接而現實的單線效果。就如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的論證而言，可能過於簡易樂觀。人們不會只從一個管道得到各式各樣的「世界知識」而已。就大英帝國及其領地之間的情況而論，Anderson 的論點可能會忽略了各地區的地方認同與利益，也處於持續不斷的打造／維繫過程，人們閱讀的，不見得是在帝國範圍內的全國性報刊（也不會只閱讀一分而已），許多區域性的報刊，其實也會鼓動極其複雜的認同面向。例如，身兼報人與加拿大參議員（Senator）二職的 O'Leary，是在愛爾蘭大飢荒時期移往加拿大的愛爾蘭人後裔，即回憶說他在 Quebec 成長的青年時分，閱讀的多是愛爾蘭人的報紙，「從 Dublin 來的《自由人》（*Freeman's journal*），從 New York 來的《愛爾蘭世界》（*Irish world*），從 Minneapolis 來的《愛爾蘭標準》（*Irish standard*）」，所以他說，「我們知曉的不列顛的政局，尤勝於加拿大」。也就是說，他正是從這樣特別的視角積累關於不列顛政局的知識（轉引自 Potter, 2003: 215）。同樣的，晚清知識人知道國族危難／世界變局的渠道，也可能多重複雜，《時務報》提供的訊息，實非惟一渠道；他們的認知和迴響，也是千樣萬態，更難可一言蔽之。

無論如何，就 1890 年代中末期的中國思想世界而言，像《時務報》這等媒體可以快速提供的訊息，非僅可以讓讀者儘速地掌握世局之變，也成為他們理解

14. 「地理體」的觀念，參見 Winichakul (1994)；承沈松橋教授提示注意此論，謹此深致謝悃。

15. 這是 Schudson 對於美國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等）的反省，他提出了「新聞做為公共知識」（news as public knowledge）的論說。在他看來，媒體向公眾提供了某條新聞，它就被授與了某種公共正當性（public legitimacy），閱聽人在公共論壇上便可一起討論它，這樣，新聞報導不僅是散佈傳播而已，更是產生了像音響擴大機一樣的擴大作用，引發了公眾的注意力，參見 Schudson (1995: 19-21)；當然，他亦指陳，這是在人們相信穩定可靠的民主體制之下，公民應隨時獲得有效資訊的理想情境下的論說。

／認識／闡釋世界的依據之一。正如 Carey 所謂，報紙與其他媒體扮演的角色是「建構與維繫一個井然有序而又意義無窮的文化世界」，在他看來，閱報的最重要的效果，並不是讀者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事實資訊，而是他或她可以「做為觀察者，參與了一個各種力量相互競逐的世界」(Carey, 1989: 18-20，轉引自 Popkin, 1995: 23)。《時務報》做為供應多樣訊息／知識的載體，正容許當時的知識人自由進出，共享同潤，並開展自身獨特的精神／思想活動，讀者對於它的回應，更是千樣萬態（潘光哲，2005：60-83）。就這個面向而言，在 1890 年代中期起，像《時務報》這樣的「制度性傳播媒介」提供的訊息，正為搥成近代中國觀念世界多重變動的歷史場景，提供了無窮的動力來源。如果選取與《時務報》同期存在的其他媒體（如《萬國公報》、《知新報》等等）提供的訊息，相互對比，那麼，我們對於當時「制度性傳播媒介」提供的訊息與觀念世界互動的多重樣態，應當可以有更形豐富精致的認識。

參考書目

- 上海強學會（1991）。〈開設報館議〉，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1，《強學報》），總頁 4-5。北京：中華書局。
- 戈公振（1927）。《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方漢奇主編（1992）。《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卷 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王覺任（1980）。〈開儲材館議〉，邵之棠（編），《皇朝經世文統編》（景本冊 714），總頁 1330。臺北：文海。
- 古城貞吉譯（1991a）。〈中人憤言〉，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4，《時務報》），總頁 3364-3365。北京：中華書局。
- （1991b）。〈美西開戰始末〉，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5，《時務報》），總頁 4337-4340。北京：中華書局。
- 〈西人為患中國之由〉。（1972）。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輯 72），頁 22A。臺北：文海。
-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
- （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李昌華（1980）。《清季四川開民智運動之研究（1895-191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磊（2002）。《《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蘭州，中國：蘭州大學出版社。
- 〈汪大燮函（七十二）〉。（1986）。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冊1），頁7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汪康年（1991）。〈論膠州被佔事〉，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4，《時務報》），總頁3527-3531。北京：中華書局。
- 汪詒年（1988）。《汪穉卿（康年）先生傳記》，章伯鋒、顧亞（編），《近代稗海》（輯12），頁197-198。成都，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
- 周麗潮（1982）。《湖南開民智運動之研究（1895-191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樂知主編（1968）。《萬國公報》（冊25）。臺北：華文。
- 〈美日戰場圖〉。（1991）。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5，《時務報》），總頁4327-4328。北京：中華書局。
- 胡道靜（1946）。〈報壇逸話·路透社在中國〉，《新聞史上的新時代》，頁49-52。上海：世界書局。
- 夏曾佑（1986）。〈夏曾佑函（十八）〉，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冊2），頁19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超、王史譯（1991a）。〈中國宜亟開民智論〉，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4，《時務報》），總頁2933-2935。北京：中華書局。
- （1991b）。〈德人仇英〉，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3，《時務報》），總頁2715-2716。北京：中華書局。
- 徐勤（1991）。〈中國除害議〉，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4，《時務報》），總頁2842。北京：中華書局。
- 徐載平、徐瑞芳（1988）。《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
- 康有為（1990a）。〈上今上皇帝第二書（1895年5月2日）〉，姜義華、吳根樑（編），《康有為全集》（冊2），頁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0b）。〈上今上皇帝第四書（1895年6月30日）〉，姜義華、吳根樑（編），《康有為全集》（冊2），頁1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張坤德譯（1991a）。〈中國不能維新論〉，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1，《時務報》），總頁152-153。北京：中華書局。
- （1991b）。〈英國下議院議論土亂及英國應如何辦法〉，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1，《時務報》），總頁302。北京：中華書局。

- 張灝（2004）。〈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頁 37-60。臺北：聯經。
- 梁啟超（1991）。〈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1，《時務報》），總頁 6。北京：中華書局。
- 郭雙林（2000）。《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曾虛白主編（1966）。《中國新聞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曾廣銓譯（1991a）。〈膠州灣圖說〉，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4，《時務報》），總頁 3696。北京：中華書局。
- （1991b）。〈論各國於東方用意所在〉，強學報館、時務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景本冊 4，《時務報》），總頁 3543-3544。北京：中華書局。
- 湯志鈞（1993）。《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新開時務報館〉。（出版年代不詳）。《申報》（景本冊 53），總頁 340。
- 鄒振環（2000）。《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廖梅（2001）。《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潘光哲（2005）。〈《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5：60-83。
- 鄭觀應（1988）。〈日報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頁 345-3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閻小波（1995）。《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上海：三聯書店。
- Barnhurst, K. G., & Nerone, J. (2001). *The form of news: A hist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Briggs, A., & Burke, P. (2002).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ewis, M. W., & Wigen, K. E. (1997).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T.-I. (1970). The first cultural and social refor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1895-1898 (Abstract). 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頁 279-283。香港：萬有圖書公司。
- Popkin, J. D. (1995). Media and revolutionary crises. In J. D. Popkin (Ed.), *Media an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 23).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Potter, S. J. (2003).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 The emergence of an imperial press system, 1876-1922*.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nichakul, T.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同／異之間： 社會科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的對話之旅^{*}

Patterns / Variations: Bridging Historicist and Historian Approaches in Journalism History

張詠^{**}

Volz, Yong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Missouri, USA

壹、歷史研究是否需要理論？

傳統史學認為歷史是一種敘事與記錄，所研究的是特定時空下發展出的社會存在現象。然而，好的歷史研究往往能夠超越對個別事件的細節性描述，而使讀者達到一般性的了解。也就是說，歷史的技藝在於能將對個案的分析提升到社會科學意義的理解，將事件、個人作為社會過程和社會基本組織的縮影，以理論闡釋歷史進程的普遍和特殊原則。

為什麼歷史研究需要理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怎麼運用理論？我做新聞史研究也還在試驗摸索中，這裡只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一點讀書、教學和研究的心得。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先從余英時（1979／2008：90）所說的傳統的史料學派和受社會科學影響的史觀學派的區別來談。傳統史料學派的做法，是先對所研究的特定的時代和區域有廣泛的了解，仔細爬梳蒐羅得到的大量文獻，再找出一個有意義的選題，由材料自身發展和歸納出立論的觀點。而從社會歷史學的做法看，則是先有一個普遍性的理論問題，再提出具體的理論預想，然後透過梳理所記載的具體歷史事件的相關文獻，來演繹、印證、補充和完善一般性的社會理論。這兩種歷史研究的取向，一個歸納，

* 本文的完成，承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侯剛本在訪談的基礎上梳理、潤色，備極辛勞。其中的治史觀點，受李金銓教授指導頗多。對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的各位同仁的幫助，謹表致謝之忱。

** Email: volzy@missouri.edu

一個演繹；一個見異，一個求同；一個強調以史料為還原歷史的基礎，一個則以理論為檢視歷史的起點。

我個人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在具體材料和理論概念之間不斷地、來回地穿梭。對理論的把握可以鍛鍊鑑別「好的問題意識」，提出有普遍意義的選題，社會學的理论概念也可以幫助掌握各類材料之間的扣連關係，以及材料和問題之間的聯繫。

歷史研究需要理論的照明，同樣，社會科學研究也需要融合歷史研究的核心精神。回顧許多做社會理論的人，也都會回歸到歷史脈絡的研究中。像涂爾幹、韋伯、馬克思這幾位社會學巨擘，都是在歷史的脈絡下發展出有力的解釋性概念，用於對不同社會結構的批判性分析。引用社會學家密爾斯（C. Wright Mills）的話說：「每一個社會科學或每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學研究，都需要一個歷史的關懷與範疇，以及對歷史資料的廣泛使用。」（1959: 145）。除了透過歷史事件的元素形構研究觀點之外，要更進一步地透過所形構的觀點，進行對於歷史的診斷，並從社會結構的研究分析中，找到一條改善社會的方法與途徑。

我之前的學術背景，經歷過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兩套不同的訓練，有過選擇的困惑，也一直在求索自己能夠接受的歷史研究路數。我會對一個歷史現象感興趣，有一個大致的脈絡的了解，然後會研讀一些理論，以燭照關心的具體問題，並提出假設性的回答。有了具體的問題和假設，就可以著手系統地收集、甄別資料，在大的理論和歷史脈絡中去辨證具體的歷史案例。這樣的研究取向，也許就是胡適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概念。從理論建構的角度與社會科學的概念大膽假設，並從中提出創新性且具有解釋力的闡釋，但小心求證的這個部分，還是要讓自己的創新性和解釋力的論述回到史料和證據當中。胡適的這八字箴言，時刻提醒我們要在理論假設和史料之間尋求平衡。對於做傳統歷史考據工作的人，需要大膽地做理論假設，對於受過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人，更要在這樣的精神之下小心求證。

貳、脈絡的重要性

然而，不管是從事歷史的研究或是社會科學研究，皆不能忽略脈絡（context）的重要性。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專攻英國史，畢業後才轉向中國史的研究。他一直從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脈絡開展中國史，他受過西方社會科學的訓練，但是對理論在歷史中的應用非常小心。他認為，治學不可被似

有創意而數據不足的社會科學理論所迷惑，必須從大量多種史料的考訂、詮釋、控制入手（何炳棣，2005：300）。他又說：「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同上引：434）。我一開始是從思想史開始做的，主要看梁啟超和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從他們的著作來看他們怎麼闡釋新聞的社會意義；但是後來我發現這樣的起點，會缺乏對整個脈絡的理解，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個論述，要看整個大的文化背景，也要看他整個的思想轉折，個人更微觀的情景。往往我們都覺得脈絡指的就是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但是「個人」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脈絡：即他的社會關係網絡。梁啟超這個人在特定的歷史場景當中，他的思想源流是從那裡來的，受什麼經歷和甚麼人的影響，然後他又去影響什麼人；把他的觀點放在這個特定的時間點和社會網絡中去觀察，會比較容易把握這個人的思想過程的變化，而不是僅止於把他這一生多年的闡述，做為一個持恆不變的、非常個人的新聞理念。所以何秉棣特別提醒做思想史的研究者們，堅實的史料根據乃為史家養命之源，必須耐心地去翻查大量那個時代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的文獻史料。要把握這些歷史人物的個人脈絡，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了解個人的脈絡關係。在具體方法上，著重地看他的傳記、日誌和交往書信，以及他的社會網絡中的相關人物的資料做為佐證，進而理解這個人的新聞觀念的發展的關鍵點。

我讀書的時候，當時大家都喜歡批判性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但是在具體操作時，論述分析被當作一個架空了的理論框架，做出的論文，往往開篇先是設置一個大而化之的社會文化場景，然後直接跳到具體的文本，埋頭分析文本的含義是什麼，而文本與脈絡之間的勾連則語焉不詳。我覺得在大的社會脈絡和具體的文本之間應該搭一座橋，因為論述分析應該是個社會學的分析，需要看論述的生產、流通、消費和再生產的環環相扣的社會過程，而不應僅僅著眼於文本的本身。我們所說的脈絡分析就應該落實到對這個社會過程的分析，而對這個過程的分析又應該落實到對鉅觀的社會脈絡和微觀的個人脈絡之間的「中層的脈絡」的分析。就具體方法而言，中層的脈絡可以落實到「社會網絡關係」（social network），這個交往網絡可以是私誼網絡，也可是結社或集會網絡，或是通過媒體形成的公共交往網絡。這樣，我們先看一個抽象的歷史遠景，把它的鏡頭拉近到中景，了解整個歷史文化的脈絡是怎樣型塑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社會過程，進而了解其中各個當事人通過各種社會網絡獲得各項政治和文化資源，從事話語實踐，再將這些關鍵人作為某個特定歷史時空中的節點（node）和聚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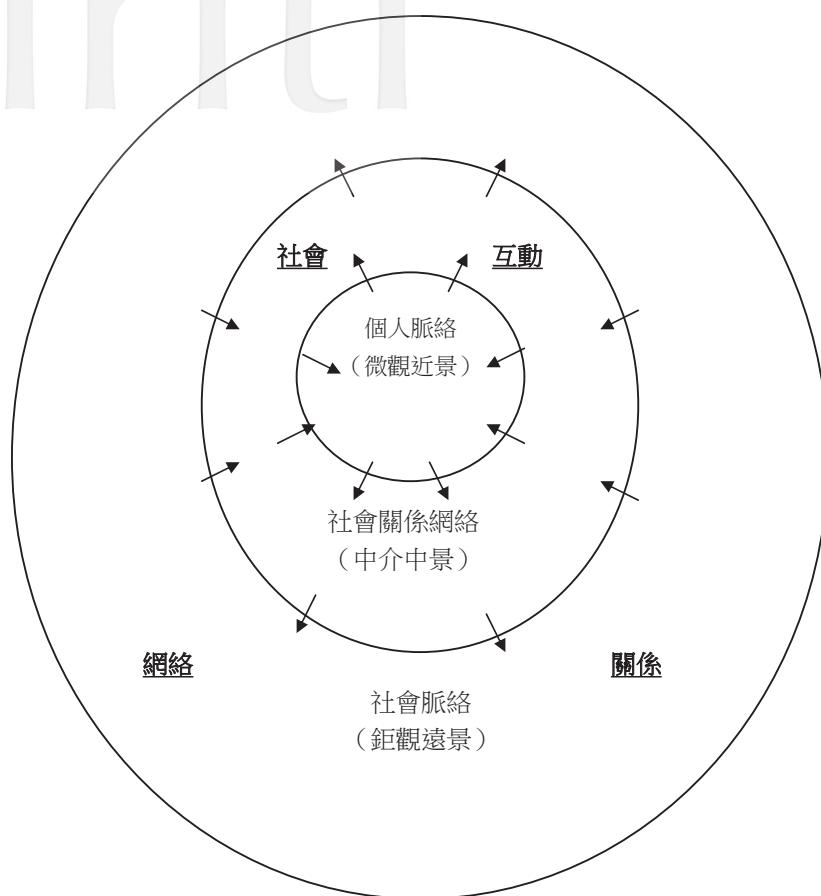


圖 1：脈絡層次圖

資料來源：侯剛本根據訪談內容所繪。

（cluster），來看他們又怎樣通過延伸他們的社會網絡而向外幅射產生影響。這樣來看（見圖 1），從大的社會脈絡（遠景）、落到社會關係網絡的闡釋群體（中景）、進而再到具體的個人（近景），有三層相輔相成、環環相扣的脈絡關係。

參、歷史學研究的視角取徑

歷史研究的視角取徑大致可從兩個切入點來談：一個是從人文的角度，另一個是社會科學的角度（見表 1）。

人文取向的學者，研究興趣往往關注個體的經歷體驗和歷史事件的特殊性；社會科學取向的學者，則追求歷史進程中概括性和普遍性的原則。舉例來說，前

人文角度的歷史研究	社會科學角度的歷史研究
1. 關注個體	1. 關注社會結構
2. 求異	2. 求同
3. 闡釋觀點	3. 建構／修補理論
4. 追求如何（How）	4. 追求為何（Why）
5. 重視個體的經驗和歷程	5. 重視社會結構和能動性的互動
6. 看重動機、情感與意義	6. 看重整體行為與類型歸因
7. 研究結果是否為真	7. 研究結果有無解釋力

表 1：歷史研究與社會研究的核心關懷

資料來源：Tilly, C. (2007). Three visi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46, 299-307; Tilly, C. (1990). How (and what) are historians doing?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 685-711.

者會問：「為什麼二戰會發生？」這是一個傳統的歷史問題。但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則會問：「為什麼戰爭會發生？」，因為社會科學所要尋求的是一個規律的公約數，意圖「求同」，所以要在不同的戰爭中找出共同的變量與類型。但從人文的角度來看，它關心的是「求異」，研究的是每一場戰爭背後的個別差異性。傳統史學會認為「戰爭為什麼會發生」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它忽視了個體的具體性與差異性。所以這兩個取向的世界觀是不一樣的，它們所認識個體的角度也不同：社會科學的角度強調個體間的共通性，研究是要尋找出個案之間的共性。從人文的角度來看，每個個體都是特殊的，所以做研究的目的乃是要回歸事實，還原真相，把每個事件的複雜性找出來。

另外，人文的角度是要「闡釋一個觀點」，以幫助理解一個具體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後果；從社會科學的目的來說，則是要「建構」或是「修補」一套理論，它所希望提供的是一個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解釋，這樣的解釋能夠被應用或被轉移到其它的案例之中。即或人文和社會的視角做的都是個案研究（case study），人文視角希望回歸到事件的原貌（how），而社會科學則要問「為什麼」（why），要處理的不是一個特殊事實，而是一個普遍解釋。人文的角度也特別強調個體的經驗，社會科學的角度所關懷的則是社會型態與社會歷程，也就是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的互動。再者，若是從分析的核心來看，人文的角度特別注重身處歷史情境中的個人動機、感情和行為的意義，社會學的角度則著重於系統性的社會結構，是對整體的行為與類型性的歸因分析。

從敘事風格來看，一般來說人文角度的歷史著作會好讀一點，因為它是一個回歸事實的求真敘述，而社會科學角度則側重分析、解釋，甚或預測。從評價標準而言，人文歷史學家在意研究的結果是否為真，社會科學學者則關注提出的論點有沒有普遍性的解釋力。

肆、傳播史的三個研究面向

傳播史研究需要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努力。做歷史的、做文學的、做傳播學的、做性別或族群研究的，都在做傳播史；大家做的角度不一樣，集力而為，則可以相互啟發和補充。以報紙為例，做歷史研究的人把往往將報紙當做一個記錄歷史事件的資料來源，和方誌、日記等資料一起使用，以求甄別或印證。做新聞史研究的人看待報紙的方式則不同，他們將新聞做為研究的主體，透過報導的文本來看歷史脈絡中的人類意識。

傳播史研究大致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做的是生產過程的研究，探討在一定的歷史情境中，媒介是如何組織起來的、記者的組成是什麼及其社會化過程、新聞是如何處理的、媒介的政治和社會的立場為何、它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又為何等等 (Schudson, 2000)。所以如果要做新聞和文化生產過程的歷史研究，落實到資料就是要去看這些媒介和相關人士的檔案資料或回憶錄。

第二類做的是文本研究，也就是脫離了組織或制度的研究，而關注新聞（報紙、電視或其它媒介平台的文本內容）本身的呈現，尤其關注的是它的文化意義。這也就是 Carey 在 70 年代所倡導的新聞史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s；Carey, 1974）。

第三類的傳播史研究則探討閱聽人的組成和他們對文本的解讀。英國文化研究中的新閱聽人的取向 (new audience research) 認為，新聞文本本身是多義性的，閱聽人對文本的解讀依賴於他們各自對性別、世代、種族、階級和文化的認同，也依賴於他們過往的經驗、教育和認知，這樣他們的解讀與文本生產者的原意很有可能大相逕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解讀參與了文本的再生產過程 (Boyd-Barrett, 1995)。

在美國傳播史的研究中，我個人最推崇的是社會學家 Schudson (2000)。大家對他應該很熟悉。他是哈佛社會學的訓練，1978 年的成名作的副題就是「美國報紙的社會史」。我曾經問過他成名作的出書經歷，很有意味的是，他的書稿曾被明尼蘇達大學的新聞史專家 Emery 教授斃審，幾經輾轉重投，才得以出版。Emery 教授是 50、60 年代美國新聞史經典教科書的作者 (1962)，代表傳統敘事型新聞史的取向，他對 Schudson 的斃稿，實際上彰顯了 70 年代傳統新聞史和後來居上的社會歷史學的衝突和競爭。除了 Schudson，做傳播史的華人學者可能不太熟悉的還有 Nord，著作也非常精彩。他強調傳播史應該是制度史，要注重媒介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和政經關係，也特別關注讀者的組成。他從社群 (community)

的概念出發，探討社群與新聞生產和再生產（community of journalism）之間的關係，從讀者的角度為新聞史研究找到一個新的落腳點。他曾以 19 世紀芝加哥報紙為例，做了非常細緻的讀者的階層分析。雖然 Nord 認為 Carey「文化轉向」的論點具有深意，但他覺得僅僅依賴於新聞文本的文化研究，難以觸及到最核心的權力關係的分析，也往往忽略政治經濟結構對新聞體制和新聞運作的型塑和限制。也因此，他認為新聞史研究的核心應該回到研究新聞媒體、新聞從業人員和讀者本身，回到政經的歷史脈絡中 (Nord, 1988)。

伍、歷史的精神與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很難。我們故事要「怎麼說」，尤其是要把一堆看似雜亂無章的歷史材料放在一起來說好一個故事，是要放入你個人的理解，還是要盡力接近真實？這個真實，如果我們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來看，不是絕對的，而是多義性的。還原真實是歷史的精神和追求，但任何還原總還是有某個「特定的視角」。所以「做歷史需不需要理論」，這個理論也可以理解為「觀點」和「視角」。這樣看的話，即使是傳統歷史的敘事書寫也是暗含理論取向的。

談到歷史研究方法，就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而言，理想上，首先要大量閱讀相關的史料；比方你做 1920 年代中國史，就要把那個年代各個面向的原始的歷史材料，包括政治、軍事、文化、個人傳記……都要拿來讀，力求閱讀面的廣博。什麼都不要想，就先讀；讀了之後自然而然會發展出一個靈感，從而確定一個研究題目，找出它的問題意識來。有了問題意識之後再回頭去看先前的那些資料，通過系統地整理、排比來駕馭那些原始資料。如果嚴格按照紮根理論來做，光是第一步的大量閱讀就得花上很多時間，直到等你看得多了，才會發展出研究的敏感度，找出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問題。然而就實際操作而言，因為時間和材料的限制，往往不能漫無目的地去閱讀大量史料，而需要帶著一個大致的問題和想法去看材料。在這樣的過程中，有理論的訓練不僅能夠使材料的閱讀有的放矢，而且可以提升出一個社會學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只是做 1920 年代中國史研究的人感興趣，做 1920 年代美國史或其它歷史年代的人也會得到啟發，甚或做社會科學的人都會對概念性的問題感興趣。

舉一個「制度移植」的概念為例。我做的具體問題是美國的新聞教育作為新聞專業化的制度是如何移植到近代中國的。這個移植發生在中國的 20、30 年代，有其具體而且可能是特殊的時空脈絡，但是通過這個歷史案例可以進一步發揮和

解釋制度移植的概念，對當前全球化情景下不同國家移植他國的現成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或也可以有參照意義。同樣，我也可以借鑒其它國家在其它年代的案例，來對照我的具體研究問題，以求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和對制度移植理論的更深探求。比如說，現有的研究將殖民地運動中的制度移植過程大致分為全盤接受式、抵抗式和協商式三大類型。這些現有的類型可以幫助我找出材料中的聯繫，以類型規整材料，但是在一個類型中也要留心彼此的異處。既求共同的類別，也求同一類別中的高低層次，如此才能夠把歷史做得細緻，而不僅僅給它套一個現成的架子依樣畫葫蘆。

口述史的訪談也是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學生常常會問我，到底訪談的個案要做「多少個」才夠？材料要收集到什麼地步才可以停手？我認為這首先要看你問的是什麼問題，來決定你的研究框架、個案數目和材料種類。其次，這個問題有兩個條件必須考慮，首先，當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時，要判斷所蒐集的信息是否已經飽和，如果你所再得到的資料也只是重複印證你從材料中得到的觀察和論點，那麼這些資料不能夠再提供給你新的視角，這時可以不用再找新資料。至於另外一個狀況是當研究者透過大量的資料，找到存在於資料之間的樣貌（pattern），並從足夠多的例證中找出類別同時又能保持個案之間的差異性時，唯有在這兩種狀態底下，研究者才能夠暫時停止收集資料。

然而，不管是做社會科學或是傳統歷史學的研究，二者都要試圖解釋因果關係（causal effect）。社會科學的因果關係常用變量分析來做，做歷史的人除了描述歷史現象，也要找出事件發生原因、事件之間的影響，以及變遷因素。歷史學家對因果關係的判斷要經歷過好幾個步驟。首先，要先經過一個時間的編序，「那個事件發生在前，那個事件發生在後」，然後再看事件發生的各個脈絡，找出不同的可能解釋，再審慎評估最可能也最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個解釋不單單是要合情合理，也要有信效度，能以大量的、不同類別的論據來支持，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研究者論證的功力。

陸、辨析歷史細節的意義

佛家說，「是非無實相，轉眼究成空」，提醒我們不要輕易地判斷歷史的是是非非。但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需要對史料有一個分辨真偽的工夫。你所拿到的歷史資料是否為真？這個歷史資料的作者是誰？對事件是目擊、是身歷、還是遠距離的觀忘？即使是近聚焦的觀察記錄，是否真可為實？如果抽去了脈絡，研究者對這個資料的理解很有可能有所偏差。

以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和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2011）來說。撇去觀點和批評的態度不談，李敖對龍應台書中的歷史小細節的挑刺（比如對臺北紫藤廬的來龍去脈的描述），固然有吹毛求疵之嫌，但的確是對研究者一個警示。不管是歷史學家或是歷史作家，選題立論自然重要，但應該重視細節，分辨真偽，因為一個小小細節的錯誤可能會使整個脈絡的詮釋發生錯亂和誤差。

李安當年拍《色戒》（2007），記者採訪他的拍攝過程，他特別提到盡量還原當時那個年代老上海街景的歷史痕跡；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牌照號碼，所有的尺寸都是經過大量調研確認後製作的，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一棵棵種下去的，易先生辦公室里那張民國時代的桌子，桌上所有的文具還有杯子，都是費了大工夫尋找而來。李安說，這樣做，是為了「搶救一段歷史」。電影創作尚如此追求細節的真實，做歷史研究不更應如此麼？有些社會科學學者批評歷史研究過於糾纏於細節，我倒覺得，立論首先要對史實有確切的把握，包括每一個文化實體，背後都有著特殊的歷史意味，每個意味組合在一起，才能盡量接近一個歷史現象的真實，這是歷史研究的精神，也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柒、如何開展歷史研究的敘事風格

到美國去唸書的時候，以前中文寫作的風格不再適用於另一套語言系統的論述習慣和要求。當時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博士班的導師李金銓教授告訴我，多讀一些歷史研究著作，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寫作風格，就將那個作者的文章反覆閱讀並練習臨摹。當時我找到的想要臨摹的學者是 Schudson，他將社會學的概念滲透在對史實的分析和敘事之中，絕非傳統學術寫作的洋八股：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和結論（1978）。他以概念編織材料，敘事性開展非常細緻，既有故事的生動性，又能提升到社會理論的層次。這種深入淺出的風格是我心之向往的，也是我寫作的摹本。我度假和旅行時，也常常會帶上他的書，反覆品味他的論述風格。至於中文的歷史研究，我喜歡余英時的書寫方式（如，[1976]），娓娓道來，層層細緻地剝開，常有恍然大悟、別有洞天的感覺。當然歷史的論述風格，每個研究者都有很多的範例可以挑選，重要的是不斷練手，在臨摹中逐漸摸索出自己的寫作風格。

捌、什麼樣的人適合做歷史研究

一個傳統的歷史學家的基本功在於考證史料的真偽，這個甄別過程很費功夫。很多費盡心力收集到的材料未必能夠用到，最終用上了的不過是所有材料中的鳳毛麟角。這也是「博觀而約取」的意思。若不從那麼多資料裡爬梳，又怎能發現新的歷史觀點和解釋。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效率看，確實做傳播史出論文的速度不及那些量化研究。我在人民大學讀書的時候，教授新聞史的方漢奇先生勉勵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年青人，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決心。做歷史研究會很孤獨，要投注很多的時間，必須對歷史研究有強烈的熱情與持久的興趣。

方老強調的是「厚積」的過程，好在歷史研究也可後續「薄發」。在積累的過程中，先有一個大的核心問題，然後陸續做個個小規模不同面相的研究，成為一個系列，最後可以串連起來以回答先設的核心問題。要提高效率，理論的訓練非常重要。有良好的理論背景，養成對訊息的敏感，容易抓到重點，因此能夠加快對材料的理解與吸收。或許第一篇論文最難寫，但是到了以後幾篇就會快一些，因為對資料愈發熟悉，對脈絡的掌握愈發自信，所以做歷史研究，將會是一個漸漸加快先苦後甘的過程。

那麼，什麼樣的人適合做歷史研究？我認為有兩種人適合做這樣的苦差事。一是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人，二是最好有豐富生命閱歷的人。一個做歷史研究的人，「移情」（empathy）能力很重要。要靠閱歷與閱讀培養移情能力，把自己放在歷史人物的位置上，去理解這些人的行為動機，以及他們情感的衝突和心理的矛盾。回想我二十多歲在看歷史人物的傳記時，有一定的情感上的回應，但理解上總還是一知半解、蜻蜓點水。年紀再大一些，自己經歷了出國、求學、結婚、生育，才會更有心地去關著歷史人物的方方面面，像是他的婚姻關係、家庭關係、師生關係、家中排行、出身背景……等等。比方說，某個歷史人物是江浙出身的，我就會關心他的社會網絡中的「鄉誼」關係，在歷史脈絡是否有解釋意義。又好比我現在也做母親了，就比較容易理解女記者在衝破男權社會的矛盾與妥協。以前讀清末民初女報人的文章，只不過停留在表面意思，現在重讀，就會多一些移情，將自己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以體會彼時他們的困惑與限制，想突破卻又不得維持社會當下的男性主導的報業體制。正因為有了移情，解釋歷史人物上也會更加小心謹慎，而盡量避免單面相的分析。而從另一方面看，這些年做歷史研究也增助了我「移情」式的理解能力，對我個人的成長包括待人接物和對日常社會生活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影響。另外，年輕的時候我愛看小說，

現在只看傳記、回憶錄和記載性的文獻，覺得更能夠產生共鳴，這個個人閱讀興趣的轉折可能和歷史求真的訓練都有關係。

參考書目

- 余英時（2008）。〈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頁 89-114。臺北：聯經。（[1979]。〈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1：1-24）——（1976）。《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
- 何炳棣（2005）。《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安（導演）。（2007）。《色戒》【影片】。中國及美國：焦點電影。
- 李敖（2011）。《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臺北：李敖。
-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雜誌。
- Boyd-Barrett, O. (1995). Approaches to “new audience research.” In O. Boyd-Barrett &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pp. 498-504). London: Bloomsbury.
- Carey, J. (1974).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 3-5, 27. Reprinted in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 Warren (Eds.). (1997). *James Carey: A reader* (pp. 86-94).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mery, E. (1962).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journal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d, D. P. (1988). A plea for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5, 8-17.
- Schudson, M. (2000).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again).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 pp. 175-200). London: Arnold.
-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Tilly, C. (2007). Three visi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46, 299-307.
- (1990). How (and what) are historians doing?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 685-711.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經濟學理中的脈絡元素

Context in the Content of Economics

doi:10.6123/JCRP.2011.025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黃登興(Deng-Shing Huang)

頁數/Page：123-12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2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經濟學理中的脈絡元素 Context in the Content of Economics

黃登興*

Huang, Deng-Shing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壹、緒論

先說文解字：「脈絡」（context）可解讀為來龍去脈、經緯、環境、背景、架構。此外「脈絡」也可以是網絡（network）、各種關係（relationship）如血緣關係、人際社會關係、競爭或合作關係。脈絡或網絡，兩者在經濟學領域中有時候是無法清楚的切割，因此本文在以下的論述中將兩者交替使用。

首先，要釐清「脈絡」在經濟學內的地位，我們先來解剖經濟學的「脈絡」。「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活動的學科。其探索範圍，依所觀察對象或參與經濟活動的實體（entity）規模，由小而大可解構如下：

個人 → 人與人 → 群體 → 群體與群體

亦即，個人的經濟活動 → 人與人的經濟活動 → 單一群體的經濟活動 → 兩個以上之群體的經濟活動。當我將經濟學的研究範疇作了這樣的解構時，已經提供了經濟學由小而大的「脈絡」。以下依這個順序，逐一解析經濟學理中的「脈絡」概念。以經濟學的專有名詞來表示，上述經濟學領域的「層次」關係，則可以大略統括為：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與國際經濟學（International Economics）。個體經濟學探討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生產者的生產行為、生產者結合而成的廠商與廠商結構，以及交易發生的市場與市場結構。群體經濟活動，則以一個族群、區域或一個國家為單位的經濟行為。這個層次，以一國而言，則涉及所謂的總體經濟活動。這時就涉及了這個

* Email: dhuang@econ.sinica.edu.tw

經濟體（economy）的產出水準（或稱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s, GDP）、價格與就業等總體變數（aggregate variable）的衡量與觀察，屬於所謂總體經濟學的範疇。換言之，總體經濟學是以國家為單位，探討一國之所得、就業、物價、貿易、環境、健康、人口等等總體變數的決定與政府政策的衝擊。最後，跨群體的經濟活動則如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跨國投資與跨國勞工、匯率、國際救助，甚至世界的經濟貿易組織如 GATT/WTO 等等，則屬於國際經濟學的範疇。顧名思義，其探討對象由國家擴及國與國間的經濟交流活動。當然，經濟學還可細分包括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經濟發展、健康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等等，但其中所含藏的脈絡元素而言，沒有特別之處，為節省篇幅略過不談。另外還有博弈理論與計量經濟學兩個領域，但前者以數學為底，後者以統計為基礎，非關本文所要談的「脈絡」故也略過不談。接下來我們依序由簡而繁的解析與經濟學領域有關之脈絡的概念。

大抵而言，我們將說明經濟學是以「人類的經濟活動」——生產、消費與分配，為研究對象；其主要內涵是：透過經濟現象的觀察，找出其運行的脈絡，據以分析與預測經濟活動的興衰，探討政策或客觀環境變化對於經濟活動的衝擊。整個經濟運行的系統中，關鍵的動力來源是交易行為，其發生所在的市場則扮演關鍵的資源分配角色，因此幾乎所有經濟脈絡，都可以透過市場這個脈衝所在來透視或解析。

貳、一個人的經濟活動

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網絡或脈絡的展現。在自給自足的環境中，一個人最少得面對要如何生存的民生問題。他本身是個消費者，同時也是個生產者。在原始的社會中，他得在有限的時間、體力下，決定生產或捕獵什麼東西來食用。這時候你觀察一個人，從他的消費內容如所吃的是米、麥為主，或肉魚、山林野味等等，這些「蛛絲馬跡」就可以尋出其經濟活動的「脈絡」，或沿這個脈絡來追尋背後幾個影響生產與消費行為關鍵因素：資源稟賦、生產技術與偏好。魚米之鄉，當然以魚米為主食，山林曠野之地則以走獸野味為糧食，這是「資源稟賦」所影響；也就是俗話說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古典貿易理論則稱為「資源稟賦說」（此說發源於二十世紀初的 Heckscher-Ohlin 定理；Jones, 1956）。若有山林，也有河川湖泊，有者因為善於捕獵而以山林野味肉食為主，有者則因善於種植或撒網打魚而以魚米為主食，這是因為生產技術的差異所影響，這是古典經濟理論中的相對優勢說（Comparative Advantage）。

參、多人的經濟活動：市場

當兩個人相遇、互動後，最可能發生的經濟行為就是「互通有無」。在沒有貨幣的時代，物物交易（barter economy）是最簡單的經濟行為，於是「市場」的活動出現了。住在山上的人以山產，交換住在海邊者的魚蝦。互通有無的結果，市場成了多餘物資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如 Smith（1776）在其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國富論》¹中所言，市場創造了剩餘物資的價值。顯然，市場成為經濟網絡或脈絡中一個重要的節點（node）。

另一方面，參與市場活動者，發覺不用所有要消費的物品都得自己生產，可以將時間盡量專注於自己比較擅長的生產活動；如此一來生產力可以提高，產量增加，再將多餘者送到市場找人換取其他的消費品（這也可以由前面提到之「相對優勢原理」來解讀）。換言之，市場催生了專業化的生產活動，而且市場規模越大，參與者越多，則專業化分工程度也就越細密；分工越細密則經濟活動的脈絡也跟著越複雜。以往是不同產品的交易，如衣服換糧食，逐漸演變同一個產業的產業內交易（intra-industry trade）。以紡織業為例，有人專門紡紗、有人專門織布、有人專門做成衣服，然後相互買賣。同樣地，其他製造業如製鞋業，也會出現類似的所謂上、下游垂直分工的製造與交易網絡。還有一種產業內貿易，則發生在同類但不同質的產品交易，尤其在國際貿易中我們發現一國同時出口與進口相類似產品，如成衣。這是由於透過國際市場的交流，引起對於舶來品的喜好。因為就是要穿些舶來品，因此雖然有國產品還是有進口需求。在這個例子裡，我們可以觀察到國際貿易的「示範」或誘發需求的經濟脈絡。換言之，市場不論是國內或國際的市場，除了扮演互通有無的交換平台外，它同時也扮演訊息（information）傳遞的中心。經濟活動，因為市場這個脈絡作用而促進了訊息的流通，也因為消息的流通而促使其互通有無的效率更為增加。經濟學原理中的「價格機能」（price mechanism），透過市場這個「暢通脈絡」的作用，使得生產要素得到最佳的使用，使得產出落到最需要著手中，物盡其用。

此外，由於外部性（externality）的作用²，我們會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網絡現象，即所謂的產業「聚集」（agglomeration）。例如我們可以發現同一個工業區

1. 書名原文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Smith, 1776)，經濟學界習慣簡譯為《國富論》。

2. 外部性指一個經濟活動的表現，影響其他經濟活動的結果之現象。外部性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的影響則造成受益者「搭便車」（free rider）的行為。

所聚集的都是生產電腦者，同一條街都是鞋店、或樂器行、或成衣店等等，如臺灣早期的打鐵街，家俱街等等。若去越南首府河內觀光，可以發現該地華人早期留下的商業聚落「行街」內，各街行業分明如漆器街、佛具街、食品街等等，則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產業聚集背後有「外部性」的本質在驅使。因為聚集使得技術與人才的交流方便，技術外溢效果強；商店街的同業聚集可聚集人潮搭他店之便車，省下銷售費用。換言之，產業「聚集」背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外部性」這個無形的關係之存在，其「來龍去脈」甚為清楚。

回到「市場」這個「節點」。原始之定時、定點的「市集」提供了現代市場活動的雛形³。市集的存在誘發專業生產與生產力的增加，專業分工帶來的便利與好處，使得市集的交易量更大、參與交易者更多，於是「商人」與「商店」出現了。商店乃常設性的市集，原始的功能可能是為那些找不到交易現象、無法完成物物交易者，提供儲存、保管的目的。「商人」的出現則象徵生產與運銷的分工，亦即生產的工作與將產品帶到市集之工作（運銷或行銷）兩者的分工。生產者與運銷者，最原始的組合可能就是家族的成員如兄弟、父子等，所謂血緣關係，為當今「家族企業」的雛形。這種家族成員間的合作，表面上依賴親屬血緣關係，但就經濟學的理論而言，這種合作關係本質上是建構在「信賴關係」上，「信賴關係」之所以重要，又根源於當事人雙方「訊息不對稱」的交易本質上。由於產品出門到市集交易的時間落差，同時成交價格如何也只有負責買賣者知道，因此若生產者對於行銷者沒有充分的信任，必然不敢貿然將貨品交付委託買賣。家族的共生互利關係，則可以無此顧忌。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人手不夠，於是其他的次等關係，如同窗、鄰居、同鄉等等，相對於沒有任何關係者，優先成為合作的對象。因為，有這些「關係」代表對於對方的訊息掌握愈充分，合作或委託代理時被欺瞞的風險愈小。在經濟學學理中，有無關係代表交易成本的多寡；這些關係透過信任度的提高，使雙方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降低，成交的可能性因此增加。因為買賣雙方訊息不對稱（賣方對於貨品的了解程度大於買方），交易的認證成本或欺瞞的風險成本（稱為風險貼[risk premium]）導致交易成功的機會降低，若有些「關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當今的經濟學中的訊息經濟、或博弈理論中就有專門探討訊息不對稱現象所衍生的經濟問題。

3. 傳統市場得有個具體的地方，一個買賣者都方便到達的地方，所以交通網絡發達程度決定市場的位置。現代市場，不必然發生於有個實體的地方，但方便於買賣雙方的本質並無二致，發展最極端的現代市場，則如當今的網路市場（書店、拍賣、購物）。它存在於虛擬的網路世界，沒有實體的地方可言，但是其提供買賣雙方「碰頭」的平台，則無二致。

前述之合作經營的型態，在當今的經濟體系所呈現的樣態更為多元。經濟學門中，大抵將其歸入「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課題。日本戰前的財閥集團(Zaibatsu)與戰後的系列企業(Keiretsu)、南韓的Chaebol與臺灣集團企業均是透過企業的聯盟關係，來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與市場佔有率⁴。在臺灣我們稱為關係企業，這裡企業的關係甚為廣義，除了一般的相互投資持股關係外，其他的私人關係如親屬關係、姻親關係、甚至舊識、同鄉關係都包括在內。換言之，在東方這種私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於企業組織如家族企業、集團企業或關係企業等，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此外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則進一步可能涉及政商關係，也牽動產業組資型態。另外稱之為「商務網絡」(business networks)，「個人網絡」(personal networks)或「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等等⁵，也在經濟、貿易的文獻中，被考慮並分析其在均衡(最後的經濟圖像)所扮演的角色。名稱或有不同，但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稱之為個人關係網絡或社會網絡，其影響經濟活動之表現主要是透過降低交易成本的管道。

有趣的是這類「關係」文獻均發現，相對於歐美的企業，「關係」在華人與亞洲企業或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有顯著的影響。這種關係網絡，固然如前述因為「天生」的信賴關係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使得企業組織的擴張更容易。前述集團企業在亞洲的發展，透過其關係企業的解析我們不難看出「關係」網絡所扮演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是因為透過私人關係與政商關係，而缺少透明度乃滋生弊端。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與受害嚴重的東南亞諸國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其背後都有建立在關係上的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在作祟。大抵而言，關係網絡在經濟學尤其是產業經濟中，被視作「降低交易成本」與「提高經濟風險」的兩面刀刃，前者有利於企業與市場擴張的作用，後者則暗藏著體系崩潰的危機。

4. 在 Feenstra, R. C., Huang, D.-S., & Hamilton, G. G. (2003). A market-power based model of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1, 459-485，我們透過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關係企業內交易成本如何影響集團組織型態。相對於日本與南韓大企業集團之擠壓小企業現象，臺灣集團企業的規模相對小，也給了個體廠商（不隸屬於任何集團者）更大的存活空間。另外在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economies: A comparative equilibrium analysis (Feenstra, Hamilton & Huang, 2001) 我們進一步就臺灣與南韓的集團企業做了比較。

5. 見 Numazaki, I. (1991).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Guanxiqiye (Related Enterprises). In G. G.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77-93).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另一篇將經濟學與社會學結合來討論的文獻有 Rauch, J. E. (2001).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1177-1203。

肆、結論

從前一節的內容，我們大略可以發現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網絡，甚至是貫穿整個經濟活動網絡的關鍵「器官」。在一般均衡的經濟理論裡，市場不只是產品市場，交易的標的幾乎是包羅萬象。買賣生產要素者稱為要素市場，如勞動市場或就業市場、資本市場、土地、房地產市場。買賣最終產品者，則有具體產品市場、無形資產市場、保險市場（買賣風險）、醫療市場、服務商品市場、訊息市場等等。交換中間財者則稱為中間財市場。換言之，在人類的經濟秩序中，交易的行為是構成經濟體系的重要活動，幾乎可稱是無所不在。而交易發生所在的市場，不管是具象的抑或虛擬的，其在經濟脈絡扮演重要器官的角色，則是無庸置疑。透過市場的把脈與觀察，從其參與者（買方、賣方）、交易標的（生產要素、消費品、中間財或零組件、資本財、風險），交易者的行為地位（獨佔、寡占或完全競爭）等等，我們可以進一步得知整個經濟體系運作的全貌。

另有一類經濟現象是無市場可觀察，但為經濟學中重要的課題者。最為典型的例子或「產品」是「環境污染」。毫無疑問，環境污染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主要產物。若說經濟活動都有市場可以觀察其來龍去脈，這顯然是個例外。「污染」在經濟活動中是個副產品。活絡的經濟活動帶來分工、量產的人類福利，市場經濟活動越熱絡，經濟利益越大，但副產品也越大，亦即帶來的環境污染也越大。在沒有節制規範的前提下，污染累積到整個環境生態無法負荷的程度，則物種滅絕、人類消失的絕境並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發現，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的關鍵是缺少「污染交易」的市場。而這個市場不存在的原因是「所有權」不明。前述產品市場，其交易標的有明確的所有者，該擁有者有權可以決定要賣或不賣。「環境污染」或「乾淨的環境」的產權不清，所以不存在可以對其進行買賣的市場。換言之，即便我想買「乾淨的環境」也不知向誰買。這在經濟學理論中稱之為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它是造成經濟體系崩潰的重要經濟活動之病原。存在這種「負面的外部性」之經濟活動副產品，光靠市場經濟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可供交易的市場不存在。於是政府的角色進來了，一方面他屬於經濟學中的公共經濟學的範圍，專注於所謂的公共政策制訂與形成等等議題。另一方面，這個領域再也不獨屬於經濟學所研究的範疇。直覺上，面對經濟活動所「生產」出來的職業病、環保、生態破壞等，民主機制、公民意識的塑造、社會運動的演化等等，都應該都與社會學和傳播學所關注的議題有密切的關連。

參考書目

- Feenstra, R. C., Hamilton, G., & Huang, D.-S. (2001).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economies: A comparative equilibrium analysis. In J. E. Rauch & A. Casella (Eds.), *Networks and markets* (pp. 86-14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eenstra, R. C., Huang, D.-S., & Hamilton, G. G. (2003). A market-power based model of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1, 459-485.
- Jones, R. (1956). Factor proportions and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 1-10.
- Numazaki, I. (1991).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Guanxiqiye (Related Enterprises). In G. G.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77-93).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Rauch, J. E. (2001).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1177-1203.
-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以組織同形理論探討大眾媒體中的跨組織模仿現象

The Phenomenon of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Mass Media Industry

doi:10.6123/JCRP.2011.026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李秀珠(Sarrina Shu-Chu Li)

頁數/Page：131-1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2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以組織同形理論探討大眾媒體中的 跨組織模仿現象

The Phenomenon of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Mass Media Industry

李秀珠 *

Li, Sarrina Shu-Chu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壹、緒論

大眾媒體產品與其他產品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其必須面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而大眾媒體產品之所以處在一個這麼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主要是因為它的產品特性：首先，大眾媒體所製造的產品是資訊，而非其他產業的實體產品，當所製造的產品是資訊時，其創意必須相當的高，而且必須不斷的更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報紙或電視新聞，其每天的新聞必須是不同的，不可能重複使用過去已經使用過的新聞，當然能夠稱之為新聞，其新聞性必須足夠。第二個大眾媒體產品的特性在於其產品必須能夠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而消費者的喜好變異性高，也很難去預測。因此，媒體產品的產製者須不斷地創新並時時掌握住消費者喜好的變動，才能夠製造出可以存活下來的媒體產品。第三，隨著管制的放鬆及新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同媒體已經形成所謂的媒體匯流。因此，過去不同的媒體間競爭程度不高，然而經由匯流之後，不同媒體的取代性反而增高，讓媒體產業的競爭更加的劇烈。以上這三種媒體的特性，導致媒體產業處在相當高的不確定性環境中，有著這樣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媒體產業中所謂模仿的現象就相當的普遍。事實上，過去的相關文獻中已經不斷地記錄到媒體產業中的模仿現象，舉例而言，不少研究發現當電視產業處在一個變動性很大的環境中，電視節目製作

* Email: shuchu@mail.nctu.edu.tw

者就傾向採用所謂的 *track records* 做為其製作新節目的指導方針，而所謂的 *track records* 就是電視節目製作人，譬如要採用一個新劇本時，他／她們會採用那些過去已經製作過很多成功劇本的劇作家，而沒有 *track records* 的劇作家就不敢加以採用。另外，在製作新節目時去製作一些過去已經證明成功的節目類型，來減低其電視節目製作的不確定性 (Andrews, 2003; Chan-Olmsted, 2006: 16-37; Lowery, 2005; McDowell & Sutherland, 2000; Ryan & Peterson, 1982)。除了國外的媒體產業記錄了不少模仿的現象之外，臺灣的媒體產業也有相同的情形，過去臺灣的電視台都競相推出綜藝節目，綜藝節目的數目很多；但內容常常被批評是缺乏創意，彼此相當的類似。有些綜藝節目甚至最後被發現是抄自日本或美國的知名綜藝節目內容，而且媒體產業間的模仿情形也不只發生在綜藝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報業或電視劇，都有相同的模仿現象出現，過去也曾經出現某一電視台的鄉土劇收視率高時，所有電視台一窩蜂地製作鄉土劇，讓所有八點檔的電視劇一時之間全部都是臺灣鄉土劇（朱秋萍，2009；吳品儀，2011；沈慧聲、陳怡如，2003）。組織模仿是組織在面臨高度環境不確定時，一個相當有效率的生存策略；因為藉由模仿其他類似組織的行為，組織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找出應對方法，並減少策略搜尋的成本，這樣的一個現象稱之為跨組織模仿。跨組織模仿不只出現在媒體產業中，事實上所有產業面臨不確定的環境時，組織模仿現象就很容易出現 (Haunschild & Miner, 1997)。

跨組織模仿的現象可以用新制度理論的組織同形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理論來加以說明。根據 DiMaggio & Powell (1983) 的組織同形理論，當組織處在相同的環境中，由於來自政治經濟及法規政策等的壓力，組織會漸漸地變得彼此非常的類似，而這樣的現象就稱之為組織同形現象，而組織之所以漸漸變得彼此非常的類似，可能是因為來自環境的不確定性導致彼此模仿，或來自相同的政治經濟法規的壓力導致其必須做類似的改變，或來自專業訓練的壓力導致其有類似的價值觀。因此，採取類似的策略來應對。組織同形理論主要應用在組織管理領域，理論來自新制度理論，所謂新制度理論其實比較是從組織生態學的觀點來探討組織的運作，並認為環境的壓力對組織的影響可能遠大於組織自己內部的運作，而組織同形理論其實就是探討來自相同環境的壓力，導致在同一個場域中的組織變得彼此愈來愈相似，而有所謂組織同形的現象。雖然在媒體產業中，跨組織模仿的現象相當的普遍，但媒體產業研究很少將組織同形的理論觀點運用至媒體產業研究中。本研究從組織同形的理論觀點來說明媒體產業中跨組織

模仿的現象，首先，本研究介紹組織同形理論及相關的實證研究，接下來並就臺灣現有少數研究中探討媒體跨組織模仿現象的案例加以說明。

貳、組織同形理論

組織同形理論的主要觀點為，組織在其環境中不僅僅努力地尋求經濟利益，而且也努力地尋求其在環境中的合法性，而在組織所存在的社會環境中所建構的共同規範，對組織的行為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為組織唯有遵守社會環境中所建構的共同規範，包括共同遵守的規則，以及環境中的各種儀式，組織才能夠取得其存在環境中的合法性。因此，面對相同環境情境的組織，它們彼此會變得愈來愈齊一化，因為這些組織必須回應相同的壓力，這樣的過程導致組織同形現象。學者定義組織同形的現象為「一個限制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強迫面對類似環境情境的族群中某一個單位去類似族群中的其他單位」(DiMaggio & Powell, 1983)，組織同形理論強調影響組織行為的力量同時來自環境中的社會壓力以及市場中的經濟利益。學者認為組織同形可能是組織的管理者在環境中學習最適當的回應方法，而這些方法已經獲得環境中正面的回應，所以這些方法不斷的被複製，就導致同形的現象。學者也認為組織同形是指在同一個環境中，同一族群的組織擁有相似的組織特質，而這些類似特質的形成可能是因為組織為了符合環境中的社會期望所漸漸演化而成的最適合組織的特質 (Deephouse, 1996; Hannan & Freeman, 1977; Oliver, 1988)。

在組織同形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稱之組織場域。所謂的組織場域就是指存在於相同環境中的組織，其所面對的制度環境相當的類似，包括政治經濟、法規政策，以及社會文化情境，而存在於類似環境中的這些組織，因為面對相同的制度環境，為了符合制度環境的各種壓力，其齊一化的現象會愈來愈明顯。因此，根據 DiMaggio & Powell 兩位學者的觀點(1983)，在組織場域剛成形的時候，組織間彼此存在很多的不同特質、行為及結構，一旦組織場域漸漸的成型，組織彼此之間的差異就會漸漸的消弭，而所謂的組織同形的現象就愈來愈顯著，而實證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譬如在洪世章、陳忠賢的研究中(2000)發現，臺灣前十大企業在發展初期時其結構、行為、策略彼此非常的不同，然而經過二十年的演化，這十大企業的特質竟然變得相當的類似；另外，像大醫院的結構彼此非常類似，或是教學場域中的主流教學模式齊一化的現象，都是組織同形的現象。

一、影響組織同形的環境機制

DiMaggio & Powell (1983) 兩位學者也同時指出在同一場域中導致組織彼此類似的三個環境機制，其分別是強迫性同形、競爭性同形及規範性同形，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強迫性同形（Coercive isomorphism）

所謂強迫性同形是指組織的改變源自於環境中共同的文化期望，或是政府法規政策的規範，或是來自母公司的要求，舉例來說，臺灣的蘋果日報其特殊的譁眾取寵的走向就是來自於香港母公司的要求，這就是來自母公司的壓力。而政府的法規政策也是一個強大的壓力，導致組織作適度的改變，譬如臺灣的法規政策要求所有酒類的電視廣告必須在晚上九點半以後才可以播放，或是教育部對於獲得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必須撥出一定比例的金額，來作為補助大學教授的彈性薪資。這兩個例子都是很典型的法規政策的壓力導致組織的改變，而教育部對於五年五百億的要求也導致獲得五年五百億的十二個大學，其朝向同形化的方向作改變。另外，組織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已經建構出來的文化期望，對組織也會造成很大的壓力，而促使組織做相對應的改變；譬如在臺灣的社會中，許多大規模的公司在組織具有相當規模之後，都開始建立所謂的基金會，來負責慈善公益事業，以彰顯組織愛護社會的形象，這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社會文化期望所導致的組織齊一化改變。

（二）競爭性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

所謂競爭性同形是指組織改變的壓力來自環境中的不確定性，而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有各種來源，其中最普遍的來源就是市場競爭及科技的發展，導致環境中不確定性增高，在面對這樣的環境時，組織常常採取模仿其他類似組織的作為，來作為降低環境不確定性的因應策略。所以我們在臺灣的媒體產業中常常看到，綜藝節目彼此互相的模仿，或是電視劇不斷地複製臺灣鄉土劇類型的現象，這些就是很典型因為市場競爭的劇烈導致組織彼此互相的模仿。根據 DiMaggio & Powell 兩位學者的觀點(1983)，模仿行為並非是一個不好的策略；因為藉由模仿，組織可以節省其搜尋可行方案的成本，也可以減少其做出錯誤決定的機率，某種程度而言是相當具有經濟效益的策略。另一個常常導致競爭性同形的因素是科技的發展，導致產業的運作產生很大的改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因而增高，媒

媒體產業對新科技的發展最為敏感，一個新科技的發展常常改變整個媒體產業的面貌；譬如過去網際網路的形成造就了電子報的興起，而電視數位化也對電視媒體的運作產生很大的改變。因此，新科技的發展也常常對媒體產業帶來極高的環境不確定性；舉例而言，幾年前新聞局要求有線電視必須開始進行數位化轉換的時候，很多的有線電視系統開始彼此模仿來因應這樣的變化，尤其比較小的獨立有線電視系統，以模仿大型有線電視系統的因應方式來減低數位轉換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就是一個科技改變導致競爭性同形的例子（李秀珠、陳忠勝，2002）。

（三）規範性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

所謂的規範性同形是指組織改變的壓力來自於專業化的過程，所謂專業化的過程是指某一職業，其成員共同努力所建構的專業性知識及共同的工作標準及規範，規範性同形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一個是教育的養成，另一個則是同業組織的規範。所以，在大眾媒體產業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聞記者的訓練，在各大學的新聞系所中，新聞記者的教育養成會經過一系列的專業訓練，而這些專業訓練其實都是經過新聞專業領域所認可出來的專業知識，經過這樣訓練的過程中，記者對於所謂的新聞性事件及如何採訪新聞，都有相當的共識；所以不同的新聞組織，其記者所採訪出來的新聞會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因為他／她們所認知的具新聞性的事件是類似的，而其採訪新聞的手法，如平衡報導等也是類似的，所以教育的養成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規範同形力量。另外，同業組織的規範也是很重要的組織改變壓力的來源，很多專業性的職業都有其同業組織，譬如記者會參加記者協會，醫生有醫生協會，而這些同業組織藉由各種活動會發展出來一套共同的規範及執業的模式；因而同一領域的組織，其員工所製作出來的產品，某種程度上有其相似性，這就是同業組織所帶來的規範性同形。

二、跨組織模仿行為（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組織的模仿模式包含自我模仿及跨組織模仿等等形式，其中跨組織模仿形式是指某一組織模仿環境中其他組織的行為，跨組織模仿形式是影響環境中組織同形化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也是最多研究檢視的焦點。根據學者的觀點，所謂跨組織模仿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才可以稱之；首先，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必須存在 A 組織的 a 行為；其次，在另一個時間點上必須存在 B 組織的 a 行為；最後還必須證明 A 組織的 a 行為發生在 B 組織的 a 行為之前才可以證明 B 組織進行跨

組織模仿（朱秋萍，2009；Haunschild, 1993; Haunschild & Miner, 1997）。根據 Haunschild & Miner (1997) 兩位學者的觀點，跨組織模仿的行為包含三種形式的模仿，分別是從眾式模仿、從形式模仿及從效式模仿，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從眾式模仿（Frequency-based imitation）

所謂從眾式模仿是指組織模仿環境中大部分組織都採行的策略或行為稱之為從眾式模仿，從眾式模仿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增加一個組織在環境中的正當性，因為當環境中大部分的組織都採用某一行為或某一策略時，該行為及策略即變成制度化，合法性因而增強。因而藉由從眾式模仿，是強化組織正當性的最佳方式，當然其缺點在於一窩蜂的模仿環境中大部分組織的行為，卻不檢視該行為所帶來的正面或負面效益，並不是一個太明智的組織策略（朱秋萍，2009；Haunschild & Miner, 1997）。

（二）從形式模仿（Trait-based imitation）

所謂從形式的模仿是指組織的模仿是有選擇性的，而其選擇的標準是從環境中選擇在某個層面上跟自己類似的組織，就這些組織的行為加以模仿；而所謂的某個層面的類似可以是市場定位相同，或是規模相似，或是地位類似。所以同環境中某私立大學可能不模仿同環境中其他公立大學的行為，反而模仿其他成立已經較久私立大學的行為。在傳播領域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幾家主流報紙，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等彼此模仿的行為，就是很典型的從形式模仿，因為這幾家報紙，其市場定位相似，規模也類似（朱秋萍，2009；Haunschild & Miner, 1997）。

（三）從效式模仿（Outcome-based imitation）

所謂從效式模仿也是屬於選擇性的模仿，其模仿的對象是根據其行為的結果來決定是否加以模仿，而且並不是盲目的模仿某一組織的所有行為。而是有選擇的，其模仿的對象僅在於其他組織成功的行為，而避免那些失敗的行為。換言之，組織模仿其他組織具有正面效益的行為，而避免模仿其他組織具有負面效益的行為；這種方式的模仿應該是屬於非常有智慧的模仿方式，因為這樣的模仿行為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首先經過對其他組織的行為加以詳加檢視，分辨出有正面效益及負面效益的行為，最後再決定模仿具有正面效益的行為。然而學者也

指出，從效性模仿是三種模仿形式中風險性最高的模仿，因為組織的環境及資源有極大的不同。因此，其他組織成功的行為，並不表示套用在自己組織上也可以成功（朱秋萍，2009；Lu, 2002）。

三、大眾媒體產業與組織模仿現象

雖然組織同形理論很少被用來研究媒體的組織行為，但是如前所述，組織模仿行為在大眾媒體產品中普遍的存在，而且在媒體產業中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是探討市場競爭及媒體多樣性的研究，在這一個領域中的相關研究也常常發現有所謂跨媒體模仿的現象。譬如 Dominick & Pearce (1976) 研究美國的無線電視台市場結構及產品多樣性的時候，發現在 70 年代美國無線電視市場屬於寡佔的市場結構，三家無線電視台常常彼此模仿，尤其在節目的概念及類型上面，模仿的現象相當的普遍；所以兩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在 70 年代三家美國無線電視台的節目變得非常地類似，有同形化的現象。Lin (1995) 檢視美國 80 年代有線電視崛起，對美國無線三台的影響為何，她的研究檢視了 80 年代美國無線三台的電視節目多樣性。研究結果發現，有線電視的崛起對美國無線三台造成很大的競爭威脅，環境不確定性極高；在這一段期間裡面，美國無線電視台節目多樣性大大地減少，而且三家無線電視台的節目策略變得相當地保守，不斷地彼此模仿過去成功的節目類型，而不再開發新的節目類型，以此種模仿策略來降低環境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

在國內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譬如 Li & Chiang (2001) 研究臺灣有線電視在 90 年代崛起對臺灣無線三台所造成的影響。她們的研究也是分析市場競爭對無線電視台節目多樣性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有線電視崛起造成無線三台的優勢不再，而且無線三台的收視率急速的流失，對無線三台造成很大的威脅；在如此高度的環境不確定性環境下，無線三台採用極為保守的方法來因應，也就是不斷的複製彼此成功的節目型態，並避免失敗的節目型態來因應競爭所帶來的威脅。因此，無線三台的節目多樣性顯著地降低。另外，劉幼琍（1997）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她的研究也是檢視 90 年代有線電視崛起對無線電視的影響，同樣的也發現有線電視的競爭威脅導致無線電視節目多樣性大大的降低；這個研究顯示，無線電視在這一段期間裡面模仿彼此的節目類型，導致節目多樣性降低。劉怡靖（2007）研究 1986 年至 2000 年臺灣無線電視台市場競爭及黃金時段戲劇節目的多樣性，研究結果發現，競爭愈劇烈的時段，節目多樣性愈低，反而競爭

比較不劇烈的時段，才會有多樣性增加的現象；這樣的結果也顯示，競爭過於劇烈的環境導致無線電視台模仿彼此的節目類型及概念，導致戲劇節目的多樣性降低。蘇衡、牛隆光、黃美燕與趙曉南（2000）研究臺灣解除報禁之後，國內主要報紙在版面上的改變；研究結果發現，幾家主要報紙尤其是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在其版面上的改版可以用亦步亦趨來加以形容。換言之，報禁之後主要報紙採用彼此模仿的方法來進行其版面上的改變，才會產生亦步亦趨的現象。另外，李貞怡、李秀珠（2006）研究臺灣報紙從 1992 年到 2003 年之間，幾個競爭時期對報紙內容多樣性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競爭比較劇烈的時期裡，報紙多樣性降低，尤其定位比較相似的報紙，如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彼此亦步亦趨地進行改變。換言之，在競爭劇烈的時候，主流報紙採取從形式的模仿來因應競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四、組織同形的實證研究

關於跨組織模仿的實證研究很少研究媒體產業，大部分都集中在其他的產業，包括汽車產業、銀行業等等，而且很多的研究集中在組織決定如何開設國外分公司或分行時，其跨組織模仿的現象為何。

（一）從眾式模仿

從眾式模仿是指組織模仿其他大部分組織所採用的方法稱之為從眾式模仿，實證研究發現從眾模仿是跨組織模仿常採用的模仿模式。舉例而言，Delios, Gaur, & Makino (2008) 研究日本公司從 1980 到 2000 年在進行設立海外據點時，其跨組織模仿的行為為何。Delios et al. 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的方法，預測當日本公司決定要在那個國家設立據點時，會參考其他組織的決定，而且會將據點設立在最多組織設立據點的國家；而研究結果證明了日本公司海外擴張的決定支持了從眾式模仿。Williamson & Cable (2003) 以組織同形理論研究 Fortune 500 大公司在雇用高階管理者時是否有跨組織模仿的現象，研究的結果支持了從眾式模仿的假設；他們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公司會跟隨其他最多公司採用的來源，去雇用高階管理者。Salmeron & Bueno (2006) 兩位學者研究歐洲中小企業採用資訊科技及資訊系統的跨組織模仿現象，研究結果也支持了從眾式模仿的假設；他們發現，當某一中小企業決定採用資訊科技及資訊系統時，它會跟隨在那一個時間中最多中小企業所採用的資訊科技及資訊系統，作為它的資訊科技及資訊系統。同樣

的，Townsend & Campbell (2007) 研究美國某一社區防止性侵的電視節目，他們發現在這一個社區中，推出好幾個防止性侵的電視節目，但這幾個節目的同質性非常的高；經由深度訪談及內容分析的結果發現，當製作人在策劃防止性侵的電視節目時，會參考其他類似節目的內容，而且製作人傾向採用最多人採用的節目概念及節目內容，因此，這個研究的結果支持了從眾式模仿的現象。

（二）從形式模仿

所謂從形式模仿是指組織選擇在某些層面上跟自己類似的其他組織的行為加以模仿，稱之為從形式模仿。舉例而言，Rhee, Kim, & Han (2006) 研究英國汽車製造業進入新市場的策略及模仿行為，他們採用次級資料檢視了英國汽車製造業從 1894 年到 1981 年進入市場的模式；研究結果發現，開拓新市場是一個不確定性相當高的決定。因此，英國汽車製造業傾向去模仿跟自己相似的其他汽車製造業的決策，來決定要到哪裡開拓新市場，因而這個研究發現了從形式模仿的現象。Barreto & Baden-Fuller (2006) 研究葡萄牙銀行開設分行的模仿行為，他們的研究發現也支持了從形式模仿的假設，他們發現當葡萄牙銀行要決定在哪裡開設分行時，他們會參考其他他們認為值得參考的銀行的決定，即使那些參考銀行開設分行的決定與銀行自行蒐集的資料是相違背的，他們還是傾向會去跟隨參考銀行的決定。Barreto & Baden-Fuller 的研究結果還發現，藉由跟隨參考銀行的決定，葡萄牙銀行因而可以取得正當性；但是為了取得正當性，常常犧牲了銀行的獲利機會。Lun, Wong, Lai, & Cheng (2008) 研究貨櫃運輸業採用新科技來增加其安全措施，他們的研究也發現，當貨櫃運輸公司要採用這個新科技時，他們比較喜歡去檢視類似的公司在這上面的作法，因而他們的研究支持了從形式模仿的假設，研究發現貨櫃公司會模仿他們認為相似公司的科技採用模式。另外，Lu (2002) 研究日本企業在海外十二個國家的投資行為時，也發現從形式的模仿；Lu 用組織同形理論的觀點檢視 1999 年日本企業在海外開設分公司的行為，結果發現日本企業會選擇與其類似的參考企業的行為加以模仿。洪世章、陳忠賢（2000）則是研究臺灣十大企業其過去 20 年的擴張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十大企業剛剛創立的時候，其結構、擴張模式及行為具相當大的差異，而經過 20 年的改變，十大企業的組織特質變得相當的類似，尤其擴張模式相當的類似；他們的研究結果證實了從形式模仿的假設。

（三）從效式模仿

所謂從效式模仿是指組織選擇其他組織成功的行為加以模仿，避免去跟隨其他組織失敗的行為，稱之為從效性模仿。相關的實證研究包括 Brouters, O'Donnell, & Hadjimarcou (2005) 研究來自新興市場的組織如何至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國家開拓海外市場；結果發現這些新興市場的組織最喜歡採用從效式模仿的方式，來開拓這三個地區的海外市場，更明確地說，他們發現這些來自新興市場的公司會模仿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地成功公司的行為來拓展他們的海外市場；而研究結果也發現這樣的模仿行為導致這些來自新興市場的公司，能夠成功地擴展這三個地區的海外市場，這樣的研究結果驗證了從效式模仿的現象。黃佑安、王秉鈞（2001）則是研究臺灣商業電視台在進行組織改革時，是否有跨組織模仿的現象；研究的結果發現，當商業電台必須進行組織改革時，商業電台會模仿其他大型及成功的商業電台的組織改革模式，以減少不確定性，尤其當組織改革的規模相當地大，從效式模仿的現象就更普遍。Haveman (1993) 研究美國的儲蓄及放款銀行，在決定進入新市場時，是否有跨組織模仿的現象；研究的結果發現不支持從形式模仿，他發現互助儲蓄銀行並不會參考其他規模相似銀行的進入市場模式，但是他們發現大部分銀行會參考其他成功銀行的決策模式，而且獲利銀行的行為是所有其他包括大中小型銀行的參考模式，因而這個研究的發現支持了從效式模仿的假設。

參、臺灣媒體產業跨組織模仿現象的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臺灣媒體產業面對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尤其媒體產業相當講究規模經濟，臺灣的市場規模太小，而各種媒體又蓬勃發展，尤其電視頻道多達一百多個以上的頻道，因而比起其他的國家，臺灣的媒體產業其環境的不確定性更高。雖然很少研究以組織同形理論的觀點來探討媒體產業的跨組織模仿現象，然而一些相關的研究不斷地記錄到臺灣媒體產業中的跨組織模仿現象。本研究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三個在臺灣進行的媒體產業跨組織模仿現象的研究，這三個研究分別檢視臺灣有線電視的兒童頻道，臺灣電視頻道週間的綜藝節目，以及臺灣電視頻道週末的綜藝節目其跨組織模仿的現象。

一、兒童頻道的跨組織模仿

該研究為朱秋萍（2009）所進行，她選擇國內五家兒童頻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五家兒童頻道分別是東森幼幼台、MOMO 親子台、迪士尼頻道、卡通頻道以及 Animax 頻道。該研究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側錄了這五家兒童頻道的節目內容。更詳細的說，該研究側錄這五家兒童頻道自 2008 年 5 月至 8 月，共四個月中週一到週日，每天下午 4 點至晚上 10 點的節目內容，以內容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兒童頻道的跨組織模仿現象；除了內容分析之外，該研究並做深度訪談及次級資料分析，以這三個方法來分析跨組織模仿現象。研究結果發現，這五家兒童頻道有從眾式模仿的現象，這五家兒童頻道在節目定位及收視族群的定位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五家頻道大量的播出日本卡通節目，尤其在黃金時段日本卡通節目是這五家兒童頻道的首要選擇。另外，這個研究也發現，五家頻道在其行銷策略上也存在著從眾式模仿的現象，這五家頻道都喜歡用名人代言並舉辦各種活動來宣傳其節目，其行銷策略有許多類似之處。至於從形式的模仿，這個研究發現東森幼幼台、MOMO 親子台及迪士尼頻道三者存有互相模仿的情形，不過三個頻道彼此模仿的方式有些差異性，其中 MOMO 親子台在綜合型態及娛樂型態的兒童節目中，模仿東森幼幼台的程度相當高，然而，在報導型的兒童節目中，MOMO 親子台則模仿迪士尼卡通頻道的程度最高，換言之，這個研究發現，MOMO 親子台是最積極進行從形式模仿的兒童電視台，而其模仿的方式會根據節目類型的不同而分別模仿東森幼幼台及迪士尼卡通頻道。至於從效式模仿，這個研究預測東森幼幼台因為它的收視率最高，會成為其他四個兒童頻道模仿的對象。然而研究的結果發現，除了 MOMO 親子台積極努力地模仿東森幼幼台之外，其他三家兒童頻道並沒有模仿東森幼幼台的節目內容，因而並沒有支持從效式模仿的假設。這個研究說明，東森幼幼台之所以沒有成為其他四家兒童頻道的模仿指標，可能的原因是東森幼幼台除了跟 MOMO 台的定位非常類似之外，跟其他三個頻道的節目定位及目標族群都有很大的差異，因而沒有辦法成為其他三個兒童電視台的模仿指標。

二、臺灣週間綜藝節目的跨組織模仿

該研究主要檢視週間晚間 10 點檔及 11 點檔的四個綜藝談話性節目，包括 10 點檔的康熙來了、麻辣天后宮及 11 點檔的國光幫幫忙、女狼俱樂部，該研究為李育倩及簡郁凌（2008）所進行的研究。該研究蒐集從 2004 年 1 月 5 日到

2007年10月31日四個綜藝節目所播出的所有節目內容，並以一集節目作為分析的單位；該研究採用內容分析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並輔以次級資料的蒐集來加以佐證。至於模仿行為的測量指標則以節目的主題、節目形式及來賓重複性為測量的指標，節目的樣本包括康熙來了 939 集、麻辣天后宮 283 集、國光幫幫忙 606 集及女狼俱樂部 177 集。該研究預測四個綜藝性節目會有從眾式的模仿，而相同時段的節目會有從形式的模仿。也就是說，10 點檔的康熙來了及麻辣天后宮彼此會互相模仿；而同樣的，11 點檔的國光幫幫忙及女郎俱樂部也會傾向彼此互相模仿；最後，該研究預測康熙來了是四個節目中收視率最好，而且得過金鐘獎，因此會是其他三個節目模仿的指標，因此會有從效式模仿。研究結果發現（一）支持了從眾式模仿的預測，研究資料發現新進的綜藝性節目會去模仿其他節目最常使用的節目主題、節目形式及來賓。（二）關於從形式模仿的預測，該研究結果發現 10 點檔的兩個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及麻辣天后宮彼此模仿程度比 11 點檔的兩個節目程度高，因此證明了當競爭激烈的時候，模仿情況也比較普遍，而研究結果也證明了從形式模仿的現象。（三）關於從效式模仿的預測，該研究發現康熙來了的節目主題、形式及來賓並非是所有其他三個節目模仿的指標，因此並沒有支持從效式模仿的預測，該研究認為，可能四個綜藝節目其節目定位及觀眾族群並不十分的相同，因而不會完全跟隨康熙來了的節目形式及節目內容。

三、臺灣週末綜藝節目的跨組織模仿

該研究主要比較臺灣週末期間四個綜藝節目的跨組織模仿行為，包括週六的綜藝大哥大及綜藝大國民，以及週日播出的鑽石夜總會及 Power 星期天，該研究由張艾茹、張雅菁（2010）所進行。該研究蒐集從 2010 年 6 月 19 日至 12 月 19 日，四個綜藝節目共 104 集做為樣本來進行內容分析，其中包括綜藝大哥大 26 集、綜藝大國民 25 集、鑽石夜總會 27 集及 Power 星期天 26 集，該研究以主題及來賓重疊度作為模仿行為的測量指標，預測四個綜藝節目會有從眾式的模仿，而同時段的節目之間會有從形式的模仿，最後並預測鑽石夜總會因為其收視率最高，會成為其他三個節目模仿的指標，因此會有從效式模仿。研究結果發現，四個綜藝節目中有從眾式模仿的現象，而這個從眾式模仿主要來自新進綜藝節目，綜藝大國民是這四個節目中最年輕的節目，因此其節目內容、方式及邀請的來賓，甚至連節目流程都會去模仿其他三個節目中最多使用的方式，因此證明了從眾式模

仿的現象。至於從形式模仿的預測則僅得到部分的支持，研究結果發現，週六八點檔的兩個綜藝節目，綜藝大哥大及綜藝大國民，其在節目主題及邀請的來賓非常地相似，彼此互相模仿的情形相當的明顯；然而，週日八點檔的鑽石夜總會與 Power 星期天則在主題及邀請的來賓上相似度不高。最後關於從效式模仿，研究結果僅部分支持研究預測；更詳細的說，該研究發現鑽石夜總會以競賽 PK 為其節目的最大重點，而該重點頗受歡迎，因此成為其他節目競相模仿的對象，包括 Power 星期天有極高比例的節目主題為競賽 PK；而綜藝大國民也在 2010 年 8 月後將其原本素人才藝表演的主題，改以競賽 PK 這個主題。然而除了這個部分的模仿以外，並沒有發現其他節目競相模仿鑽石夜總會的內容及形式；因此，研究發現僅能說明部分支持了從效式模仿的預測。

肆、結論

本研究對組織同形理論的觀點加以介紹，並探討組織同形理論的這些現象，尤其跨組織模仿的現象與媒體產業的相關性，其中並分析了三個媒體產業中跨組織模仿的案例，接下來本研究將就組織同形理論的限制及其適用性加以討論。

（一）很多學者指出，組織同形理論能夠很有效率的說明在同一個環境中，各個組織就其策略結構及行為，為何朝向同質化發展，然而組織同形理論學者也指出這個理論的兩個限制 (Li & Lee, 2010; Townsend & Campbell, 2007)：首先，組織同形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在同一個環境中，仍然有一些組織沒有朝齊一化的方向去發展，反而背離大部分組織的運作模式。另一個限制則是，現有的文獻並沒有辦法歸論跨組織模仿對組織的表現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效益，在有些研究中發現，跨組織模仿會帶來正面的效益，譬如 Brouthers et al. (2005) 研究新興市場的公司到日本、美國及歐洲開拓市場時，這些公司採用從效式模仿的方式，模仿日本、美國及歐洲當地成功公司的經營模式。結果發現這樣的模仿方式，讓這些新興市場的公司得以成功的開拓日本、美國及歐洲的市場。然而有些研究則發現，跨組織模仿會帶來負面的效益，譬如 Barreto & Baden-Fuller (2006) 研究葡萄牙銀行決定到什麼市場開設分行時，傾向採用從形式模仿，也就是這些葡萄牙銀行會模仿他們認為值得參考的銀行，然後跟隨這些參考銀行的決定去開設分行；而這個研究發現，從形式模仿的決定即使會影響銀行的獲利機率，這些葡萄牙銀行仍然寧願進行從形式模仿而不採用自行蒐集比較有利的資訊。

(二) 有些學者也批評組織同形理論將組織的經營形容是不斷的模仿，那麼在同一個環境中所有的產品及組織行為不就呈現相當的同質化，那麼創意要如何出現。針對這樣的批評，學者也提出來一些關於跨組織模仿的觀點。組織並非時時在進行跨組織模仿，常常是在某些情況下組織不得不做跨組織模仿；而學者也點出來在哪些情況下，組織可能進行跨組織模仿 (Li & Lee, 2010; Lieberman & Asaba, 2006)：(1) 當環境中不確定性極高，譬如新科技的發展或是新競爭者的加入，導致環境的不確定性突然的增高，而情況又相當地危急，不允許組織慢慢的發展出因應策略來時，跨組織模仿策略在此時可能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方法；(2) 當組織沒有太多的資源，沒有辦法用 R&D 的方式慢慢發展出來合適又具有創意的經營策略時，跨組織模仿是一個不錯的因應策略，因為藉由跨組織模仿，模仿那些大型又具有相當多資源的組織的運作方式，資源缺乏的組織可以節省搜尋可行方案的成本，也可以藉助大組織已經集結出來的智慧來經營自己的組織，不失為非常具有經濟效益的因應方式。

(三) 根據組織同形理論的觀點，要證明有跨組織模仿的情形要具有三個必須條件。首先在某一時間點需有 A 公司的 a 行為，在另一個時間點上有 B 公司的 a 行為，最後還必須證明 A 公司的 a 行為發生在 B 公司的 a 行為之前，才能夠證明具有跨組織模仿的情形存在；比較弔詭的地方在於，所謂的跨組織模仿並非完整不缺地將 A 公司的 a 行為完全複製在 B 公司裡面，常常 B 公司想要模仿 A 公司的 a 行為時，可能因為 B 公司的資源、環境不同於 A 公司，所以當 a 行為複製至 B 公司來時，a 行為已加以修正，它看起來的樣子已經不像 A 公司的 a 行為；因此要證明跨組織模仿的行為存在，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所以在現有的組織同形的文獻中，其採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的不一樣，並沒有一套共同可用的方法來驗證跨組織模仿行為的存在。在現有文獻中，比較可以歸論的一點就是，很多的研究都是採用歷時性的資料蒐集，起碼要蒐集十五年以上次級資料才可以推論出來跨組織模仿的現象；譬如 Delios (2008) 研究日本公司設立海外據點其跨組織模仿的行為，他們的資料就是蒐集從 1980 到 2000 年的資料來作為分析；Rhee (2006) 研究英國汽車製造業進入新市場的模仿行為，他們的資料也從 1894 年到 1981 年將近一百年的次級資料來作分析；而洪世章、陳忠賢 (2000) 兩人研究臺灣前十大企業的跨組織模仿行為，也是橫跨 20 年的資料分析。

參考書目

- 朱秋萍（2009）。《檢視臺灣電視產業之模仿同形：以臺灣兒童電視頻道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品儀（2011）。《市場競爭與模仿同形現象之關聯性研究——以 2010 年電視綜藝談話性節目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秀珠、陳忠勝（2002）。〈政府政策與臺灣有線電視數位化之研究〉，《廣播與電視》，18：1-26。
- 李育倩、簡郁凌（2008）。《臺灣綜藝談話性節目模仿行為之研究——以「康熙來了」等四個節目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媒介管理 2008 年 9 月課堂作業。
- 李貞怡、李秀珠（2006）。〈臺灣媒體競爭市場之報紙內容多樣性研究〉，《新聞學研究》，88：135-172。
- 沈慧聲、陳怡如（2003）。〈無線電視台綜藝節目評析：暴力與色情〉，「2003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新竹。
- 洪世章、陳忠賢（2000）。〈臺灣企業集團的發展是漸趨同形嗎？〉，《台大管理論叢》，11（1）：73-101。
- 張艾茹、張雅菁（2010）。《以媒體模仿理論檢視臺灣週末八點檔綜藝節目之模仿同形現象》。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媒介管理 2010 年 9 月課堂作業。
- 黃佑安、王秉鈞（2001）。〈跨組織模仿決策影響因素之研究——以臺灣商業廣播電台為例〉，《管理評論》，20（3）：1-20。
- 劉幼琍（1997）。多頻道電視與觀眾：九零年代的電視媒體與閱聽人收視行為研究。臺北：時英。
- 劉怡靖（2007）。《檢視電視產業市場結構與戲劇性節目內容多樣性之相關性：以臺灣地區無線電視台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蘅、牛隆光、黃美燕、趙曉南（2000）。〈臺灣報紙轉型的問題與挑戰——提供讀者更好的選擇〉，《新聞學研究》，64：1-32。
- Andrews, D. L. (2003). Sport and the transnationalizing media corporatio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6, 235-251.
- Barreto, I., & Baden-Fuller, C. (2006). To conform or to perform? Mimetic behaviour, legitimacy-based groups and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3, 1559-1581.

- Brouthers, L. E., O'Donnell, E., & Hadjimarcou, J. (2005). Generic product strategies for emerging market exports into triad nation markets: A mimetic isomorphism approa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2, 225-245.
- Chan-Olmsted, S. M. (2006). A primer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media firms. In S. M. Chan-Olmsted (Ed.),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media firms: Strategic and brand management in changing media market* (pp. 13-37).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Deephouse, D. L. (1996). Does isomorphism legitimat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 1024-1039.
- Delios, A., Gaur A. S., & Makino S. (2008). The timing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Information, rivalry and imitation among Japanese firms, 1980-2002.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169-195.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 Dominick, J. R., & Pearce, M. (1976). Trends in network prime-time programming, 1953-74.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1), 70-80.
- Hannan, M. T., & Freeman, J. (1977).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929-964.
- Haunschild, P. R. (1993).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locks on corporate acquisition activ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 564-592.
- Haunschild, P. R., & Miner, A. S. (1997). 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472-500.
- Haveman, H. A. (1993).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 593-627.
- Li, S. S., & Lee, C. Y. (2010). Market uncertainty and mimetic isomorphism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 study of Taiwan's mainstream newspapers from 1992 to 2003.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 367-384.
- Li, S.-C. S., & Chiang, C.-C. (2001).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gramming diversity: A study on the TV market in Taiwa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4, 105-119.
- Lieberman, M., & Asaba, S. (2006) Why do firms imitate each oth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366-385.

- Lin, C. A. (1995). Diversity of network prime-time program formats during the 1980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8, 17-28.
- Lowery, W. (2005). Commitment to newspaper-TV partnering: A test of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 495-515.
- Lu, J. W. (2002). Intra-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ve behavior: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Japanese firms' entry mode choi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3, 19-37.
- Lun, Y. H. V., Wong, C. W. Y., Lai, K.-H., & Cheng, T. C. E. (2008).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for the security enhancement of container transport. *Transport Reviews*, 28, 21-33.
- McDowell, W., & Sutherland, J. (2000). Choice versus chance: Using brand equity theory to explore TV audience lead-in effect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3, 233-247.
- Oliver, C. (1988). The collective strategy framework: An application to competing predictions of isomorphis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3, 543-561.
- Rhee, M., Kim, Y. C., & Han, J. (2006). Confidence in imitation: Niche-Width strategy in the UK automobile industry. *Management Science*, 52, 501-513.
- Ryan, J., & Peterson, R. A. (1982). The product image: The fate of creativity in country music songwriting. In J. S. Ettema & D. C. Whitney (Eds.), *Individuals in mass media organizations: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pp. 11-3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almeron, J. L., & Bueno, S. (2006).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dustry-based classific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 institutional 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73, 1012-1025.
- Townsend, S. M., & Campbell, R. (2007). Homogeneity in community-based rape prevention programs: Empirical evidenc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 367-382.
- Williamson, I. O., & Cable, D. M. (2003). Organizational hiring patterns, interfirm network tie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6, 349-358.

原住民部落自主傳播的媒介試驗： 花蓮縣福音（Lohok）部落「村長麥克風」 計畫^{*}

林福岳^{**}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臺灣原住民族由於長期被殖民的歷程，使得傳播主體性被剝奪，傳播權未獲得保障，可能的改變方式是透過自有媒體進行自主傳播，方能翻轉傳播弱勢的現況。「村長麥克風」是一個在原住民族部落實施的試驗性傳播計劃，一群原住民研究生的志願工作者，他們前去花蓮縣玉里鎮的福音部落，運用小學中電腦教室的資源，教導 10-14 歲的小朋友運用自己的族語製作廣播節目，放在網路上供聆聽，並經由部落中的播音系統公開播放。該實驗一方面為原住民傳播權找到實踐的場域和方式，同時也為部落傳播創造新的可能。尤其是年輕一代，將所建構的認同轉化成為媒介內容，更是饒富興味的嘗試。

關鍵詞：部落傳播、原住民傳播、福音部落、另類媒介、傳播主體性

* 本文特別感謝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高曉佩、黃寶珠的研究協助及資料提供，同時也感謝三位匿名評審所提供深入且寶貴的意見，讓筆者受益甚多。

** Email: fuyueh@ms45.hinet.net

壹、緒論：失卻自主性的原住民傳播

關於在臺灣社會中，原住民在傳播環境中所遭遇的問題及面臨的困境，論者已多有陳述。其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媒體中所呈現的原住民形貌，經常是模糊扭曲的、被偽造的、簡化的、拼湊的；其中又包含了許多自以為是的判斷、焦距暴力、符號暴力與文化霸權（浦忠勇，2000）。推究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漢族中心主義的主流媒體以既有的框架來再現（represent）原住民的形象，將原住民是為「他者」，以致呈現出刻板印象以及將新聞事件標籤化（王嵩音，1998；林惠娟，2006；倪炎元，2003；黃葳威，1997）。

長此以往，不但主流社會的閱聽人無法得知原住民的真實形象，甚至原住民本身也因為長久被迫去認同一個被扭曲的社會圖像，常常瀕臨自我否定的分裂危機（浦忠勇，2000）。所以倪炎元（2003）才會深刻地指出，「原住民」的新聞具體再現了漢人媒體如何藉諸一組迷思、符號、隱喻乃至於諸多修辭的操作非漢人的原住民世界進行建構，同時也顯示漢人媒體工作者如何藉諸自認優勢文明的發言位置，對身處邊陲位置的原住民進行注入殖民文化的過程。

職是之故，在面對主流媒體的符號暴力和文化霸權時，部分原住民人士便提出應該建構原住民自我的論述空間，積極爭取傳播自主權的意見，藉以翻轉長期被視為他者、被和人詮釋的被動地位。巴蘇亞·博伊哲努（2000）就認為，當原住民在面臨急遽變動和多樣思維的潮流時代中，不論是要意圖掌握生存的生機，或是要向社會中其他族群表述其自身文化的內涵、發出期望獲致平等對待呼聲之時，傳播媒介已經不能視之為偶然的工具。孔文吉（2000）也表示，傳播媒介是塑造形象和尊嚴最有力的論述場域，同時，媒介象徵著一種符號權利，它可控制並賦予族群關係定義，擁有媒介，也就是擁有族群的解釋權。

原住民需要自有媒體，掌握傳播的主體性，並擁有能力實踐傳播權，這已經是近年來關於原住民族傳播研究的共識（張鴻邦，2010，郭雅婷，2010；陳楚治，2008）。2005年原住民族電視台出現之後，這樣的狀況似已有所改變；近年來幾個在地方為原住民服務的廣播電台出現，是另一個原住民獲取傳播管道的機會（林昶鴻，2011）。如果回歸到傳播運作的生活脈絡中來探索，屬於原住民族傳統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部落之中，所具有的傳播樣態，有沒有在自身脈絡中，得以擁有符號建構能力和詮釋權？是否有自我主體實踐的機會和可能？這種提問方式是過去傳播研究中未曾嘗試過的研究途徑。筆者過去曾經嘗試在部落中進行迥異於一般傳播媒體的傳播試驗，在試驗中發掘部分值得深思的傳播現象，也可

能是對於原住民傳播自主性的某種回應方式，是以本研究報告將嘗試從一個部落自主發聲的案例，來探索原住民部落自主傳播的樣態，並探討其意義。

貳、原住民自有媒體與自主傳播

臺灣原住民從 1624 年荷蘭人入侵開始，便進入三百多年的被殖民過程，歷經荷蘭及西班牙統治、明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儘管統治者不斷遞嬗，被殖民的狀態卻未曾改變。國際慣用以「Indigenous People」一詞稱呼原住民族，但後殖民論述卻常用「第四世界」（Fourth World）來指涉全球的原住民族，用以和「第一世界」的強勢形成對比，彰顯全世界各地在政治和經濟弱勢下的原住民族，因為殖民歷程所造成的族群創傷已不容置疑（謝若蘭，2006）。

臺灣原住民歷經三百多年殖民統治，正處於一種長期壓抑和宰制的過程中，造成了自我主體的扭曲、變形、甚或消失或被取代。這種情況，並不會因為單純的殖民統治消失或離開而完全改變，就後殖民的觀點而言，原住民族主體被侵略的現象，是從被殖民的時刻到目前為止不曾間斷的過程，其間受到殖民影響下的文化（Ashcroft, Griffiths, & Tiffin, 1989）。此等政治文化的影響，並不因為殖民時期中止而停止，實質上殖民者的意志仍透過殖民借喻（colonial tropes）的手段，強行嵌入被殖民者，以致其對於土地文化的記憶被扭曲（McClintock, 1995）。

也因此主流政治運用操作國家教育與傳播，對原住民這個弱勢族群進行本質化、污名化形象，摧殘原住民族。因而造成在傳播環境之中，原住民族的傳播權被剝奪、缺乏自有媒體，成為被詮釋的他者，成為原住民在傳播方面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面對被殖民歷史而成為社會弱勢的原住民，要如何翻轉現況，重新建構自我的主體性？按照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73 / 郭官義、李黎譯，1999）的說法，該從什麼途徑去克服意識形態及僵化的權力關係，從盲目的社會、歷史力量中獲得解放，朝向自由成熟、免於異化與宰制？

關於這點，論者多半從建立傳播主體性與實踐傳播權的角度來思考如何改變現況。部分學者會從傳播功能的觀點來說明原住民擁有自我媒體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傳播媒介可以達到重塑原住民形象、文化傳遞、形成公共論壇、凝聚原住民共識等功能。持這類看法的國內研究者和文獻，諸如孔文吉（2000）、王嵩音（1998）、金惠雯（2000）、張錦華（1997）、陸正誼（2004）、黃葳威（1997）、楊政霖（2005）、謝偉姝（1996）等。以陸正誼（2004）為例，他認為原住民媒

介所扮演的功能有：（一）傳遞文化與族群認同，（二）凝聚社區共識，（三）資訊提供，（四）環境監測，（五）社會教育，（六）保障近用權利，（七）掌握文化解釋權，（八）與外部社會的對話權，（九）幫助原住民順利適應近代社會。上述說法相當程度反映了國內學者對於原住民傳播媒介的認知和期待，覺得國內若要讓原住民擁有自我的媒體，就應該朝這個方向去規劃和運作。

有些國外學者也持類似看法者，例如 Viswanath & Arora (2000) 提出少數族群媒介在少數族群社區中扮演五種功能：傳遞文化、社區推動、環境監測、融合主流、提供資訊。少數族群媒介報導族群的文化活動、祭典儀式等以強化族群之文化認同。少數族群媒介傾向於報導社區光明面，例如人情味的消息、社區傑出人士的成功故事、社區服務工作等；而對於負面的消息則較少去報導，藉以促進社區的經濟繁榮。功能學派強調媒介具有監督環境的功能。對於少數族群媒介而言，更是對於外在威脅特別敏感，會密切注意有關於少數族群各項權益、措施、福利等訊息，隨時做好監督的工作。另一項少數族群媒介的特殊功能為促進同化。對於少數族群而言，融入主流社會並參與主流社會事務是立足社會的基礎。譬如少數族群媒介會傾向報導少數族群參與地方選舉，或愛國的行為等。最後，少數族群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訊息。尤其是主流媒介往往忽略有關少數族群的訊息及議題。只有少數族群媒介能彌補遺漏，提供充分的訊息，以聯繫少數族群社區。

但是上述的傳播功能論點，期待媒體以資訊補助的方式達到主體性的建立，是否能夠在根本上翻轉統治階層和主流社會長期的異化和意識灌注，其實不無疑問。

因此部分國外的學者對原住民傳播媒體的存在，指出另一個運作的方向，呈現了不同的關懷旨趣。像是 Subervi-Velez (1986) 執簡馭繁，明白地揭示少數族群媒介所應扮演的角色就只有兩個：融合（assimilation）和多元（pluralism）。少數族群需要適應主流社會的語言和規範以立足於社會中，媒介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融合的結果卻又會降低了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因此少數族群媒介一方面要能協助少數族群適應主流社會，但另一方面也應該要透過少數族群母語和文化內容，以維持少數族群對於其母文化的聯繫，甚至是保存和維護。

Riggins (1992) 則認為傳播媒介對於定義、維護或減弱族群認同的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主流媒體通常忽略對於少數族群的報導，或將之視為社會的問題族群。要維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必須靠少數族群媒介的存在方行。由是，Riggins

(1992) 引用 Subervi-Velex 雙重角色的觀點，集結了學者們對於世界各國少數族群媒介的研究，總結提出少數族群媒介抵抗同化力量的特色，包括以下七點¹：

- (一) 在內容上明確地呈現反霸權論述。
- (二) 完全使用少數族群母語。
- (三) 建立一套有別於主流媒體的議題優先順序。
- (四) 充分報導少數族群社區的活動以加強社區參與。
- (五) 少數族群媒介較少出現主流廣告，因此可避免同化。
- (六) 少數族群媒介的存在本身即具反同化的象徵意義。
- (七) 少數族群新聞工作者在媒體所累積的專業經驗，助其成為少數族群運動者。

這種觀點建構的理論取向，很明顯的和結構功能論典範下所認定的傳播功能有所不同，不再著眼於所謂的傳遞、守望、聯繫、資訊提供、認同建構等功能，反而是從批判觀點和社會實踐的角度，指出對於少數族群媒體如何能夠針對長期以來主流社會觀點代言的媒介環境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建構過程和論述空間。

這類學者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其實正是針對主流媒介的霸權宰制所提出的對抗策略。當主流媒介用既定的霸權文化框架去再現和建構對於原住民的符號世界和論述時，就已經隱然制定了一套屬於他們的遊戲規則，例如媒體的產製邏輯和符號系統，這些對於長期浸濡在媒體環境和技術的現代社會人們，早已不自覺習慣於視為理所當然的運作方式。但是對於某些少數族群而言，主流媒體慣用的運作邏輯其實正顯示了霸權文化所設定的技術門檻和不公平競爭基點。如果少數族群的媒介要去複製如同主流媒介一般的運作方式時，必須先能夠熟悉主流媒介的操弄模式。而就在熟悉的過程之中，正好被既有的文化模式所影響甚至操弄，以致脫離其自我的生產脈絡。

原住民族面臨文化傳承的斷層與主體性的被漠視，原住民便在傳播策略上就針對殖民政權的運作機制，予以反支配的抵抗與自我建構的文化認同。這也就

1. 其實 Riggins 是先提出少數族群媒介關於同化方面的功能的特色，共有六點：(1) 少數族群媒介內容隱含強勢族群意識型態，因為少數族群新聞工作者採用主流的新聞價值判斷，或因少數族群媒介常常採用主流媒體的訊息。(2) 少數族群媒介的製作難以逃脫主流文化對於媒介類型 (genre) 之定義，不易製作真正具備少數族群特色之節目內容。(3) 少數族群媒介集中報導某個特定族群或部落，可能產生自我隔離之反效果。因為逐漸貧乏的內容，反而危害其生存。(4) 少數族群媒介若以較廣大閱聽眾為目標時，促成更多與主流文化融合的可能性。(5) 少數族群媒介若使用主流語言而非母語會加速同化。(6) 少數族群文化在透過傳播科技的傳遞過程中將失去其精髓。然後才因此提出抵抗同化力量的特別功能，彰顯少數族群媒介反抗主流論述的辯證關係。

是為什麼研究原住民傳播議題的學者一再宣稱原住民要有自己的傳播權，要掌握原住民的主體性，站在原住民的觀點來詮釋原住民（孔文吉，2000；孫秀蕙，2001；張鴻邦，2010；郭雅婷，2010；陳楚治，2008；黃葳威，1997；楊政霖，2005；謝偉姝，1996）。

參、原住民傳播主體性與另類媒介

原住民的傳播議題中，原住民主體性是核心議題之一，其理由在於長期殖民和高壓統治下受壓抑的社會現實中，原住民必須尋覓各種可行的抗爭工具和互動場域，重新建構所謂當下「原住民」的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一方面必須承接殖民時期中被迫斷裂的自我，但是又必須能在現代社會中豎立成形。而當代的傳播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公共領域，成為原住民如何證成自身主體性，和整個主流社會辯證和互動的空間。當社會中的傳播者站在原住民族的主體位置上觀視和發聲時，所呈現出來的便是所謂原住民觀點。

但是原住民觀點所指的是什麼？誰所製造和傳送的文本有所謂的原住民觀點？其判準為何？經整理過去各家的見解，初步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個主要的論點：

（一）原住民觀點是指媒體工作者處理議題的態度。

原住民觀點是指以原住民主體性為出發，在原住民一種看待原住民處境與問題的思維模式。在這個觀點下，原住民可以跳脫國家機器的框架，可以用民族自主的觀點找到與強勢族群的互動方式，甚至是進一步地思考民族未來的出路（金惠雯，2000：14）。

以「誠實」的態度報導原住民議題，並且減少已知的「侵略性與攻擊性」論述。原住民在面對族群被壓迫的命運時，同樣出身於部落的原住民記者，更能透過「共同命運」的體認，盡力在採訪報導的過程中，不斷尋求一種新聞專業與族群命運的平衡點；藉著誠實或健康的報導方向，即使是原住民部落醜陋的一面，原住民記者更有責任與義務將其真相報導呈現（馬紹·阿紀，1998：29）。

「原住民觀點乃為匡正主流媒體長久以來對原住民塑造的錯誤刻板迷思，呈現真實的原住民風貌與觀點；亦即『剖開迷思』：把社會對原住民存在已久的『迷思』解釋剖開來，將裡面的實相拿出來」Watan 極力強調著（轉引自謝偉姝，1996：37）。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製作人丹耐夫表認為原住民媒介的原住民觀點便應是主觀、運動化與控訴化（謝偉姝，1996：42）。

（二）原住民觀點乃是媒體工作者的觀視角度。

原住民觀點是以弱勢觀點出發的新聞，它的題材環繞在事件抗爭、政策法令與部落消息；在新聞處理上對弱勢採同情觀點，對漢人的文化及政策採批判的觀點。這樣的新聞處理觀點，類似六、七年前的自立早報，以及《新新聞雜誌》對社會運動的報導觀點；唯一不同的是題材的差異與母語的使用，至於原文化與漢文化的批判觀點涉及階層與族群上，中央對邊陲的結構性反思與投射（江冠明，1996：66-67）。

原住民觀點是讓原住民自己掌握攝影機，自己掌握對於他們的事件詮釋權，然後，從這樣子的處理新聞事件的過程中，讓他重建原住民的自主性，以相對於我們的媒體對於原住民事件的處理——醜化、膚淺化或觀光化。用他們的眼睛和他們自己的感受，來處理他們的新聞素材（鄭立明，1996：60）。

馬紹認為，原住民觀點與漢人觀點（在看待原住民相關事務上）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由內往外的一種方向，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處在這個環境或文化裡面，或甚至是這個事件裡面，所以他比較清楚（社會文化）整個結構及意涵，因此由他向外表達、擴散或傳遞，那種傳播的方向性是由內往外的；而漢人觀點，比方說，他想了解原住民，但因為不是生活在這個文化空間裡，當他想進去的話，一定是由外往內進去，進去之後因為不了解可能必須經過很多誤會與嘗試，或是很多錯誤才能進到這個核心，這就是原、漢觀點不同的地方，即「方向性」的問題（謝偉姝，1996：34-35）。

（三）原住民觀點必須要從媒體工作者的生活脈絡出發。

它是由生活在土地的新聞事件所建立起來的觀點，是記者在現場觀察、採訪和新聞判斷所組成的觀點。因此，原住民觀點不是一個概念性的單一觀點，它是由一連串的原住民新聞事件報導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觀點（江冠明，1996：67）。

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米將認為，原住民觀點本身要回歸到部落裡頭，真正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整個環境，像我是卑南族的人，必須跟卑南族的感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才有卑南族的觀點，這不是由外來的，而是從內……這是很抽象的（謝偉姝，1996：35）。

無論上述何種說法，其共同點在於強調媒體工作者對自身族群認同的自我知覺，將過去由主流社會概念主導媒體運作的意識形態，改變為具有自我思維、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等概念的傳播實務運作。換言之，原住民在長期喪失自主發聲的權利之後，要以更基進（radical）的出發點和方式，在整個媒體生態中建構出具有自身特性且自我具足的媒介機構（institute）和內容。

也正因為如此，原住民籍的傳播學者孔文吉才會表示，原住民新聞的主體性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也是一個能夠拋開族群本位主義的狹隘性思考，能夠向上提升且能跨越族群及文化中心主義的藩籬，所累積形塑的一股多元文化、族群共榮的思維與視野；也是一個不同族群、文化互相欣賞、尊重且能求同存異，交互激盪之下所綻放出一個開放性園地（孔文吉，2000）。這也就是他所認為的「反論述」。

質言之，原住民試圖在媒體環境中建構所謂的「反論述」，其意義並不僅僅是針對主流霸權文化的壓制而產生的反撲；更重要的意義是藉由各種論述的交織喧嘩，呈現多元的發聲管道及論述，以顛覆漢族中心的單一思維和觀點，達到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目的。

所謂的主體性，其意涵在於展現一種自由成熟、免於異化與宰制的開放與解放狀態。社會中所存在的差異，會牽引個別主體不斷地對所處的情境產生問題與思考，驅使主體必須正視並嘗試超越過去的自我定位，不斷地進行修正與重建，這是一種動態的多重主體位置觀點。若轉由文化實踐的角度來看，主體的認同其實一直處於一種未完成的進行狀態，新的認同也出現在社會不斷交雜和變異的過程中。即以「原住民」一詞為例，當時原運提出此一名詞取代過去政府給予的「山

地同胞」一詞，正意味著原住民開始競逐象徵符號的詮釋權，透過象徵權力的建構，得以用主體的姿態，在生產與再生產的實踐運作中，重新詮釋和建構世界（林福岳，2010）。

這也就是為什麼探討原住民傳播議題，必須以原住民主體性做為起；其原因在於原住民族的主體因為長期殖民和高壓統治而備受壓抑，如果要翻轉殖民所造成的邊緣和弱勢，必須多方尋覓各種可行的抗爭空間和互動場域。將「原住民」這個既是新生、又是傳統的概念重新建構和詮釋，正是立足和展現主體個性的必要過程。現代社會的傳播媒體，理想上應該具備公共領域的性質，也因而可以成為原住民展現主體性，用以和主流社會辯證和互動的公共空間。

林福岳（2010）便認為，原住民的媒體以及傳播工作者，可以藉由媒體的場域再現自我的主體性，一則可以表達自我族群對生活世界的觀點與價值，再者也因為體會環境中由主流媒介宰制整體傳播的被壓迫狀況，而能針對此種現象建構反論述並發掘抗爭的策略，在激烈的傳播場域競逐態勢中，試圖突顯自我族群主體意識再現的種種可能，展示自己的發聲位置和詮釋權利。因而，原住民族展現主體的姿態，必須透過更為清楚而精準的文本建構和再現的傳播智能，透過媒體不斷地實踐過程，一方面替原住民族主體價值重新定位，另一方面也向社會展現他們詮釋意義和建構世界的意圖和能力。

由此，原住民傳播權的概念也可以在此脈絡下被理解。簡單來說，從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觀點來看所謂的「傳播權」。根據管中祥（2002）的說法，其基本意義即是指傳播參與具有的表意、發聲的權利與能力，不是被動接收資訊或解讀訊息的能力，而是一種參與傳播過程資訊生產的權利，這是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公民資格（citizenship）²。卑南族學者孫大川也曾進一步詮釋，媒體權是任何民族或群體基於不同的文化、經驗和背景，對內（族群本身）或是對外（所屬的大社會）有介入公共討論、對話與資訊傳播的權利。但是原住民在分享媒體權的過程中，要的不只是形式上的確立過程，更重要的是在媒體權的實踐中——族群文化的傳承、詮釋與創新，公共議題的參與，細膩地思考與解決期間所帶來的問題與挑戰，從而達到原住民主體性的自我開顯（轉引自李文富，2000）。

2. 傳播權的權利性質和來源是屬於公民權或是社會權，論者各有不同的觀點；按照林福岳和陳楚治（2008）的說法，傳播權利的位階並不能和集體權平行，而是位於集體權利之下，因為文化權、語言權或發展權，這三個權利都蘊含著傳播權利中的部分概念。正因如此，也不能完全的將原住民族傳播權只視為其中任何單一權利的具體展現，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應該為一種涵蓋好幾項類目集體權利的權利，單單用文化權、語言權亦或發展權，都不能完全涵括原住民族傳播權的概念，因此，他們認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應該等同於文化權、語言權或發展權利的層次，才可顯示傳播權的獨特意義和主體位置。

是故，郭雅婷（2010）將過去相關的文獻整理之後，歸結出原住民族傳播權在臺灣的發展，無論是法規、政策或視媒體環境上，都處於不利的地位；即使有了電視頻道，族人和部落要進行自我的傳播仍有其困難。因此，要如何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突破結構上的限制，確保媒體獨立自主，以草根、另類的實踐模式，提供原住民族人參與、發聲的管道，塑造多元的傳播環境，是當前傳播權實踐的重要課題。

但是，若要達此目的，本文就不得不指出，在媒介制度和組織上，如果試圖複製主流媒體的運作方式，無異將屬於專殊和建構反論述的基進媒體，放置於資本主義的媒介運作邏輯中，卻要求其能夠超越這樣的脈絡而獨立運作，簡直是緣木求魚。原住民需要屬於民眾參與式（participation）的傳播樣態，在「族群」這個社會層次中有許多民眾日常生活關切的議題必須共享或解決。所謂的參與，易言之就是自我管理，民眾有機會透過各種管道參與了決策的過程，便會使得民眾處理與共同議題相關的訊息、以及參與政策選擇的過程成為可能（Servaes, 1996）。在這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特質就是鼓動者要致力培養社區成員的能力，使他們成為自己社會改變過程的主體（Kennedy, 1988）。

因此，若要能夠滿足這樣的需求，就必須仰賴所謂的另類媒介。另類媒介對於大眾傳播最尖銳的挑戰，就在於民眾接近使用（access）和參與的可能性大幅的提高。民眾對社區生活環境的關切及實際需要，運用共通的媒介是最便利的溝通方式，社區媒介提供了一種民眾可以共同參與的決策方式，而不再只由少數人來決定公共事務。一旦社區媒介的功能彰顯，整個社區的決策溝通過程便有更多互動及對話的空間，也為各種不同策略的呈現提供了更多的機會（Nigg & Wade, 1980）。

關於另類媒介，國內過去其實不乏在各社會脈絡中實際的案例，而相關的討論則是到 1990 年代初期才開始（林福岳，1993）。所謂另類媒介的基本概念，Fontes (2010) 認為應該包含了下列幾項原則：（一）以媒體產製科技和參與的近用（access）做為核心理念；（二）於媒體生產與決策過程中追求民主的社會關係；（三）重視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與觀點；（四）植基於社會凝聚與反抗壓迫的倫理；（五）非營利導向（轉引自郭良文，2010：44）。郭良文（2010：45）也將 Carpentier, Lie, & Servaes (2003) 對於另類媒介的特質歸納為幾項：弱勢團體使用、呈現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庶民平等近用、以及呈現非支配型的論述；同時也可以補充或對抗主流的新聞再現，鼓勵非專業人士與志工的參與。這些觀點都顯示了另類媒介的自主與對抗性格，也提供傳播自主實踐的場域。

但是黃孫權（1996）帶著批判意味指出，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另類媒介，而是對於媒介傳播方式之另類意識的批判。他對「另類媒介」寧願採取一個較為開放

的定義結構：相較於主流媒體，提供一定的另類意識。換言之，我們不認為有某種另類刊物的存在，而是在此刊物中，能夠提供一個另類的、批判的、世代的、階級的、性別的、種族的等等、相對於主流媒體而提出不同視野的刊物。此種刊物的特色是能夠作為一種獨特聲音的載體，對主流媒體產生一定的威脅性、對於人們想像的新聞刻板模式具有分裂的效果，它不一定是菁英的，也可以是大眾的。由此觀點來看，另類媒介的存在和運作，並不一定是一個特定屬性的媒體，而是任何可以承載另類意識訊息的載體。

也因此某些具有另類意識的社區／社群中，部分媒介的工作者和社區參與者，都將自己視為傳播過程的授權執行者（enablers），而不是現成訊息的製造者。他們認為民眾的意見、想法、感覺，都應該有管道直接地表達，而不是祇有社區領袖才有權表達意見。當然，實際上社區媒介也無法讓所有民眾完全接近使用，但參與者相信就算無法直接涉入計劃、執行、生產的所有決策過程，至少也應該有篇幅表達他們的意見（Nigg & Wade, 1980）。

民眾願意參與社區的理由固然各有不同，但就意願及意義上而言，巴西學者 Demo 歸納出幾項社區參與的原因，可能是為了達成：自我提升、公民身份的實踐、投入民主的遊戲規則、掌控權力和科層組織、協商機制的設立及民主文化的建構（轉引自 Peruzzo, 1996）。

所以，本文接下來要提出一個例子，就是花蓮縣玉里鎮福音（Lohok）部落所進行的「村長麥克風」計劃。該案例是部落族人以另類媒體的方式，實際呈現原住民媒體如何嘗試建構具有主體性和原住民觀點的論述。本研究經由上述的討論，將針對下列數項問題意識，嘗試提出回應與詮釋：

（一）「村長麥克風」計畫的內容為何？如何透過計畫實踐原住民族的自主傳播權益？

（二）「村長麥克風」在「部落」這種社會脈絡下的運作情形，建構了什麼樣的傳播樣態？如何詮釋這種樣態和部落發展及傳播環境有什麼樣的意義？

（三）「村長麥克風」所具有的另類媒體意涵為何？如何體現另類媒體的角色與功能？傳播主體性又如何能在運作過程中體現出來？

肆、研究案例：「村長麥克風」部落傳播計畫

「部落」是臺灣原住民傳統的生活脈絡和社會組織，事實上部落的形成及其組織運作，和傳播的社會功能息息相關。原住民文化的多元性，以及部分部落所保存的傳統文化內涵，其中隱含了族人生活世界的傳播樣態以及其特有的運作

模式，例如特殊的訊息傳播傳遞方式、歷史紀錄方法、器物與社會制度的傳播運作等。而一個社群的傳播方式和意義建構的過程，必然和其所處的文化脈絡有關係。族群文化長期所形塑的生存環境，如何影響傳播的運作；而傳播的過程，又會漸次建構文化的深層意義。

高曉佩（2010）指陳，部落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制度提供一個意義體系，因而傳播工作可以有秩序、有規範的進行，即便部落成員在傳播過程中未必有明顯的互動及交流；但傳播活動自始至終都在一個有認同的社會中進行，部落文化就是認同和傳播機制的脈絡，傳播運作的過程便會在部落中產生共同性、有效的意義。文化與傳播相互糾結，部落社會制度是部落傳播的基礎，影響族人對訊息的接受、傳遞與解碼。

過去是如此，但是當代的部落，我們不禁要質問：部落的傳播在哪裡？如何發生和運作？影響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是在過去傳播研究中所無法找到答案的。本文試圖以一個筆者曾經進行過的部落傳播媒體試驗計畫做為例子，對於上述問題提出初步的探討與回應，來窺探現在的部落傳播可以呈現的是什麼樣貌。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包括參與觀察法及文獻蒐集這兩類。參與觀察的部分，由於該計畫實為筆者的研究所課程，因此曾經三度前去福音部落實地觀察計畫執行的狀況，並且親身參與計畫的內容，協助部落授課。而參觀的過程中，也曾對計畫執行的四位研究生、靜浦國小王邦文老師、參與計畫的學童、部落人士進行深度訪談，蒐集彼等的意見。

文獻蒐集的部分，主要來自於負責計畫的研究生所製作的「村長麥克風」計畫書及計畫成果報告，包括計畫執行現場的照片及影音資料。本研究中關於執行的細節和相關的觀察分析角度，部分即來自於這些報告。而有關部落的資料，則是來自部落人士所提供，或深度訪談所得。

以下則是關於「村長麥克風」部落傳播計畫的陳述，並進行分析。

一、計畫緣起

該計畫的產生，是因為筆者在學校研究所開設的「部落工作」³課程，要求學生規劃一個關於部落工作的計畫。其中有一組學生便選擇了一個位於花蓮縣玉

3. 「部落工作」這門課是當時筆者在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開設的必修課程，開課時間為2007年2月至6月。其目標在於探討部落的本質以及形成的過程；並面對部落所面臨的狀況，提出因應的構想與計畫。同時將過去有關原住民發展及研究方法所相關課程所習得的知識，應用在實際的社會場域中，一方面以部落做為實踐的場域，另一方面也檢視和省思我們對於社會科學實踐的認知和理解。由於修課學生一半以上為原住民籍，和部落的連結較為緊密，相對起來比較容易進入部落的情境。

里鎮的阿美族部落——福音部落。由於這群學生大學時期便就讀傳播相關科系，了解原住民在傳播方面的處境，而過去曾經有過廣播製作與主持的經驗；再加上又具有原住民身分，過去有在部落成長的經驗，因此引發一個全新的構想，希望嘗試教導部落的孩童製作廣播節目，而且是和部落相關的廣播節目。他們將此計畫取名為「村長麥克風」。

構想之初，原本是希望能夠縮短部落的數位落差，想要以網路廣播作為轉換原住民族資訊落差的槓桿，試圖用比較前瞻的視野、更具創意的試驗，在特定的社會架構和文化脈絡中，以此做為部落轉型的開端。不過，實施之後卻發現將焦點集中在廣播節目工作上，也發掘了更多值得玩味的議題。

其中最讓人感到興奮的是，我們可以親身經歷和觀察到，傳播新媒體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相遇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而這個原住民阿美族部落在它既有的社會組織、生活步調中，是否會因為一群小朋友使用傳播新科技後而產生不一樣的生活步調？在舊有社會組織仍舊有其架構的情形下，新傳播技術和運作是否會活絡組織中最底層的部分？

二、計畫內容

簡單的說，「村長麥克風」的構想，就是由該班的這四位同學做為啟動者，結合當地小學松浦國小的教師和資訊資源，在福音部落中召集一批對廣播和電腦有學習興趣的小學生，運用基本的電腦和網路設備，教導他們製作廣播節目的能力和技巧，讓他們成為部落的小小記者，製作網路廣播節目，成為部落的傳播媒體。這段試驗進行的時間大約是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8 月⁴。

本計畫選定玉里鎮福音部落（族名稱呼為「Lohok」）做為實驗場域，理由是因為該部落與中華電信基金會合作，設有資訊中心，其中有 15 部電腦，並有網際網路功能。另一個理由則是福音社區為阿美族部落，其年齡階層組織依然存在並運作，故在動員部落參與實驗計畫人員上較有意願及效率。

計畫的規劃與執行者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四名研究生⁵，他們的專長和工作分別為：廣播製作、新聞採訪、田調紀錄、計畫統籌等。在和松浦國小老師協商之後，經過挑選和諮詢，選定為部落中五、六年級的 12 位學童參與此計

4. 時間的起點設定在 2007 年 4 月，是因為當時開始進入部落進行田野工作，和部落人士研議計畫。2008 年 8 月份福音部落舉行 Ilisin（豐年祭），志工規劃學生擔任部落小記者，做為成果驗收的執行方式，故以此時間點做為觀察研究的結束點。實際上該計畫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

5. 這四位研究生為高曉佩、黃寶珠、杜宜蓁和何元豐。其中兩位原住民籍者，高曉佩為排灣族，黃寶珠為阿美及布農族。

畫。當初之所以選定孩童，是因為小朋友為阿族年齡階層最下一層之下，容易因社會文化必須服從的狀況，而較容易被動員。此外他們在學校有接觸、使用網路功能的基礎，學習電腦和廣播較易入手。

三、實施方式

（一）學程內容

教授部落小朋友如何製作廣播節目、如何採集部落聲音資料、如何採訪。而特別要求的是，小朋友應該盡量使用族語（秀姑巒阿美語⁶）進行採訪工作。

（二）時間

進行時間共分為二個時段，一為每星期五晚上 7 點到 9 點；二為每星期六早上 10 點至中午 12 點，每一時段為二小時。每星期學程種子人員擇一種時段進行學程教導。

（三）地點

松浦國小、部落資訊中心與部落。

（四）課程內容

廣播節目企畫與製作、新聞採訪、田野調查、錄音軟硬體之使用。

（五）所使用的器材

1. 硬體：錄音筆、電腦、照相機、麥克風。
2. 軟體：GoldenWave、Winnap、網際網路系統。

四、計畫成效評估

（一）學習興趣

小朋友的出席率頗高，每次上課大約維持八成以上的出席率，顯現小朋友學習的熱忱。

6. 依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認定方式，阿美語共可分為五個方言群：北部阿美語、中部阿美語、海岸阿美語、馬蘭阿美語和恆春阿美語等，而福音部落所在地所使用的是中部阿美語，又稱為秀姑巒阿美語。

（二）學習狀況

關鍵人物為部落小朋友的國小教師王邦文老師。王老師會督促、提醒小朋友至部落資訊中心上課。另外，在國小上課期間，王老師亦會要求小朋友將學程的心得撰寫、發表於網路部落格上。故小朋友的學習態度頗佳。青年團的幹部鍾肇基先生常至部落資訊中心關心小朋友學習狀況。若有小朋友不專心或是吵鬧，鍾先生的責備與訓斥會讓小朋友安靜、順服。

（三）特殊狀況

小朋友錄製的作品於部落播放之前，青年團幹部與王邦文老師表示必須先請示部落頭目之後，舉辦過「部落試聽會」，邀請部落人在部落資訊中心試聽小朋友的學習成果，並做計畫說明。

（四）學習成果

小朋友會用訪問部落的長者，進行簡單的訪問，以錄音筆紀錄部落長輩的歌聲，並使用軟體進行後製與整理，製作成廣播節目，之後放置於部落的網站上。有一次較為特別的經驗是，經過我們數度向村長要求後取得同意，小朋友錄製的歌曲介紹節目，在 2007 年 11 月 30 日晚上 8 點鐘，第一次在部落透過部落麥克風公開播放。播放之後，引起部分家長的好奇，了解小朋友做的節目內容為何後，皆表示願意配合小朋友日後的採訪與紀錄。此外，在採訪部落老人家時，老人們發現到小朋友的族語使用能力不是很好，連基本的問候語也很難說出口，因此主動與部落青年團、老師討論，決定要協助加強孩童的族語能力，尤其側重他們採訪時所需要使用的語句和詞彙。

五、後續發展

為了進一步培養小記者的專業職能，並嘗試更進一步的部落傳播試驗，2008 年 8 月份的部落 Ilisin（豐年祭）籌備的期間和舉行的時間，要求該計畫參與的小朋友正式成為部落豐年祭的特派記者。

為了 Ilisin 期間的採訪工作，本計畫特別在當地設置「Lohok 部落小記者中心」，以利採訪和節目製作的進行。小記者們穿著標示有「部落小記者」字樣的背心服、並佩戴記者證，持著數位相機和數位錄音機在祭典活動中穿梭、採訪、紀錄部落籌備 Ilisin 的前後事宜。Ilisin 舉行當天，他們也進行活動的訪問與側拍紀錄，而後製作成廣播節目，放置在部落的專屬部落格上。

以往，在阿美族傳統部落的年齡階層中，他們的年齡還太小（正式進入青年團，必須至少為國中生，國小五、六年級生為準備期），無法參與部落事務。然而隨著部落小記者中心角色的被接納，頭目、部落其他長老及青年團的成員反而會主動地要求部落小記者記錄部落祭典進行時的各項事務。祭典的前置作業期間、還有一連三天的 Ilisin 舉行期間，常常可以見到小記者拿著數位相機、麥克風和筆電穿梭在部落裡。特別地是，由於部落權力核心至部落其他族人的接納，小記者可以輕易的捕捉豐年祭的真實樣貌，而非電視或其他傳播媒介所看到刻意安排的祭典展演。部落小記者所採訪紀錄的聲音和影像文本會送至位於部落資訊中心的「Lohok 部落小記者中心」，和計畫種子老師進行文字、影像和影音的編譯，完成之後將節目放置在部落的網路平台上。他們因為記者的身分，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參與了部落的公共事務。

「Lohok 部落小記者中心」藉由科技工具延伸部落祭儀的參與經驗，將部落 Ilisin 的文化與情感深刻地烙印在部落的孩童們的身上，同時也延伸到部落空間以外的部落族人。網路有助於部落的內涵延伸至在外的社群，讓共同認同的歷史及集體意識有更為多元的傳播管道，將部落原本傳播機制緊扣認同意義的精神，也能夠落實在部落的電子社群的使用者之間。

如今，當初啟動計畫的四位同學業已研究所畢業，不過王邦文老師仍然延續該計畫，和部落的青年團共同持續進行培養部落小記者的工作，直到現在。

以上是「村長麥克風」部落傳播計畫的執行狀況。在原住民部落中進行特定的傳播方式，是一個嶄新的媒體型態，也引發特定文化社會脈絡中的傳播議題，下一部分將針對所引發的議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伍、部落自主傳播與另類實踐

一、部落文化與傳播科技

本研究當初之所以選定阿美族的部落，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因為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中，年齡階層有相當重要的份量和意義。阿美族的年齡階層組織在過去人類學的研究中分類為政治、軍事防衛及儀式功能的社會組織（李亦園，1982；黃宣衛，2005），而對於此組織近代功能很重要的意義在阿美族對自己認同的很重要表徵（黃貴潮，1994）。蔡政良認為阿美族的年齡階層組織的社會秩序觀念呈現出：

- (一) 與祖先信仰有關的老人概念，
- (二) 與社會活動、政治、祭祀有關的壯年人觀念，
- (三) 與漂亮、名聲、活力、禮貌有關的青年人概念，
- (四) 被使役、勞役有關的青少年概念，
- (五) 社會學習的概念，
- (六) 部分非連續且循環的時間觀。

其中，(二)、(四)及(五)這三點的內涵，與福音部落的小朋友為什麼會成為使用者的選擇有很大的社會關係及影響力。因為既然年齡階層與社會活動、政治、祭祀有關的壯年人觀念，因此透過「村長麥克風」所傳遞出去的訊息，就是一方面將聲音呈現在公共領域上，另一方面小朋友也藉此學習參與部落的社會活動。而(四)的被使役、勞役有關的青少年概念，使得在青年團團長或是年齡階層較高層級的青年召喚時，小朋友會較容易集合且遵守規定。關於(五)社會學習的概念，會使得參與者在部落的社會架構中學習順從並習得知識。

不過外來力量和新媒體科技對於部落的傳統結構，仍是有一定程度的衝擊。新科技就像是陌生的外來者進入部落一樣，夾帶著知識和權力的高度，似一股壓迫力量讓部落的人無法抵抗；然而這種所謂的新科技、外來者，不見得每一次都能和部落在一開始有良好的互動。然而在本案例中，福音部落的青年團願意接納並輔助此計畫的執行，使得進入初期的文化隔閡和排斥力量相當程度地降低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成為接受新興事務的緩衝體。

根據高曉佩(2010)的觀點，她認為原因有二，一是部落的傳播活動還是必須回到部落過去既有的社會制度之下運作，才能引起較大的共鳴；由頭目或青年團組織的播廣活動，很自然地會強化訊息在部落的流通和接受程度。再者，小朋友的採訪內容，以及整個傳播工具的運用主軸，均是以部落歌謠、祭儀和神話故事為主要的傳播內容，這樣的傳播活動很容易讓部落族人產生信仰和感情連帶，特別是在小朋友和老人之間的互動上，串連過去與現在的部落經驗。

所以，部落有其既存的生活步驟、社會組織，福音部落迄今仍保存著阿美族的年齡階層組織，並且組織確實讓它的功能運作於部落，是此次計畫的技術面較容易被接受的重要社會脈絡。

然而回到技術擁有與使用者的議題上，在傳統原住民部落之中，究竟誰可以、或誰應該使用部落新科技？這裡面包含兩個層次的問題：其一是，什麼樣的人有資格成為學習和使用新科技的人，除了自我的意願之外？其二是，誰有權力決定哪些人有優先學習和使用新科技？這裡面有事務推展、人才培育的考量；同

時也有權力結構改變和社會階級重組的意涵。除了使用者是否需要容易培養和學習，會是其中一種選擇標準之外；部落中哪些人需要和必須學習與使用，才是根本問題。

網際網路做為一種新媒介，以龐大「數位化」（digitalization）的效果，能讓各種資料透過數位格傳送，產生各種整合的效果，更趨向於使用者互動、個人化選擇、非同步（asynchronous）使用等特質（Rogers，轉引自程予誠，2003：128）。網路傳播的傳播意義和傳統傳播通路的差別，在於網路傳播不但藉由個人或團體將各種不同性質的電子媒體訊息傳送到被接者，如個人、團體甚或只是機器；網路結構複雜、多路徑的傳播方式，也提高了傳播的效能與影響（程予誠，2003）。

就本質而言，傳播本就是一種社會運作的過程，人們因符號和訊息的交互作用產生意義。網際網路的傳播特性強調個人特色、互動式的內容，使社會交互合作的過程變得更為開放而多元，同時個人的突顯與原本傳統的社會結構也會有所衝突。由於網際網路，人類在社會傳播運作因而可以跳脫地域、距離、身份和主流意識型態宰制，在傳統的社會關係中產生多樣的社群內容和文化關係（高曉佩，2010）。

將數位科技的媒體操作技術和能力帶進部落，是本計畫的重點；然而，部落真的需要這樣的新科技嗎？過去沒有數位科技的時代，大部分的部落依然在運作、生活著。剛開始，我們也心思索著自己在部落所實施的計畫是否必要，因為這個計畫有其顯著性，當小朋友的聲音透過村長麥克風傳遞、散佈出去的時候，總是能引起族人的注意、關注與討論。但「村長麥克風」這個計畫真是的部落需要的嗎？

網際網路的運作，使人們在遠距離與非同步的情況下，同樣可以產生經驗和情感上的連結。使用者經由網路互動而發現別人的經驗，對環境產生新的認知，更可相互交流經驗或知識，此一互動的特質產生了一種「經驗社群」，使用者對彼此有了共享與共用的經驗（程予誠，2003）。網路傳播的特質異於大眾傳播的一元化主導，而是促成使用者關係間的互動與參與，傳播關係上呈現多元的狀態，也更為複雜。過去藉由部落社會制度的傳播結構，社群在其中學習或是產生認知的過程，但在新科技的運作之下，部落對當下生活形式和文化的直接感受，產生有別於以往的部落社群。

計畫過程中，我們看見小朋友在部落裡訪問、採集族語歌曲，手拿錄音筆及麥克風的時候，他們真的十分顯眼，部落的族人一開始不是很能適應他們所進行

的工作；甚至有時候，部落裡的人會因為感覺尷尬而拒絕他們的採訪、拜訪，以致往往只為了錄一首歌，小記者就要跑個四、五戶人家，才会有老人家、家長願意配合接受採訪。小小記者剛開始穿梭在部落中、使用著新科技時，所引發的僅僅是好奇的眼神；然而當這個計畫從「顯著」變為一種具有正面價值的「助益」時，小朋友與部落長輩的互動變產生了微妙的改變，應運而生另一種新的互動的模式。當他們所做的事情被了解之後，有些老人家甚至反應希望小朋友可以常來找他錄音，除了自己愛唱歌之外，重要的是體會到自己有「被需要」的感覺。

確實，廣播節目剛開始在部落播放時，曾經引發質疑和討論，一方面是對於這種傳播形式的陌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挑戰了部落過去訊息傳遞的既有模式與接收習慣。不過之後能夠緩和部落的情緒反應、進而接受並肯定，高曉珮（2010）認為是因為數位科技媒體的使用，反而促進了部落族人彼此之間的情感的互動。廣播節目的參與人員是部落的孩子與部落的青年團成員（他們其實也就是部落小朋友的家長），並且以部落的語言與歌謠做為節目的主要內容，頭目與族人便肯定這種節目的製作方向，認為可以透過族語的使用拉近孩子與部落距離、增加孩童的族群認同。

不過也有人建議，節目傳送的方式可以更多元化，至少不要透過部落的公共播音系統發送，因為這不是部落所習用的傳播模式。由此似乎可以窺見，無論數位科技媒體的運作引發了多少好奇、興趣、新的討論或新的傳播樣態，部落的族群文化特質、傳統的傳播空間中，依舊必須保存部落部分的舊有結構和尋求穩定的基調。

是以，全程參與計劃的高曉珮（2010）便認為，前現代的部落文化因為部落所處的時間與空間而得以延展，隨著與現代傳播科技的連結，部落固然可以得到史無前例的發展機會；但另一方面也阻礙了部落社會制度對於新制度思考與比較的機會。我們不能只是簡單的允諾族人新型態的互動方式，卻不告知可能的負面影響，也不提供任何替代性的可能路徑；反之，我們必須企圖建立一套幫助部落適當地了解傳播新科技的管道，讓族人知曉可以透過哪些途徑，來進行部落建構內部和對外的新傳播樣態。

本計畫由於初期尚在試驗階段，工作和計畫內容所涉及的也僅止於語言和文化的議題，故並不會碰觸較為敏感且核心的權力結構層面。然而科技的進入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終歸是部落無法逃避的現象和議題，本報告暫時無法深入探討此一議題，但是必須指出此一問題在部落中未來可能引發的社會變遷，仍需留意。

二、部落傳播的另類實踐

一群在地小朋友在部落中製作、播放的廣播節目，可以算是一種在地的傳播實踐嗎？還是充其量只算是一個教學活動？甚或遊戲？我們可以如何詮釋這個計畫的意義？筆者嘗試在此討論及回應前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

首先，該計畫何以能夠實踐原住民族的自主傳播權益？

部落是原住民族社會經過殖民之後殘存的傳統社會單位，在被統治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幾乎斷斷了其原有的社會意識與文化內涵。由部落的位置，運用新傳播科技從新發動媒體的運作，此行動本身所傳達的就是部落對抗主流掌控的傳播行為。「村長麥克風」的發起者雖然是外來的團隊，但是在初期的協商過程中，是非常清楚地告知部落族人，這不是一群外來者要求你們幫忙事情，而是共同發起一個自身能夠參與進行的傳播活動。基於這樣的理念，志工團隊才會在訓練的過程中，非常明確地要求小記者在製作節目時所應該具備的核心概念，是針對部落所發生的事情，以族語做為使用的主要語言，製作和部落相關的節目。其目的就是希望這個傳播試驗是以部落做為傳播運作的主體，由自身的需求和觀點出發，儘管運作的主體剛開始只是小學學童。

而自主傳播的意義，或是說傳播主體性的實踐，可以觀察到的一個面向就是由族人自己成為傳播及媒體運作的發動者（initiator）。村長麥克風由部落內的小學生開始進行廣播節目製作，報導部落內的事務，並對社區居民進行網路播送，這些行動初步已經具備了社區傳播⁷的性質，也展現了透過傳播自我發展的意圖。另一個面向，則是這個計畫所涉及的傳播主體性內在建構過程。因為由兒童自己做為媒體運作的主體，在製作節目的過程中，一方面刺激和強化了小朋友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挑戰了部落族人對自身族群定位的再思考：為什麼兒童無法流利地使用族語？為什麼他們要來訪問過去的歷史？為什麼部落面臨現今的處境？為什麼部落呈現如今的風貌？因此，部落的主體就是人的存在，包括歷史上的族人、現今的族人，在部落裡的族人，在部落外的族人，部落傳播企圖建構或重構部落與族人，族人與族人間的共同意識、心意的交流。部落的文化特質和歷史經驗，如起源神話、土地、語言、宗教、先人事蹟或祖先受難經驗等集體記憶和經

7. 所謂的社區傳播，根據林福岳（2002）的說法，是指小規模的公共傳播，所有參與社區傳播的人，都同時是傳送者也是接收者，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在公共議題上關切的方向及利益通常也是共同的。所以，社區傳播在向閱聽人訴求時，便已認定彼此間有共同的關切並且息息相關，社區傳播中流通的訊息是一種共同關切和利益的再生產（reproduc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用以獲致社區媒介的社會及政治意義。

驗，不只是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更是族群用以區隔我群和他群的重要依據，以及我群認同的象徵（symbol）。前文提及，一個族群面對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差異，會牽引個別主體不斷地對所處的情境產生問題與思考，驅使主體必須正視並嘗試超越過去的自我定位，不斷地進行修正與重建，「部落麥克風」計畫驅使族人必須正視和尋找定位和認同，傳播主體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更新和重建的可能。

而「村長麥克風」在「部落」這種社會脈絡下的運作情形，建構了什麼樣的傳播樣態？這個運用媒體進行更新和重建的過程，正和部落所存在的特定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族群的存在，往往會使得成員有隸屬於整體的「歸屬感」，繼而產生一種安身立命的感覺，因為族群的存在解答了成員生命中的永久性問題，諸如生命的起源、命運、意義等問題(Eriksen, 1993)。因此，族群（ethnic group）一詞，在人類學的觀點，是指由單一族群成員所構成的社區組合。蘇裕玲（1995）綜合學者意見，將族群社區界定為：「一群具有相同根本賦與感知的人，基於共同的理念與行為模式，在一個有限範圍所形成的聚落，其成員之間依照一套權利義務原則，來維繫彼此的關係」。她也指出，族群社區的發展，因為其特定的歷史過程，故能形塑出該社區的地方特質（locality），使得居民除了擁有共同的族群性之外，還可能共享特定的地域文化，進而發展出對該社區的地方認同。這種地方認同，必須仰賴居民的心理建構，使得社區成為他們認同的範疇，一如族群一般，可以被居民加以操弄成為日常生活中運用的策略。

「部落」其實就是一個典型族群社區的概念，從福音部落中仍保有的阿美族傳統年齡階層來看，就知道他們對於傳統社會特質仍有相當的堅持和認同。雖然「村長麥克風」只是小朋友在進行的傳播媒體試驗，卻可以從中顯現年齡階層所形成的權力結構和關係。而節目製作所獲得的認知和迴響，也顯示無論所採用的傳播媒介和形式為何，當語言、祭典、歷史等文化要素都成為符號元素時，傳播的認同功能就可以持續運作。

當過去部落尚未使用現代傳播媒介時，所憑藉的傳播方式是人際傳播、神話、傳說、歌謠、祭典、儀式、禁忌等文化現象和社會規範；而現代傳播技術所改變的是承載和傳遞的方式，可是內容依然是部落的文化元素。無論所採用的是何種進步的科技，部落所保存的社會體系維繫著過去的舊貌和某種程度穩定的體質，雖然人類生活的環境以及社會結構，會依著傳播方法的創新而發生傳播過程的變化，衍生更為多元而繁複的傳播體系。「村長麥克風」計畫試探出了一個可能，就是在部落的既有社會結構中，仍然可以採用新的傳播方法，建立部落未來

發展的新傳播模式；而這個可能性，使得原住民族期待翻轉當前弱勢的傳播處境時，多了一份實踐的管道和機會。

而以一個另類傳播的視角來觀照此計畫，站在一個有別於主流媒介的角度發聲，儘管村長麥克風相較於龐大的主流媒介，幾乎可以完全忽略，也未必具有任何議題設定的功能，但是既然已經做為一個在地的草根性媒體，所站的位置本身就已經展現了區隔和對抗的姿勢。亦即，藉由自主權的掌控，在福音部落觀點的發聲位置上其所建構的論述，就已經是處於一個相異於主流媒介的社會脈絡中，和閱聽眾進行互動和發生影響。雖然媒體運作的實際工作者未必有意去突顯其反主流和反同化的意圖，但是他們存在本身就已經具足了反抗的意旨。孩童以生澀的族語與長輩對話，用以製作廣播節目的內容；長輩將記錄豐年祭的重責大任交付給孩童，在影音中留存傳統，這是主流媒體不會也無力關注的題材，但是孩童們的部落網路廣播，卻達到主流媒體所無法企及的媒體功能。在此基點上所建構的論述，也就相對地成為所謂主流媒介內容的「反論述」。由於部落中長輩們不諳閱讀中文，口語是的傳播媒介更容易被接受且發揮影響力，這也是第一次透過放送會引發震驚的原因，族人沒有想到孩童們竟然可以掌握部落最有力的傳播工具—擴音器，這種內容和型態，顛覆了部落族人對於使用媒體的認知和想像。另類媒介反論述的出現，會逐漸地發散影響，在主流媒體的資本集中化和利潤極大化的既有邏輯中，悄悄地產生某種顛覆的力量。

郭良文（2010：68）所引用 Vatikiotis (2010) 的說法，認為另類媒介實踐的反叛特性，正是地方形塑政治意識，做為反面資訊的提供、或做為一種發展權力的代言者，進而形成大眾反抗文化，公共媒體的參與建立在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的概念之上，具備的民主過程的實踐意義。由此觀之，Lokoh 部落的小記者，正無形中實踐了另類傳播的精神。做為主流意識仲介者（agency）的主流媒介，無意也無能力在社區或部落的社會脈絡中運作，這是對部落在文化權和傳播權上的雙重剝奪。「部落麥克風」所開拓出來極其有限的公共領域，已經代言了部落面對宰治權力的抗拒態勢。

在 Ilisin 期間，小記者突破年齡階層的限制，一反常規的進入祭典的核心部分，進行採訪、紀錄部落籌備 Ilisin 的前後事宜。Ilisin 舉行當天，並且對活動過程進行訪問與側拍紀錄，再製作成廣播節目，放置在部落專屬部落格上。部落權力核心和部落其他族人對於傳播工具能力的需求和期待，使得以部落事件為節目內容主題的部落小記者，可以得到權力階級的授權，自在地補捉豐年祭的真實樣貌，跳脫一般主流媒介所看到經由刻意安排的觀光式祭典展演。因為記者的身分，孩童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參與了部落的公共事務。

這個案例顯示了「村長麥克風」計畫中，原住民的傳播工作者——即使是孩童，得以有機會透過媒體內容的產製再現自我主體性，在生澀的節目中卻依然表達自我族群的觀視角度，以及對生活世界的認識與價值判斷。同時，也有能力在被主流媒介代為再現的傳播權利被剝奪的狀態中，嘗試建構出反論述，並發掘另類運作的策略，展現自我族群主體意識再現的另一種可能。他們站在自己的發位置聲並提出詮釋，昭示了原住民族實踐自我主體觀點的可能，也向部落和整體社會展現他們詮釋意義和建構世界的意圖和能力。

從計畫的發動者到實際參與的學童，儘管未必有另類媒介工作者的確切認知，然而他們都理解自己正在做為一個傳播執行者（enablers），透過廣播節目的製作將民眾的意見、想法、感覺直接地再現，跨越單一而權力集中的社區領袖才有的傳播權利。

就論述建構的觀點而言，這些稚嫩又粗糙的節目內容，也完全無法和主流沒媒介的內容相抗衡；但是他們製作節目的目的本來就不在於取代或顛覆主流媒介對於原住民的論述和詮釋方式，而是在媒介環境中呈現出屬於自身、另類的觀點，相對反映出原住民族——即使是小朋友——對自身的認知和想像，也會因著族群或是其他社會脈絡因素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推動者，對於自身的角色及文化背景，在推動計畫的行動過程中，透過反思及辯證的關係而建構屬於自我的原住民意識，進而轉化成為媒介內容，更是饒富興味的傳播實踐過程。

陸、結語：一個可能的起點

對於原住民傳播權益的維護及原住民觀點的呈現，幾乎成為研究原住民傳播議題的政治正確。但是當前以官方經營方式的原住民族電視頻道，因為其政經結構的本質，往往讓節目失卻其草根特質，部落的訊息和聲音無法使得和主流媒介區隔與抗爭的內在動力無從發生（張鴻邦，2010）⁸。

「村長麥克風」這個研究案例，在整個媒體環境中其實是十分孤獨而渺小，沒有足以和主流媒介相抗衡的任何條件和資源。但是他們卻可以展現出做為所調具有原住民主體性的媒介，在建構反論述上的實踐可能。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試驗，出現時間也不長，質量和能量上都明顯地不足，影響的範圍也很有限，但這仍然是一個可能性的初步創造。

8. 關於為何當前的原住民族電視台並不具備草根特質，也無法成為部落傳播的有效媒介，當前原住民的廣電政策因為採取的是標案的形式，因此媒體有其限制而無法完全具備自主媒體的個性。這方面的理論可以參考張鴻邦的碩士論文《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廣電政策》（2010），裡面有詳盡的剖析。

「村長麥克風」計畫不單單只是探究一個另類傳播媒體的實況，更是面對一個正在實際發生的傳播活動。由此我們可以探索到，族人對於自己部落主體文化的重新思考與認同的再建構，以及部落原有的傳統結構中傳播的運作樣態，無論外來的傳播科技以何種型態、造成何種衝擊和影響，部落仍然會展現出特有的文化性格和社會機制，也就是所謂的傳統，如何應對各類新型態傳播的進行（高曉佩，2010）。

用更巨觀的傳播視角來看待這個試驗，部落經由傳統的傳播活動到現代的傳播活動，部落的社會觀念也隨之轉變、重構與延伸。由於部落觀念的對外延伸，族人在有形、及無形的部落社會中，試圖重新發掘認同與歸屬，部落傳播的運作正在創造、延伸關於部落更寬廣的想像與指涉，傳播與部落形成的辯證關係被再度彰顯出來。

原住民需要在主流媒體環境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因為霸權文化的本質及資本主義邏輯的龐大權力結構，其發展的空間其實很有限。但是蘊藏在市民社會的反論述空間卻是無限的，我們支持原住民擁有自己的媒體以及自己發聲，不單單是因為這些族群的弱勢處境，而是為整體社會建構多元文化內涵的必要，保留多一些的可能。另類媒介的基進意義就在於讓在地、草根（當然也包括部落）得以有機會開創自我為主體的傳播方式及媒體，積極透過傳播運作達成自我定位與提升、公民身份的實踐、進入民主社會的互動場域、在權力科層的科層架構中覓得運作的空間、設立協商機制及建構民主文化。任何一種在地另類的傳播試驗，一方面可以建構多元文化社會和實踐社會公義的可能，更讓我們開拓傳播的想像範疇，並延展豐富我們探索和思考的場域。

對於臺灣原住民部落的傳播環境及其運作樣態，在臺灣的傳播研究社群中，是一個尚未觸及的新領域，可是其中卻蘊含著許多重要的傳播議題。其中像是族群文化長期所形塑的生存環境，如何影響傳播的運作；而傳播的過程，又會漸次建構文化的深層意義，兩者之間的互動和辯證關係，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研究取向。本研究是一個初探性的試驗，關於在部落要如何進行傳播議題的研究，儘管有民族誌法做為基礎；但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最適切的研究途徑和方法尚在摸索之中，本研究也可能有過度簡化之虞，是為本研究的限制。

由於傳統文化及社會脈絡的保存，部落中所既有的傳播樣態，可能還可以窺視到人類社會在現代媒介發明之前的傳播方式，讓吾人有機會洞悉人類傳播的本質。本研究也建議未來關於原住民族的傳播研究，可以將部落視為研究的場域，累積有關部落傳播的研究和論述，這將會是臺灣最具特色的傳播研究，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傳播對於人類社會的意義究竟為何。

參考書目

- 孔文吉(2000)。《忠於原味：原住民媒體、文化與政治》。臺北：前衛。
- (1998)。〈前瞻跨世紀原住民傳播權益之藍圖——兼論傳播媒體與原住民形象的文化問題與權力政治〉，《山海文化雙月刊》，19：105-123。
- 巴蘇亞·博伊哲努(2000)。〈傳播媒體與原住民〉，《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8：2-3。
- 王嵩音(1998)。《臺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臺北：時英。
- 江冠明(1996)。〈「原住民觀點」與「原住民新聞雜誌」〉，《電影欣賞》，14.79：65-67。
- 李文富(2000)。〈訪問孫大川老師談原住民媒體權〉，《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8：19-21。
- 李亦園(1982)。《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
- 林惠娟(2006)。《原住民的報紙新聞再現——以花蓮縣長補選期間「殺豬涉賄選」爭議為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福岳(2010)。〈由「他者」轉向「我群」——原住民電視臺傳播主體性實踐之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2)：131-162。
- (2002)。《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1993)。《將社區劇場視為另類傳播媒介之研究：以「民心劇場」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林福岳、陳楚治(2008)。〈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探源及詮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1)：59-81。
- 林彪鴻(2011)。《臺灣原住民族廣播發展歷程 1945-2010》。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金惠雯(2000)。〈原住民與媒體運作之我見〉，《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8：13-15。
-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北：韋伯文化。
- 孫秀蕙(2001年2月)。〈原住民節目的經營與定位：主體性之建立與雙元論述的可能性〉，「新視野：公共電視發展與未來國際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浦忠勇(2000)。〈從鄒族祭典場域看媒體的操弄〉，《原住民文化與教育通訊》，8：9-12。
- 馬紹·阿紀(1998)。〈原住民與「頭條新聞」〉，《台大新聞論壇》，5：27-32。
- 高曉佩(2010)。《「部落傳播」概念之建構與實踐——以花蓮 Lohok 福音部落「村長麥克風計畫」》。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華(1997)。《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臺北：正中。
- 張鴻邦(2010)。《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廣電政策》。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良文(2010)。〈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43-74。
- 郭官義、李黎譯(1999)。《認識與興趣》。上海：學林。(原書 Habermas, J. [1973].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Suhrkamp.)
- 郭雅婷(2010)。《公民新聞與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實踐——以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楚治(2008)。《臺灣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原住民族電視台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陸正誼(2004)。《蘭嶼原住民電台發展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程予誠(2003)。《網際傳播對網路、人、組織未來的影響》。臺北：五南。
- 黃宣衛(2005)。《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黃孫權(1996)。〈九零年代的另類媒介〉，《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八十五年版》，頁 269-284。臺北：新聞局。
- 黃貴潮(1994)。《豐年祭之旅》。臺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黃葳威(1997)。〈原住民傳播權益與電視新聞節目：一個回饋的觀點〉，《新聞學研究》，55：76-102。
- 楊政霖(2005)。《「原住民新聞雜誌」服務品質之研究——以原住民閱聽人觀點為例》。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管中祥(2002)。〈從 Habermas 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185-220。

- 鄭立明（1996）。〈媒體，觀點，原住民——「原住民新聞雜誌」座談紀實〉，《電影欣賞》，79：55-63。
- 謝若蘭（2006）。〈土地與記憶——從「懷坦吉條約」談原住民認同與權利〉，施正鋒、謝若蘭（編），《當代紐西蘭民主政治》，頁 139-178。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 謝偉姝（1996）。《公共電視原住民記者報導觀點之探究》。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裕玲（1995）。《族群社區與族群書寫——當代臺灣客家意識展現的兩個面向》。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Ashcroft, B., Griffiths, G., & Tiffin, H.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 Eriksen, T. H.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 Kennedy, T. (1988, May-June). *Attitudes, roles, and the development field work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Orleans, LA.
-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quest*. New York: Routledge.
- Nigg, H., & Wade, G. (1980). *Community medi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the UK: Video, local TV, film, and photograph*. Zurich: Regenbogen-Verlag Zurich.
- Peruzzo, C. M. K. (1996). Participatory i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J. Servaes, T. L. Jacobson, & S. A.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162-179). London: Sage.
- Riggins, S. H. (Ed.). (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 Sage.
- Servaes, J. (1996).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new social movements: A realistic utopia. In J. Servaes, T. L. Jacobson, & S. A. White (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p. 82-108). New Delhi, India: Sage.
- Subervi-Velez, F. A. (1986). The mass media and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m: A review and research proposal with special focus on Hispanic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71-96.

Viswanath, K., & Arora, P. (2000). Ethnic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ssay on their role in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 39-56.

The Media Experiment of Indigenous Tribal Communication: The “The Village Head’s Microphone” Project in the Lohok Tribe

Lin, Fu-Yu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have long been disadvantaged, thus their communication rights have not been well-protected. “The Village Head’s Microphone” is an experimental communication project carried out by a group of volunteer indigenous MA students in the Lohok Tribe, Yul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These students used the resources in the computer room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to teach 10-14 year old children to use their tribal language while they were producing a radio program which people can listen to on the internet and also broadcast via the tribal public address system. The experiment created an opportunity to put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into practice and to create new tribal communication possibilitie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ransforming their ident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media is a new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

Keywords: tribal communication,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Lohok Tribe, alternative media, communication objectivity

* Email: fuyueh@ms45.hinet.net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舊聞新史：對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思考

Old News, New History: Rethinking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in Taiwan

doi:10.6123/JCRP.2011.028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黃順星(Shun-Shing Huang)

頁數/Page：179-20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2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舊聞新史：對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思考^{*}

黃順星^{**}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摘要

論文透過 Carey 對美國新聞史的反省為起點，梳理出傳統新聞史研究的局限性，並以此回顧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儘管中外有別，但疏無例外地都將新聞事業視做特定的社會建制，新聞事業的價值必須依賴於民主政治的進展才得以成立，而忽略新聞所具有的文化意義乃至其他的面相與可能。本文認為以典範與文化史的概念重新理解與詮釋新聞事業的演變，典範不只意味著相異的世界觀與更是立基於特定社會想像而生成的認知圖示，正是這些不同的想像而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新聞實踐與新聞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臺灣新聞史、新聞典範、感覺結構、社會想像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0 年「新聞典範的挑戰與另類媒體」研討會，對當日與會者的建議及批評、黃國富對本文初稿提供的意見，以及評論人翁秀琪教授提供出版中的論文供本研究參考，僅此致謝。

**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壹、新聞史的問題

新聞史能否證明自身為一種知識類型？能否成為一門具體的教學課程？能否成為值得我們獻身投入的專業研究活動 (Carey, 1974/1997: 86) ？

新聞史向來是新聞傳播學門的重點教學科目，透過歷史傳統的回顧與塑造，證明新聞教育與實踐的必要與正當性。但長久以來，無論是研究觀點或教材編寫方式，相比於其他傳播學門的發展，新聞史研究並無顯著的更新與突破。對此，Carey 於 1974 年在 *Journalism History* 的創刊號上發表：〈新聞史的問題〉(1974/1997)，展開一系列對美國新聞史研究的反省與檢討。在這篇提綱挈領的文章中，Carey 認為美國社會思想的特徵是其科學與非歷史的特質，這些特質同樣反映在美國的新聞史研究中。特別是由於受行為科學的影響，使得美國新聞史研究的範圍過於狹隘，更無視其他歷史學者的成果，從而限制新聞史研究的可能與貢獻。

除美國特殊的文化思想背景而導致新聞史研究無法與其他學科傳統產生對話外，另一個矛盾的根源來自長期主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典範。Carey (1974/1997: 88) 引用 Butterfield 的說法，將這個研究傳統稱之為「輝格式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輝格式解釋的特徵是將進步理念與歷史發展連結並置，視新聞史為緩慢但穩定的成長歷程。這個發展過程的經典表述就是個人權利的擴張，在當代則被描述為人民獲取知的權利並取得制度性保障，整個美國新聞史研究就在這樣的解釋框架下持續地累積。跟隨 Carey 的批判，Weaver (1975) 分析 Mott 的 *American journalism: A history 1690-1960*，這本在美國新聞史研究佔據經典地位的著作後指出，在 Mott 的歷史敘述中僅關切大人物，而不是新聞的概念與書寫風格，對不同時期的新聞特色毫不存疑，僅從政治演變的角度觀看新聞史的演變。

McKerns (1977) 則另以〈進步的新聞史〉(Progressive journalism history)，描述潛藏在這些新聞史書寫背後的預設。進步的新聞史背後預設了個人主義、自由放任的社經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不同層次的社會文化成因；但總歸一句，進步的新聞史就是善惡間的永恆鬥爭。所謂「善」即進步主義，而「惡」就是保守反動思潮，歷史是跟隨進步主義的潮流前進，新聞事業在歷史洪流中有助於克服保守反動的思維及其它反民主的勢力。但這種史觀如何解釋保守主義的

反彈？而進步主義的理念又如何維繫至今？其面貌歷經哪些不同的轉變？這些問題，進步的新聞史無法回答，因為除了將保守主義視為負面因素而徹底否定之外就一無所是，也喪失其他解釋的可能。

在新聞史外，西方的媒體史論述也存在著這種線性進步的史觀。Curran 整理存在於英國媒體史研究中不同的論述流派，依照 Curran (2002: 33) 的觀點，這些不同的媒體史敘事，除了基進主義敘事外，其共同之處在於認定歷史朝向日益進步的方向演變，Curran 故而以「肯定性敘事」(affirmative narratives) 稱呼這不同的媒體敘事。正如許多評論者 (Brennen, 1995; Erjavec, 2008) 所指出的，這種肯定性的新聞、媒體史論述，是以線性發展的進步史觀為基礎，假設一個固定不變且值得為人稱頌的歷史發展目的。傳統新聞史寫作的共同傾向是：毫不質疑地頌揚資本主義的成功，認定企業與資本家一同構築現代新聞事業的礎石，新聞史展露的是少數權勢人物所擘建的恢宏藍圖，根本就是一部權力傳記 (Hardt, 1995)。

新聞史研究在權勢人物之外，對於新聞資訊的生產過程、新聞工作者被馴化的方式，以及被視為廉價勞動力而被剝削的實況，完全隱匿不察。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雖然被認為是新聞產製的核心關鍵，但這些底層的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史中卻是默默無聞的。這種新聞史論述類似傳統政治史的敘述，藉著探索與分析媒體菁英的活動：無論是媒體所有者、編輯或者明星記者，以此解釋某些具有影響力的情境、實踐與事件。這是一種強調少數菁英的歷史論述，新聞史的論述主體是媒體機構，而非新聞工作者以集體實踐所構築而成的新聞專業文化。以少數菁英與特定機構為主體的歷史論述，成為新聞事業與新聞教學的正當基礎 (Hardt, 1992; Lester, 1995)。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臺灣的新聞史研究，無論是早期依附於黨國體制的社會公器說，抑或晚近的侍從報業理論，均將政治體制視為影響臺灣新聞事業繁榮與否的決定性因素，而忽略新聞報業作為自主場域的內部動力及其他可能的解釋（黃順星，2010）。因此一旦影響臺灣新聞報業發展的戒嚴體制解除後，上述解釋模式也不再適用，尤其是在臺灣社會已具備基本的形式民主之際，該如何評估新聞事業的興衰發展？當新聞報業面對的不再是政治權威的恫嚇威脅，無所不在的市場巨靈不但主宰新聞報業的日常產製，甚至成為從業者的唯一倫理準則時，新聞業又該何去何從？

倘若歷史研究的意義在鑑往知來，研究者就無法迴避歷史詮釋的當代意義，特別是對新聞史研究與教學而言，其存在的目的就在替學科與未來的從業者在廣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定位自身。因為這不但是新聞史研究的意義，也是新聞報

業理解自身處境的關鍵，新聞史研究比起其他領域內的次學門有更多的機會，透過歷史文獻的梳理建構自身的正當性基礎。新聞史研究的不被重視以及研究方法的陳腐，反映的是新聞史研究者疏於將靜默無語的檔案資料，與當代傳媒重要議題做鮮活的連結而為當代所用，並提供關於新聞此一社會建制（social institution），在當代情境中究竟能夠扮演何種角色、實現哪些職能的多元另類詮釋。

本文認為，新聞報業此一社會建制是隨歷史發展而有不同的意義，既存新聞史研究對當代傳媒關鍵議題的軟弱回應，肇因於將新聞報業視為固定不變的社會實體，僅著重新聞報業在公共領域中所發揮的理性批判功能。這種史觀就生產面而言，低估新聞報業作為經濟實體所必須面對的商品化與市場化趨力；從讀者消費面來說，僅以理性論述掌握新聞的社會使用，忽略讀者藉新聞得以分享情感經驗以形成共同體的文化整合功能。本文主張應放棄傳統對新聞事業的單一想像，以典範這概念所蘊含的歷史建構特質，以新聞典範而分析不同時期的新聞實作，並強調不同新聞典範乃是基於不同的社會想像所致。新聞史研究的重點應在爬梳這些對新聞的不同想像，提供新聞事業未來發展的可能思考。

貳、新聞作為文化行動

引言中所提及西方新聞史研究的觀點如：「輝格式解釋」、「進步的新聞史」或「肯定性敘事」等，在 Carey (Reilly, 1997: 108-109) 看來，這些主流的新聞史研究途徑，在解釋新聞史時的主要缺陷是將新聞事業等同於社會建制，而忽略新聞的文化特徵。Carey 不斷地強調，對輝格式解釋的批判並非徹底否定其成就，而是認為輝格式解釋已耗盡精力，需要一種新的方式或史觀重新探究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Carey 建議應當賦予新聞更多的文化意義，視新聞為一種文化行動，以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新聞報業的發展，而不僅只是一種制度化的結構。在被視為 Carey (1989/1992) 扛鼎之作的〈傳播研究的文化取徑〉一文中主張：

新聞是一種歷史實體，這種歷史實體的文化形式是由特定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時刻中所發明的……。新聞不只是資訊而是戲劇，新聞不僅是對世界的描述，更像是對劇場中一舉一動的素描，還要求我們投入參與（同上引，21）。

Carey 此一對新聞的獨特界定，以及主張傳播的儀式觀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¹，反映 1970 年代美國學界的文化轉向，特別是 Geertz (1973) 在《文化的解釋》中提出的「厚描」與象徵人類學的興起。在 1960 年代受年鑑學派影響的社會史研究主宰當時的歷史研究，並且廣泛地影響到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其基本關切是社會結構，但當時的人，也就是社會史所關切的底層民眾到底是怎麼想的？他們相信些什麼？他們又如何感覺？社會史的方法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1973 年 Geertz 出版的《文化的解釋》適時地填補這個空缺，新文化史應運而生。以 Darnton (1985 / 呂健忠譯，2005) 的著作《貓大屠殺》為例，就可以看到 Geertz 的著作對新文化史的影響。

《貓大屠殺》(1985 / 呂健忠譯，2005) 這本論文集來自 Darnton 與 Geertz 在普林斯頓大學共同開設課程的成果，Darnton 認為史學家可以如同人類學家般地遊走在部落之間，以土著的觀點看待事情，試著了解當地人行動的意義之網。文化史的任務就如同人類學家一般，以解讀民間傳說與文本的方式，解讀儀式或城市 (Chartier, 1988: 97)。Darnton (1985 / 呂健忠譯，2005) 認為新文化史：

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徑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這個類別在英文仍然無以名之，為了單純起見，不妨稱作文化史，因為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同上引：ix）。

自 1980 年代起，西方史學界開始大量使用新文化史一詞，由 Lynn Hunt (1989 / 江政寬譯，2002a) 主編，並於 1989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即以《新文化史》作為書名。另一位倡導新文化史的重要旗手 Burke (1992 / 江政寬譯，2002b：190) 認為，新文化史所遵循的是一種新的研究典範：一方面是為了區別於傳統思想史研究，主張把研究重點放在心態、預設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觀念或者思想體系上。而新文化史不同於傳統的思想史在於：第一，它強調集體的態度而非

1. 〈傳播研究的文化取徑〉(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一文中，Carey (1989/1992) 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主流傳播研究僅僅將傳播視為資訊傳遞，而忽略傳播所應具有之儀式共享的文化意涵。因此將主流傳播研究對傳播的界定名之為「傳播的傳送觀」(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Carey 則在 John Dewey 的思想上尋找源頭，另提倡「傳播的儀式觀」。

個人的態度；第二，它強調未言明的預設而非明晰的理論，即強調常識或在某一特定文化裡看起來像常識的事物；第三，它強調信仰體系的結構，包括關切用以解釋經驗的範疇以及證明和勸服的方法。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還用來區別於戰後影響廣泛，以年鑑學派為標舉的社會史研究。Chartier (1988: 6) 強調心態史研究是源自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對集體表徵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的探索，以及受人類學家毛斯 (Marcel Mauss) 所開啟原始分類、認知圖示等研究的影響。涂爾幹與毛斯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分類，但分類並非心理世界對外在世界的反映，而是社會文化的產物。社會分類的意義在於行動者都以相同的方式構成辨認世界的認知圖示 (scheme)，經由分類而賦予事物意義與秩序的時，也創造出接受與排除、正統與異端的社會區分。從社會史轉變到文化史，意味著研究焦點從社會結構轉移到文化實踐，從客觀的社會實在轉向建構社會實在的各種文化象徵與分類範疇。換言之，傳統上認為例如檔案、文獻與統計數據等文化客體是事實的證明；但新文化史卻認為這些文化客體是由研究者所製造、建構的，文獻資料本身就充滿意義，需要研究者深入解讀。

Carey 認為文化史的任務是恢復過往的想像與歷史意識，這目的不只是重新建構態度與理念，而是去掌握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亦即應該以行動者角度，說明這些行動的意義。感覺結構由 Williams 所提出，在《文化與社會》 (Williams, 1960 / 彭淮棟譯, 1985) 這本書裡 Williams 認為，透過分析文化這字彙出現的脈絡與字義的演變，可以掌握影響現代社會形成的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意義。而且從文化這個概念的形成可以觀察到，經歷工業與民主革命衝擊的個人，是如何透過適當的言語表述而傳遞獨特的個人經驗。這種經驗、感受最容易在例如劇作、小說等文藝創作中發現，也是透過這些文藝創作，整體的生活經驗得到最完整的呈現。這個想法到了《漫長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 一書裡，Williams (1961/2001) 明確地以感覺結構這概念來描述上述想法：

(分析文化時) 我們發現到生活的特殊意義，這是一種難以表達的經驗共同體，但藉此得以透過一種外在分析的方式，描繪出生活方式的特徵，並且賦予其所獨具的特殊性與色彩……。我建議以感覺結構這術語來稱呼。如同結構這字眼具有穩定與明確的意義，但感覺結構卻是人類活動中最微妙、難以掌握的部分。在這意義上，感覺結構就是某一時期的文化，是所有普遍組織化要素的特殊產物 (同上引：64)。

正如 Williams (1977: 132) 所說的，他所要界定與分析的是一個關於社會經驗與社會關係的特殊性質，正是這種特殊性質讓我們得以感受並區分出特定的世代或文化時期。但這種特殊性質傳統上不是被視為社會形構或社會建制的附帶現象，就是當做在階級關係與經濟結構互動間的次要說明。選擇感覺一詞為的就是要區別於這種形式化的世界觀或決定論的說明，突出意義與價值是被經驗到並且是活躍的，感覺不是與思想相對，而是被人們所感覺到或正感覺到的思想，是屬於當下狀態的實踐意識。而結構則是一組有著內在關連但又彼此緊張的設置，社會經驗的定義則是過程性的也就是一種動態的形成過程，但卻又往往採取了私人的、個別的形式呈現出來，因此在分析時必須將這些孤立的特質關連起來。後續 Williams 將感覺結構與霸權的概念結合起來，試圖以感覺結構作為一種替代性霸權的地位，成為文化分析的核心：

感覺結構可以被定義為溶解中的社會經驗，是一種明顯有異於其它已經沈澱且明顯與直接有用性的社會語意型態。不是所有的藝術都和當代的感覺結構有關，實際上多數的藝術都與主導的、殘餘的形構相關，只有新興的形構與這種處在溶解狀態中的感覺結構相關……。感覺結構有著許多前形構的特徵，直到特殊的接合亦即一種新的語意型態出現後，才在物質實踐中被挖掘出來（同上引：133-134）。

這也是 Williams 在《文化與社會》（1960／彭淮棟譯，1985）及《漫長革命》（1961/2001）兩本著作中，所意圖重構的文化與社會傳統。正是在面對工業革命的糾結情緒中所產生的複雜思想，以及多樣的文化定義，構成我們現在所能明確辨識、具有獨特性的感覺結構。而且作為一個文化物質主義者，Williams 無法相信文化有著絕對的自主性，但在行動者身上呈現的能動性卻又不可忽略，感覺結構就是為了反映這種結構與行動二元性所提出的概念²。因此 Williams 將文化實踐予以範疇化為主導、殘餘及新興（dominant, residual, emergent）三種不同的感覺結構，並強調主導文化從未全面掌控，必須持續性地與殘餘及新興的文化形式鬥爭。當中特別關切於新興的感覺結構，因為在這當中存在著新的也是先前所無法想像的社會秩序。

2. Filmer (2003) 認為 Williams 的感覺結構，與 Foucault 的「認識型」（episteme）、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都具有著類似的問題意識。

Carey 顯然受到 Williams 的啟發³，強調傳播與共同性（commonness）、共享交融（communion）、共同體（community）間的關聯，傳播不只是訊息在空間上的傳遞，也是社會在時間向度上的維繫；傳播不只是傳遞訊息，更是共享信念的再現。一旦掌握新聞史，同時也就掌握了人類想像的特殊形式。更具體地說，就是不只將新聞當作史料來源，新聞、報紙本身就是豐富的研究對象，從中可以觀察到人是如何經歷現代性的衝擊。但這一切要如何與新聞史畫上關連？其中一個可能是「報導的歷史」。因為早在新聞作為一種社會建制、事業或者某種權利前，新聞就是一種文化行動、一種文學行動：

新聞是創造性與想像性的作品，一種象徵策略，它權衡局勢、識別要素、營造出我們看待事務的方式。新聞提供讀者行動與感覺的模型，也就是對情勢的判斷，它與文學行動一樣都分享著這樣的特質 (Carey, 1974/1997: 91)。

某種新聞報導與寫作形式所以出現，乃是源自特定人對某些事務的分類與認知圖示，但這一切都不斷地在時間中轉變、定義與再定義，最終可歸結為人類意識。

當記者從事新聞報導時，記者動用起所有可用的文化資源，處理掌握複雜混亂的事件。記者與編輯處理新聞時，正是挪用那些先前存在的經驗而組織與編排新聞。文化提供新聞敘述的形式，這種形式讓新聞得以被組織、敘述與理解。無論是報紙或電視新聞，新聞報導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關係不是內容而是形式，是形式決定讀者如何接受與認識世界 (Ettema, 2010)。這樣的研究取徑，與成露茜（2006）對民初新聞史研究的文章裡所提過的觀點相仿。成露茜認為在形式上，報紙這一新時代的產物無疑是典型外來西化的產物，但：

對什麼屬性的讀者而言，報刊可以被視之為是「現代性」的創造者？報刊是以何種文本形式來傳遞『現代性』？報刊傾向於強調何種政治、社會、文化的共同習俗？透過廣告、影像以及圖表形式的知識與資訊，報刊散播了何種現代性的想像（同上引）？

3. Carey 與英國文化研究的關聯與互動，參考 Hay (2006) 與 Carey (2006)。

在講述文化現代性時，論者特別著重諸如 Baudelaire、Simmel、Benjamin 等人在描述現代大都會生活時，那種目眩神迷，稍縱即逝的經驗感受。個人在傳統共同體中是無法感受到這種經驗，而且在 Benjamin（1968／張旭東譯，1998）看來這個轉變特別容易在新聞報導上呈現出來：

（報紙）的意圖是把發生的事情從能夠影響讀者經驗的範圍裏分離並孤立起來。新聞報導的原則對實現這個意圖做出的貢獻絕不亞於編排版面所做的貢獻……。老式的敘事藝術由新聞報導代替，由訴諸感官的報導代替，這反映了經驗的日益萎縮（同上引：153）。

具體地說，倘若現代性被人經驗為破碎與不連續，則現代報紙的版面編排最能呈現出這種破碎化的現代性經驗。報紙的版面是由眾多孤立的事件所構成，每則新聞是獨立存在而無需依賴另一則新聞，新聞彼此之間也沒有必然的聯繫。瀏覽報紙不但無法得到完整、單一的意義整體，更因為現代新聞寫作強調以事實為核心、眼見為憑的正序寫作法，讀者所體驗到的是不斷往後消逝的時間與記憶，敘事傳統中所具有的神祕性在新聞寫作中不復存在。

正如 Carey 所言，新聞不止是文學藝術，它還是工業技藝。處理新聞的技術、程序、規範，不只源自於新聞專業的要求，還與新聞作為大眾消費的產品以及文化工業的需求相關。這些規範如同小說家的寫作方法般，決定什麼可以寫，以什麼方式寫，新聞技術還定義什麼能被思考為真實。而從讀者的角度來看這問題，新聞技術也決定讀者的思考，研究新聞史也就是掌握過去特定時段中閱聽人所掌握的實體。換言之，報紙能夠表現特定的時代氛圍、情緒與想像，新聞史則具體地呈現過往時代的感覺結構。Schudson（1978／何穎怡譯，1993）的《探索新聞》，正是在與主流新聞史相同的編年史結構下，追溯不同年代裡新聞報導的類型與追問客觀新聞如何成為專業意識型態。而且客觀新聞報導的崛起與「社會客觀化」：從傳統共同體進入現代社會、個體逐漸分化的自我認同過程密不可分。這些轉變都促使個人開始採用一種客觀化、外在化的方式看待世界所致，新聞由故事取向轉變到訊息取向，反應的正是這個過程。

但 Nord（1988）指出一個 Carey 未處理但卻重要的問題：如果文化史的任務是恢復過往的想像與歷史意識，那麼是誰的意識？研究主體為何？這些問題 Carey 並未回答，而即便新聞的文化史能夠反應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並呈現行動者的日常實踐，那麼更該繼續追問與探究的是那些生產新聞史分析素材的無名

新聞工作者究竟如何產製這些文本。無論是傳統的新聞史或者新聞的文化史，皆甚少關切新聞工作者與新聞技術變遷間的關係。現代新聞的特徵之一是客觀新聞，客觀新聞興起的外在結構是市場利益，內在結構則是新聞室、編輯台成為新聞產製的核心。那麼新聞室與現代新聞採集技術的出現，是如何改變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對新聞專業產生哪些影響、又如何促使新聞工作者將這些技術予以內化，並創造現代新聞記者的角色與專業認同。新聞室如同廠房的生產線一般，在過去百年來一直是創新技術的實驗室；但同時也是經濟與社會利益爭鬥的戰場，新聞文化既非等待被人描述的靜態客體，也不是可以被固定框限的意義與象徵，而總是在爭鬥、浮現與消失中的事物 (Hardt, 1990: 355)。但無論如何，Carey 主張以文化史途徑書寫新聞史，與傳統新聞史研究形成斷裂。使後繼的新聞史研究者不只以研究權貴人士為足，得以另闢蹊徑視新聞為文本，分析不同報導類型的生成流變及其意義，或者回歸日常生活的個體實作，研究每個獨特的新聞工作者是如何在工作中實現新聞專業。

參、臺灣新聞史研究的回顧

回頭檢視臺灣新聞史研究的現況，陳世敏（2001）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成立為觀察指標，認為在 1950 年代成立初期，早期的碩士論文大部分屬於歷史研究；但到 1960 年代末期由於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臺灣後，臺灣傳播學的歷史研究開始沒落。在須文蔚、陳世敏（1996）整理 1961-1995 年間臺灣傳播學的專題研究中發現，傳播史研究僅佔傳播學門研究成果的 12%。陳百齡（2001）整理 1996-2000 年間國科會針對傳播學門的補助研究案中，傳播史的比例更只有 0.8%。邱家宜（2006）針對 1996-2005 年間傳播學門研究成果的分類研究中，傳播史研究僅佔傳播學門研究產出的 2.6%，在所有十七個研究領域中僅領先「分眾、社區傳播」與「媒體新科技」。翁秀琪（付梓中）近期針對 1996-2009 年國科會研究案的整理中，以「傳播史」為研究概念的提案有 37 件，佔所有傳播學門提案的 4.2%。

儘管上述統計與分類的標的是「傳播史」而非「新聞史」，在具體的研究對象、範圍與問題兩者顯有不同；但無論就研究數量或就新聞史被整併為傳播史的結果而言，新聞史研究在臺灣逐漸沒落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除了行為科學成為社會學門的主導研究典範而導致傳播學門中歷史研究的衰退，林麗雲（2000）還認為戒嚴時期歷史研究的敏感性也是讓研究者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究竟是何種

原因導致臺灣學術界的反歷史性格並非本文探究的重點，本文只從既存的研究成果中去釐清與描繪當下臺灣新聞史研究的面貌為何。

首先就史觀而言，基本上現存研究都將臺灣新聞事業的發展與民主政治的進程劃上等號，認定民主政治與新聞事業的發展間存在著正相關。例如在分析「自由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榮景時，曾虛白（1989）這樣主張：

自由中國傳播事業能有這樣斐然的成績，社會環境的繁榮，教育成效的普及，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應推各種傳播事業都能在民主自由的政治氣氛中，循企業發展的正常途徑、做公平合理的競爭，因相互刺激而互相激勵，遂形成這樣同時起飛的進步趨勢（同上引：27-28）。

報禁時期的新聞傳播環境是否真如曾虛白所言，是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成長茁壯，在此並非重點。所要強調的是在這樣的論述脈絡下，其背後的理論預設無疑是承襲前述 Carey 所言「輝格式解釋」的詮釋傳統，對新聞體制的理解必須依賴於政治環境的背景脈絡，只不過在「自由中國」的新聞史中，正義的一方是三民主義、國民黨；亟欲打倒的惡魔是共產主義、朱毛匪幫。

這樣的歷史論述到 1988 年解嚴前後開始轉變，一方面湧現許多以臺灣為論述主體的本土化新聞史研究，特別是重建 1911-1949 年間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報刊經驗與實踐。另一方面，則是對戒嚴時期與國民黨當局持反對意見，而遭迫害的新聞工作者與機構的歷史再發現，例如二二八事件中媒體角色的探討、白色恐怖時期中消失的報業菁英等，這當中又以對《自由中國》與黨外雜誌之類的異議媒體，以及《自立晚報》等本土報業的研究最為蓬勃。這當中可以陳國祥、祝葦（1987）所寫的《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一書為代表，該書以曾虛白的《中國新聞史》中關於早期臺灣報業發展的資料為基礎，增補前述著作中所缺乏的臺灣報業發展近況。在敘事主軸上不再想當然地視臺灣報業為「自由報業」，而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為參照，批判戒嚴體制的不當，將政治力視為影響臺灣報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予以探討。

及至戒嚴體制終止，臺灣媒體市場徹底開放，不只印刷媒體急遽成長，電子媒體與新媒體皆大量湧入並分食媒體市場。2003 年由王天濱書寫的《臺灣報業史》，是解嚴與媒體開放後最具企圖心的新聞史著作。這本著作在史料上持續更新並延伸到 2003 年《蘋果日報》創刊前夕，在敘事結構上仍依照編年史並輔之

以重大媒體政策而予以分期，敘事主軸則以傳統的報業機構為主，而後分述各報之起落。這些研究與著作在史料的累積，以及重現過往被壓抑的記憶有顯著的貢獻；但在臺灣版本的輝格式史觀的主導下，新聞事業的發展顯然是政治發展的應變項。而儘管敘事主體從中國替換為臺灣，善惡異位，新聞事業的內部邏輯與自主性在這些歷史論述中付諸闕如。

相對於上述依循編年史方式逐步累積史料，臺灣新聞傳播學界也反省這種編年史敘事的局限性。具體檢視臺灣新聞史的研究，以林麗雲（2000）的〈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翠危：臺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為代表。林麗雲以政治變遷做為新聞史研究的分期，而將臺灣的新聞史研究區分為：「威權政體下建構的新聞史（1949-1976）」、「威權政體下鬆動的新聞史（1979-1986）」、「政治自由化下重構的新聞史（1987-）」。

影響臺灣新聞史的書寫最重要的因素，無疑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有密切關連，在臺灣新聞史論述中著重的是以國民黨為主的媒體事業發展，「強調這些報刊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如宣揚革命理念、鞏固領導中心、對日抗戰、不屈不撓。」（林麗雲，2004：106）也讚揚多位報人為典範與英雄，例如章炳麟、戴傳賢、張季鸞等人。

歷史書寫固然離不開刻意的記憶與遺忘，但相對於主流的官方記憶，民間與學界開始利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霸權等概念，分析國民黨統治的社會基礎，強調威權統治在常識基礎上的灌輸與召喚，當中特別關注新聞媒體在市民社會中的角色。李金銓在 1993 年以英語發表，後收於 2004 年《超越西方霸權》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臺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開宗明義地強調該研究：「分析的取徑是從臺灣政治經濟的文化矛盾來看媒介。」（李金銓，2004：135）論文的問題意識固然不在歷史，而是政經結構與媒介文化的互動，但由於批判政治經濟學在認識論上強調社會總體性，使得批判政治經濟學對傳媒結構與產出的研究成為當今臺灣少數尚且涉及傳媒歷史的研究成果。例如馮建三（1995）以全球資本流動與閱聽人商品化等概念，析理臺灣 1990 年代的媒體開放工程，如何造成階級間在資訊接收上的不平等，以及去管制的市場化媒體政策又如何地削弱臺灣原本就已欠缺且薄弱的公共服務理念。

史觀上，臺灣的新聞史研究重蹈西方新聞史研究的覆轍，以政治發展定位新聞事業，而未能展現臺灣與中國新聞事業可能存在不同於西方新聞事業發展的文化特性。方法上，因循陳舊的編年史寫作方式，缺少新聞事業與社會變遷間如何相互滲透的洞察。在分析對象上也未能超越被過度浪漫化的新聞工作者形象，而淪為 Hardt 所言的權力傳記。無論是傳統以中國為敘事主體或本土化的新聞史研

究，都是經由偉大報人的行跡事宜而鋪陳。更甚者，由於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臺灣的新聞史寫作更強化新聞工作者的英雄形象⁴。這當中尤以「文人論政」、「文人辦報」所構築的新聞工作者形象最為矛盾弔詭：新聞工作究竟是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的勞心職志，還是新聞採集的耗神勞力工作？

通常認為中國新聞事業裡文人論政的傳統，起自 1873 年王韜於《循環日報》上，每日刊登一篇論說評論時政為始。何謂「文人論政」？王洪鈞（1998：48）認為：「大體是指著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在國家戰亂頻仍，憂患迭生之際，以獨立之思考，超然的地位，大公的精神，創辦報刊，造成輿論，以匡政治，而濟民窮之謂。」，賴光臨（1998：234）也持類似的定義：「所謂士人，是指具博學宏識的造詣，抱匡時濟世的襟懷的知識份子。由這批士人所辦之報，是為士人報業。」這個傳統歷經維新黨人康有為與梁啟超的發展，至民國後邵飄萍、林白水與成舍我等人不畏權勢的表現，最終在張季鸞與胡政之共同主持的《大公報》到達頂峰。在獲頒密蘇里大學「最佳外國報紙」時，張季鸞（1979）在〈本報同仁的聲明〉一文中明確地點出中國報業的特色正在文人論政：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而我們同仁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並且不求名。我們以為不求權、不求財，是士人常行，容易辦，不求名卻不甚容易。因為辦報都希望人愛讀，讀者越多越喜歡，名聲越大越高興，而危機也就在這裡。因為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采，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禍國家（同上引：582-583）。

張季鸞的談話反映出新聞工作者身分處境上的曖昧：一方面視報紙為知識分子論說評政的機構，另一方面也體認到自身所從事的新聞工作乃是一項現代化的職業。就前者而言，文人論政的主體：文人，從來就只是少數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可縮小為「報人」——報紙所有人，而非新聞現場的記者與編輯。而且能夠

4. 近期的代表著作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台大新聞研究所，2008），儘管書中多數受訪者謙稱自己並非刻意對抗戒嚴體制、爭取言論自由，僅是從新聞專業意理的基本理解，在新聞管制的年代中從事新聞工作。但從每一篇訪談的編者前言、訪談對象的選擇，所呈現的無疑仍是大衛對抗巨人的英雄史詩。

肆無忌憚暢所欲言的始終就只是這些少數精英，這種言論自由很少會及於這群新聞工作者。而就後者來說，張季鸞已經認識到新聞事業得面對名利，也就是市場競爭的誘惑，新聞工作終究還是有償勞動，這點在張季鸞的論說中以超脫於世的「士人」精神特質給美化忽略。

實際上，中國報業從誕生起就充斥著濃厚的商業氣息。例如《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 1875）在題為〈本報作報意〉的文章中這麼寫著：

夫新報之開館賣報也，大抵以營業為生計。故其疏義以僅謀利者有之，其謀利而兼仗義者亦有之……。若本館之開館，余願直言不諱焉，原因謀利所開者耳（同上引：2）。

美查這種赤裸裸地在商言商的現實態度，卻少見於兩岸的新聞史書寫中。所能看到的僅是少數幾位秉持知識分子良知的偉大報人，以言論報國的積極入世精神，創辦報刊教化民眾。但報人同時也是資本家，新聞事業終歸得在市場壓力中謀求生存之道，這些報人是如何想像所面對的市場與讀者？為了服膺市場需求，新聞產製又如何應對？新聞工作者又如何將這些市場與讀者需求規範化為例行性的新聞產製慣例？這些更細緻深刻的問題都被文人論政的面紗予以掩蓋。

儘管李金銓（2008：18）已經看到民國時期主流報業存在三種典範：「民營商業報紙」、「專業報紙」、「黨報系統」，除了專業／文人辦報這個高度政治化的主旋律外，前述新聞史研究者卻鮮少將眼光投注在民營商業報紙身上。而李金銓僅粗略地將這三種典範概括為：「商人辦報（最賺錢）、文人辦報（最受尊敬）和政黨辦報（最有權勢）」，除此之外便無其他更明確的分類說明。因此令人困惑的是在商人辦報與文人辦報（專業報紙）間該如何界定區分？

仍舊以上海《申報》為例，在中國新聞史研究裡無疑地將這份報紙列為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報紙，特別是前引美查本人那段直言不諱的陳述更可以證明《申報》的商業本質。但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中不可忽略的事件是 1883 年爆發的中法戰爭，正是由《申報》最早派遣記者採訪戰爭實錄、發出戰地通訊。《申報》此舉當然是著眼於戰爭新聞能夠吸引讀者目光、有助報紙銷量所致，但著重新聞事件的實地採訪也是現代新聞專業的表徵。以事實為核心的客觀報導是西方新聞專業的特質，但這顯然並非突出文人論政典範者所在意的，那麼文人論政的專業性何在？很明顯地，由文人論政串連起新聞事業起落的歷史論述，依舊是依附於政治演進的歷史解釋；不但在史觀上無能超越輝格式解釋，在分析對象上更自我

侷限在少數菁英記者身上；不但疏於探討作為產業的新聞事業的勞動過程，也無法從勞動過程中的特殊技能與新聞專業間的深入分析，更遑論進而分析基於新聞專業意理的新聞產製是如何反應與形塑現代文化樣貌。

肆、典範的歷史

如果新聞能夠反應不同世代間相異的感覺結構，顯然新聞就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概念與實體，不同時代的人對新聞有著不同的想像。特別是一旦我們接受文化史的基本預設：社會是透過文化實踐才得以發揮效用，是行動者以符號為中介而產生的實體，那麼更不可能將社會看成是外在於行動者的產物，因為任何社會實體都是經由行動者的實踐而存在。就如 Chalaby (1998) 觀察到的，當下的主流新聞概念是 19 世紀英美世界的發明；在這年代裡逐漸產生關於新聞為何與何謂新聞專業的論述，新聞成為一個顯著不同的文本，新聞場域裡的行動者發展出獨有的新聞論述、規範與價值，新聞的寫作方式藉由論述策略與論述實踐而獲得其特徵，發展成為既非文學、亦非政治的文本特徵。

但這樣的發展也不是舉世皆然的普遍真理。Schudson (2003: 85) 指出儘管現代新聞在 19 世紀獲得空前的發展，但此時英美兩地與歐陸的新聞工作者在身分認同上有著顯著的差異。對歐陸的新聞工作者來說，他們傾向在寫作上力求突破以仿效文學前輩；而在英美兩地的「同業」，則力圖掙脫文學枷鎖，致力於新聞專業的社會認可。於是在 19 世紀中後期於英美兩地的新聞報業發展過程中，誕生出以事實為導向的現代新聞；但同一時間的歐陸報業仍舊保留強烈的黨派色彩。必須要到一次大戰前後，由於英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倫敦成為越洋電報的主要發散地後，以事實為核心的現代新聞模式才同時伴隨英美帝國主義而擴散至全球。

北歐傳播學者 Høyer & Pöttker (2005) 在《新聞典範的擴散 1850-2000》這本論文集中，便將此一發軔於英美的新聞論述，界定為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寫作典範 (news paradigm)⁵，並視為歐陸各國新聞事業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參考模式。在他們的定義中，新聞寫作典範包含五個要項：事件、新聞價值、新聞採訪、新聞客觀性，以及倒金字塔寫作。今日看來這些技術雖屬枝微末節，卻也使得新聞成為眾所知悉的文化類型，並形成世人對新聞事業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理解方式。中港臺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但所指涉的對象則更為廣泛；根據羅文輝、陳

5. 無論是 news 或者 journalism，在中文都以「新聞」一詞翻譯。為求區別起見，根據 Høyer & Pöttker (2005) 對「News Paradigm」所界定的內涵，在本文中以「新聞寫作典範」表示。

韜文（2004：271）等人的界定，所謂新聞典範（journalistic paradigm）是指新聞社群對「什麼是新聞」以及對既有社會秩序所建立的共同假設，一方面涵蓋抽象的世界觀以指引媒介組織的常規，另方面也蘊藏於新聞人員的專業操守和工作慣例中。但除了這兩個不同的分析層次外，新聞典範也指新聞人員心中理想的媒介範例（exemplar）或專業模範，新聞典範的轉移也意味著媒介範例的轉移，而影響新聞典範的重要因素就是社會中的權力結構⁶。

前者強調的是新聞文本在形式上的獨特性，後者著重對新聞的特定認識途徑及生產過程，而使新聞得以區別於不同的文化產物或資訊商品，而且不同論者都注意到典範意涵的社會建構特徵。根據定義，典範是一組為科學共同體成員間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要素所構成的整體。這套由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慣例原則，支持著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從事日復一日的解謎工作，以實際的範例構成知識複製的教材（Kuhn, 1970／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1989：234-235）。典範固然決定行動者看到什麼，構成行動者認識世界的認知圖示與分類架構，但這些被觀察研究的客體、分析拆解的範疇又從何而來？

Foucault (1970) 在《詞與物》的開頭藉波赫士的小說，說明不同時代、地點的人，可能以一種絕然不同於西方人的方式理解世界。在這虛構的故事中，Foucault 發現到存在一種事物的秩序而將事物給組織起來，使某些事物出現、讓某些事物成為不可能。透過將事物予以分類並且賦予意義及價值，而將事物彼此相聯繫，如此一來也決定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事物，不同的理解與分類意味著不同的知識型（episteme）：

知識型不是一種知識形式，或一種合理性，知識型不可以像這兩者那樣跨越迥異的科學的界限，聲稱一種完全統一的主題、精神或階段；它是在一給定期限內，在論述規則的水準上得到分析的科學間所能發現的關係總和（Foucault, 1972: 191）。

無論是 Foucault 或 Kuhn，都注意到無論知識型或典範與約定俗成慣例的相關性，並以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主宰認識世界的觀點；但 Foucault 更強調論述

6. 不同於新聞典範，Berkowitz (2011: 179) 認為當代新聞文化的核心為鑲嵌於其中的「專業典範」（professional paradigm），這套專業典範包含被認可與接受的新聞生產方式及程序，並且經由新聞室、教學與受眾對新聞媒體的期待而被新聞工作者所經驗與學習。儘管兩者用語不同，但概念所指涉的定義：世界觀、常規慣例；具體內涵：中立客觀、寫作方式，雙方所欲說明的現象歸屬相同。

(discourse) 在構成知識型上所發揮的效用。所謂論述就是由不同的陳述、範疇所構成的結構，任何一種社會建制都會發展出自身專有的實踐與論述，置身其中的個體必須學習採納這些論述與實踐以適應其中。於是論述成為一種真實的意義體系而運作，意義由此建構，文化實踐由此組織。而不同時期的知識型或檔案就是由不同的論述所組成，藉此形成既定領域的知識，而且每一種論述都包含一套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y)⁷，正是這些不同的社會想像成為不同知識型間的斷裂與不連續性。以 E. P. Thompson (1966) 的工人階級分析為例，並不只是工人將工作狀況體驗為勞動剝削，還必須從自身的道德價值出發，開始覺得自己遭受剝削。

Thompson 不斷強調階級是種關係而非事物，既表現在物質層面上，也表現在意識層次上，階級是人們走過其自身的歷史時定義出來的。但在工人能夠以階級的集體身分行動前，更必須先存在階級的概念。工人是因為先沉浸在一個特定的論述世界中，並能夠賦予階級這種身分歸屬某種意義，工人階級才得以存在。換言之，工人階級並不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是由論述所建構的 (Miguel, 2004 / 李康譯, 2008: 31)。而 Thompson 所強調的階級經驗，無非是以論述的方式所理解社會實體的結果，要產生這種效果只有透過既定的意義模式或者社會想像才有可能。正因為存在特定的社會想像並結合上論述，才產生出特定的社會實踐。

實際上自新聞被發明以來，就存在不同的社會意義與功能，例如：提供資訊給個人或群體以監測環境；作為公共資源而促使個人參與公共討論；同時還是一種教育、啟蒙與娛樂的媒介，透過新聞讓個體群聚的文化功能 (McNair, 2005)。Schudson (1999) 則根據美國新聞史的發展脈絡，認為曾經存在過三種不同的新聞模式：市場 (market model)、籲請 (advocacy model) 及信託 (trustee model)，在不同模式中所設想的閱聽人角色也不盡相同：消費者、黨派支持者與公民。但無論是不同的新聞事業模式或新聞典範，都是基於特定社會想像而來的現代新聞論述。簡言之，這些表面相異的新聞論述，卻共同指涉具有不可轉移的現代權利主體，無論是公民或消費者。故而現代新聞典範之所以要滿足於人民知的權利、擔負第四階級的角色，都源出於此一現代社會想像。

對堅信市場模式的人士而言，新聞資訊的流通乃是以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予以設想，言論自由成為保障不同言論流通，進而得以彼此競爭的資訊商品市場，

7. 所謂社會想像乃是先於社會實體而存在的，是一套關於人類社會之運轉與變遷的假定或原則，人們由此理解社會事件，將自身體會為主體，並規劃自身的實踐，為其提供正當性。對社會想像的討論可參考 Castoriadis (1975/1987)、Taylor (2004)。

透過此一競爭機制社會得以獲致最大的公共利益。但對批判政治經濟學與信守新聞專業意識型態的學者們來說，新聞事業的社會意義遠不止於資訊流通，新聞事業還具有教育啟蒙的意義，更是新聞事業立足之所在。無論是二戰後的「社會責任論」，或者近年的「公共新聞學」，無非是向世人與新聞從業者述說新聞可以、也應當有另一種面貌。反對市場模式或主流新聞典範的主張者立論殊異，但基本的問題意識卻是一致的：亦即經由論證現代新聞體制的建構特質，說明新聞事業不必然只能依賴市場經濟而得到發展。而且由於新聞事業在公眾資訊流過程中佔據顯著位置，而必須擔負起更多的公共期待。

特別是由新聞典範所規範的編輯程序、採訪規範，與新聞事業的商業本質脫離不了關係。於是問題是如何在積累資本的必然邏輯上，與公眾對資訊的渴求間取得平衡。回顧歷史如今被認為落後的政黨、基進報刊，儘管充滿政治偏見與意識型態，但從創辦人的背景與動機來看，無疑是以公共服務的理念為出發點，以發聲為首要的目的，營利與否乃是次要考慮。一旦新聞商品化成為趨勢，新聞事業不免成為資本密集的現代企業，少數弱勢、前衛進步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聲音既然無利支撐報刊，也就無法登上主流報刊版面。在這些學者看來必須在主流商業典範外，另行倡導以公共服務為主導的新聞典範，不只報紙存在目的應該有所區隔，新聞報導所想像的讀者也得改變，必須視讀者為公民而非消費者。

這樣的討論固然有著倫理規範上的迫切性，但很顯然是無效的。所以無效，是因為這些討論忽視新聞事業作為營利企業的實然，而期待新聞工作者具備反市場、不獲利的新聞專業倫理。學界抨擊新聞的弱智化，業界則以必要之惡作為回應，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間無法緩和的衝突，反應的正是典範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因為不同的典範意味著不同的世界觀：業界看到的新聞事業是有利可圖的企業，學界看到的新聞事業是公共空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設置。Kuhn 提到過，兩群持有不同典範的科學家，即使從同一個方向從事相同的觀察工作，他們看到的會是不一樣的東西。Kuhn 強調這不是科學家刻意的挑選與排斥，而是典範主導了他們能看到什麼。要在兩個不同的典範間做價值判斷，不但不可能也無助於對現實的理解。

傳統新聞史研究的問題正在於假定新聞事業為固定不變的社會建制，並且以進步史觀評斷新聞事業的進展，不但藉此評價新聞實踐之良窳，並由此產生出規範性的專業倫理判準。但前述回顧中發現新聞事業，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設想與實踐，新聞顯然並非固定不變的實體。當下視為理所當然的新聞實踐，是在歷史進程中跟隨特定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所衍生而成的，並依據不同的歷史脈

絡演化出具體的新聞實踐規範，最終以特定的新聞形式為人所認識。以典範的概念從事新聞史研究，不只意味著對新聞事業採取建構主義的觀點，視新聞為特定歷史環境中人為建構的產物，並認為這樣的建構乃是基於特定社會想像的論述構成而來的，對新聞事業的特定想像既決定新聞為何，同時也設定研究者的研究範圍，因此從事研究之前必須拋棄對新聞的既定乃至特定的設想。

但無論是立基於市場概念的商業模式，或者倡議公共服務理念的信託模式，都僅從新聞的部分功能：新聞資訊的有用性、實效性著手立論，而忽略新聞具有的娛樂與想像性的創造功能。以 Carey 的分類來說，僅著重於新聞傳播在資訊傳遞上的功能，而忽略新聞傳播具有文化儀式的意義，亦即新聞傳播具有之意義共享與凝聚共同體的文化整合功能。近年來西方學界討論新聞史，免不了必須回應印刷資本主義與現代性是如何相互構成的議題，當中又特別以 Habermas 為代表的公共領域論述最具代表性。新聞報業肇因於印刷術的普及，以及在公共空間中扮演理性論說的批判功能，並體制化為中介於市民社會與國家間的溝通協商機制。

但在溝通理性的構思外，Anderson 更指出透過新聞報刊，共同體成員得以超越時空侷限而體驗無法直接觸及的事件，於是經驗得以共享、敵我得以區分、國族得以凝聚，現代報刊成為動員與形塑國族個體的主要動員機制。共同體所以能夠想像，正是藉著閱讀方言所書寫的報刊，民族的概念才得以具體化，共同體也在日復一日閱讀晨報的活動中成為我族同胞所共享的集體儀式。作為當代民主政治基石的新聞事業，當然必須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承上啟下的溝通功能，但在訊息溝通之外，新聞事業還存在其他可能與迥異的想像。例如生前致力於創辦另類媒體的成露茜（2004）所言：

另類媒體最基本的原則是它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而非自我保存，也就是說這個媒體是否能存活，對它並不是最重要的。另類媒體認為智慧財產是公共財，它反對私有化，它提倡 DIY，任何人都可以做媒體，說自己的話、唱自己的歌。它力主去制度化：讀者也是作者，意見同樣重要。它是多元的，它不需要反映社會上已經很大的聲音，而是讓許許多多還沒有發聲的人，用自己的形式發聲。如果我們認為另類媒體的發展是一個新的媒體典範，那麼它還需要所謂「新聞專業」嗎（同上引）？

從新聞媒體存在目的、經營生存、寫作方式乃至專業內涵，另類媒體主張的新聞實踐，不但是不同典範的差異，更是在對何謂新聞、何謂媒體在社會想像層次上的差別。這些對歷史過程的不同解釋不見得抵消解釋的效力，反而揭示新聞事業在發展過程中的複雜與多樣，擴展更多的詮釋可能與理解當下的機會，同時提醒研究者關切更多元的新聞傳播過程。例如對現今新聞媒介的八卦化趨勢，多從經濟結構層面分析與批判。經濟結構限制新聞生產的可能性自不容忽視，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何以被評斷為「低俗」品味的內容為閱聽人所接受？

新聞報刊作為大眾消費市場的產物，報導題材的選擇自不外於大眾的喜愛偏好，如果將讀者對消費偶像故事的青睞視為：「新興的、處於溶解狀態中的感覺結構」去設想，問題不見得必然是批判報紙與讀者的消費取向，而是如何將這些散佈但無以名之的個體化經驗，透過論述實踐的方式予以接合產生論述。在 Habermas 的版本中這個感覺結構反映的是資產階級成為歷史主體的過程，在 Anderson 的分析裡則是國族成為現代社會的行動主體。而 Williams 分析英國社會在 18 世紀因為閱讀公眾的成長，而帶來通俗報刊的普及，當時英國社會對通俗報刊的低俗品味也深感不安，但 Williams 卻指出批判的背後實際上是對前所未見的「群眾」（popular）、「大眾」（mass）現象的恐懼。八卦、消費新聞當道的現在，除了典型的文化工業分析以及批評消費的被動消極外，是否可以透過新聞報刊的呈現，去分析、掌握正逐漸湧現的感覺結構，並賦予更積極地論述以形成新的行動主體？

伍、以典範思考新聞史

史觀上，新的新聞史研究不該以單一的線性史觀為足，在分析層次上也必須擴及日常實作的層次。因為新聞不只被動地反應不同世代與人群的感覺結構，同樣也能主動地決定世人如何看待事物的文化機制。因此除了將報紙視為客體，理解所可能反應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外，更須注意到新聞更指涉一整套生產技術與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新聞不只是靜態分析的客體，新聞本身也具備形成分析對象的創造能力，落實到研究層次可以從五個分析要素著手，這些不同要素與新聞典範的關係則具體化為「新聞典範的分析架構」（參考圖 1）。

分析架構中上半部的三個要素，指的是新聞典範如何生產出為人所熟知的新聞，不同時期的新聞寫作體例、版面分類與新聞生產流程，乃是受特定時期的新聞典範所影響的產物，而決定新聞該當如何的核心。分析架構的下半部指的是新聞典範的再生產，試圖說明這套主宰特定時段的新聞典範，是如何透過新聞教育

的管道，或者是新聞室的社會化過程而繁衍傳遞，而新聞勞動者又是如何學習或內化這些新聞知識，乃至形成不同時期的專業角色認同。

首先就新聞體例而言就是為閱聽人所接觸到的新聞作品。Høyer & Pöttker (2005) 所界定新聞寫作典範的五個要素：事件、新聞價值、新聞採訪、新聞客觀性，以及倒金字塔寫作，正是當前為人所接受為正統的客觀新聞呈現方式。但西方新聞寫作在 19 世紀的寫作特徵，不只以事實為核心，更強調以第一人稱為起始的新聞報導模式。這種模式所以被新聞界採納並成為慣例，關鍵在於當時新聞事業與英美公共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新聞報導的重心是促使讀者行動而不只是中介傳遞訊息，報導形式作為新聞文化的慣例並為同業所接納，反應的是對公共生活的常識性理解 (Ryfe, 2006: 67)。但等到客觀新聞的興起後，這種看似主觀的第一人稱寫作方式，便被貌似客觀的第三人稱的寫作方式替代

新聞寫作方式的轉變，背後是 Schudson 所言「社會客觀化」的趨勢，反映個體化成為社會主導性原則的變化。因此促成記者以居高臨下、自外於局勢的中立觀察者自居。但相較於新聞體例的緩慢變化，版面分類更能凸顯或反映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在新聞實務中慣常將新聞的刊登與否，視為來自新聞價值的判斷，但是否刊登的取捨，亦或決定刊登後該放置在那個版面，這一連串的判断過程無疑正是社會分類的複製。就以臺灣的報紙為例，若依據議題則可以將報紙版面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休閒、消費等類型。但很明顯地，休閒與消費版的出現乃至成為主流，不過是近二十年的發展，這背後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遷軌跡？而若依據新聞發生的空間為區分，又可看到國內、國際、地方與大陸新聞的劃分，這種分類又說明怎樣的共同體意識或在地化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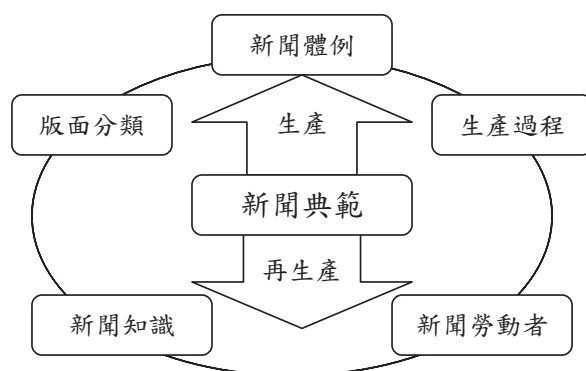


圖 1：新聞典範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且由於現代新聞事業以訊息為基礎，視新聞資訊為圖利販售的商品，才誕生出以資訊蒐集為核心概念的現代新聞專業，這些轉變與新聞事業作為產業的生產技術脫離不了關係。現代新聞的獨特寫作形式所以成形，固然是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時產生獨特感覺結構的結果，但純粹的意識狀態仍必須仰賴特定的物質形式方得以呈現，這也就涉及到分析的第三個面相：新聞的生產過程。由於現代報紙有每日出版的壓力，對內容的需求勝過一切，於是現代新聞事業必須廣設通訊員、在第一線派駐記者，添置有利於縮短時空差距的通訊設備，讓讀者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了解事態的發展。關鍵的轉變在報社大量運用電報傳輸新聞，但由於電報傳輸的成本昂貴，迫使記者必須壓縮字數以降低生產成本，於是新聞寫作不再著墨於事件的細節與背景脈絡的分析，轉而以陳述事實為新聞寫作的核心。

記者出身的海明威寫作特徵正是文筆簡潔、刪除不必要的虛矯修飾為特色的電報體（*cablese*），成為現代新聞寫作的經典範例。大量聘僱的新聞工作者、添購所費不貲的通訊設備，這些轉變都助長新聞事業朝向資本密集的企業形式發展。更促成新聞室這種新聞編輯組織型態，在 19 世紀後逐漸成為現代新聞事業的主要組織與生產型態。早先報紙與印刷廠的緊密關係乃至由印刷工所主導的場面逐漸退位，而模糊的新聞工作也在此時有更細緻的分工，誕生如今熟悉的編輯、評論員、校對與採訪員等不同專業分工（Høyer, 2003）。過往由少數人掌攬採訪、編輯乃至印刷事務，且充滿個人主觀意見的政黨、基進報刊被視為落後、非專業的報業模式，不但被視為充滿偏見、無助公共利益的落後新聞模式，更必須被客觀中立的專業新聞予以取代。

於是新聞從業者嘗試將這套新聞商品化的技能予以正典化為系統性知識，證明並遊說社會大眾承認新聞業的存在價值與特殊性。任何行業專業化的最後階段即為要求學院承認並接納，於是這就導向分析的第四個要素，新聞知識的分析。新聞技能和日常生活中無法明說的共識或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不同，除了可以在例行化的勞動過程中得到再生產（新聞室中的常規與慣例），成為特定時期可資辨識的新聞寫作與實踐類型外。新聞工作更試圖爭取教育機構的認可，透過系統化知識的建構與教學過程，不但完成特地時期新聞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同時也替自身爭取專業性的認可，以提升新聞業的社會地位。新聞教育與知識體系的建構所以重要在於，對新聞業本身乃至於社會，為學院所認可的制度化知識傳遞發揮著象徵資本的效用，提供新聞業立足社會的正當性基礎。但除此外，新聞知識與教育的意義還在於，這套知識技能既反映又建構不同時期的新聞實踐。

例如陳順孝（2003）透過臺灣新聞編輯實務的分析，指出早期臺灣報紙因為動輒得咎，只能在標題上作文章、展現編輯的才華，因而在 1960 年代的臺灣報紙經常出現對仗式的駢麗字句，成為當時評斷新聞編輯良窳的重要判準。徐昶（1989）也指出報禁時期的編輯，必須具備流利的文筆和良好的國學素養才能賴以為生。如此可以設想當年在編輯室或者新聞教學的課堂上，前輩教師所傳遞的內容傾向文學傳統的知識，因為這是往後學生在編輯台上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成為必備的新聞專業技能。但等到臺灣報禁解除乃至當下，大量地運用攝影作品與圖表，編輯的專業技能也就不再是文雅的修辭能力為主，可能是聳動下標或如何視覺化地處理素材，新聞教學與新聞專業的界定也隨之更動。

從新聞專業化的籲求到經由體制化學院傳遞新聞知識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新聞知識日益地系統化為新聞勞動者不可或缺的必要技能。這樣的視角顯現出傳統臺灣新聞史研究的盲點，也就是將新聞工作與記者身分過度地浪漫化。儘管批判政治經濟學已從勞動研究的角度切入分析新聞工作的勞動條件與職業認同，但除了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差異，在新聞事業的演進過程中乃至當下，實際上還存在著不同的身分認同與想像。無論在 1920 年代的中國，或 1970 年代的臺灣，由於報紙高度重視副刊，而促使大量的作家投入新聞工作。換言之，在歷史發展中新聞事業曾經是一種屬於高度個人化的創意工作，是這樣充滿創造性的文字工作吸引許多人投入新聞事業，這種複雜的身分、職業認同也因為缺乏其他的論述與史觀而被忽視。

因此，以典範的概念進行新聞史研究的最後一個要素，就是透過實際的田野資料與歷史文獻的回溯，重新建構多元的身分認同。這個歷史研究的缺陷，反映在臺灣的報業困境裡就是多數新聞工作者對自身工作滿意度的低落，以及社會對新聞事業的貶抑。對此，學界不是無能為力或者就是以無上律令的倫理法則，要求新聞從業者履行知識分子的公共職責。任何倫理要求必須基於現實條件，如果主流新聞典範的實踐是基於商業市場的想像，如何能夠要求新聞勞動者捨棄營利而實現公共利益？如果新聞是集體性的勞心工作，如何在集體協作與專業要求甚至個人創作能力的實現間取得平衡？這些現實的問題，或許可以藉由不同的視角審視歷史而獲得新的啟發。

以臺灣目前的研究為例，多數以 1988 年解除報禁為象徵，劃分出前後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前期受制於政治高壓，後期以迄當下則屈服於經濟獲利邏輯，對當前新聞實踐日益喪失公共性並充斥八卦低俗報導的歷史詮釋，便歸因於報禁解除之際，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的市場政策管理新聞媒體，而忽略大眾傳媒同時具

備公共服務的特性所致。作為眾多社會實踐的新聞報業，當然無法自外於結構環境的影響，但倘若僅將焦點擺放在政治與經濟場域如何塑造或扭曲新聞場域，而忽略作為次場域的內在邏輯與理路，顯然也失去探究新聞場域如何獲致自主性的可能。

例如《民生報》，這份以體育與娛樂新聞為訴求，並定位為家庭中第二份的報紙，早在 1978 年也就是報禁解除的十年之前就開始發行，到報禁解除後一度聲稱具有五十萬份的銷售量。從《民生報》的自我定位來看，明顯地在對何謂新聞的界定上，採取與當時主流報業的不同觀點。將《民生報》與其他同時期的報紙並列觀察，是否可以說在 1970 年代末期的臺灣即呈現某些消費社會的徵候？一份以休閒消費新聞為訴求的報紙，又對成形中的消費文化發揮那些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適當地呈現此類軟新聞，在新聞寫作、版面編輯與表現上又必須作那些更動？由於軟新聞成為報導重點，報社在徵選記者的專業要求上，又產生那些轉變與不同？對這些記者來說，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職業身分與認同？當 2006 年《民生報》在《蘋果日報》的強烈競爭下停刊，又意味著什麼？從新聞的選擇、寫作時的用字遣詞、乃至版面的視覺呈現與分類，藉由這些過往所忽略的細節，才能更充分地掌握報紙的文化意義，及其所承載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唯有透過歷史性的梳理，才能理解現狀的偶然，進而產生新的論述與新的實踐類型。

新的新聞史研究，必須關注新聞的文化意義以超越輝格式解釋過度偏重政治制度層次的解釋，不再理所當然地視新聞事業為公共領域的關鍵環節，而以文化行動面對新聞。新聞事業正是在日復一日的新聞生產過程中，經由如何處理新聞的爭論裡，在彼此相衝突的新聞事件裡產生何謂新聞倫理的實踐判斷，並且具體化為組織型態，而在新聞室、編輯台等工作場所中，傳遞新聞專業並馴化記者成為符合特定專業規範的勞動者，亦即是這些日常生活的新聞實作裡的默會知識構成歷史上不同的新聞典範。如 Chartier (2003 / 楊伊瑄譯, 2008: 200) 所言：「新文化史卻是要從那些不包含論述的實踐、再現形式的對抗，以及陳述的行動性表現成果出發，強調一種流動的、不穩定的、具衝突性的結構。」同樣地，新聞史也必須回眸觀望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忽略的差異或另類的新聞傳播實踐，以豐富新聞的想像。

陸、小結

在新理論出現前，必然有一段時期研究者是處於明顯的不安全感中。我們並不難了解，這種不安全感是因常態科學的解謎工作無法順利完成而引起的。既有規則無法解決疑難時，正是尋找新規則之契機（Kuhn, 1970／程樹德等譯，1989：119）。

在這篇嘗試性的論文裡，透過文獻整理與理論回顧，梳理過去新聞史研究的成果與侷限，說明新聞史研究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亦即以新聞典範的概念重新詮釋與理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Carey 主張新聞的文化史，是對傳統陳腐的新聞史研究的批判，試圖以跨學科的方法與洞見展示新聞史研究的潛力。無論東西方，傳統新聞史研究忽略新聞事業在發展過程中可能有的自主性，新聞事業的轉變被化約為市場利益下的經濟抉擇而忽略新聞專業可能的回應策略。同時，無視底層新聞工作者的實存勞動狀況，而甚少關注傳播技術如何改變工作環境，傳播技術又如何被新聞工作者內化為牢不可破的專業意識型態，成為從事新聞工作必須具備的專業技能，而主導日復一日例行化的新聞產出。

新聞史研究應當是包含讀者、記者與新聞機構的社會與文化過程，而不只是傳記研究。新聞的文化史的研究，必須被當做是一個集體的過程，這過程包含了許多在不同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下的利益爭鬥過程（Hardt, 1990: 360）。典範不只以科學革命與慣例常規形成的生活方式理解，更多是從 Foucault 對論述與知識型間的詮釋為切入。不同知識型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必然性，也不會有優勝劣敗的價值判斷，不同的知識型意味著不同的社會想像。換言之，新聞事業所應具有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也非一成不變，當中的差異正是源自對新聞事業不同的社會想像。這不只反應在新聞生產者身上對自身角色的認定，也在讀者對新聞產品的使用上，尤其是特定版面的出現與隕落，抑或從新聞分類的浮現與消沈追索這不同的感覺結構。

倘若新聞能夠反應不同時代的感覺結構與身分認同，這些迥異的呈現仍舊必須透過日常的新聞生產過程而得以凝固。誠如 Høyer & Pöttker (2005) 的主張，新聞典範是由事件、新聞價值、新聞採訪、新聞客觀性，以及倒金字塔寫作等要素所構成。但這些如今在新聞實作與新聞教育裡當做牢不可破的新聞典範，是從日常細微的新聞技能中逐步地明文常規化。因此以典範從事新聞史探索，就不只將

報紙當做分析客體，甚至是靜態的史料呈現，更應將視角投入形成後人分析對象的材料：報紙，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換言之，在新聞生產的過程中是如何採納、排斥並凝結起不同的技能成為組織常規，被奉為圭臬的諸多新聞專業意識型態正是在這過程中形成。

本文的嘗試既是建構的也解構的。建構的意義在於建議發展不同於當下主流的詮釋角度，重新挖掘不同歷史過程中新聞具有不同的文化與象徵意義。而所以是解構的，則是藉此破解現代新聞典範所信以為真的信念基礎，凸顯新聞典範社會建構的歷史事實，而另外主張新聞事業具有其他的社會與文化價值。所以要解構現代新聞典範，是出自對當下新聞困境的關切，也就是傳統學院中的論述不但已無能為力解決新聞生產的難題，同時也與實際的新聞生產存在嚴重的脫節。新聞事業的現狀是日益朝向娛樂性資訊（infotainment）的方向發展，並因這種混雜性的內容與形式讓現代新聞典範所設立的判準失效。

解決之道可以是重新修飾傳統新聞理論以因應新發展，但也可以是另起爐灶代之以新的理論詮釋。這裡的嘗試顯然是屬於後者，也就是試著剝離現代新聞事業所穿戴的公共性質：現代新聞體制創設以來就以資訊商品化為前提，除了販售訊息，新聞也還可以是文人發揮創意想像的空間，這些複雜的面貌不必然彼此衝突或抵消，但也絕非單一解釋典範所能充分掌握的。解構現代新聞典範的目的不只在於破，相反地，也是重新建構主流與另類的想像。假若新聞勢必需以其公共性而卓然於世，那麼當主流媒體只關注名流八卦，而另類媒體投注心力於公共事務的探討，誰是主流？誰才另類？誰才是典範？

參考書目

王天濱（2003）。《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

王洪鈞（1998）。《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臺北：遠流。

台大新聞研究所（2008）。《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臺北：時報出版。

成露茜（2006年10月）。〈文本與媒介：民初報刊的研究取徑，1911-1949〉，「文本與媒介：民初報刊的研究取徑，1911-1949 研討會」發言稿。臺灣，臺北。

上網日期：2006年11月1日，取自 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headline&id=56#m1

- (2004)。〈全球都在尋找新的新聞工作典範〉，「與大師對話：Dr. Lee Bollinger, President of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研討會」發言稿。臺灣，臺北。上網日期：2010 年 1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luciememory.org/49#more-49>
- 江政寬譯 (2002a)。《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原書 Hunt, L.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2b)。《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麥田。(原書 Burke, P. [1992].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何穎怡譯 (1993)。《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臺北：遠流。(原書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 呂健忠譯 (2005)。《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臺北：聯經。(原書 Darnton, R. [1985].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李金銓 (2008)。〈導論——近代中國的文人論政〉，李金銓 (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1-32。臺北：政大出版社。
-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康譯 (2008)。《後社會史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Miguel, A. C. [2004].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林麗雲 (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臺北：巨流。
- (2000)。〈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翠危：臺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傳播文化》，8：177-211。
- 邱家宜 (2006)。〈近十年來臺灣傳播學研究趨勢分析 1996-2005〉，「2006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臺灣，臺北。
- 美查 (1875 年 12 月 1 日)。〈本報作報意〉，《申報》，頁 2。
- 徐昶 (1989)。《新聞編輯學》。臺北：三民。
- 翁秀琪 (付梓中)。〈臺灣傳播領域學術研究素描：以 1984-2009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為例〉，《中華傳播學刊》。
- 張旭東譯 (1998)。《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原書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張季鸞 (1979)。《季鸞文存》。臺北：臺灣新生報社。
- 陳世敏 (2001)。〈臺灣傳播史的研究與書寫〉，《傳播研究簡訊》，26：1-3。

- 陳百齡（2001）。〈從國科會傳播專題計畫提案看傳播學門發展生態：1966-2000年〉，《新聞學研究》，67：25-49。
- 陳國祥、祝萍（1987）。《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
-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臺北：五南。
- 彭淮棟譯（1985）。《文化與社會：1780至1950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臺北：聯經。（原書 Williams, R. [1960].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曾虛白主編（1989）。《中國新聞史》。臺北：三民。
- 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1989）。《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原書 Kuhn, 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9-36。
- 馮建三（1995）。《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黃順星（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113-160。
- 楊伊瑄譯（2008）。〈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5（1）：199-214。（原書 Chartier, R. [2003]. *La nouvelle histoire culturelle existe-t-elle?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31, 13-24.）
- 賴光臨（1998）。〈中國士人報業的特質與精神〉，王洪鈞（編），《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頁233-272。臺北：遠流。
- 羅文輝、陳韜文（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
- Berkowitz, D. A. (2011). PART IV: Repairing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In D. A. Berkowitz (Ed.), *Cultur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pp. 179-18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rennen, B. (1995). Newswriters during the interwar era: A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media history.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3, 197-209.
- Carey, J. W. (2006). From New England to Illinois: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In J. Packer & C. Robertson (Eds.),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p. 11-28). New York: Peter Lang.
- (1997).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86-94).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4)

- (1992).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In author (Ed.),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pp. 13-36).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 Castoriadis, C.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K. Blamey, Trans.). Cambridge, C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Chalaby, J. K. (1998).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London: MacMillian.
- Chartier, R. (1988).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urran, J. (2002). *Medi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Erjavec, K. (2008). How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directions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Medij. Istraž*, 14, 21-34.
- Ettema, J. S. (2010). News as culture. In S. Allan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ews and journalism* (pp. 289-300). New York: Routledge.
- Filmer, P. (2003). Structures of feeling and social-cultural forma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 to 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199-219.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rdt, H. (1995). Without the rank and file: Journalism history, media workers, and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H. Hardt & B. Brennen (Eds.), *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 (pp. 1-2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n*. London: Routledge.
- (1990). Newsworkers,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4), 346-365.
- Hay, J. (2006). Between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spatial materialism: James Carey's writing about communication. In J. Packer & C. Robertson (Eds.),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p. 29-56). New York: Peter Lang.

- Høyer, S. (2003). Newspapers without journalists. *Journalism Studies*, 4, 451-463.
- Høyer, S., & Pöttker, H. (Eds.). (2005). *Diffusion of the news paradigm 1850-2000*. Göteborg, Sweden: Nordicom.
- Lee, C.-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1-39.
- Lester, E. (1995).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exclusive: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ewsworkers. In H. Hardt & B. Brennen (Eds.). *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 (pp. 30-47).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Kerns, J. P. (1977). The limits of progressive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4(3), 88-92.
- McNair, B.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In H. de Burgh (Ed.), *Making journalists: Diverse models, global issues* (pp. 25-43). New York: Routledge.
- Nord, D. P. (1988). A plea for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5(1), 8-15.
- Reilly, T. (1997). "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 A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W. Carey.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95-116).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yfe, D. M. (2006). News, culture and public life: A study of 19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7, 60-77.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orton.
- (1999). 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public. In T.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118-133).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Taylor, C.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Weaver, D. H. (1975). Frank Luther Mott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History*, 2(2), 44-47.
- Williams, R. (2001). *The long revolution*. Peterborough, Canada: Broadview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1)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ld News, New History: Rethinking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in Taiwan

Huang, Shun-Shing*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rough the critiqu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by Jams W. Carey, this study argu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to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aiwanese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Whether in the East or the West, both regard journalism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whose legitimation depends 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democracy and neglect the journalism's cultural meanings or other social dimen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pply the concepts of paradigm and cultural history to re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A paradigm not only means a different worldview, but also a distinct scheme based on a specific social imagination, and it is the variety of social imagination that makes multiple journalistic practice and cultural meanings possible.

Keywords: Taiwanese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tic paradigm, structure of feelings, social imagination

*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語藝觀點探討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之認同策略

The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in Ridiculous Religious Broadcasting Programs: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doi:10.6123/JCRP.2011.029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 蔡鴻濱(Hong-Pin Tsai)

頁數/Page： 211-2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2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語藝觀點探討荒誕宗教廣播節目 之認同策略^{*}

蔡鴻濱^{**}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在於探討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中言者的語藝策略，以及聽者認同的形成，對此研究者利用 Burke 的群集批評（cluster criticism）尋找語藝文本中的關鍵詞（key terms）群集後，並透過認同（identification）、實質共享（consubstantiality）、疏離（division/dissociation）、命名（naming）、重生的語藝（the rhetoric of rebirth）、終點視界（terministic screen）等語藝觀點，以及 Campbell 的「英雄歷險模式」析論、探討之。經過群集分析，得出此宗教節目中，強度與頻率較高的六個關鍵詞群集為：（一）聞聲救苦、無限靈驗的大王母娘娘；（二）老弱殘疾者藥到病除；（三）鬼魅魍魎為不幸的淵藪；（四）結緣商品加持護身；（五）自助者天助；（六）主持人乘願而來。研究者反思言者複誦的關鍵字群集發現，其內涵是 Campbell 英雄歷險之神話敘事結構的隱喻（metaphor），是 Burke 實質共享（即認同）概念的實踐，更是言者的語藝策略，也是與聽者共享的價值。而言者的鬼神二元宗教觀，離苦得樂的追求，除了契合華人生活的宗教背景外，言者的神話語藝，更作為聽者重生的語藝，更讓聽者對言者凝聚力與認同感之產生，成為可能。

關鍵詞：認同、終點視界、重生的語藝、群集批評、英雄歷險

^{*} 本文曾發表於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2010 年「數位傳播與媒介消費」研討會，作者感謝研討會評論人張玉佩副教授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費心閱讀並提供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 Email: hptsai@mail.nh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Language] may be treated as an instrument developed through its use in the social proces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uch considerations are involved in what I mean by the “dramatistic,” stressing language as an aspect of “action,” that is, as “symbolic action.” (Burke, 1966: 44)

BEING BODIES THAT LEARN LANGUAGE
THEREBY BECOMING WORDLINGS
HUMANS ARE THE
SYMBOL-MAKING, SYMBOL-USING, SYMBOL-MISUSING ANIMAL
INVENTOR OF THE NEGATIVE
SEPARATED FROM OUR NATURAL CONDITION
BY INSTRUMENTS OF OUR OWN MAKING
GOADED BY THE SPIRIT OF HIERARCHY
ACQUIRING FOREKNOWLEDGE OF DEATH
AND ROTTEN WITH PERFECTION (轉引自 Foss, Foss, & Trapp, 2002: 212)

Burke (1897-1993) 廣博精深的研究領域，使得其思想長期以來都是學者研究專注的焦點。雖然 Burke 涉入的領域廣袤，諸如哲學、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或經濟學等，但是主要的研究則為語藝學 (Rhetoric)。

Burke 研究涉入的領域廣大、其使用的語言冷僻特殊難解，再加上討論經常離題，使得柏克學 (Burkology) 不僅難以解讀，還容易誤讀、誤用 (Foss et al., 2002; Wolin, 2001)，語藝學者 Kennedy (1999: 94) 在其著作中甚至稱他為「古怪的作家」(quirky writer)。

不過，Wolin (2001: ix) 為其辯護指出，Burke 其實是因為其複雜且抽象的哲學與語言討論模糊了其寫作上強烈的社會與政治目的，如果可以閱讀 Burke 早期的著作，就可以了解到 Burke 整個研究的重點其實就在於追求「更美好的生活」(towards a better life)。而其探討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方法在於人類透過符號 (symbol) 的使用來改變自己與社群 (themselves and communities)，是以 Burke 的核心理念中便認為：語言的使用乃是符號行動，而語藝是符號的誘發 (language use is symbolic action, and that rhetoric is symbolic inducement; Herrick, 2009: 225)。

由此思考 Burke，則不難理解上方何以特別引語強調 Burke 視語言為符號行動，以及 Burke 定義人類是文字動物且是製造符號、使用符號、誤用符號的動物，並利用符號創造負面、階層，甚至以之追求完美等等。

語言符號是 Burke 理論的核心而且認為其效用強大、用途廣泛，Burke 終其一生都在探索語言及其本質、作用，研究結果亦見諸其各著作之中¹。透過前述對 Burke 核心思想的闡明，可知經由符號的行動可以創造甚至改變社群，而符號行動的誘發更代表語藝的產生，同時也是認同（identification）運作的過程（Foss, 2009: 63）。換言之，認同是 Burke 改變社群、追求人類美好生活的敲門磚。基此，Burke 的語言觀點，也成為研究者思考荒誕怪異宗教廣播節目的認同何以形成的理論基礎。

在此合先定義何謂「荒誕怪異宗教廣播節目」。首先，就荒誕怪異言，《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贊曰：「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²，其次，就宗教廣播節目言，乃指傳達宗教理念的廣播節目類型，例如福音節目、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等等。綜前所述，荒誕怪異宗教廣播節目的定義乃為：「一般俗世眼光中，以怪異、暴力、悖亂、神鬼等違背常情常理之事者為節目內容的宗教類廣播。」。

研究者所以研究此荒誕怪異宗教廣播節目係因工作故，致有機會收聽到桃園地區晚間時段的廣播節目³。在該地區眾多廣播節目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以興建大王母娘娘宮廟為由的廣播節目，此節目以起宮建廟為由，不斷向聽眾推銷販賣其所謂的信仰必需商品，例如神像週邊產品（無極瑤池大王母娘娘活動金尊、項鍊、珍珠與鑰匙圈）、七彩琉璃法寶、老山粉、茱草淨身皂、艾草、香（烏沉香、烏沉香環），甚至是綜合蔬菜餅、原味香菇餅等等。由於主持人宣稱所得款項將全部作為建廟之資，因此物品單價甚高。

再者，細聽其廣播內容亦極為荒誕不經，主持人各種籌款的說詞不僅漏洞百出且服務態度不佳。不過，該節目的「見證」單元，卻經常有大批信徒自動 call-in 宣稱大王母娘娘的法力無邊以及從大王母娘娘身上獲得無比神奇感應，不僅許

1. 例如 *Permanence and change: An anatomy of purpose* (1984)、*Counter-Statement* (1968)、*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1937)、*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1941)、*A grammar of motives* (1969a) 及 *A rhetoric of motives* (1969b)。

2. 本文所謂之荒誕怪異乃指怪力亂神的宗教廣播節目，是以怪力亂神之定義為荒誕怪異之定義。本定義參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07）。

3. 收聽頻率為 FM98.9，時間為上班日晚間 6-10 點，亦可網路收聽，<http://www.0800893979.com.tw/>。中部地區有線電視台的頻道在冷門時間可見到本尊現身說法。

多多年的沉痾病症不藥而癒，出門在外更是逢凶化吉，大王母娘娘的靈感無人可比，堪稱千萬年來世間罕有。

舉例來說，節目主持人就經常以臺灣民間的宗教與鬼神觀來自我推銷：

茱草淨身皂，從頭皮洗到腳底，不論身體怎麼樣都能洗，邊洗邊求大王母娘娘，過去你最怕經過弔喪的地方跟陰煞、麻煞，以及前面如果有喪事，你就快要嚇死，來！這大王母娘娘可以幫你處理，……以後你看到這東西，你統統不會怕（A-8-1）。

事實上，前述荒誕的內容加上節目中販售的商品強調「神奇的效果」，早被衛生單位盯上也經常受罰。主持人不僅經常在節目上大喊吃不消，並且極力自我澄清。在前述的長期性危機下，主持人為了鞏固信徒的信任，乃不斷在原本內容就變化不大的節目中複誦前述臺灣民間的宗教觀、神鬼觀等等，企圖對聽眾諄諄教誨或洗腦。

整體來說，該節目呈現型態與運作方式之荒謬可笑、匪夷所思，與臺灣充斥著近兩百家賣藥廣播電台（陳婷玉、王舜偉，2004，2006）以及聳動浮誇、大放厥詞的政論電台（盛治仁，2005；張卿卿、羅文輝，2007；楊意菁，2004）大有異曲同工之妙。易言之，本荒誕怪異宗教廣播節目，某種程度可說是前述賣藥、政論節目的翻版。基前觀察，乃引起研究欲從語藝角度思考此類型廣播節目之認同如何形成之動機，並期待研究結果有助於吾人理解臺灣社會中此類特殊社會現象。

深入來說，宗教作為一種信仰，迥異於真實可驗證的科學現象。因此宗教欲獲得大眾的認同與信仰，便需要消除大眾對其疑慮，尤其是當其宣稱具有神奇療效或能產生靈異現象時，言者便負擔極大的舉證責任。在研究者的觀察中，則發現該節目有不少死忠的信眾，他們不僅經常購買或回購高單價的各類商品，而且還會共同反抗其他聽眾的質疑、挑戰與杯葛等等，儼然已與主持人以及大王母娘娘形成一生命共同體，心手相連一起抵抗不信神的人；而其為自我捍衛的種種論述中，更可發現此一空中的廣播團體，具有一股強大的向心力、認同感，沛然莫之能禦。

因此面對此現象，研究者不從普羅的、俗世的位置來批判其荒誕程度，而是探討身陷其中的言者如何論辯與舉證？亦即言者運用哪些語藝觀點或策略為其自身立場捍衛，並駁斥社會上各種質疑與挑戰，以取得或深化聽者（即信眾）的認同？此則為本研究進行之目的。

研究者認為 Burke 的符號行動、認同、重生的語藝、戲劇理論中群集批評（cluster criticism）等等觀點，有助於回答與思考前述的現象與提問，即透過 Burke 諸多的概念進行分析之，來思考此節目社群實質共享的觀點，進而探討言者說服聽者的語藝策略。此外，研究者併援用神話學者 Campbell 的「英雄歷險模式」，協助解釋本研究中言者的行為，及其對聽者的意義。

對於聽者，Perelman (1912-1984) 將聽眾分為兩類，一為特定聽眾（particular audience）、一為普遍聽眾（universal audience），前者指一群特定的人，不管他們的合理性與溝通能力為何，例如演說現場，便是在特定時空下演說者企圖影響的人；後者則指具有溝通能力、合理的人，這些人可能是由許多特定聽眾所組成 (Foss et al., 1991: 124-126)。研究者將收聽此廣播節目的聽眾視為特定聽眾並關心這群聽眾的認同如何受言者的形塑。

總而言之，本研究目的有二：（一）為透過 Burke 與 Campbell 的觀點探討此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中言者的語藝策略。（二）探討此節目聽者認同之形成。

貳、文獻探討

針對研究需要，以下主要說明 Burke 的認同概念、重生的語藝、戲劇理論中群集批評的觀點與批評方法的應用情況，以及 Campbell 的神話觀點。

一、Burke 與認同

Herrick 指出，時至今日，Burke 或許仍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語藝理論家，對語藝批評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不僅是一位符號系統與行動的專家，其作品更是橫跨哲學、文學、語言學、語藝學、社會學與經濟學。Burke 觀點的主軸則為認同。Herrick 並引述 Bitzer 的話指出，認同是 Burke 語藝理論的關鍵詞（the key term）。換言之，Burke 發現疏離（alienation）與分離（separation/dissociation）是人類最嚴重的問題，而語藝則是其唯一的解決方法 (Herrick, 2009: 225)。所以作如是說，在於語藝帶來認同、弭平裂痕。

提及 Burke 的認同觀點，就無法不一併討論其實質共享（consubstantiality）、區分（division）與疏離及分離（dissociation）、命名（naming）、終點視界（terministic screen）等等觀點。

首先，就實質共享言，Burke 視認同一詞與實質共享同義，而共享實質建構了個人與他人之間的認同。Burke 也將說服（persuasion）和實質共享畫上等號，

視說服就是認同的結果。**Burke** 指出個體形塑自我或認同乃透過各種物質，例如職業、朋友、活動、信仰與價值觀等的聯盟（ally），如此一來就可以選擇與他者共享或不共享實質。易言之，當兩個實體（或個體）透過共享的觀點、態度、物質擁有或是其他資產（properties），則他們便實質共享。深言之，若試圖說服他者，最好能運用對方的言詞、姿勢、聲調、順序（order）、形象、態度、觀念等（Foss, 2004: 69-70），以同理心的方式形成認同。

其次，透過區分的概念，更能釐清認同的運作。所謂的區分，**Burke** 稱之為疏離或分離。因為人類在生理上是單獨的個體，所以被迫與他者隔絕和分離，神經系統的個體因中樞需要「身體被供以飲食，使之成為特殊私人資材；身體的娛樂和疼痛都是這個身體專有的。」、「認同於乙的某甲是『實質上的個體』」，而不是自己本身，此時他仍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富含動機的獨特處所。因此，個體既被統合卻又獨立，擁有獨特實質卻也和他者具有同質性。進言之，區分概念使我們發現語藝的基本動機，即人類溝通或說服是為了嘗試消除區分或疏離。**Burke** 認為個體如果沒有和他者分離，則不需要語藝學來宣告他們的統合性。就是因為他們的分離促使個體和他人溝通，並解決差異所帶來的問題，因此可以弔詭的說認同或語藝需求植基於區分。語藝嘗試克服、甚至超越不可避免的疏離問題（Foss, Foss, & Trapp, 1991 / 林靜伶譯，1996：188-189；**Burke**, 1969b; Foss, 2004: 70）。

第三，另一個創造認同的方法是為聽者命名或定義情境（defining situations）。舉例來說，**Burke** 便指出一場演說或一首詩，就是「一個包含情境的策略」，一種對情境問題的回答。言者掌握情境為結構命名並凸顯其組成元素。不過，語藝也不僅僅為情境提供命名，它也是解決情境問題的創意策略。語藝提供某些工具好協助個人巧妙地處理生活並且協助他們自在地活在世上，這是因為語藝協助言者解決其感知到的問題，乃為其「生存裝備」（equipment for living）。此外，語藝行動或文本也協助言者判斷其行為、轉化其似乎不道德或是荒謬可笑的行動而變成深思熟慮後的美德或讓行動更加精確，因此，命名提供通往情境的方法，也提供了改變的助力（Foss, 2004: 70）。

最後，就終點視界言，由於文本（artifacts）也具有為聽者提供「生存裝備」的作用，因為它們會洩露言者的世界觀，或稱為 **Burke** 所謂的言者創造之「終點視界」。此詞語係指我們選擇用來描繪的，會構成我們看世界的視窗，其引導我們關注特定的真實觀，且異於他者。簡單來說，我們觀察到何謂真實，而此真實的形成來自於我們對特定詞語的選擇。只是，終點視界的數量就和人一樣多。語

藝批評者藉由分析終點視界可洞察言者的語藝，而且不論言者關鍵詞的選擇是有意或是無意，均可以之「追查出隱含在術語中的可觀察之（關鍵詞）種類」⁴。簡言之，找出言者世界觀與意義的線索，在於與其終點視界中重要的元素產生連結，並且注意何者伴隨何者而來（what follows what；Foss, 2004: 71）。

Burke 提供許多方法協助批評者透過調查構成終點視界的語藝，來發現言者的世界觀，其中認同、關鍵軼事（representative anecdote；Brummett, 1984）、不協調觀點（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Hoban, 1977）、動機的順序（motive orders；Foss, 1984）、形式（form；Blankenship & Sweeney, 1980）與救贖（redemption；Brummett, 1981）等是其提出具創新且重要的發現言者世界觀之批評方法，群集批評與戲劇五因亦若是。基於研究目的，本文採 Burke 的認同觀點與群集批評作為方法。

Burke 視人為符號的使用者，不僅具有發展認同的潛力，也讓符號互動成為可能，而認同的發展所以可能，也端視我們前述探討的實質共享、區分與疏離及分離、命名、終點視界等的觀念在社群之間的建立與運作，由此也方讓語藝的認同作用成為可能（rhetorical possibility）。前述觀點，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荒誕廣播節目的言者策略與聽者認同的取得。

二、重生的語藝：污染—淨化—救贖

語言是 Burke 思想論述的核心，其除由此探討出認同此一核心概念外，也定義出人類與符號的關係（如文前引語）。在此之外，語言在 Burke 的觀點中尚具有更深刻的宗教意義，與本研究的題旨「宗教廣播節目」緊密相關，其包括神諭學（logology）與重生的語藝（the rhetoric of rebirth）。

神諭學為 Burke 式用語，用來發掘語言如何運作，以及動機系統與態度，其以基督教神學作為分析基礎⁵。Burke 的神諭學不在爭論宗教原則的真偽，而是企

4. 原文 track down the kinds of observation implicit in the terminology，參見 Burke (1966), p. 47。Burke 舉例解釋，如果我們說：「山裡的生活」，並不是指生活在山中，事實上意在言外。

5. 「logology」一詞，Burke (1970) 在著作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Studies in logology* 中定義為「words about words」，與神學「theology」的定義「words about God」有某種程度關聯。至於「logology」一詞的中譯則莫衷一是。有人譯作「理學」、「道學」，定義為一種宗教修辭，尤其是指基督教；林靜伶譯作（1996）中則譯為「神諭學」，定義為發覺語言的運作，特別是發覺動機系統與態度。再者，神諭學的智識來源是神學，Burke 特別研究神學詞彙，以探討語言的運作，簡言之，Burke 認為神諭學是研究符號系統的方法，並以中立的基督教神學為模式。Appel (1993) 的文章中則整理指出「logology」的意含有：「logology is in some sense a surrogate theology」、「secular and empirical」、「perspective of how language generates knowledge」，更精確的定義則為「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ological terms...for the light they

圖洞察是哪些語言的關鍵詞在宗教中運作。其選擇神學乃因其語言被充分運用，且認為宗教上宇宙論的起源設計完全是說服模式。換言之，語言創造了神學，沒有語言就沒有神學，神學並體現語言的基本功能，即利用符號創造真實 (Foss et al., 2002: 204)。

神學的語言符號除了創造真實，更是人類重生的憑藉。在重生之前，Burke 指出負面 (negative) 及其相關詞語階層 (hierarchy)、完美 (perfect) 與神秘 (mystery) 為人類重生奠定了基礎。此因個體可藉處理這些語言的過程達到救贖、重生或新的認同結果。重生的語藝包括三個階段：污染 (pollution) — 淨化 (purification) — 救贖 (redemption)。其中污染是罪惡的原始狀態，處在充滿罪惡與負擔的不潔狀態；淨化是清理的階段，罪惡將被掃除；救贖是潔淨的階段，達到身、心、靈潔淨的新狀態 (Foss et al., 2002: 209)。

首先，就「污染」言，階層造成服從和溝通，卻同時也產生罪惡與污染。在此罪惡就是世俗所謂的「原罪」。至於污染，則與排泄動機有關，意即透過排泄才能保持身體健康，就像個體必須排除本身的罪惡、污染，才能維持心理和生理健康一般，因此排泄動機在救贖過程中驅使言者淨化聽者對人、地、事、觀念等之負面觀點 (Foss et al., 1991 / 林靜伶譯，1996：206-207；Foss et al., 2002: 210)。

其次，就「淨化」言，由於罪惡是我們人類永恆的一部分，且由語言系統中負面與階層不斷產製，因此為了除罪以獲救贖，則淨化是必要的手段。對於淨化，Burke 提出兩個基本方法——犧牲 (victimage) 與苦行 (mortification)。前者將罪惡轉換到言者以外的事物，犧牲法就是代罪羔羊 (scapegoating) 原則，被選為犧牲者需代表罪過、承擔罪惡，深言之，代罪羔羊是認同和疏離兩個相對立原則結合在某一人身上。Burke 反問：「如果沒有共同的羔羊，人們將如何統合呢？」至於苦行法是由自身承受罪惡或原罪的過程，苦行法是自我懲罰、自我犧牲與自我否定，並約束自身的性格與衝動 (Foss et al., 2002: 211)，就像是一位苦行僧。

最後，就「救贖」言，此階段的言者因自身的淨化與救贖而發生改變。認同的改變、新的觀點、或朝著目標向前的感覺、或追求較佳的生活等等都是救贖的顯示。因此，污染—淨化—救贖，是不斷段循環的過程，也是建立和發現真我的戲劇過程 (Foss et al., 2002: 211-212)。

might throw upon the forms of language」。基此，研究者認為神諭學的翻譯自比坊間一般譯為理學、道學者為佳，且更能反映其原旨，乃援用之。

「污染—淨化—救贖」對言者與聽者而言，其在語藝上的作用，就是實現個人的救贖、重生與新的身分。以此思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中言者的語言使用與此重生邏輯的符合程度，可作為探討此類節目中言者的語藝策略，以及聽者的內心戲。

三、群集批評

群集批評是 Burke 用來尋找言者世界觀的方法。在群集批評中，透過發掘圍繞在言者文本中具有關鍵意義的符號，批評者可以發現言者在有意無意間展現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也是言者說服他者、尋求認同的語藝。

Burke 指出，每位言者的作品都隱含一組恆等式。Burke 使用「關聯群集」(associational cluster) 來說明群集批評，即批評者要檢視作品並找出在這些群集中彼此相隨者——例如何種行動、形象、個性、情境會伴隨英雄主義、撫慰人心、絕望等等。換言之，批評者採用群集批評必須指出「何種主題與其他主題群集」(what subjects cluster about other subjects)。Burke 舉例指出，一個面部痙攣的人會突發性的眨眼睛，此時痙攣就是關鍵的群集符號 (Foss et al., 2002: 71-72)。

Burke 也指出，批評者從文本中找到的群集，言者通常都未意識到。言者從文本中發現恆等的概念所以不容易，肇因於言者縱使清楚意識到書寫的行動、意識到特定形象的選擇來強調某一情緒，但言者仍可能無法意識到這些恆等觀念彼此之間的關聯性。透過群集可以讓批評者揭露言者的語藝，也讓其無法說謊。簡言之，群集批評提供一個徹底調查言者心智的機會，更能洞察關鍵詞的意義與言者所未查覺的世界觀 (Foss et al., 2002: 72)。

進一步來說，即使言者對於自己的言說行動具有相當高的自覺且刻意採用某些形象來描述或是加強自己想表達的特殊情感，但是他們仍可能無法完全察覺到自己所運用的群集間之相互關係。不過，批評者透過群集批評卻可以深入到言者的內心世界，發現蘊含在言者所言文本當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並發覺言者動機，而且「群集的劃分也可以對蘊含在符號世界中的重要成分加以排列」，從而擺脫言者文字表象上的限制，深入到言者本身都無察覺的層次（高菁黛，1999：7；Marston & Rockwell, 1991: 71）。

前述所提：「群集的劃分可以對語藝行動當中蘊含的重要元素加以排列。」係因在 Burke 觀點中，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建立，都是一種經由排列先後高低順序的方式下所形成的階層組織。在區分高低與先後順序之後，建立如 Rueckert 所言的「一種劃分等級的價值結構 (graded value-charged structure)」，將事物、字語、

人、行為和意念等排列等級（ranked），從而建立起言說當中的階層。這些組成元素包括勞力的分工、擁有不同的資材、年齡、地位、職位、學習階段、技術層次等。」（Foss et al., 1991: 190 / 林靜伶譯，1996: 202）。因此，透過對先後次序、高低等等的排列，有助於我們發覺言者論述當中價值位階之高低。

再就與聽者的關係言，語藝行動所建構的符號世界中，同時包含言者想要與聽眾建立的認同，經由觀察言者所欲建立的認同，可以發掘言者的動機。從 Burke 的觀點來看，認同的建立是一種符號互動下的結果，聽眾不但包括他人、同時也包括自我（洪文俊，1998b: 5）。當言者進行言說的語藝行動，便是在企圖建立言者與聽者之間的認同。

群集批評除了發掘言者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外，Berthold 指出群集批評透過對衝突性與戲劇性的分析，可觀察到言者在文本中呈現的比較與對抗（what is vs. what；轉引自洪文俊，1998b: 5）。Corcoran 也認為，群集分析可發掘文本中的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模式。文本當中一些典型重複出現的形象，緊密結合成一相關的群集，這些群集會造成如同戲劇形式一般的二元對立形式（同上引）。換言之，透過群集分析可發現言者文字的魔力，了解言者如何透過語言的運作，傳達出各種意向、價值觀等等以引起讀者的共鳴。通常 Berthold 與 Corcoran 的對立觀點比較適用在衝突議題上，例如核四、ECFA 等等議題，因此二元對立觀點的尋找，並非群集批評的必然，端視文本的特性而定。

四、Campbell 與英雄歷險

《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是神話學者 Campbell (1904-1987) 的經典之作，本書追溯了幾乎全世界各地神話中的英雄歷險和轉化的故事，並從中揭露同一原型的英雄。本書內容遍及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文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藝術及流行文化等不同領域，由此融匯成為其獨特的神話學見解，奠定他在神話學領域的歷史地位。Campbell 神話思想的創造性，在於將人文價值及宇宙性的精神體驗，注入當代科學及藝術的詮釋中，此一洞見不僅豐富了神話學研究領域，更為人類未來開闢出許多想像的空間（Campbell, 1968 / 朱侃如譯，1997a: 23）。

Campbell 的神話特色在於其非來自於「理念的體系」（a conception system），而是來自於「生活的體系」（a life system），意即其神話觀點來自於生活經驗，主張我們必須回歸生活的經驗去認識神話（閻振瀛，1997）。鹿憶鹿

(1997: 25-26) 引 Campbell 的話說：「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兒遭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且「每個人出生時都是英雄，英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比他偉大的事物的人。」「所有英雄歷險的基本主題，都是為了脫離某種境界並發現生命的來源，而將自己帶入另一個更多采多姿而成熟的世界。」。

《千面英雄》一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從全世界不同歷史階段故事中，找出一種特定的、典型的英雄行動規律。Campbell 在博覽中外群書之下，發現神話主題的一元性，並由此揭露了英雄歷險的各個面向，他且在《千面英雄》一書，以四個基本架構貫穿英雄的歷險的主要過程，此即：召喚、啟程、歷險與歸返（見圖 1），他並由此填入其取自世界各大宗教文化傳統中的神話故事。此外，英雄歷險不止於個人的層次，它同是也是宇宙的事件，整個宇宙發生的循環過程，不僅是英雄歷險效法的典範，更是古今所有英雄的終極歸宿。因此，英雄在完成身心轉化後離世，乃是大、小宇宙最終必然消解的註腳（Campbell, 1968 / 朱侃如譯，1997a: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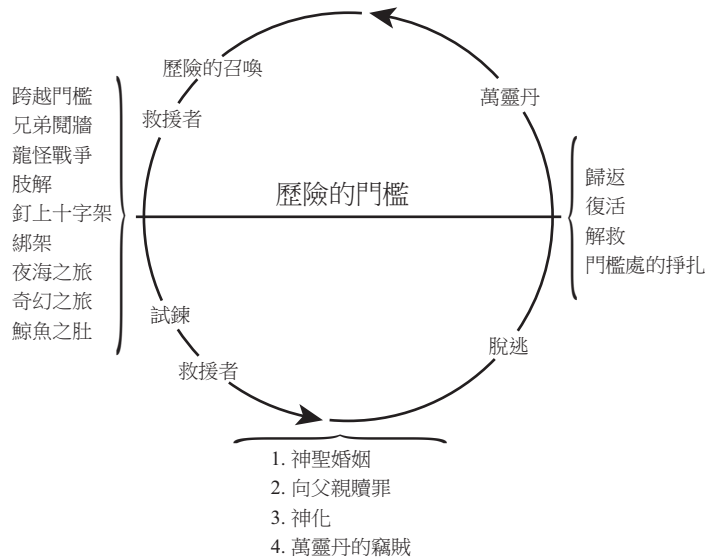


圖 1：Campbell 的英雄歷險圖

資料來源：朱侃如譯（1997a）。《千面英雄》，頁 262。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再者，Campbell 觀點中的英雄不僅僅是史詩、神話中歷險的英雄。事實上，他擴大英雄的概念，認為個人從出生一開始就是個英雄，人的一生就是英雄歷險過程。對此，Campbell 註解道：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深言之，Campbell 把英雄個人發展的心理層面和宇宙發生的形上層面，在理論上結合聯繫起來，此觀點也是全書精要之所在。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旅程上接受試煉的潛在英雄，要完成生命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要成就英雄的事業，只待我們對廣大深刻的宇宙生命內涵有所醒悟（Campbell, 1968 / 朱侃如譯，1997a：29-30）。

其實，神話概念下的「英雄」一詞何嘗不是一魅力名詞（charismatic terms），此名詞指涉一種神秘的力量，它的說服力來自一種共識或者「克里斯馬」（charisma），且對於聽者具有一定的號召與說服的力量（Foss et al., 1991 / 林靜伶譯，1996：75），使言者不僅在生活中形成小宇宙，引領信徒，又得以讓聽者服從、追隨與犧牲。

依據前述的觀點，本研究對象中的言者，自許肩負為大王母娘娘起宮建廟的神聖使命，可作為 Campbell 觀點中英雄的體現，又依據 Campbell 認為個人是自己人生旅程上接受試煉的潛在英雄的觀點來看，則本研究中言者與聽者共享英雄的實質，也奠定彼此相互認同的基礎。

五、群集批評的應用與反思

以下分說群集批評在國內外的應用狀況以說明本研究的合理性，也反思援用方法在運用上之優劣與可能的貢獻。

（一）群集批評的應用

在群集批評的應用上，國內研究較少。洪文俊（1998a）論文《蘭嶼核廢料爭議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語藝觀點的檢視》，利用群集批評分析反核與擁核兩方陣營在蘭嶼核廢料爭議中採取 / 建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洪文俊（1998b）《公娼與核廢料——臺灣弱勢族群反對運動的語藝分析》，探討了公娼與核廢料議題中，弱勢族群所建立的世界觀；高菁黛（1999）《美伊雙方領袖論述的群集分析——以兩次波斯灣危機（1990 & 1999）為例》，探討兩次波斯灣危機中交戰雙方領袖的論述，發掘雙方領袖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以了解他們如何召喚人民投入無情戰火。

就國外研究言，Berthold (1976) 透過關鍵詞選擇、群集分析和對立分析三個步驟分析美國總統 J. F. Kennedy 的演說；Crowell (1977) 分析一篇利用科學統計方法所做的論文來檢證作者運用的群集，Burke & Rueckert (1995) 更據此主張利用統計方式來檢視言者的論述，說明群集批評具科學化的潛力（轉引自高菁黛，1999：8）。

群集分析的研究也常應用於具爭議性的議題，例如 Foss (1984) 利用群集批評分析美國 1974 年出現的女性是否可以擔任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神職的爭議，在分析當時聖公會當權者與其支持者在多份宗教性刊物上的反對意見之後，發現教會當權者在文本中，強調男性的正面特質恰足以勝任神職，而女性擔任神職恰給教會與牧師帶來負面影響，以合理化其立場並試圖解決爭議。

Avalos (1983) 以群集批評檢視美國婦女運動先驅——Friedan 的三本著作，分析作者論述當中的權力概念，並比較其早、晚期著作，以了解其論述上的改變，其研究凸顯群集分析應用在爭議性人物上的適當性（轉引自高菁黛，1999：8）。

Foss 在其著作中也收錄多篇群集批評的應用文章，Reid (1990) *The Hay-Wain: Cluster analysi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探討藝術作品的群集分析，其從視覺元素出發，以（黃金）顏色（golden color）、亮度、尺寸、線條、協調度，以及畫面中的神職人員、夫妻等等為關鍵詞分析畫作，發現此法適於應用在視覺傳播，且高度主觀的視覺傳播文本也可被破解與解釋 (Foss, 2004: 78-93)。

Elliott (2004) 的 *A cluster analysis of Enron's code of ethics* 以群集分析探討美國能源交易大企業 Enron 破產後的檢討報告——Code of Ethics，其以企業倫理（ethics）、法律（laws）、公司（company）、員工（employees）為關鍵詞。發現其報告企圖建立 Enron 新的倫理意義，並說服成員接受。最後，Nowlen et al. (2004) 的 *Construction of an enemy in George W. Bush'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分析布希總統 2003 年 1 月 28 日的演說，探討戰爭語藝。其以美國（the United States/America）、海珊（Saddam Hussein）、伊拉克（Iraq）、伊拉克人民（Iraqi people）為關鍵詞進行群集分析，發現布希把伊拉克與海珊視為魔鬼、美國與伊拉克人民則塑造為上帝。

綜此，舉凡環保、軍事、科學、性別、視覺、企業等等可尋找出關鍵詞的語藝文本皆能以群集批評分析之，以尋找言者追求認同下所建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而本研究除了拓展群集批評應用之新可能性，也提供了一個在地宗教傳播現象的理解觀點。

（二）群集批評方法的反思

Burke 在 1937 年出版的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已經指出「何種主題與其他主題群集」來點出言者在描述某一主詞時會用某些形容詞來描述此一主詞，形成群集的現象；在 1941 年出版的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更對群集一詞作了明確定義：言者在論述中，通常包括一連串隱含的相關群集，並由此發現某些形象。時過大半個世紀，學者對群集的價值似乎興趣不高，相對的在研究的質量上便有所侷限，致群集批評的價值也無法充分彰顯。

事實上，群集批評透過相關關鍵詞的鏈結，批評者除了可輕易發現連言者自身都無法察覺的價值群集，以了解言者的終點視界外，更可讓批評者或讀者認識到言者的動機與觀看世界的角度。再者，群集批評又具有從文本中歸納、建立類型的特性，提供語藝研究上的創新價值，例如新類型的發掘。因此，以群集批評探討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之認同策略，不僅可以在看似龐雜的文本中找到言者的動機與語藝策略，且透過關鍵詞的尋找，更可能歸納出荒誕宗教節目的類型，甚至進行理論上的建構。

一般說來，語藝批評方法的實踐端視研究主題與文本特性，故事性強的文本多由戲劇理論下產生的語藝批評方法，諸如戲劇五因批評（pentadic criticism）、幻想主題批評（fantasy-theme criticism）、敘事批評（narrative criticism）等等析論之。唯，前述批評方法均提供了一完整的分析架構供批評者應用，所得結果通常用來驗證理論或觀點，對於較為獨特或具理論發展潛力之研究主題、文本，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弊，或是張冠李戴之嫌，而群集批評的使用則避免前述問題，又讓語藝批評行動具有理論建構的契機。

前述雖然點出群集批評的優點，及其在語藝研究上的貢獻，不過亦有其侷限性。此因群集批評與所有語藝批評方法一樣，歸納所得之類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闡述了選取文本本身蘊含的意義，但是通常需要借重其他理論或觀點進一步詮釋。例如，本文援用 Campbell 的「英雄歷險」觀點來進一步說明言者的語藝策略及說明其取得聽者認同之道，即是此理。只是，研究者如何知道採用 Campbell 或其他解釋觀點，則端視研究者的訓練而定，唯如此一來，也讓批評者寫就一篇論證深刻、具理論價值的語藝批評論文缺乏脈絡可遵循。

本研究結合 Burke 與 Campbell 的觀點，來解釋世俗或是普羅大眾眼中荒誕的宗教性廣播節目，並提供可能的詮釋觀點來說明當前諸多令人匪宜所思的宗教電台所以生生不息背後之言者的語藝策略為何，以及本研究中言者的英雄歷險故

事如何對該社群產生號召力與認同感。是以，本研究除了提供異於過往此類研究的切點、拓展群集批評方法適用議題的廣度之外，也讓臺灣的語藝批評研究在習於借用既有架構進行模擬之外，開始嘗試探索新的語藝分析模式。

參、研究方法

對於 Burke 的群集批評，在分析步驟上，Foss (2004) 建議：選擇文本、分析文本、形成研究問題以及撰寫文章。其中又以「分析文本」的方法最為重要。以下乃說明群集批評的步驟，並說明本研究分析文本選取的方法。

一、分析步驟

就群集分析的階段言，Foss (2004) 指出步驟有三：（一）界定文本關鍵詞（identifying key terms）；（二）劃分關鍵詞的群集（charting the clusters）；（三）找出文本中的有力解釋（discovering an explanation for the artifact）。

（一）界定文本關鍵詞

關鍵詞的選擇是群集批評的第一步。關鍵詞的數目應以五或六個為度，數量愈多則愈難分析。關鍵詞的顯著度奠基於出現的頻率（frequent）與強度（intensity）。首先，就頻率而言，一個不斷被言者重複使用的詞語，就有可能是關鍵詞。以 Martin Luther King 的演說「I Have a Dream」而言，「dream」就是關鍵詞；其次，就強度而言，其指一個詞語雖非經常出現，但卻是論辯的核心、代表最終的協議或是能表達出最深沉的感受。例如美國 911 事件之後，小布希演說中的關鍵字就是「evil」(Foss, 2004: 73)。

文本中的上帝名詞（god term）與魔鬼名詞（devil term）通常是關鍵詞。在 Weaver 觀點中，上帝名詞與魔鬼名詞皆為終極名詞（ultimate terms），前者代表言者的理想（ideal），後者代表言者負向的或是邪惡的部分。另外，分析一件非語言或藝術作品時，則關鍵詞並非文字而是視覺元素，例如色彩、形狀或影像，像是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其關鍵詞就是黑色、V 形以及陣亡的將士名單 (Foss, 2004: 73)。

（二）劃分關鍵詞的群集

界定出關鍵詞之後，可能得到一群關鍵詞，因此下一步就是對關鍵詞群集的劃分。劃分時要非常仔細地檢證各個關鍵詞之間的關係。關鍵詞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組成群集，所以要找出最接近的關鍵詞或是可相互連結的詞語 (Foss, 2004: 73)。

（三）找出文本中的有力解釋

最後階段中，批評者試圖歸納出一類型。在篩選出所有與關鍵詞連結的詞語後，批評者必須進一步將意義接近、類型（pattern）相同的詞語集合起來，歸納成一類型或形成一群集，並且找出可以代表群集完整形象的名稱，對群集進行命名，方可使群集的劃分完整（高菁黛，1999：11；Foss, 2004: 74）。

Foss 也指出，批評者嘗試找出相互連結的群集，可以了解認識言者建構的世界觀。言者若老是以特定的文字或影像（word or image）與關鍵詞連結，則可說言者深受到該關鍵詞的影響。就以群集批評中的對立分析（agon analysis）來說，對立分析檢視對立的詞語，尋找語藝中反對或是反抗的詞語，由此得出的類型可一探言者在衝突或緊張關係上的世界觀，或是凸顯言者世界觀中的上帝或魔鬼名詞 (2004: 74)。易言之，進行群集批評時，批評者要定義哪一個群集最有趣、最顯著而且對於文本最具解釋力。意即群集幫助研究者定義關鍵詞，且提供解釋力。

二、文本選取

本研究分析桃竹苗地區的調頻（FM98.9）廣播節目，其播出時間為週一至五晚間 6-10 點。其節目主要訴求為希望在雲林縣林內鄉興建廿一世紀才剛剛出現的神明「大王母娘娘廟」，盼透過聽眾捐錢以及購買周邊產品過程助其建廟。因此，此一廣播節目相關內容就為本研究的對象。

在收聽過程發現，其節目內容與型態與地下賣藥電台相似，不斷重複相關內容、說詞、歌曲、見證等等，因此文本重疊性極高。在此前提下，研究者乃選擇 99 年元月 26-27 日的各四小時節目中的任意一小時內容進行群集分析。

研究者將上開節目談話內容轉為逐字稿並以此內容逐一分析。研究者以詞語為分析單位，尋找關鍵詞。在關鍵詞的選取上，端視其出現的頻率與強度而定。

肆、群集分析結果

透過反覆的閱讀、分析、歸納與整理之後，尋找出諸多關鍵詞以及環繞在其四週的同義概念所形成的群集，這些群集皆反映出言者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必須先說明的是，受限於此節目的特性、聽眾對象以及主持人屬性等等，致文本選取日期雖有不同，但內容重複性仍高；因此得出的關鍵詞廣度較低、抽象性不高，且缺乏對立性。

在對諸多關鍵詞進行劃分之後，得出六個類型的群集：（一）聞聲救苦、無限靈驗的大王母娘娘；（二）老弱殘疾者藥到病除；（三）鬼魅魍魎為不幸的淵藪；（四）結緣商品加持護身；（五）自助者天助；（六）主持人乘願而來。以下列出六個群集的相關關鍵詞，並輔以主要逐字稿說明。

一、聞聲救苦、無限靈驗的大王母娘娘

大王母娘娘等於是節目中不容挑戰的上帝名詞，是言者論述中所有權力與說服力的來源。不管賣東西、為聽眾治病、解釋靈異現象、或為建廟動機尋找理由與說詞等等，言者言必稱誦大王母娘娘，並以祂作為面對外界謾罵的檔箭牌。因此，大王母娘娘不僅出現的頻率極高、強度極大，也被賦予相當豐富的意義。在整體的論述中，大王母娘娘幾乎就等於觀世音菩薩，其神格特質包括：聞聲救苦、大慈悲、是大家心靈上的寄託且庇祐大家平安等。此外，大王母娘娘也是位有求必應的神祇，凡是信祂者，祈求祂時，祂必然會有所回應，不論是事業、錢財、健康，甚至去除鬼魅魍魎的騷擾，都一次就能克竟全功，不可思議（見表 1）。

在此群集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就是「見證」。除了工商時間、唱歌時間，就是在做見證，見證的事項無奇不有，從晚上睡不著、久病痊癒到穿越時空與亡者見面，全仰賴大王母娘娘無限靈驗的法力之賜，信徒唯一要做的就是信祂、愛祂，愛到眼淚流（台語：愛到流眼油）。

這些真人見證言之鑿鑿，都以大王母娘娘為歸因，舉例來說，

（林內慈鳳宮無極瑤池）大王母娘娘、拚建宮／廟、（有）靈驗／神奇、添香油錢、（做）見證、聞聲救苦、救世間人、（去）祈求（祂）、有求必應、避邪、心靈的依靠、慈悲、愛祂、愛到流眼油、家庭、神明（正神）、庇蔭／保佑、功德

表 1：大王母娘娘群集

……自從用一萬塊請大王母娘娘來幫我收，替我姐姐渡就是了，從那天開始晚上就很好睡了，我姐姐沒有再來吵我了（A-6-2）⁶。

再者如

……（車子）撞到我厚，我只有跌下來而已，都不會怕，我覺得很感謝大王母娘娘，因為我有戴項鍊還有掛鑰匙圈（A-11）。

又如

大王母娘娘是我們這邊信徒的心理上的寄託啦！雖然沒有怎麼見證，但是祂會感應到，對大王母娘娘的感謝萬分啦（B-3-1）！

當然大王母娘娘也成為主持人各種說詞的藉口，

全國唯一的大王母娘娘現在已經來到凡間救濟，我沒有設一個宗教把你們綁得死死的，你不用為了我這個宗教來付出什麼，你不用為了大王母娘娘付出什麼事情啦！……我們只是家庭顧好，我要承認，這個家庭是大王母娘娘的，大王母娘娘的家庭就對了（B-15）。

訴諸近幾年才出現的神——大王母娘娘——而且是主持人率先感應、發現的神，是其整個論述與合法性的來源，也是其不斷向聽眾諄諄教誨取得認同的關鍵詞。新神大王母娘娘之所以為聽者認同，主要來自於前述關鍵詞「見證」的作用。缺乏見證，則讓言者與聽者之間的認同缺乏聯繫。研究者發現，見證者多是貧病的鄉下阿公、阿嬤，而其願意認同一般世俗中視為荒誕的廣播節目，則與其過去的工作、信仰、身上不癒的久疾、孤單寂寞、經濟弱勢、生命經驗等等原因密切相關。換言之，言者與聽者間如 Burke 所言實質共享了某些物質與經驗，使得各自窩居在家乏人陪伴的一個一個獨立的孤單老人家，因為與環繞在大王母娘娘的物質與經驗共享，而使得所有分離的生命個體被串連起來，並得到了認可。於此之際，我們或可說荒誕背後所蘊含的不外乎是這些阿公阿嬤的認同感。

6. （A-6-2）中，A 代表的是逐字稿 A，6 代表逐字稿的頁碼，而 2 則代表段落。

二、老弱殘疾者藥到病除

這個節目像台大醫院病情諮詢部。從 call-in 者的聲音與自白來看，收聽者多是年老殘疾貧困者，地區主要在中南部，因此主持人在節目中經常要面對聽眾對於其自身疾病的詢問（見表 2），讓主持人儼然就像醫師、職業介紹所。值此，主持人第一個反應就是問結緣商品買了嗎？有無在使用？有無回購？效果如何？等等，如果未購買，乃要求聽眾先買再說？買了若未持之以恆使用，便信誓旦旦言無怪乎無效？或是持之以恆仍然無效，就請聽眾要耐心等待？或是推說大王母娘娘很忙，也是要排隊等等。真的被惹惱了，就要聽眾去看醫師，說主持人不是醫生等等。

只是，更常聽到的都是大王母娘娘加持過的商品效果奇佳，因此不斷有正面見證。於此，主持人乃大肆吹噓商品的好用，請大家不要再懷疑云云。舉例來說，

我那個啦！做一個見證，昨天人很難過，跟大王母娘娘說，說如果讓我好好的，可以吃飯厚，我就……替祂做見證啦！主持人：到最後怎麼樣？聽眾 8：有啦！就可以吃飯了，不然都吃不下。主持人：這樣好啦！好啦！恭喜你啦！聽眾 8：五百元添香油厚（A-13）！

再者如

身體不好沒關係啦！該看醫生我們就要看醫生，大王母娘娘對你靈驗啦！……剛剛那個住在鹿谷，那個伯父不知道幾歲，精神百倍！……他求大王母娘娘求到血壓降下來就對了啦（B-3-2）！

還有如

老年人年紀比較大，真的都禁不起摔，……摔下去，那個骨質疏鬆，……，突然間跌倒，跪下去，膝蓋就破了，走一走滑倒，從屁股跌了一下，……結果屁股的骨頭就裂了，雖然大王母娘娘很靈啦！你們自己也要注意哦（B-5）！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老年人（或年紀較大者）、小孩、失明者 • 腰酸背痛、失眠、骨質疏鬆、骨頭裂開、不舒服、肚子痛（肚子絞痛）、痛、腳抽筋、生病、發燒（全身肉燙）、吃藥、針灸、刮砂（放血）、筋絡、往生、改善體質 |
|---|

表 2：疾病弱勢群集

同樣的，言者與聽者共享了一個疾病這個關鍵詞的實質，老疾纏身的阿公、阿嬤雖然彼此間是疏離的、分離的，但在節目中都尋找到一個共同的、且可能離苦得樂的出口——大王母娘娘的周邊商品。不論其商品效力的真假，則在這些疾病纏身、子女不在身邊作陪的老人家，病痛也似乎可以藉由這些商品獲得緩解，也進而提升、凝聚這一空中的想像社群成員之間的認同。

三、鬼魅魍魎為不幸的淵藪

在節目中，主持人認為鬼魅魍魎（也等於是節目中的魔鬼名詞）普存於我們生活的空間，舉凡隔壁鄰居有人辦喪事，到出門在外都有機會與好兄弟沾上，並因而導致生病、事業不順等等。換言之，身體有疾、事業不順、家庭不平靜等等，都與人無關，而與未能妥善處理冤親債主、鬼魅魍魎密切相關。因此，想要一切平安順利，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信大王母娘娘並且購買週邊商品使用，甚至放在家中祭拜，透過切實遵守這些程序，則保佑家中大小禽畜一切平安無事，而且縱使宅第風水不好，例如位在路衝、房子的方位不佳等等，透過周邊商品的加持，也能有逢凶化吉的神奇效果（見表3）。

雖然週邊商品的價值很貴，但是主持人常言，又有什麼比平安更重要，而且這些錢也是用來建廟起宮、功德無量。舉例來說，

如果遇到無形中的東西，真的！大王母娘娘跟你們說真的是有效，無形的東西雖然是輕輕的而已，……附在你的身上你就完蛋了，你連走路都像被人家綁著一樣就是了，八卦被人家鎖住了，它附在你的身上你連走都走不了，真的耶！覺得自己怎麼掙得那麼重，怎麼那麼奇怪，讓人家按摩也沒有辦法，讓人家刮砂也沒有辦法。斗六就有一個很漂亮的人，在開卡啦OK，六年來都這樣啦！卡陰的哦！你就不知道，想說奇怪怎麼會這麼難睡，走也不太會走耶！然後筋絡很緊，筋絡很緊就想說去給人家刮砂，……讓人家按摩、針灸。針灸就是用那個針這樣插插……想說筋絡要鬆開，結果也沒辦法，六年多來吃盡苦頭，花了很多錢，結果怎麼樣？結果大王母娘娘幫她解決了，一下子而已（A-3-1）。

- 陰煞、魔煞、喪事、弔喪、白帖、樹精、無形的、卡（到）陰、引渡、神主牌、抓替死鬼
- 風水：地理師、路衝

表3：鬼魅魍魎群集

再者如

他如果晚上在睡覺，他的姐姐還是誰都會在他的頭上一直亂，一直亂他，亂到他晚上都會起雞皮疙瘩，都睡不著，都卡到那種東西，……然後就跟大王母娘娘參加建廟的陣容，這個人（他姐姐）已經往生了，我跟你說真的（他就好了；A-5-2）！

另外如

聽人家說「哎喲！那條路很可怕，常常在抓替死鬼，」有時候你會起雞皮疙瘩，從今以後，你戴著我們的大王母娘娘七彩琉璃法寶以後，無形的當中不敢深入車內，……吊七彩琉璃法寶，來跟前跟後，大王母娘娘跟著你，……幫你擋凶擋煞，這樣有夠讚（A-16）！

傳統避邪商品與鬼魅魍魎的結合，不僅顯示言者的言說策略，也透露其宗教世界觀或終點視界，而這些觀點又與其聽眾的生命經驗密切結合。以下這段話是每次都會複誦的內容，顯示言者與聽者之間共享的臺灣民間宗教信仰的觀點⁷，也讓彼此的生命經驗有了充分的聯繫與相互認同的依據。例如：

茱草淨身皂，從頭皮洗到腳底，不論身體怎麼樣都能洗，邊洗邊求大王母娘娘，過去你最怕經過弔喪的地方跟陰煞、麻煞，以及前面如果有喪事，你就快要嚇死，來！這大王母娘娘可以幫你處理。……因為別人白帖送到我們家，只是看到、摸到而已，慘了，嚴重了！這要怎麼辦，沒關係，我是跟你說真的耶！茱草淨身皂，從頭皮洗到腳底，慢慢洗，慢慢改善你的體質，以後你看到這東西，你統統不會怕！真的耶（A-8-1; B-2）！

-
7. 在此所謂的臺灣民間宗教信仰觀點，係指一般流傳於臺灣社會的宗教觀念。對此，本文採用鄭志明（2001）〈臺灣民眾宗教信仰的生死關懷與靈驗性格〉一文的觀點。該文援引了《臺灣社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指出臺灣宗教信仰的特色為：臺灣民眾的宗教信仰處在傳統與創新的衝突情境中，正面來看，可謂臺灣民眾的教信仰體現了臺灣文化的發展、顯示了臺灣民眾整體的精神教養，但是更多持負面態度者卻大力批評臺灣傳統民眾的宗教信仰是以「靈驗」為要件，偏向庸俗性的巫術需求，展現出巫術的符心理，凸顯出傳統宗教的神秘性與巫術性，導致社會功利主義與現實主義變本加厲。再者，傳統宗教信仰也經常與落後、迷信等視為等同。

事實上，前述解決鬼魅問題之法，是臺灣民間流傳已久的秘方偏門，在某種程度上符合聽眾的需求與認知。再者，老人家久病多已成良醫，一般中藥西藥對其病症似已惘效而偏愛旁門左道，因此這類特殊商品頗具吸引力。

四、結緣商品加持護身

工商時間就是結緣商品推銷時間，主持人花了很多時間解釋商品的功效與神奇的效果，是一能言善道的生意人。這些關鍵詞主要都是商品（見表4），而且主持人不僅鉅細靡遺地介紹，並且宣稱使用之具有改變磁場、護身的作用。

結緣商品所以成為關鍵詞，與前述疾病與鬼魅關鍵詞息息相關。因節目中的言者提出一個聽者知之甚詳的現象與問題——疾病與鬼魅，此時這些結緣商品便成為了問題解決之道。在節目中，結緣品具有兩個功能：一是作為其自設困局的解答；一是作為牟利的工具。就前者言，言者在廣播節目中不斷宣稱我們與鬼魅魍魎共存，也不斷宣示疾病的存在；於此之際，若無大王母娘娘及周邊商品的加持，則此節目僅剩死亡與鬼魅，應無收聽率可言；因此具有法力的結緣品就成其解套的工具。後者謂其作為牟利工具，係指結緣商品販賣所得可為建廟之用。

言者說詞如：

我頭尾收一收，然後大王母娘娘金尊給她解一解，隨便打一打她，唉！爬起來整個人都輕鬆起來，……花多少，花一千塊而已，……你不要來我們這邊來做，這種事情你戴著我的項鍊，用我的鑰匙圈（A-3-1）。

再者如

茛菪哦！這是絕對避邪，一塊一百，一千塊十塊，兩千塊就二十塊，配合我們的大王母娘娘，大王母娘娘的項鍊，掛在我們胸前，慢慢戴，庇陰你們就是了，……水沉香，一盒，一斤裝的，五百元結緣，……過去我都點好香耶！我都買好幾千塊的，結緣我都買好幾千塊，現在每一分錢，對大王母娘娘都很有幫助（A-9-1）。

- 週邊商品、0800893979、鑰匙圈、茛菪淨身皂、項鍊（墜子）、金尊、七彩琉璃法寶、老山粉（檀香粉）、艾草、香（烏沉香、水沉香、烏沉香環）
- 磁場

表4：結緣品群集

最後如

七彩琉璃法寶吊在車上一把，這個磁場還比鑰匙圈、項鍊墜子那個磁場更強，因為畢竟你有花到兩千元向大王母娘娘結緣（B-12）。

五、自助者天助

此節目最弔詭的地方，在於主持人不斷要求信徒不要到林內鄉參觀建廟基地，因為多年來廟一直都沒建好，什麼都看不到，所以要求信徒，若有所求，在家裡面對著大王母娘娘的金尊來求即可，不必找她。

節目主持人是一般傳統宮廟或是神壇的負責人，因此其住家就等於是神壇，當信徒不斷前往參觀，自成其困擾，這也是她不斷要求沒事不要去其宮廟的主因。這其實不合常理。一般說來起宮建廟，都常會先選定一塊地，並且搭上一些設施作為即將建廟的標示，有時候也會先放上神明的畫像。可是信徒卻不能前往，甚至自行前往林內卻什麼都看不到，匪夷所思。暫且不論其問題在哪，但是主持人為了避免信徒前往其住處，不斷勸說大家不要前往，還要求大家不要為此舉罵她、要知恩圖報等等，用心極為良苦。事實上，面對虔誠、熱情的聽眾或者說信徒，言者也發展出一套關鍵字，且形成一「自助者天助」群集（見表 5），一種具有超越性的論述以作為回應聽者要求的語藝，在某種程度對聽者也會產生說服。

言者在一方面的說詞如

你要在家裡求哦！靠你自己求哦！靠自己求啦！向我說沒用，要向自己求，我說真的啦！有的人把這叫做走地下，你跟我說沒有用，靠自己求，真的靠你自己求，你跟我說，我就是怕人吵就是這樣（A-7-2）。

再者如

不用來到我的宮，因為我也忙碌，你……士農工商隨便你去做，大王母娘娘是希望說我們的家庭顧好，你不用因為大王母娘娘迷成這樣啦！

自己求、在家裡求就好、（沒事）不用來我們的宮、莫毀謗、福報、知恩圖報

表 5：自助者天助群集

不要來我的宮，不用！我是要法號讓你們去祈求，要幫你們的忙啦！
(B-4-1)。

六、主持人乘願而來

聽眾多稱主持人為麗萍，很多信徒看到她都說，大王母娘娘來了，她也不推辭，儼然就是大王母娘娘的化身。事實上，她說她是有發願的，是有使命的，感覺就像是乘願而來的菩薩，一個肩負使命的歷險英雌。主持人且宣稱其乘願而來的目的只是為了建宮廟，推崇大王母娘娘的靈驗，此舉也為其收取香油錢、販售商品取得了合理的藉口。由此，她不斷在節目中呼籲大家不要再攻擊她、損害其名聲，她與大家無怨無仇，不會害大家，其所言所行皆有天良，皆是為了大王母娘娘建宮起廟的大任，怎會有問題。

主持人以自許為大王母娘娘的人間代理人，也形成一圍繞在「主持人麗萍」的相關關鍵詞群集（見表 6），在節目中麗萍兩個字不斷被複誦，不斷被提起，儼然成為大王母娘娘與聽者之間的中介。主持人是遭神附身的人間菩薩、接受召喚的英雄。

實際例子如

我們無怨無仇，我不可能害你啦！大家都無冤無仇，大王母娘娘是慈悲，不然我們又不認識你了，我們大家應該都沒相欠耶！互不相欠，你在難過，但是大王母娘娘就是這樣慈悲，我說的意思你聽得懂嗎？我們大家沒有相欠啊（A-5-1）！

其次，如

我們不能亂來的，因為麗萍都沒有出門，所以你如果聽我的節目，一句要送你，我們用慈悲心來聽我的廣播，不要攻擊我，我說的完全句句屬實，本節目有大王母娘娘，別間廟沒有啦！這是拚我自己的名聲，我們不能做錯事，輸贏我都要擔待。……麗萍啊！沒錯！全世界唯一可以代表大王母娘娘（就是麗萍），不要再攻擊我了（A-5-3）。

麗萍（=大王母娘娘）、我不會害你、無怨無仇、天良、不要攻擊我、名聲

表 6：主持人麗萍群集

最後，如

我這樣走過去，遠遠看到我「大王母娘娘要來救世間人了」就向大王母娘娘，跪在地板上，拜三大拜就對了，他有感應到，親身向大王母娘娘（拜）……沒錯啦（B-4-3）！

伍、結論與後續研究

結論中乃回答本研究的目的：（一）為透過 Burke 與 Campbell 的觀點探討此荒誕宗教廣播節目中言者的語藝策略；（二）探討此節目聽者認同之形成。此外，並提出觀點進行綜合性討論。

就研究目的一言，研究者綜合六個群集，並整理出言者整體性的語藝策略。首先，這六個群集為：（一）聞聲救苦、無限靈驗的大王母娘娘；（二）老弱殘疾者藥到病除；（三）鬼魅魍魎為不幸的淵藪；（四）結緣商品加持護身；（五）自助者天助；（六）主持人乘願而來。

其次，研究者並整理言者的整體語藝策略，即前述所提之神話敘事結構：「英雄歷險、拯救世界。」換言之，前述對 Campbell「英雄歷險」內涵的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節目主持人在這六個群集中如何進行讓聽者認同的符號行動。

就「英雄歷險」內涵言，Campbell 指出英雄或是神話故事通常都有一個公式可循，即一開始一定要有一冒險的召喚，而英雄則是一定會接受歷險的召喚，在艱辛地通過第一道門檻之後，各種試煉接踵而至，可喜可賀的是英雄必能逃脫、被解救，甚至重生與復活，最後不負使命的達成任務；例如殺了巨龍、得到寶物或是抱得美人歸等等，邁向回歸之路。但是，不久之後，英雄又會再度接受歷險的召喚，踏上冒險犯難的旅程，就像著名史詩故事《奧德賽》的情節（Campbell, 1968 / 朱侃如譯，1997a）。研究者精簡圖 1 的架構，整理成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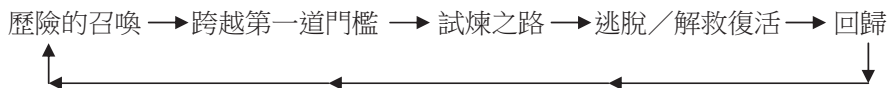


圖 2：Campbell 英雄歷險的架構簡圖

資料來源：朱侃如譯（1997a）。《千面英雄》，頁 262。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的「召喚—啟程—歷險—回歸」，是英雄歷險的神話敘事基本架構。而英雄是每一個時空都必然需要的產物，其所以出現乃在於彌補或滿足人類社會的某種缺陷與匱乏，或是人類對生活中的生、老、病、死的原因，以及對未知、未來、恐懼等等的一種自我安慰性的歸因解釋（Campbell & Moyers, 1991 / 朱侃如譯，1997b）。簡易之，英雄歷險過程中的種種冒險，是人類在大自然下生存所遭遇的恐懼（如巫、怪、龍、蛇、妖等等）以及人類對本身問題迷惑（如未來、生與死）的一種象徵性解釋或隱喻；這些隱喻表達了人類對這些問題的詮釋與解決方法，例如以成仙得道的隱喻，作為對超脫死亡的嚮往。因此，英雄歷險的模式提供了一套具解釋力的「說服策略」，且其說服可說是有效的（如從中外神話與寺廟悠久的歷史作為判斷等）。

研究者判斷本文荒誕宗教節目中言者的語藝策略也服膺於前述英雄歷險的神話敘事架構，使得言者充分展現其對聽者的說服力。此因節目中，待被解救者是一般的聽眾，英雄／解救者是大王母娘娘，主持人麗萍則是大王母娘娘在凡間的代言人／化身（也是歷險的英雄）。此廣播節目依循著英雄歷險的神話，而這種神話的敘事架構是人類文化的基石與關鍵結構，自對聽者具有吸引力（由前述群集分析中引用的逐字稿可見其端倪）。事實上，在主持人的歷險過程，串連起支持她的個別聽眾，成為歷程之路的夥伴，成為生命的共同體，也促成聽者的認同。

深入來說，透過六個群集勾勒出的言者與聽者皆熟悉的英雄歷險之神話敘事結構，也反映出言者的世界觀或終點視界。在主持人的終點視界中，隱藏著一個鬼、神二元對立的世界。就前者言，這世界充斥著各種無形的鬼魅魍魎，到處找人麻煩或是抓交替或是附身，也成為人們各種不幸與疾病的來源；就後者言，於此充滿鬼魅的天地之間，幸好主持人發現了聞聲救苦的大王母娘娘，且透過主持人發願成為大王母娘娘在世間的代言人並販售各類結緣商品下，得以協助陽間的聽眾，不僅能避邪抗魔、離苦得樂，還能助其建宮起廟來彰顯大王母娘娘的慈悲與靈驗。易言之，世俗眼光中荒誕不經的廣播節目內容與匪夷所思的建廟使命，卻是該社群眼中實質共享的世界觀、認同的來源、接受召喚與歷險的關鍵理由。

綜此，研究者認為此節目言者顯露的六個關鍵詞群集，其背後隱藏的語藝策略，實雷同與 Campbell 之英雄歷險的神話敘事結構（其歸納整理如圖 3 所示）。此圖說明了此荒誕節目中的言者化身為人類心靈中普遍嚮往或艷羨的歷險英雄或是神話故事中的主角，扣連該社群聽者內心最深沉的渴望，一同冒險，實質共享英雄遭逢的各種驚險故事，終究建立起堅實的認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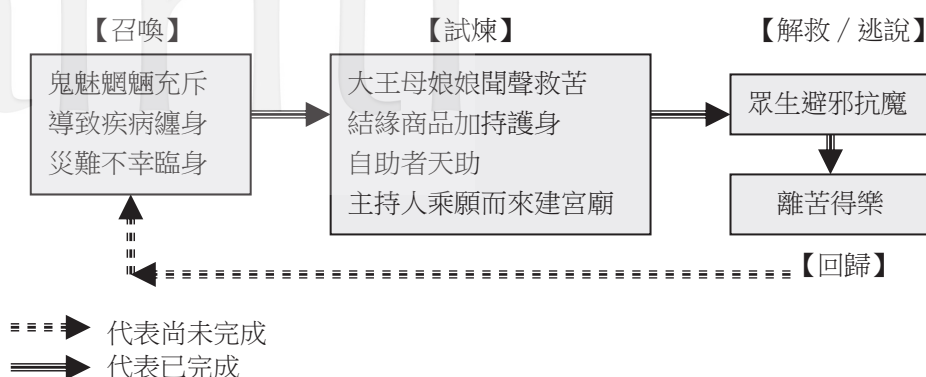


圖 3：廣播節目言者為自身建構之英雄歷險模式

人是愛聽故事、愛說故事的動物，尤其是好的故事，例如英雄、愛情、冒險、勵志、成長、驚悚等等。英雄或神話不斷傳誦，也說明了人類世界中的不同時空都須要英雄或傳奇作為精神上依賴的圖騰，一個可以讓人類感到安心的理想。英雄 / 傳奇 / 圖騰 / 理想等等，實是人類精神上的指引，荒誕廣播節目中的聽者也有同樣的渴望。

第三，再從 Burke 的神諭學觀點來看，主持人的論述仿同於 Burke 所言之基督教神學對於上帝或是宇宙論的探討，一種完全說服模式的設計。易言之，關於大王母娘娘的一切討論就是基督教對於上帝存在、神蹟等等的討論。人們透過語言認識了神學、認識了上帝，在節目中，聽者透過主持人的舌燦蓮花的言語表達，認識了新神祇大王母娘娘，並知道甚至感應了她所做的一切。鬼魅與神祇都是言者的語言所創造出的結果。

整體說來，言者的語藝策略使用回歸到人類文化中最基礎的英雄歷險的神話敘事結構，不僅反映出言者的終點視界，並以語言符號創造出大王母娘娘的真實存在與聽者實質共享，進而創造言者與聽者間的認同，以達成說服，形成社群。

就研究目的二，聽者認同的形成言，可從 Burke 的認同概念談起。Burke 指實質共享為認同的同義詞，因此言者創造形塑的一切認同策略，即為聽者認同形塑的源頭。進言之，本研究中的主持人其終點視界或世界觀與聽者重疊，因此言者在此作為接受歷險召喚的英雄、解民於倒懸的聞聲救苦之大王母娘娘的化身，則聽者縱使未能化身英雄；但是精神與金錢上的支持，也顯示他們是其價值觀或行動意義上的共享者、認同者或追隨者，遑論英雄作為一魅力名詞，本身即具共識、說服、號召與遵從等力量。因此，更可精確的說，在言者與聽者世界觀重疊

的前提下，言者正帶領聽者進行一場神話式的英雄歷險行動。此一現象正也說明聽者何以會形成抵抗外來批評的社群？又何以會不斷回購？又何以不惜花盡足當每月生活費的老人年金？

再者，言者的符號行動中建構出一個鬼魅魍魎充斥的人間，從 Burke 對語藝的定義：「人類運用文字以形成他人的態度或勸誘他人行為」來看，這個鬼魅充斥的天地也是遠古以來人類運用文字勸誘或誘騙全人類的結果，這個結果並為此節目言者所全盤承繼。

換言之，在華人宗教信仰中必然背負的鬼魅文化（或華人鬼神文化中的原罪），一種無法避免且由所有人共同承擔的罪（這些罪尚成為聽者疾病痛苦的淵藪）成為聽者形塑認同的文化背景或共享的實質。對此，言者不僅讓聽者看到自身背負的原罪，更提出一套淨化與救贖之道。其淨化之道在於結緣商品加持護身、作一位自助天助者、協助乘願而來的主持人建宮起廟等等，一起避邪抗魔。

言者鼓勵聽者淨化與救贖，其方法與 Burke 的「犧牲」、「苦行」概念相仿。在此犧牲者或是代罪羔羊為風水、魔、煞等等，透過結緣商品趨吉避凶，聽者得到解脫。換言之，言者讓聽者集體對抗無形的標的且忽視個體因為年老、生活習慣不佳、遺傳等等帶來的病因，並在聽者不斷的見證下，形塑聽者的認同。而且有趣的是，當聽者疾病愈大，則無形的力量愈強大，凝聚力向心力也就愈大，更呼應了 Burke「內在罪惡愈大，言者愈會將罪惡由『敵人』、代罪羔羊背負」的說法。

再就苦行言，其可從自我犧牲、約束本身個性言，其具體的做法就是請大王母娘娘回家供奉、膜拜，日日持誦法號，清楚知道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有那麼一日，達到聽者所追求最終的救贖——離苦得樂——不再有病痛與痛苦。言者為聽者設立了一個苦行之後的願景，也成為聽者集體認同的實質。簡言之，在華人宗教環境下，聽者透過犧牲與苦行追求的「離苦得樂」的願景，已是該社群共享的希望與認同形成的重要憑藉。

整體說來，從前述的說明便可發現聽者透過各種回饋方式，直接、間接地認同了言者的觀點，例如信仰言者建構的大王母娘娘、透過購買週邊結緣商品來化解言者所謂之鬼魅魍魎的騷擾或是聽者身上的各種病痛等等。這些言者、聽者的互動與因之共享的實質，最終都成為聽者認同形成的重要堡壘。

綜前所述，可以理解此節目主持人的荒誕行徑在世俗觀點中或許不可思議，也難以解釋；不過若從六個群集以及飽受疾病、孤單等等之苦的聽眾角度來思考，則不難理解何以他們願意認同、捐輸並與主持人一起踏上起宮建廟的歷程。

換言之，此一分析結果讓吾人知曉此一節目在世俗視之「荒誕」的眼光背後，其實也蘊含了龐大的人性與靈命關懷，這些關懷可以是本文最初強調的 **Burke** 觀點——促使聽者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一種「生存裝備」，也可以是達成言者或聽者所欲達成的強烈社會與政治目的。

其實，本文透過 **Burke** 之認同概念、對人類的定義、重生的語藝、群集批評的觀點與應用，以及 **Campbell** 英雄歷險觀點等等來解釋荒誕的宗教廣播節目的觀點，也有助於吾人理解口水氾濫的政論類型節目與偽藥處處要人命的地下電台何以迄今依舊在臺灣屹立不搖。

最後，研究者並提出兩個值得後續討論的問題。

第一，曾在上個世紀引起西方高度關注與討論的 **Campbell** 神話觀點。**Campbell** 的神話敘事結構反映出人類對生命、自然、宇宙認知的解釋，同時發掘出一種普遍存在於人心人性之中的架構。尤其，**Campbell** 將神話的主角由英雄擴展至每一個獨立個體都是自己生命歷程中的潛在英雄之後，更振奮了無數迷惘的心靈。只是不容否認的，英雄的背後尚窩藏著「反英雄」、「非英雄」的反向思索，唯在 **Campbell** 的豐富著作中或是本文論述中都缺乏對「反英雄」、「非英雄」的探索，例如英雄歷險失敗或是失敗的人生，該當如何被看待呢？換言之，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潛在英雄就是一個後續研究時值得再三檢驗是否成立的命題。

第二，本文倚重的語藝學者 **Burke**，其寫作懷抱著強烈的社會與政治目的，期待透過語言的力量，讓人類過更好的生活；而本文因多著墨於認同該荒誕廣播節目的小社群，致論文的廣度較為不足。後續若能將此類研究與臺灣社會上普存的賣藥與政論現象鏈結，則不僅提升研究視域，更能凸顯 **Burke** 在語藝研究上的苦心。

參考資料

- 朱侃如譯（1997a）。《千面英雄》。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b）。《神話：內在的旅程，英雄的冒險，愛情的故事》。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 Moyers, B.** [1991]. *The power of myth*.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 林靜伶譯（1996）。《當代語藝觀點》，臺北：五南。（原書 **Foss, S. K., Foss, K. A., & Trapp, R.**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on rhetoric*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洪文俊（1998a）。《蘭嶼核廢料爭議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語藝觀點的檢視》。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8b）。《公娼與核廢料——臺灣弱勢族群反對運動的語藝分析》，「1998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臺北。
- 高菁黛（1999）。《美伊雙方領袖論述的群集分析——以兩次波斯灣危機（1990 & 1998）為例》，「1999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臺北。
- 張卿卿、羅文輝（2007）。〈追求知識、認同或娛樂？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新聞學研究》，93：83-139。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2007）。《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上網日期：2010 年 9 月 27 日，取自 <http://140.111.34.46/cgi-bin/newDict/dict.sh?idx=dict.idx&cond=%A9%C7%A4O%B6%C3%AF%AB&pieceLen=50&fld=1&cat=&imgFont=1>
- 盛治仁（2005）。〈電視談話性節目研究——來賓、議題結構及閱聽人特質分析〉，《新聞學研究》，84：163-203。
- 陳婷玉、王舜偉（2006）。〈愚昧無知或享受參與——廣播賣藥節目的閱聽人分析〉，《傳播與管理研究》，5（2）：1-36。
- （2004）。〈邊緣的媒體或賺錢的產業？——廣播賣藥節目的媒介生態分析〉，《傳播與管理研究》，4（1）：59-84。
- 鹿憶鹿（1997）。〈導讀：尋找英雄〉，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25-31。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楊意菁（2004）。〈民意與公共性：批判解讀臺灣電視談話節目〉，《新聞學研究》，79：1-47。
- 鄭志明（2001）。〈臺灣民眾宗教信仰的生死關懷與靈驗性格〉，《輔仁宗教研究》，3：1-53。
- 閻振瀛（1997）。〈坎柏與「神話」復活——一個「後啟蒙」的趨勢〉，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7-14。臺北：立緒。（原書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ppel, E. C. (1993). Kenneth Burke: Coy theolog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 16, 99-110.
- Blankenship, J., & Sweeney, B. (1980). The 'energy' of form.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1, 172-183.

- Brummett, B. (1984). Burke's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as a method in media criticism.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 161-176.
- (1981). Burkean scapegoating, mortifica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rhetoric.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2, 254-264.
- Burke, K. (1984). *Permanence and change: An anatomy of purpos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0).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Studies in log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9a).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9b).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8). *Counter-State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6).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41).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37).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liott, K. C. (2004). A cluster analysis of Enron's code of ethics. In S. K. Foss (Ed.),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3rd ed., pp. 94-100).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Foss, K. A. (1984). Singing the rhythm blues: An argum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birth-control debat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7, 29-44.
- Foss, S. K. (2009).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4th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2004).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3r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Foss, S. K., Foss, K. A., & Trapp, R. (2002).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3r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Herrick, J. A. (2009).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4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 Hoban, J. L., Jr. (1977). Solzhenitsyn on détente: A study of 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42, 163-177.
- Kennedy, G. A. (1999). *Classical rhetoric &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2nd e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Nowlen, K., Jensen, S., Gibbs, D. A., Murphy, R. E., Taylor, M. R., & Wang, W. (2004). Construction of an enemy in George W. Bush'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In Foss, S. K. (Ed.),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3rd ed., pp. 101-108).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Reid, K. (1990). The Hay-Wain: Cluster analysi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4, 40-54.
- Wolin, R. (2001). *The rhetorical imagination of Kenneth Burk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The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in Ridiculous Religious Broadcasting Programs: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Tsai, Hong-P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dentification rhetorical strateg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listener identification in ridiculous religious broadcasting programs. The author utilizes the cluster criticism of Kenneth Burke to find clusters of key words in religious broadcasting programs, and takes Joseph Campbell's model of a hero's journey to explai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lusters. After read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artifacts, six clusters emerged. By analyzing these clusters, the author found them to be a metaphor for the structure of heroic adventures, with the speaker representing the hero or God. In fact, by using this trick, the rhetor transforms listeners into followers.

Other important concepts of Burke's thoughts, including consubstantiality, division, dissociation, naming, terministic screen, and the rhetoric of rebirth, are used to rethink the rhetorical/persuasive/identical meanings of artifacts. By doing so, the author proves that the Eastern religious culture bridges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rhetor and the listeners, and becomes the driving power in forming a community or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listeners of religious broadcasting programs.

Keywords: identification, terministic screen, the rhetoric of rebirth, cluster criticism, a hero's journey

* Email: hptsai@mail.nhu.edu.tw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論述面向

The Discourse Dimension of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V News Coverage

doi:10.6123/JCRP.2011.030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牛隆光(Lung-Guang Niu)

頁數/Page：245-26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3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論述面向^{*}

牛隆光^{**}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從新聞敘事特徵與新聞主題兩個面向，探討電視新聞台對於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操作。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調查包括東森、中天、三立及 TVBS-N 四家電視新聞台的新聞敘事特徵與不同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敘事特徵表現。本研究選擇民國 95 年 3 月 1 日、5 日、8 日、11 日、15 日及 16 日的東森、中天、三立及 TVBS-N 各一個小時整點時事新聞為樣本，經由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的方式，探討電視新聞主題與敘事文本間各變項的關係，並進行符號與敘事分析，探討電視新聞報導論述風格與論述結構的表現。經過內容分析與文本分析後，本研究發現電視新聞台操作新聞報導敘事特徵，並藉著不同的新聞報導論述風格與論述結構，做為吸引閱聽眾的利器。而一種非傳統的新聞敘事手法，就是以非倒寶塔形式的寫作方式，搭配非正常敘事速度的聽覺文本，加上現場報導的拍攝類型及特寫鏡頭構成的視覺文本，組成「綜藝化新聞」敘事文本，放在現今商業性競爭環境的電視體制脈絡下，具有相當的反省意義。

關鍵詞：新聞敘事、新聞論述、論述風格、論述結構、電視新聞

^{*} 本篇論文發表於 2009 年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研討會」，作者感謝評審老師及與會學者的指教。並感謝《傳播研究與實踐》評審老師對於本論文的指教，也感謝主編及編輯團隊專業的處理過程與態度。

^{**} Email: lgniu@mail.fgu.edu.tw

壹、緒論

新聞論述 (news discourse) 係指新聞對於時間序列裡一系列事件的報導形式，也就是一種報導時間序列事件的文本類型。從新聞敘事的觀點看新聞報導，新聞應該包含幾個部分。首先，新聞敘事結構特徵 (characteristics) 可以分為故事 (story) 與論述 (discourse) 兩個形式面向，這兩個形式面向並不是截然劃分的兩個分立面向，而是互有相關的面向 (蔡琰、臧國仁，1999)。而所謂的新聞論述，就是一種如何說新聞 (how to story the news) 的方式，著重在敘事形式的表達。因此，新聞敘事特徵與新聞的論述形式具有密切關係 (Chatman, 1978)。

Bal (1997, 2004) 認為，敘事結構的辨識首重敘事理論的建構，而敘事理論受到結構主義影響甚深。近年來，新聞敘事的研究也相當強調論述結構或風格面向的討論 (e.g., 臧國仁、蔡琰，2010)。新聞敘事的論述面向視新聞報導為新聞事件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或再述 (restorying)，新聞報導不同於新聞事實 (蔡琰、臧國仁，1999; Kenyon, 2002; Kenyon, Ruth, & Mader, 1998)。因此，新聞的研究強調對於新聞報導的敘事結構研究，尤其是「形式特徵」的研究面向 (Josselson, 2007)。

電視新聞敘事結構的研究，係有關攝影、剪接、聲音與影像等影音符號的配置，這是敘事特徵的研究重點 (Zettl, 2006)。新聞報導被視為是一種「產品」，新聞敘事特徵有其獨特的「形式特徵」。根據 Harcup (2004) 的研究顯示，新聞報導的採訪，係以新聞主題進行「分類」。因此，不同新聞主題的新聞報導，就有不同的「形式特徵」。而新聞報導敘事特徵就是新聞論述形式的表現，不同的新聞主題會有不同的敘事特徵，具有獨特的新聞報導「形式特徵」及文本特質 (Gant & Dimmick, 2000)。

從文類 (genre) 的觀點來看，新聞報導是一個類型的文類，而電視新聞報導則是新聞報導文類家族的一員。到底，電視新聞報導在新聞主題與新聞敘事的運用上，具有什麼關係？電視新聞報導呈現什麼論述形式？不同電視新聞台及不同電視新聞報導是否具有不同的論述特徵？電視新聞報導論述特徵的文本特質為何？就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面向。

貳、文獻檢閱

根據學者的研究，新聞敘事文本可以分為視覺文本與聽覺文本，不同的電視新聞主題會有不同的敘事風格。因此，才會有感官新聞（sensationalism news）與非感官新聞（non-sensationalism news）的分別（Ekström, 2000; Grabe, Lang, & Zhao, 2003）。依據上述學者的研究，新聞記者對於不同新聞主題的新聞敘事文本，會有不同的報導及寫作策略。由於電視媒體為首重視覺的新聞媒體，因此視覺文本較聽覺文本重要。

視覺文本係由攝影機運動、鏡頭的角度與框限的運作結果，構成了一幅幅的「影像」（images）。所謂的影像，係由印象記號（impressional sign）所組成。依據符號學的概念，記號可以分為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兩個層面（Bloor & Wood, 2006）。記號如果像是一枚硬幣，那麼意符與意指就像是硬幣的兩面，雖然異面但同體。意符就是符號具，也就是代表外在真實的形象，不管這個外在真實的東西是實體或意念，都可以用具有形象的符號具指稱出來。而意指也就是符號義，係指符號具所代表的概念，這個概念依附在形象上，藉此傳達出來。當符號出現時，形象與概念恰如一體兩面的硬幣，表現出符號的功用（Delanty, 1997）。

依據解構主義的看法，符號義只是第一層的符號概念，可以稱為符號的外延意義（connotation）；但是，符號的運用完全視社會脈絡及文化環境而定，從此演化出第二層的符號意義，可以稱之為內涵意義（denotation）。譬如說，玫瑰的第一層意義為鮮花，第二層意義則可以表示愛情。越是演化成熟的符號與演化成熟的文化，符號的內涵意義越豐富（Delanty, 2000）。

從新聞論述的角度來看，電視新聞報導影音符號是賦予新聞事件意義的工具。電視新聞報導所傳達的符號意義，並不一定只是符號外指的表面外延意義，更可能是符號具衍生而出的內涵意義。可以說，電視新聞報導是意識形態機制重要的一環，也是傳達符號意義的重要工具。這樣的意義傳達，往往經由表面的電視新聞符號的論述形式，進而衍生出符號背後的社會意義（Cremedias & Chew, 1994）。

攝影機運動、攝影角度與攝影框限構成符號語言，成為電視新聞報導產製影像符號的工具。這樣的符號語言，成為新聞論述的形式要件，營造出論述結構（discourse structure）與論述風格（discourse style），如果再搭配記者寫作的新聞元素，以及版面編排的框架，就是具有特定論述風格特徵的新聞文本（Delanty, 1997, 2000）。

Taylor & Willis (1999) 認為，敘事是無所不在的文本現象，不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敘事結構，都適用於所有的論域文化實踐（discursive cultural practices），譬如說，對話（conversation）、宗教（religion）、歷史（history）、舞蹈（dance）、詩學（poetry）及劇場（theatre）等論述領域，當然也包括新聞報導所處的論述領域。另方面，新聞論述也具有互文性的特性，不同新聞文類（genre）的文本，其新聞論述的敘事結構，包括論述結構與論述風格，都有互相傳承及演變的特性。

所謂的論述結構，係指前述的攝影機運動、拍攝角度與框限等論述結構的形式特徵。而所謂的敘事風格，係指每一個新聞報導的論述結構發展，都有不同的論述風格。

對於電視新聞報導而言，新聞裡也有不同的論述結構與論述風格。雖然說，敘事理論與論述觀點違反電視新聞報導的「客觀、中立」觀點。但是，敘事理論論述觀點仍是分析電視新聞報導的適當工具。原因在於，電視新聞報導的影像拍攝與剪輯，具有像語言那樣的線性性質，具有敘事與論述的特徵。也就是說，從敘事與論述的觀點檢視電視新聞報導，論述結構與論述風格是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論述形式的兩個重點。以下，將提出本研究的具體問題。

一、問題一：不同電視新聞台的電視新聞報導是否具有不同的新聞論述風格？

電視新聞的報導形式，跟報紙新聞報導一樣，有所謂的「倒寶塔寫作風格」（Inverted-Pyramid Style）。因此，文字記者採訪新聞事件後，必須經過撰寫的過程，將「事件」轉變成「新聞」。而且，新聞稿的寫作由導言先寫出新聞重點，以下各段再按時序或重要性，依序寫出新聞事件的各項次要重點（王洪鈞，2000；羅文輝，1991）。所謂的新聞重點，包括了「5W1H」等因素。一篇好的新聞稿，要把誰（Who）、在什麼時間（When）、在哪裡（Where）、發生什麼事（What）、事件發生的原因（Why）、如何善後（How）等「5W1H」因素妥善交代。

但是，隨著電視新聞報導形式的改變，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的寫作形式或說故事方式（story-telling type）的形式，成為新聞報導的主要報導形式（Langer, 1998）。這種新聞寫作方式，成為一種黃色新聞的寫作方式。新新聞學的新聞寫作形式，強調說故事的形式，而不是傳統的倒寶塔寫作形式。近年來，臺

灣的電視新聞報導，流行以創新的「說故事」敘事手法處理新聞。不同的電視新聞媒體對於新聞報導形式的操作，則有不同的論述形式。因此，不同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論述形式有不同的表現。由此看來，本研究的假設一之一如下：

假設一之一：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報導形式，會有差異存在。

電視新聞不但是報導形式變得更像說故事，就連電視新聞報導的敘事步調也加快（fast pace）了。Calacrese 認為電視新聞媒體播放新聞的時間有限，為了容納更多的新聞，新聞節奏往往加快。而這樣的新聞處理，就會忽略了對於新聞事件完整面向的詳細報導。因為，這樣的新聞報導往往捨棄一些新聞細節，導致事件的交代產生偏頗（Calacrese, 2000）。不過，不同的新聞媒體對於新聞報導的定位不同，新聞節奏的掌握也不相同。因此，新聞媒體會有不同的「產品」論述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一之二如下：

假設一之二：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會有差異存在。

近年來，電視新聞報導拍攝的類型，重點也逐漸注重現場報導（on-site reporting）的方向發展。電視新聞媒體強調對於影像（images）的現場報導，對於遠方（地）的新聞，也會報導新聞事件的精采動態過程。但是此類的新聞報導，係以強調新聞事件的動態精采過程為主。新聞報導卻忽略了對於新聞事件的社會意義面報導，甚至也忽略了對於新聞事件起因與對於新聞事件真相的探討（Calabrese, 2000）。

電視新聞報導拍攝新聞事件的精采過程，新聞報導的拍攝類型可以分為「乾稿」、「人物拍攝」、「示意影片」、「現場拍攝」、「電腦動畫或圖片」等不同的拍攝類型。由於電視新聞報導進行時，可能有採用一種以上的「鏡頭類型」。因此，不同的電視新聞媒體對於新聞發生的拍攝重點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電視新聞帶拍攝類型出現。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一之三如下：

假設一之三：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拍攝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電視新聞的鏡頭運用，也是電視新聞報導類型的一個重點。電視新聞是以影像符號為重的媒體，影像符號的表達是觀眾了解電視新聞的第一條通道。電視新聞報導的影像的表達，可以分為攝影機運動與鏡頭運用兩大類。而鏡頭運用的類型，可以分為攝影角度（camera angle）與攝影框限（photo frame）。而攝影機鏡頭的運用，又分為全景鏡頭、中景鏡頭及特寫鏡頭三大類。所以，電視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以主要的新聞整體上處理趨勢為主。不同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對於電視新聞報導鏡頭運用的類型，可能有不同的考量，呈現出不同的論述形式。所以說，本研究的假設一之四如下：

假設一之四：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聞報導不是「客觀、中立」(objectivity & natural)地存在，而是新聞媒體「有意圖及社會建構」(intentional & social constructive)的結果 (Westin, 1982)。因此，不同電視新聞台的電視新聞報導拍攝的類型，將會因為新聞媒體的不同意圖與建構機制，而呈現不同的電視新聞報導拍攝類型的取捨結果。因此，電視新聞報導的敘事特徵就會因為電視新聞台的操作，而有不同的論述形式表現。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為：

假設一：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敘事特徵論述風格，會有差異存在。

二、問題二：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是否具有不同的新聞論述風格？

電視新聞本身就是一種電視媒體生產的文類，這樣的文類來自於報紙、廣播新聞的演化。可以說，電視新聞報導、報紙新聞報導及廣播新聞報導文本間，彼此間具有互文性的關係。也就是說，電視新聞報導、報紙新聞報導及廣播新聞報導的文本，具有某種的文類共同性 (Bignell & Orlebar, 2005)。雖然說，各種新聞報導文本間有相同的文本特徵，特別是在形式 (format) 的方面。但是，文類的形式會因為時間的變遷，而產生改變。文類的概念容許改變，因為文類具有相似性、模仿性、變化性等特性，可以容許文類間文本特徵的轉變。

不同的電視新聞報導類目，雖然是電視新聞文類家族的一員，但是仍有某些特別的文本特徵。因此，電視新聞記者撰寫政治新聞、經濟新聞、社會新聞或體育新聞，雖然遵守新聞採訪、寫作的「常規」與「風格」，但是不同類目仍有文本特徵的差異。而不同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形式，各有不同的論述形式。因此，不同新聞主題的新聞報導的論述形式，也會有不同的表現。由此看來，本研究的假設二之一如下：

假設二之一：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報導形式，會有差異存在。

文類的研究，就是確立常規 (convention) 文本，區分不同的文本特徵。文本研究可以經由將文本的特徵與閱聽眾的期待連結，確立文本家族的主要特徵，並連結某一文本與另一文本的特徵，探討文本間的互文性關係。甚至，文本的概念不只是新聞報導文本而已，電視新聞採訪過程裡，也必須遵守新聞採訪的「常規」，這些「常規」成為生產電視新聞報導文本特徵一部分。

基本上，電視新聞記者採訪新聞事件，將新聞事件轉化為新聞報導。新聞報導牽涉到新聞敘事的問題，是有報導的進行節奏型態。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新聞專業「常規」具有文本的特徵，成為電視新聞報導文本特徵的一部分。而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會因為新聞報導主題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進行節奏表現。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二之二、二之三如下：

假設二之二：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進行節奏，會有差異存在。

假設二之三：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拍攝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電視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也就是攝影框限，包括了大特寫（*extreme closeup*）、特寫（*close up*）、中景（*medium*）、遠景（*long shot*）及大遠景（*extreme long shot*）等（Zettl, 2006）。不同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對於鏡頭類型的取捨，應該會有不同的考量。所以說，本研究的假設二之四如下：

假設二之四：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鏡頭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文類也具有家族（*family*）的特性，各種具有相同特徵的文類，屬於同一家族的文類系統。以電視節目文類（*television program genre*）為例，包括新聞（*news*）文類、戲劇（*drama*）文類、體育（*sports*）文類或娛樂（*entertainment*）文類節目，都是電視節目文類家族的一員。而電視新聞報導也和報紙新聞報導、廣播新聞報導一樣，具有相似的文本特徵，也是新聞報導文類家族的一員。因此，文類也具有階層（*hierarchies*）的特性，文本間具有傳承與轉變的特性（Mittel, 2004）。

另外一種文類的概念，就是新聞主題的概念。不同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具有文類的相同特徵。對於電視新聞報導文類而言，不同的電視新聞報導主題，也具有不同的文本特徵。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

假設二：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論述風格，會有差異存在。

三、問題三：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新聞論述風格文本表現及論述結構所處的脈絡情境？

王泰俐（2004）認為，電視新聞主題可以從是否為感官新聞（*sensationalism news*）作為區分標準，所謂的感官新聞，係指以刺激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news content*）或新聞形式（*news forms*），作為刺激閱聽人閱聽經驗的新聞報導方式。往往，感官新聞偏向以辛辣聳動的新聞主題及令人目眩的數位製作形式，刺激閱聽人的感官與閱聽經驗，吸引閱聽人的注意。

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在論述形式方面的討論，可以分成論述風格與論述結構兩個面向。論述風格包括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等影像進行的外顯的影像運用形式，這些影像的運用形式所具有的風格特徵，就是所謂的論述風格。另方面，從論述風格的文本層面往外檢視，可以發現文本與社會情境有密切關係，這就是社會脈絡面向的探討，可以稱為論述結構面向的研究。

閱聽人關注新聞報導論述風格的變化，接受論述文本的感官刺激。而論述文本的累積，形成獨特的論述結構，處在獨特的社會情境，形成獨特的論述脈絡。可以說，論述文本與論述結構式不同層面的新聞論述面向。以下，將討論分析電視新聞報導論述風格與論述結構的研究方法。

參、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部分分成三個小節，第一小節將先陳述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的架構；第二小節接著說明研究對象，以及選擇研究對象的原因；第三小節交代研究步驟。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希望經由量化的內容分析法與質化的論述分析法 (Bloor & Wood, 2006)，解讀電視新聞報導主題與新聞論述的關係（見圖 1）。依據文獻討論的結果，本研究從不同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論述差異、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論述差異及不同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論述文本表現等三個面向進行分析。不同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論述類型差異分析方面，針對四家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等四項論述特徵，進行交叉分析；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論述差異分析方面，針對不同電視新聞主題的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等四項論述特徵，進行交叉分析；不同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論述文本表現的分析方面，則針對四家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文本，進行文本面向與脈絡面向的分析。

雖然本研究在各電視新聞台取樣的新聞報導樣本，並非同一時段的新聞文本。但是電視新聞整點報導皆為重複播報前面時段的新聞，同一日內不同時段新聞內容的同質性很高，所以做為分析的對向，仍舊能看出不同電視新聞台或新聞主題的新聞報導間新聞風格的差異性。另方面，從文本的概念來看，特徵係具有某種特殊類型的文本所表現出的文本特徵，這些文本特徵具有普遍性，不會因為電視新聞播出時段不同，而呈現出不一樣的差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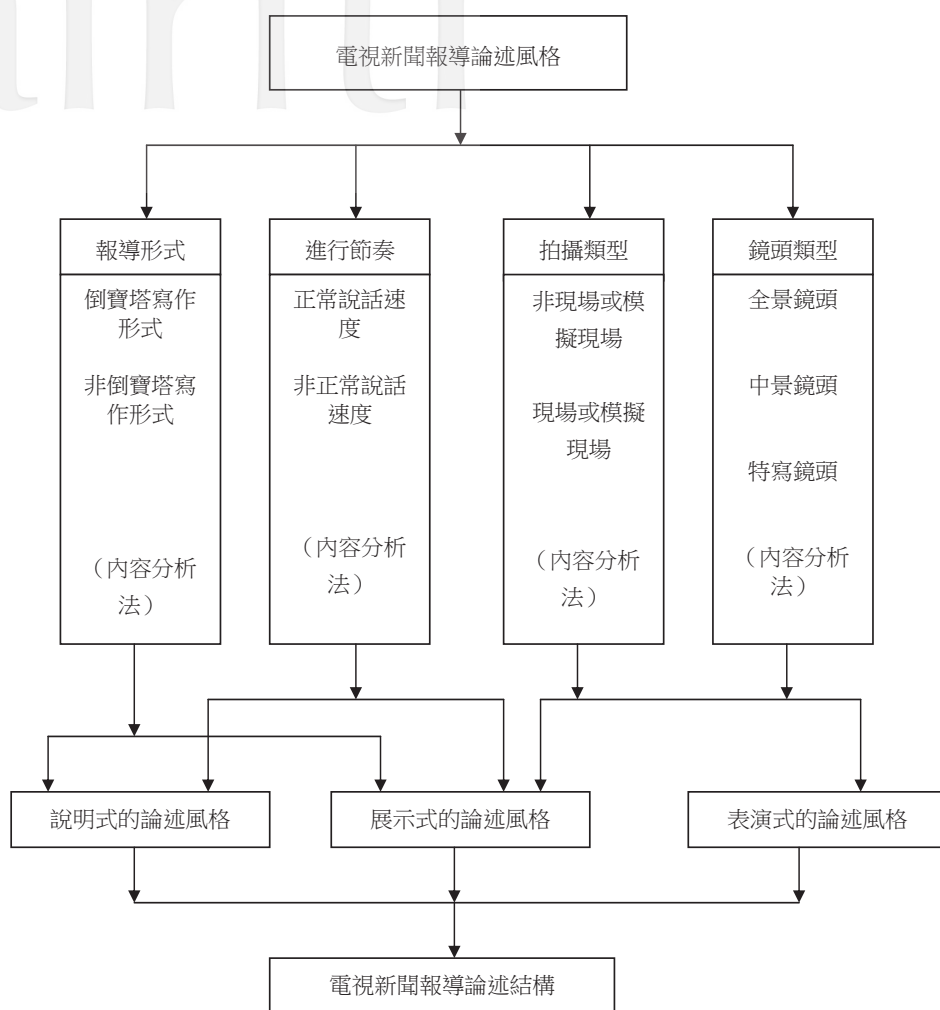


圖 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研擬。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係從論述風格的研究面向出發，探討不同電視新聞台或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的文本特徵，進而加入社會情境的分析，分從說明、展示及表演三個新聞論述風格面向，探討新聞背後呈現的脈絡意義，最後並闡述新聞論述結構的內涵，整合文本與脈絡面向的論述風格與論述結構，探討電視新聞報導論述面向的风格與結構問題。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析東森新聞、中天新聞、三立新聞及 TVBS-N 等四家衛星電視頻道新聞台的電視新聞報導文本，並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四家電視台在 95 年 3 月 1 日、5 日、8 日、11 日、15 日及 16 日等六天的電視新聞，並抽取部分時段電視新聞為樣本（具體樣本詳見表 1）。

取樣日期	電視台別			
	東森新聞台	中天新聞台	三立新聞台	TVBS-N
3 月 01 日	0000-0100	0700-0800	1200-1300	-
3 月 05 日	-	0700-0800	1200-1300	-
3 月 08 日	0700-0800	1200-1300	-	-
3 月 11 日	1200-1300	1900-2000	-	0700-0800
3 月 15 日	-	-	0000-0100	0700-0800
3 月 16 日	-	-	-	1200-1300

表 1：電視新聞報導取樣時段

本研究選取上述電視新聞台的原因，係因為上述四家電視新聞台為主要的電視新聞台，並在收視率排行上，名列比較前的排名，收視的閱聽眾相對而言比較多（AC Nielsen, 2006）。因此，本研究選取上述四家電視新聞台為抽樣對象。選取的時段方面，因為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所以採取立意抽樣方式，採早上、中午、晚上及夜間四個時段輪流抽取的方式，抽取四家電視新聞台的四個時段電視新聞報導文本。而抽取的電視新聞報導則數如表 2。

取樣日期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新聞台	中天新聞台	三立新聞台	TVBS-N	
3 月 01 日	25 則	29 則	31 則	-	85 則
3 月 05 日	-	39 則	29 則	-	68 則
3 月 08 日	29 則	20 則	-	-	49 則
3 月 11 日	35 則	25 則	-	34 則	94 則
3 月 15 日	-	-	33 則	44 則	77 則
3 月 16 日	-	-	-	37 則	37 則
合計	89 則	113 則	93 則	115 則	410 則

表 2：電視新聞報導各時段抽取則數

三、分析框架與類目建構

本研究的内容分析類目編碼框架如下：

（一）報導形式

所謂的「報導形式」，係指報導的寫作形式，也就是電視新聞稿的寫作形式。

1. 倒寶塔寫作形式：所謂的「倒寶塔寫作形式」，係指電視新聞報導的寫作，以導言最重要，以下各段則以時序或重要性排列的寫作方式。
2. 非倒寶塔寫作形式：所謂的「非倒寶塔寫作形式」，係指電視新聞報導的寫作，不以倒寶塔寫作形式為之。

（二）進行節奏

所謂的「進行節奏」，係指電視新聞報導的播報速度或影像流動的速度。

1. 正常說話速度：所謂的「正常說話速度」，係指電視新聞報導的播報速度為每秒鐘五字以下的播報速度。
2. 非正常說話速度：所謂的「非正常說話速度」，係指電視新聞報導的播報速度為每秒鐘五字或以上的播報速度，同時聽起來的感覺不同於一般人講話的速度播報。

（三）拍攝類型

所謂的「拍攝類型」，係指電視新聞報導拍攝對象的場景類型。

1. 非現場或非模擬現場：所謂的「非現場或非模擬現場」，係指電視新聞報導拍攝的場景，係以示意影片或乾稿等方式播出。
2. 現場拍攝：所謂的「現場或模擬現場拍攝」，係指電視新聞報導拍攝的場景係在新聞現場直接拍攝，或模擬現場拍攝，甚至是以電腦動畫的拍攝方式。

（四）鏡頭類型

所謂的「鏡頭類型」，係指電視新聞拍攝鏡頭的取鏡框架。

1. 全景鏡頭：所謂的「全景鏡頭」，係指電視新聞拍攝鏡頭的取景框架，係以現場全景的拍攝為取材框架。
2. 中景鏡頭：所謂的「中景鏡頭」，係指電視新聞拍攝鏡頭的取景框架，係以現場人物的全身或半身為拍攝的取材框架。

3. 特寫鏡頭：所謂的「特寫鏡頭」，係指電視新聞拍攝鏡頭的取景框架，係以現場人物的頭部、臉部或身體部分器官為拍攝的取材框架。

內容分析的類目建構方面，本研究針對電視新聞敘事特徵的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等四項敘事特徵變項進行測量，報導形式變項分為倒寶塔寫作形式、非倒寶塔寫作形式兩個尺度，進行節奏變項分為正常新聞播報速度、非正常新聞播報速度兩個尺度，拍攝類型變項分為、兩個尺度，鏡頭類型變項分為全景鏡頭、中景鏡頭與特寫鏡頭三個尺度。另將上述四個變項合為敘事特徵變項，此變項係由上述五個變項加總後求平均數而得，計算後的變項分為低頻率出現（平均數為含 1.25 以下）、中頻率出現（平均數為 1.25 以上至含 1.50）、高頻率出現（平均數為 1.5 以上）三個尺度。

肆、資料分析

以下，將依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進一步驗證各項假設。

一、假設一之一：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報導形式，會有差異存在

經過資料分析後，得到表 3 的資料。其中，三立新聞台的非倒寶塔形式新聞報導有 17 則，佔 18.3%，為四家電視台之最；中天新聞台以 14 則（12.4%）的非倒寶塔形式新聞報導數量居次；TVBS-N 及三立新聞台則分別有 7 則（6.1%）及 4 則（4.5%）的倒寶塔形式新聞報導，出現的頻率較低。不同電視新聞台在新聞報導形式的差異度方面，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chi^2 = 12.458, p < .05$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電視新聞台在新聞報導形式方面，各有不同的偏好，假設一之一獲得證實。

報導形式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	中天	三立	TVBS-N	
倒寶塔形式	85(95.5)	99(87.6)	76(81.7)	108(93.9)	368(89.8)
非倒寶塔形式	4(4.5)	14(12.4)	17(18.3)	7(6.1)	42(10.2)
合計	89(100)	113(100)	93(100)	115(100)	410(100)

表 3：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形式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12.458, df = 3, p = .006$.

二、假設一之二：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台除了新聞報導形式的差異性外，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是否也會有差異性。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4），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進行節奏的差異方面，三立電視台新聞報導非正常進行節奏的新聞稿有 14 則（15.1%），出現的比率最大；中天新聞台非正常進行節奏的新聞稿則有 11 則（9.7%），也高於所有電視台的平均數（8.8%）；TVBS-N 新聞台則有 9 則（7.8%）這類新聞稿；東森新聞台只有 2 則（2.2%）新聞報導為非正常進行節奏的新聞稿，比率最低。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比較方面（ $\chi^2 = 9.572, p < .05$ ），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一之二獲得證實。

進行節奏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	中天	三立	TVBS-N	
正常進行節奏	87(97.8)	102(90.3)	79(84.9)	106(92.2)	374(91.2)
非正常進行節奏	2(2.2)	11(9.7)	14(15.1)	9(7.8)	36(8.8)
合計	89(100)	113(100)	93(100)	115(100)	410(100)

表 4：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進行節奏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9.572, df = 3, p = .023$ 。

三、假設一之三：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拍攝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拍攝類型，是否具有差異性。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5），不同電視新聞台在新聞報導拍攝類型的比較方面，東森電視台現場或模擬現場新聞報導有 57 則，佔有 64.8%，比率最高；TVBS-N 電視新聞台出現 57 則（50.0%）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新聞報導；三立新聞台的新聞稿有 45 則（48.9%）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新聞報導；中天新聞台則有 42 則（37.2%）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新聞報導。綜合以上資料顯示，四家電視新聞台現場的新聞報導比較方面（ $\chi^2 = 15.109, p < .003$ ），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一之三獲得證實。

拍攝類型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	中天	三立	TVBS-N	
非現場或非模擬現場	31(35.2)	71(62.8)	47(51.1)	57(50.0)	206(50.6)
現場或模擬現場	57(64.8)	42(37.2)	45(48.9)	57(50.0)	201(49.4)
合計	88(100)	113(100)	92(100)	114(100)	407(100)

表 5：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拍攝類型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15.109$, $df = 3$, $p = .002$.

四、假設一之四：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是否具有差異性。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6），四家電視新聞台在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的比較方面，中天出現以特寫鏡頭為主的新聞報導有 28 則（24.8%），比率最高；東森新聞台則有 11 則（12.4%）以特寫鏡頭為主的新聞報導；三立新聞台則有 10 則（10.8%）的新聞報導以特寫鏡頭為主；TVBS-N 新聞台的新聞稿則僅有 11 則（9.6%）的新聞報導以特寫鏡頭為主。四家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鏡頭類型的比較方面（ $\chi^2 = 27.644$, $p < .001$ ），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一之四獲得證實。

鏡頭類型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	中天	三立	TVBS-N	
以全景為主	7(7.9)	26(23.0)	13(14.0)	14(12.2)	60(14.6)
以中景為主	71(79.8)	59(52.2)	70(75.3)	90(78.3)	290(70.7)
以特寫為主	11(12.4)	28(24.8)	10(10.8)	11(9.6)	60(14.6)
合計	89(100)	113(100)	93(100)	115(100)	410(100)

表 6：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鏡頭類型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27.644$, $df = 6$, $p = .000$.

五、假設一：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敘事特徵，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敘事特徵，是否也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7），中天新聞台新聞報導的敘事特徵，出現 21 則（18.6%）高頻率敘事特徵的新聞稿件，不符合新聞專業的新聞敘事特徵處理頻率最高。三立新聞台

也有 12 則 (13.0%) 新聞稿，出現高頻率的敘事特徵；TVBS-N 新聞台則有 14 則 (12.3%) 的新聞稿，出現高頻率的敘事特徵；東森新聞台的新聞稿只有 9 則 (10.2%) 的新聞稿，出現高頻率的敘事特徵。四家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敘事特徵比較方面 ($\chi^2 = 16.671, p < .05$)，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一獲得證實。

敘事特徵	電視台別				合計
	東森	中天	三立	TVBS-N	
低頻率出現	29(33.0)	56(49.6)	33(35.9)	55(48.2)	173(42.5)
中頻率出現	50(56.8)	36(31.9)	47(51.1)	45(39.5)	178(43.7)
高頻率出現	9(10.2)	21(18.6)	12(13.0)	14(12.3)	56(13.8)
合計	88(100)	113(100)	92(100)	114(100)	407(100)

表 7：電視新聞台新聞報導敘事特徵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16.671, df = 6, p = .011$ 。

六、假設二之一：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報導形式，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報導形式方面，是否也會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8），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稿報導形式，以體育娛樂類新聞主題出現 12 則 (27.9%) 非倒寶塔寫作形式的新聞稿件最多；如果不算其他類新聞，地方新聞則以 5 則 (17.2%) 居次；教科文化類新聞也有 4 則 (10.3%)，皆高於所有電視新聞報導主題出現非倒寶塔寫作特徵的平均數 (10.2%)。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報導形式比較方面 ($\chi^2 = 28.198, p < .001$)，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二之一獲得證實。

報導形式	新聞主題							合計
	政經國際	教科文化	地方新聞	社會新聞	生活消費	體育娛樂	其他	
倒寶塔形式	103 (97.2)	35 (89.7)	24 (82.8)	100 (93.5)	34 (94.4)	31 (72.1)	41 (82.0)	368 (89.8)
非倒寶塔形式	3 (2.8)	4 (10.3)	5 (17.2)	7 (6.5)	2 (5.6)	12 (27.9)	9 (18.0)	42 (10.2)
合計	106 (100)	39 (100)	29 (100)	107 (100)	36 (100)	43 (100)	50 (100)	410 (100)

表 8：不同電視新聞主題報導形式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28.198, df = 6, p = .000$ 。

七、假設二之二：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進行節奏，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進行節奏方面，是否也會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9），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稿進行節奏，以體育娛樂類新聞主題出現 6 則（14.0%）非正常進行節奏的新聞稿件最多；教科文化類新聞也有 5 則（10.3%）；如果不算其他類新聞，社會新聞則以 11 則（10.3%）；皆高於所有電視新聞報導主題出現非正常進行節奏特徵的平均數（8.8%）。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進行節奏比較方面（ $\chi^2 = 7.535, p = .274$ ），差異性未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二之二沒有獲得證實。

進行節奏	新聞主題							合計
	政經國際	教科文化	地方新聞	社會新聞	生活消費	體育娛樂	其他	
正常進行節奏	102 (96.2)	34 (87.2)	28 (96.6)	96 (89.7)	33 (91.7)	37 (86.0)	44 (88.0)	374 (91.2)
非正常進行節奏	4 (3.8)	5 (12.8)	1 (3.4)	11 (10.3)	3 (8.3)	6 (14.0)	6 (12.0)	36 (8.8)
合計	106 (100)	39 (100)	29 (100)	107 (100)	36 (100)	43 (100)	50 (100)	410 (100)

表 9：不同電視新聞主題進行節奏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7.535, df = 6, p = .274$ 。

八、假設二之三：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拍攝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拍攝類型方面，是否也會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10），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稿拍攝類型，以地方新聞主題出現 16 則（55.2%）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新聞稿件最多；社會新聞則以 58 則（54.2%）居次；生活消費及教科文化類新聞則分別有 19 則（52.8%）及 20 則（51.3%）分列為三、四位，皆高於所有電視新聞報導主題出現現場或模擬現場特徵的平均數（49.4%）。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拍攝類型比較方面（ $\chi^2 = 3.882, p = .693$ ），差異性沒有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二之三沒有獲得證實。

拍攝類型	新聞主題							合計
	政經國際	教科文化	地方新聞	社會新聞	生活消費	體育娛樂	其他	
非現場或非模擬現場	57 (54.3)	19 (48.7)	13 (44.8)	49 (45.8)	17 (47.2)	26 (60.5)	25 (52.1)	206 (50.6)
現場或模擬現場	48 (45.7)	20 (51.3)	16 (55.2)	58 (54.2)	19 (52.8)	17 (39.5)	23 (47.9)	201 (49.4)
合計	105 (100)	39 (100)	29 (100)	107 (100)	36 (100)	43 (100)	48 (100)	407 (100)

表 10：不同電視新聞主題拍攝類型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3.882$, $df = 6$, $p = .693$.

九、假設二之四：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鏡頭類型，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鏡頭類型方面，是否也會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11），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稿鏡頭類型，以生活消費類新聞主題出現 14 則（38.9%）以特寫鏡頭為主的新聞稿件最多；其次則為教科文化類新聞有 7 則（17.9%）；社會新聞類新聞主題也有 16 則（15.0%）；這幾類新聞主題的以特寫為主新聞報導數量皆高於平均數（14.6%）。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鏡頭類型比較方面（ $\chi^2 = 25.176$, $p < .014$ ），差異性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二之四獲得證實。

鏡頭類型	新聞主題							合計
	政經國際	教科文化	地方新聞	社會新聞	生活消費	體育娛樂	其他	
以全景為主	13 (12.3)	6 (15.4)	5 (17.2)	17 (15.9)	2 (5.6)	9 (20.9)	8 (16.0)	60 (14.6)
以中景為主	80 (75.5)	26 (66.7)	23 (79.3)	74 (69.2)	20 (55.6)	30 (69.8)	37 (74.0)	290 (70.7)
以特寫為主	13 (12.3)	7 (17.9)	1 (3.4)	16 (15.0)	14 (38.9)	4 (9.3)	5 (10.0)	60 (14.6)
合計	106 (100)	39 (100)	29 (100)	107 (100)	36 (100)	43 (100)	50 (100)	410 (100)

表 11：不同電視新聞主題鏡頭類型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25.176$, $df = 12$, $p = .014$.

十、假設二：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敘事特徵，會有差異存在

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敘事特徵方面，是否也會有差異性呢？根據資料顯示（見表 12），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新聞稿敘事特徵，以教科文化類新聞主題出現 9 則（23.1%）高頻率敘事特徵的新聞稿件最多；生活消費類新聞則以 7 則（19.4%）高頻率敘事特徵的新聞稿件居次；如果不算其他類新聞，體育娛樂類新聞及社會新聞則分別有 6 則（14.0%）及 15 則（14.0%），皆高於強頻率敘事特徵平均數（13.8%）。不同電視新聞報導主題的敘事特徵比較方面（ $\chi^2 = 17.996, p = .116$ ），差異性未達到顯著程度，假設二沒有獲得證實。

敘事特徵	新聞主題							合計
	政經國際	教科文化	地方新聞	社會新聞	生活消費	體育娛樂	其他	
低頻率出現	55 (52.4)	16 (41.0)	13 (44.8)	41 (38.3)	8 (22.2)	17 (39.5)	23 (47.9)	173 (42.5)
中頻率出現	43 (41.0)	14 (35.9)	12 (41.4)	51 (47.7)	21 (58.3)	20 (46.5)	17 (735.4)	178 (43.7)
高頻率出現	7 (6.7)	9 (23.1)	4 (13.8)	15 (14.0)	7 (19.4)	6 (14.0)	8 (16.7)	56 (13.8)
合計	105 (100)	39 (100)	29 (100)	107 (100)	36 (100)	43 (100)	48 (100)	407 (100)

表 12：不同電視新聞主題敘事特徵比較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字。

$\chi^2 = 17.996, df = 12, p = .116$.

十一、問題三：電視新聞報導新聞論述風格的文本表現與論述結構的社會脈絡

電視新聞報導的論述文本表現部分（見圖 2），報導形式的表現方面，三立新聞台及體育娛樂類新聞強調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這類的新聞寫作方式，強調以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方式，或是以展示表演（performance-display）的方式，進行電視新聞的報導。比較常見的作法是：採訪記者擔任說故事的「敘事者」（narrator），以說故事的方式，演說新聞事件。甚至，記者也可以化身為新聞事件的「參與者」（partner）或「旁觀者」（observer），成為新聞事件某種程度的「行動者」（actor），進而對閱聽眾進行展示或表演的工作。

電視新聞報導進行節奏的表現方面，三立新聞台及體育娛樂類新聞也以非正常說話速度的新聞陳述方式，進行新聞報導的進行節奏。這類的新聞陳述方式，強調以稍快或稍慢語調，或是以變音播報的方式，進行電視新聞報導的陳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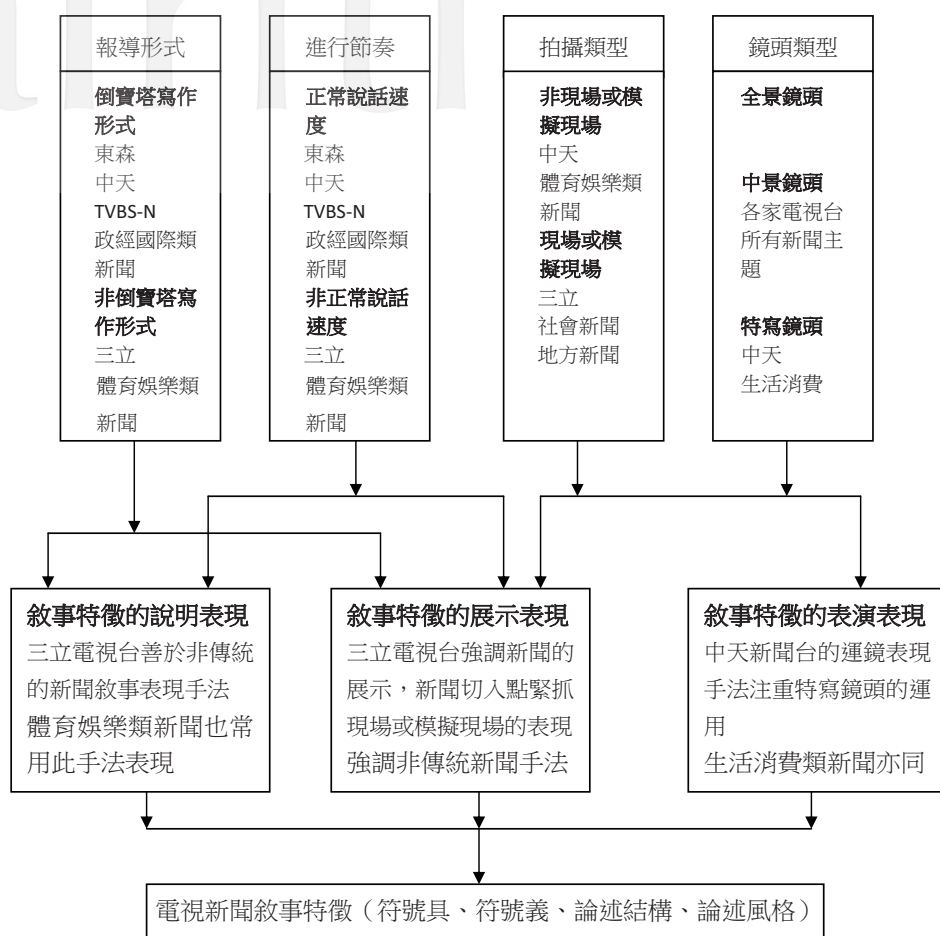


圖 2：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文本表現

較常見的作法是：採訪記者旁白新聞事件時，以快速陳述新聞事件的語調，增加新聞報導的情緒性因素。甚至，採訪記者的旁白也可以「變音」的方式，不論是裝出可愛聲音或恐懼聲音，都可以加強新聞報導的情緒因素，藉以吸引閱聽眾的情緒。

電視新聞報導拍攝類型的表現方面，三立新聞台、社會新聞及地方新聞強調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拍攝方式。這類的新聞拍攝類型方式，強調對於新聞現場的掌握，拍攝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即使沒有拍攝到新聞現場，也會藉由模擬新聞事件現場的方式，以動畫或新聞事件重建的方式，作為新聞事件的拍攝主畫面。這樣的新聞拍攝處理方式，可以加強新聞報導的情緒因素，藉以吸引閱聽眾的注

意。比較常見的作法是採訪記者報導社會新聞事件時，事後重建新聞事件的發生過程，甚至以電腦動畫的方式，畫出新聞事件過程，達到報導新聞事件的目的。

電視新聞報導鏡頭類型的表現方面，中天新聞台及生活消費新聞強調特寫鏡頭的拍攝。特寫鏡頭對於新聞對象的重點強調，可以達到激化情緒的目的。比較常見的作法是攝影記者拍攝新聞對象時，以特寫鏡頭強調對象的部分，增加新聞報導的情緒性與綜藝化因素。譬如模特兒展示服裝，攝影記者就以特寫鏡頭強調重點部位，達到情緒激發或新聞綜藝化的目的。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三立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說明新聞事件時，善於運用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搭配非正常說話速度的播報方式，說明新聞事件。這樣的新聞報導敘事表現手法，具有情緒喚起的功能。而三立電視台新聞報導展示新聞事件時，除了運用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搭配非正常說話速度的播報方式外，也使用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拍攝方式，搭配中景鏡頭的運用，展示新聞事件。中天電視台則比較常用特寫鏡頭，展示新聞事件。甚至，特過特寫鏡頭的運用，搭配新聞報導對於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拍攝，達到新聞報導的表演。

電視新聞是透過影像符號（也就是符號具）的運用，包括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非正常說話速度的播報方式、現場或模擬現場的拍攝方式及特寫鏡頭的運用等符號具，傳達出情緒煽動的符號義。對於第一層的外延意義而言，電視新聞報導傳達出情緒激動的影像，刺激閱聽眾的感官；對於第二層的內涵意義而言，就是電視新聞的娛樂化、綜藝化發展，轉變閱聽眾對於電視新聞報導的認知結果。最後導致看新聞像看連續劇一樣，具有娛樂消費的功能。而電視新聞報導的敘事結構與敘事風格，也就呈現出綜藝化的情緒激動風格，以及刺激感官的論述結構與容易接收的論述風格。

伍、結論

所謂的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可以分為故事與論述兩個層面來看。所謂的故事就是新聞故事，而所謂的論述就是論述形式，可以分為論述結構與論述風格。所謂的論述風格，就是影音符號，特別是影像符號的操弄，包括了報導形式、進行節奏、拍攝類型及鏡頭類型等論述特徵的配置。電視新聞台處於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態下（AC Nielsen, 2006），就會過度的操作新聞論述的形式特徵，刺激閱聽眾的感官與情緒，藉以提高電視新聞收視率。而這樣的新聞風格表現方式，係與電視新聞媒體所處的社會情境有密切關係，形成特殊的新聞論述結構，有其特定的背景脈絡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論述風格方面，三立電視新聞最常使用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並以非正常速度的播報方式，報導各類新聞。而中天與三立具有競爭關係，收視率競爭得相當厲害，因此新聞風格的表現也是著重在使用非倒寶塔的寫作形式，還有非正常速度的播報方式，這兩家新聞台呈現出類似的新聞報導論述風格。東森電視新聞報導則有較多的現場或模擬現場的報導方式，強調新聞報導的現場感因素。中天電視新聞報導也有較多的特寫鏡頭新聞，情感的煽動性較高。而各家電視新聞報導有顯著的差異，中天新聞與三立新聞有較多的非傳統新聞專業的新聞風格表現，東森新聞則強調現場感。

不同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方面，體育娛樂類新聞有較多的非倒寶塔新聞寫作形式，還有非正常速度的播報方式，顯現體育娛樂類新聞並不符合傳統新聞專業的要求標準。地方新聞則注重現場或模擬現場的報導，強調眼見為憑的報導方式，也比較具有現場感。生活消費類新聞則有較多的特寫鏡頭，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否與新聞置入有關，尚待進一步研究。而不同新聞主題的新聞報導論述風格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可以說新聞並不因為主題的因素，而呈現出不同風格。

新聞結構方面，不同電視新聞報導間有不同的新聞風格表現，而不同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間卻沒有不同的新聞風格表現。合理的解釋是，各家電視台因為新聞市場的競爭，必須發展出獨特的新聞論述風格，才能吸引閱聽眾注意，藉以拉抬本身的收視率。而新聞主題間的新聞論述風格卻不顯著，代表著不同主題的新聞報導論述風格趨向一致性，不同主題的電視新聞報導的新聞專業一致受到收視率因素的影響，呈現出相同或類似的新聞論述風格。這樣的結果反映出新聞論述結構趨於一致性發展的狀態，雖然各家電視台電視新聞努力建立自己的論述風格，但是「小異」下呈現出「大同」，都往新聞非專業的發展方向建立新聞論述風格，而呈現出封閉競爭的新聞論述結構。

電視新聞報導是以視覺訴求為主的敘事文本，強調論述形式的鋪陳與表達。對於電視新聞報導論述形式而言，新聞報導論述風格的鋪陳以影像敘事、加快節奏、現場報導及特寫鏡頭，並以綜藝化的論述方式，吸引閱聽眾的注意。可以顯見的是，在市場危機感充斥下，各家電視新聞台仍會強化新聞報導論述風格的「區隔化」，藉以定位自身的電視新聞市場，穩固收視率。但是總結而言，電視新聞市場的整體結構，仍舊往封閉及非專業的方向發展。

電視新聞報導具有一種強調視覺與聽覺文本的敘事特徵，尤其是視覺文本的論述形式，更是電視新聞報導強調的敘事特徵。電視新聞報導不但強調敘事結構面向的影像敘事、加快節奏、現場報導及特寫鏡頭操弄，更著重在綜藝化論述風格的表達，這是電視新聞報導敘事特徵的論述形式特質，值得後人繼續加以探討。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因素，就是電視新聞界基層新聞工作人員長久以來的「通稿」或「會稿」問題。新聞人員的「通稿」或「會稿」，可能有幾種狀況。第一，所謂的「通稿」，係指某一媒體記者採訪一則新聞，提供新聞稿給其他媒體記者，並任由對方修改後刊登或播出。第二，所謂的「會稿」，係指某一媒體記者採訪一則新聞，提供部分新聞素材給其他媒體記者，由對方依此素材或補充其他素材後，自行撰寫新聞稿。「通稿」或「會稿」對於電視新聞論述文本的表現，當然會有影響。不過，新聞守門人相互間的影響，除了「通稿」或「會稿」外，其餘的因素也有影響，如「比報」或「結盟」。所謂的「比報」，係指新聞從業人員將各個有競爭關係的新聞媒體新聞報導，加以比較的作為。所謂的「結盟」，係指新聞從業人員與其他媒體結成同盟，互相分享新聞訊息的作為。而新聞從業人員不論是「通稿」、「會稿」、「比報」或「結盟」的關係，都會對於新聞論述有所影響。這部分的影響，可以留待後續研究加以探討。

參考書目

- 王洪鈞（2000）。《新聞報導學》。臺北：正中。
- 王泰俐（2004）。〈電視新聞「感官主義」對閱聽人接收新聞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6：91-132。
- 蔡琰、臧國仁（1999）。〈新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58：1-28。
- 臧國仁、蔡琰（2010）。〈新聞敘事之時空「窗口」論述——以老人新聞報導為例〉，《新聞學研究》，105：205-246。
- 羅文輝（1991）。《精確新聞報導》。臺北：正中。
- AC Nielsen. (2006). 收視率分析調查資料。未出版。
- Bal, M. (Ed.). (2004). *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ignell, J., & Orlebar, J. (2005). *The television handbook*. New York: Routledge.
- Bloor, M., & Wood, F. (2006). *Keywords in qualitative methods: A vocabulary of research concepts*. London: Sage.
- Calabrese, A. (2000). Political space and the trade in television news. In C. Sparks & J. Tulloch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pp. 43-6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Chatman, S.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emedass, M. E., & Chew, F. (1994). *The influence of tabloid style TV news on viewers recall, interest and perception of import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tlanta, GA.
- Delanty, G. (2000).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London: Sage.
- (1997).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kström, M. (2000). Information, storytelling and attractions: TV journalism in thre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 465-492.
- Gant, C., & Dimmick, J. (2000). Making local news: A holistic analysis of sources,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opic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 628-638.
- Grabe, M. E., Lang, A., & Zhao, X. (2003). News content and form: Implications for memory and audience evalu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 387-413.
- Harcup, T. (2004). *Journal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London: Sage.
- Josselson, R. (2007). Narrative research and the challenge of accumulating knowledge. *Narrative Inquiry*, 16, 3-10.
- Kenyon, G. M. (2002). Guided autobiography: In search of ordinary wisdom. In G. D. Rowles & N. 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pp. 37-50). New York: Springer.
- Kenyon, G. M., Ruth, J.-E., & Mader, W. (1998). Elements of a narrative gerontology. In V. L. Bengtson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40-58). New York: Springer.
- Langer, J. (1998). *Tabloid television: Popular journalism and the "other news."* London: Routledge.
- Mittel, J. (2004). *Genre and television*.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L., & Willis, A. (1999). *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 Malden, MA: Blackwell.
- Westin, A. (1982). *Newswatch: How TV decides the new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Zettl, H. (2006). *Television production handbook*. Belmont, CA: Thomas Wadsworth.

The Discourse Dimension of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V News Coverage

Niu, Lung-G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Yilan, Taiw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classical journalism, news should be neutral, providing objective coverage of news events. But, other perspectiv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news narrative, including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dimensions, structure and styl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V news coverage,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on four TV stations to examine their content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differences in content,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ub-characteristics among four TV stations.

Keywords: news narrative, news discourse, discourse style, discourse structure, TV news

* Email: lgniu@mail.fgu.edu.tw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時機與傳播情境：評介《語藝與時機：歷史、理論、實踐論文集》

Kairos as the Rhetorical Moment for Communication Action: Reviewing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doi:10.6123/JCRP.2011.031

傳播研究與實踐, 1(2), 2011

作者/Author：沈錦惠(Mary C. H. Shen)

頁數/Page：269-28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3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時機與傳播情境：評介《語藝與時機： 歷史、理論、實踐論文集》

Kairos as the Rhetorical Moment for Communication Action: Reviewing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沈錦惠 *

Shen, Mary C. H.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一望書名，便知《語藝與時機》這本書 (Sipiora & Baumlin, 2002)，明顯與古典語藝學相關。一個古老的詞彙「*kairos*」，一本已出版近十年的集體創作老書，為什麼值得在這個時候給予評介？

這本出版於 2002 年的論文集，應可說是有關「*kairos*」（時機）此一語藝詞彙的里程碑書籍，收羅精選論文十四篇，加上主編用心寫就的導言，該算扎實的十五篇。分從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不同面向，甚至跨學術領域（例如醫學、心理學、美學、文學）討論這古老詞彙多元歧異的語藝意涵，但亦將殊異的語藝視角都匯歸於古希臘先蘇期的宇宙觀天人觀。考掘、比對、梳理之功甚深，且也不忘回應當代學界的需要。研究「時機」（*kairos*）的英文論著雖漸增多，書籍仍少見，大抵關乎神學或哲學¹。期刊文章亦然。社會科學或傳播相關的論著，近年來題材漸豐，多在本書出版之後，應可略推此書的學術貢獻與影響。

然而「*kairos*」這麼個古老西方詞彙，何以值得語藝研究以外的傳播學者賦予關注？對 21 世紀網際社會的溝通傳播研究乃至實踐，能有怎樣的啟發？

* Email: maryshen@cc.shu.edu.tw

1. 本書最後書目，羅列了 20 世紀西方各主要語言關於「*kairos*」及相關概念的著作，有九頁之多。由茲可見「*kairos*」的領域大致在神學、哲學、倫理學、教育學領域。

壹、*Kairos*：機會機遇之神

先談談「*kairos*」這個古希臘詞彙的來歷。希臘神話中，有兩位神祇與人類傳播息息相關。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溝通之神 *Hermes*，詮釋學（hermeneutics）的詞根詞源，職司仙界、凡界、冥界及跨界（例如陰陽兩界、神人之間）的各類溝通。另則是 *Kairos*，專司稍縱即逝的機會機遇，其形象大抵如下（見圖 1）：



圖 1：Kairos 的大理石浮雕²

由圖 1 的 *Kairos* 浮雕看來，這位行動中的機會之神手持天秤，象徵拿捏分寸分際、審慎權衡而毫釐不失。其腳踝肩背各一對翅膀，而全身光溜，僅前額一絡毛髮，象徵其動作如飛、稍縱即逝、飄忽難捉；若欲擒以為用，唯迎頭正面交鋒攫其髮絡而已。這浮雕能名垂迄今，應是因一方面具現了 *Kairos* 的精準靈動，一方面也揭示 *Kairos* 攸關人類行動，包括溝通表達的傳播行動。

2. 此 *Kairos* 造型仿古希臘雕刻巨匠 Lysippos (ca. 350-330 B.C.) 之作。原版現存於義大利杜林博物館（Museum of Torino）。

Kairos 得與 *Hermes* 並列希臘諸神族譜，流露的正是古希臘文化正視人生現實、力搏無常命運的人文理性精神。而這精神，即具體結晶為公眾傳播之道與術，亦即古典語藝。

貳、銳化中的時間意識

人間知識，沒法不帶有情境屬性，而情境總是關涉時間空間。一直以追求普同真理為務的傳統社會科學，有極其漫長的時光，輕忽情境因素對思想求索與知識尋繹的影響。上個世紀前半葉，總總制度結構看似森嚴牢固明確，情境因素像是不勞費心的既定事實。討論社會行為行動（例如 Parsons & Shils [2001]，甚或 Weber [Roth & Wittich, 1978]），大抵從狀似不動若山、鐵板一塊的既定社會現實來究其因果，論其目的理想與動機。60 年代的動盪，使社會科學中的人口學變項開始有了 Durkheim (1895/1982) 所謂客觀社會事實（social facts）之外的含意。婦權勞權黑人民權等等社會運動，揭露了學界所謂普同知識，往往潛藏著種族性別或階級的偏見——套句女性主義的慣用語，所謂白人男人優越優勢的預設。而事實上，社會不斷有主流與另類、菁英與流俗、日常平凡與異常邊緣等等之別。觀察者研究者自身的人口學特色，往往決定其所在的社會位置，因而也就不免決定其觀察研究的視角視野。於是，知識的情境屬性開始受到矚目，歷史語言文化脈絡對知識的形塑，重新獲得重視。而一連串語言相關的轉向（詮釋學、符號學、敘事學、語藝學的轉向，以及文化的轉向等等），也於焉繼起，迄今盪漾未已。

但即或已意識到情境脈絡的重要，所謂「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以及「社會位置」，大抵仍比較偏向「空間」概念，而較少融涵「時間」的向度。原因一方面固然在於社會生活既已由時鐘同步協調，難免下意識以時間為既經給定的生命事實（a fact of life），天經地義但不勞細究。另方面，萬事萬物皆在時間中生成變化不已，真要認真考慮「時間」因素，還真難捉摸。無怪乎英國社會學者 Adam (1994) 在其《時間與社會理論》（*Time and social theory*）³一書中即點出，社會科學處理結構與變遷時，看似共時貫時分治，事實上遠非只是涇渭對比、相互排除的理論選擇那麼簡單。重要的是，每當變遷是關注焦點，整個分析過程像是沿用一套界定「之前／以後」的靜態框架來加以釐測。「即或使用

3. Adam 此書初版於 1990，曾獲 1991 年度英國社會學學會 Abrams 紀念獎。此書批評貫時共時理論區分的學術傳統，並非先見。例如 Giddens，亦早在《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1979）一書中即已談過。畢竟，時空從來是並在交融的。任何情境脈絡的考量，豈能獨偏空間而輕忽時間，或獨重時間而輕忽空間？

貫時分析，也可能只是處理「時間點」，而毫不顧及暫時延伸、暫時性，或未來取向」(1994: 6)⁴。時間的多重向度與多元意涵習慣輕易遭到擱置或根本輕忽。這種輕忽，別說在瞬息萬變、牽髮動身的時代漸漸難搔癢癢，在知識與社會的建構屬性已昭然若揭，而訴諸語言符號以促進社會興革、參與知識建構愈來愈便利的今天，如何讓社會行動更具價值權衡的意義，也更具道德意識與倫理責任，不但是當今社會科學的重大課題，更是網際網路時代的傳播學門必須凜然以對的學術挑戰。

隨著網路社會的興起，進入 21 世紀的社會科學對所謂社會，已有了迥異往昔的想像，其間時間意識無疑愈為敏銳。例如 Virilio (1977/2007) 關切速度的社會衝擊，Bauman 的系列「液態」著作⁵，關切個人置身變驟頻仍、社會制度來不及凝結成形的當代社會，人生追求如何腹背受敵，生命想像如何備受考驗，社群認同如何重組再構，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如何解決等等。《液態》系列中赫然在列的，甚至還包括一本《液態時間》(Liquid time, 2007)。可以想見，時間意識在社會科學中勢將益形銳化。對傳播學者而言又何嘗不然？電訊科技促成的媒介匯流，網際網路促成多元即時的社會互動，已挑戰了傳播一詞的傳統想像。影響所及，不但新聞資訊的即時性愈見鮮明(沈錦惠，2009a：91-124)，連「新聞」是否該重新界定，也因所謂「公民記者」的崛起，以及部落格、推特、臉書等網路平台相繼加入新聞戰，而引發思考討論(見如林照真，2011；項國寧，2011；楊意菁，2011；蘇鑰機，2011 等等)。倘容素樸以觀，在網路串連起來的電子環境中，新聞的書寫發佈還真愈來愈像是(或該說，愈來愈復歸為)一種有價值宣稱的言說行動。

參、人類傳播與語藝時機

隨著時間意識的銳化，時間便不再能只當作是理所當然、由時鐘界定的生命事實，而更該從社會的、文化的，乃至個人心理的時間來考量。當時間的多元向度與多元意涵開始浮現，「時機」問題便益顯重要，尤其對傳播學者而言。畢竟，哪個傳播溝通事件，不是一個獨特獨到、無可複製、不可重來的過程？即或同樣

4. 原文：...the diachronic analysis might be dealing with points "in time" without temporal extension, temporality, or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5.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2000)、《液態愛情》(Liquid love: On frailty of human bonds, 2003)、《液態生命》(Liquid life, 2005)、《液態恐懼》(Liquid fear, 2006)、《液態時間》(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2007) 等等。

的人，同樣的事件再搬演一次，但，「舊時天氣舊時衣，唯有情懷，不似舊家時」，硬是不可回逆。這樣的觀點概念，人類傳播在概論階段即已觸及，有別於把焦點對準媒介的大眾傳播。既有心於溝通，力圖盡意達意自屬當然，因而對象場合情勢的拿捏審斷，要求的不是什麼曠百世不易的真理事實，而是有關當下此刻的務實智慧（*phronêsis*）。這也正是「*kairos*」一詞的精義所在（見如 Kinneavy [2002]、Smith [2002] 兩篇）。

從語藝學看來，只要發而為言為文，或任何影音符號，便是有心人蓄意為之的社會參與行動。行動要求果效，因而講究策略，心繫目的，不離動機。於是必然涉及價值判斷，並有意訴諸公斷。此所以討論資訊品質，在語藝學而言，決不只是忠於事實那麼簡單。而這裡，時機（*kairos*）正是關鍵思考點。語藝批評在美國的發展，前面幾十年工夫大抵小心謹慎地恪遵 Wichelns (1925) 等人依據亞里士多德《語藝學》而羅列的步驟章法、守則方針，對文本內容結構的重視遠勝於文本作為言說行動的時空脈絡。這畢竟是因為當時對演說作為公共論述及公民素養的實踐別有期待，需要時間來操練詳熟而然。後來 Bitzer (1968) 以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一文，掀起語藝情境究係主觀知覺或客觀真實的熱烈討論，也讓演說，以及一切可視為語藝批評研究對象的任何形式的文本，在學者眼中開始呈現出社會行動的事件特質⁶。事件必有其生發因果及過程，也就是，必有其會展延、會有未來預期或想像的「暫時性」（*temporality*）。事件從來不孤立抽離，必有其歷史文化及社會的情境脈絡，也必牽扯到角色、場景及行動。換言之，時空屬性並在共在，亦即是時機（*kairos*）一詞的蘊意所在，也正是《語藝與時機》一書致力所在。

事實上，這種不以靜態物件，而以動態行動，來看待「文本」的眼光，不獨傳播中的語藝傳統有之，其實當代哲學亦早就賦予類似的關注。例如 Ricoeur 甚早就注意到敘事的行動特質與行動的「暫時性」（*the temporality of action*）⁷，而文本無非是值得關注研究的言說，有其呼應社會生活需要的動機意圖。這些說法，即或詞彙、說法、重點不盡相同，但一旦將所研究的文本視同社會參與的行動，任何形式的言說便得有其除了「忠於事實」與否之外的檢視標準。原因在於，

-
6. Bitzer 此文固然具備相當程度的里程碑意義，但語藝文本的事件特質及行動屬性得以受到重視，當然不是 Bitzer 此文所能獨居其功。
7. Ricoeur 的文本觀，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不過關心敘事、認同與時間的關聯，是 Ricoeur 畢生關注的主題。作為言說行動的敘事，涉及敘事者在乎的事件，事件涉及行動者以及承受者。對 Ricoeur 而言，人的認同，無非一種敘事認同，而有意義的敘事行動即為值得研究的文本。（見 Ricoeur, 1991a, 1991b）。

人類社會中的行動者，從來沒法自外於社會價值規範與群體認同想像之外。行動既要求果效，意圖、策略、目的便內蘊其間，行動者無從卸責。這便意味著倫理與美學的思考，必然伴隨於有關「事實」的思考。在火星文遍佈，而新聞廣告難分、娛樂資訊交混的傳播環境裡，對關切資訊品質與素養的傳播學者而言，這正是「時機」（*kairos*）這個兼具時空雙重特性的語藝詞彙特別值得細心玩味之處。

肆、時機：審時度勢、抉擇行動的關鍵

Sipiora & Baumlin 編輯的這本《語藝與時機》(2002)，專門討論「*kairos*」的古典語藝意涵。關心傳播情境脈絡的學者，常可以從 Bitzer (1968) 的〈語藝情境〉借光。但有什麼必要，得重新思考「*kairos*」的語藝意涵而能從此書借光呢？對近年來所謂語藝學復興現象常犀利針砭的語藝學者 Gaonkar (1990: 341-366, 1996: 25-88)，曾慨言語藝關乎特殊性（*particularity*），如今一股語藝熱，卻搞得這個獨重特殊性的特殊取徑居然儼若普同詮釋準則（*the universal hermeneutic*；1996: 27）。古典語藝固然一直具有作為詮釋理論與作為文化實踐的兩種可能，古人畢竟以文化實踐為優先，而不是像當代學者這樣，熱衷於詮釋批評甚於產製創構。因而一些古典語藝詞彙若勉強用到當代論述與觀念中，往往顯得「單薄」（*thin*），實不敷詮釋批評工作所尤須的概念深度。不用說，Goankar 這番見解，在其兩文分別發表的書中都招來隆隆砲火。在《語藝與時機》這本書中仍然餘波盪漾。為本書寫序的語藝學者 Miller，序中重提 Goankar 的「單薄」說，並視本書為有力的反駁。她說：這本論文集，展現了「*kairos*」這個希臘概念的深邃、複雜、無法翻譯，而此一概念，起碼在古希臘語藝傳統各相殊異的流派傳承中都屬核心 (2002: xi)。

「*kairos*」一詞若連英文都沒法翻譯，能逕譯為中文的「時機」嗎？對此，筆者的確不無躊躇。兩相對照，「時間」比較是個籠統概括的概念，而「時機」則獨到獨特、明確對應，一如語藝。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華人所謂「時機」，同樣兼含時空雙重意義。此由易經中所謂悔吝吉凶都不離「時」與「位」，即可窺悉。然而「*kairos*」這個古典詞彙，不用說深深植根於希臘文化，且藉日後的基督信仰、與文學傳統、與哲學思潮繼續發皇⁸。從最早出現在荷馬史詩中的

8. 關於基督信仰，本書中 Sipiora (2002) 寫聖經新約。關於文學美學，本書中 Baumlin & Baumlin (2002) 寫莎士比亞《哈姆雷特》、Mason (2002) 討論藝術中的美感經驗。關於哲學，Thompson (2002) 寫哲學家 Emerson。例如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的 *Being and time, part 8: Temporality*，無妨視為重新詮釋「*kairos*」的宏偉企圖。在其識照下，「*kairos*」近似「神視時刻」（*moments of vision*），不必然得涉及基督信仰的救贖觀 (Critchley, 2009)。

物理生理意義（紗線穿隙而織入布中的剎那、戰場上足以殺敵致命的瞬間。見 Sipiora [2002: 17-18] 之文），到語藝傳統中的心理意義，再到哲學上的倫理意義與人性意義（Benedikt [2002] 之作），乃至神學上的靈性意義，個中蘊意豐沛厚富且深邃靈動，筆者豈敢自認夠格譯之？基於「*kairos*」總是特別關涉某個漲滿意義，等待被圓現的時間關節，就權且譯為「時機」吧。不能不承認，除了「時機」、「機緣」、「契機」之外，實在想不出還能如何譯之⁹。詞彙果真都有其歷史文化脈絡。「時機」二字，連「*kairos*」所潛含的語藝意涵都難盡捕捉，而況其他？所幸本書以古典語藝的公共傳播思維為主。但願走筆至此，「時機」這個中譯起碼已確立了合宜的語境——既是社會科學的，也是傳播相關的。

一、符號行動的語藝動能

筆者會接觸 Sipiora & Baumlin 兩位語藝學者編纂的這本書 (2002)，是基於梳理「電子語藝」這個概念的理論需要。網路時代的傳播，即時性鮮明，沒法不留意「時機」。生活世界因為數位匯流，不論行動或互動都愈來愈顯出此起彼落、如響斯應、綿密交織的特質。一介個人再尋常不過的說聽讀寫行動，在網際網路中，即或不經意，時機正巧、因緣際會，也可能有不可思議的漣漪擴散效用（沈錦惠，2009b）。於是不禁覺得與其窮究媒介影響力或閱聽人解讀創意，不如仔細思索網路時代一介符號行動者（a symbolic actor）的語藝動能（沈錦惠，2009a, 2009b）。近十年來，社會科學特別留意符號性的行動與互動所能發揮的串連力量，並往往將社群或社會更新再造的契機寄望於有承擔、能負責的人類行動者（見如 Barnes, 2000）。基於構思「電子符號行動者」（electronic symbolic actor）的語藝動能之需，覺得「*kairos*」一詞，總不能僅止於課堂上常說的，是一種主觀感受或審斷的所謂主觀質性的時間，相對於時鐘年曆所謂客觀量性的時間（*chronos*，此區分的詳細討論，見 Smith [2002] 一文）。若真的光如是說如是想，古典語藝詞彙豈能不「單薄」？

就這樣先讀到 Kinneavy (1986) 與 Kinneavy & Eskin (1994) 的兩篇論文，分別討論「*kairos*」概念如何受到輕忽，而亞里士多德的《語藝學》（此書當代意義，請詳游梓翔，2011），若不跟「*kairos*」扣連，會如何受到曲解誤用¹⁰。於是也

9. 「*kairos*」一詞，沈錦惠（2009a）則譯為「關鍵契機」。

10. 也就是 Kinneavy 的 *Kairos: 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 (1986) 與 *Kairos in Aristotle's rhetoric* (1994)。亦見 Gross & Walzer (2000)。詳細討論請見沈錦惠〈第六章，虛擬或真實？：從電子符號行動看公共溝通〉（2009a：145-192）。

注意到他收錄於本書的另一篇大文 *Kairo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rhetorical theory* (Kinneavy, 2002: 58-76)，了解一般所謂主觀心理的質性時間 (qualitative time and timing)，重點在於分寸分際的審度權衡 (propriety and due measure)。正因審度權衡是關鍵，「*kairos*」乃有其倫理學、知識論、語藝學、美學與公民教育的深刻內涵。由此回頭審視亞里士多德的《語藝學》，也才彰顯得出其道術相濟的深意與藉之社群經營的深心。

二、行動時機的雙面性

本書的里程碑意義，表現在以十五篇各自專擅發揮的論文，廣泛且深刻地討論人類行動（包括符號行動）中的時機意識與時宜問題。執筆者皆為研究古希臘文化，尤其是語藝文學歷史的一時俊彥。除了前已提過的 Kinneavy 與 Smith，還有 Enos、Poulakos，以及曾與 Kinneavy 合撰 *Kairos and Aristotle's rhetoric* (1994) 一文的 Eskin 等等。在他們鼎力合作之下，我們得以理解，原來在語藝思想上看似見解各異且互別苗頭的柏拉圖（批駁語藝花招、語藝該隸屬哲學）、亞里士多德（語藝非關道德，是可學可教的技術）、Isocrates（重視政治實務與公民訓練），乃至以語言魅惑著稱的煽「情」大師 Gorgias (Poulakos [2002] 之文)，重視演說者全人養成的 Cicero，甚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語藝 (Baumlin [2002] 之作)，其基本核心關懷皆不離「時機」(*kairos*)。原因在於這些不同的流派，其實都是畢達哥拉斯思想的不同詮釋與發展使然 (Rostagni [1922/2002] 一文)。畢氏哲學關心一與多的本質、多元紛歧的折衝與和諧，以及正義與平等的協調問題。其間拿捏與審斷的關鍵，正是時機 (*kairos*)。在古希臘文化思維及公共生活中關係至大的，言說行動如何影響靈魂的道與術 (Phaedrus, 27i-72b)，其核心焦點無非在於拿捏與審斷此時機。對此時機，謹依本文所需暫列幾點相關畢氏哲學識照如下：

- （一）*Kairos* 是宇宙論律則，亦是人類學實踐 (Smith, 2002: 48)。
- （二）*Kairos* 即正義，而正義亦即和諧。……此正義立基於平等，不是齊頭式平等，而是適才適性的平等 (Rostagni, 1922/2002: 32)。
- （三）行動中最殊勝處即 *kairos* (Rostagni, 1922/2002: 34)。

換言之，「時機」(*kairos*) 即在特殊時空情境中，以行動促成正義或和諧，使之開顯、圓現於針對性十足的斯時當刻。終極而言，一切行動的努力，無

非希冀促進這畢氏所關切的正義與和諧。符號行動亦無不然。欲達致共鳴感通、影響靈魂的語藝行動，尤其針對性十足。這正是畢氏「時機」的雙面性：既輾合於恆定恆常的宇宙律則（cosmological），亦相應於無常生活世界的人類學實踐（anthropological, practical）。諸多語藝思想的繁衍，皆因對此雙面性有不同的詮釋發揚而然（後詳。亦請參考本書 Rostagni [1922/2002]、Smith [2002]、Kinneavy [2002]、Poulakos [2002] 所撰諸章）。

畢氏哲學與各古典語藝名家之間的傳承淵源，Rostagni 這位義大利古典文化學者早在上世紀廿年代即已發表長篇論著，但一直要等上近八十年光景，才因語藝熱重燃，而終於有機會獲得英語世界的重視，也才終於得藉本書一窺¹¹。這篇《語藝與智辯術的歷史新頁》(Rostagni, 1922/2002) 列為全書第一篇的作品，由主編之一的 Sipiora 英譯，無疑為全書奠基。其後 Smith (2002)、Kinneavy (1986)、Poulakos (2002) 等人所撰諸文，列於其後，等於踵繼此文，而用心於理論的深耕。理論探討之後，則兩篇寫文藝復興時代 (Baumlin, 2002; Baumlin & Baumlin, 2002)、四篇討論「*kairos*」概念如何應用於當代藝術文學賞析 (Thompson [2002]、Mason [2002]、Benedikt [2002] 諸文) 或寫作教學課堂 (Hill [2002] 之文)。

神話中飛快滑溜 *Kairos*，一般人很容易只注意其所意味的機會運氣 (opportunity, chance)，但其手持天秤所象徵的審時度勢、審慎權衡 (prudence)，才是希臘人文理性精神流露的焦點。本書絕大多數的篇章，不論主題，不拘討論的焦點人物，大都著意攻錯怎樣算審時度勢，而且攻錯方式，可以說都與「時機」(*kairos*) 的雙面性息息相關。

三、因循乎？創新乎？

社會科學研究人類行動，常不免膠著於社會決定論或科技決定論的對比。如果從人文理性精神的「審時度勢」來看人類行動，那麼能斟酌該關注的，無非是當下此刻中的「既有既知」與「未來未知」兩個面向。這也正是「時機」(*kairos*) 一詞雙面性的深意所在，於是對所謂人類行動便也開啟不同的想像期待。如果重視「既有既知」，便可能如柏拉圖般，關心恆定普同的真理 (logos) 對當下行動的召喚籲求，也可能如亞里士多德或西塞羅般，關切社會文化環境條件對行動的繩規範限 (*prepon, decorum*)。倘若是重視當下此刻與未來未知的關係，重點便不在於回顧過往、檢視範例習尚，而在於尋索奇謀妙計，以利於突破與創

11. 本書所譯只是 Rostagni 此文的節譯。全文英譯有另書。

新。這第二個面向，通常是備受詬病的智辯士們（sophists）所特別擅長，而魅惑著稱的 Gorgias 則堪為個中翹楚（請詳見 Poulakos [2002]、Rostagni [1922/2002] 兩篇）。

若將此「*kairos*」的雙面性整合以觀，則行動當下即是庚續創新的契機，是日後堪視為轉捩點，但當下亦因之非審斷抉擇行動不可的關鍵時刻。審斷抉擇終都是為了精準行動，而這正是關心公眾傳播的古典語藝的核心所在，因而前文提及「*prepon*」或「*decorum*」，都是藉之嘗試提點的相應詞彙。但顯然，這兩個較為今人所熟悉的詞彙，都偏向「既有既知」的秩序風尚成規，不論是亞里士多德式的或西塞羅式的。希臘文的「*prepon*」相當於英文中的「propriety」（得體）、「fitness」（妥適）或「decency」（端正）。至於拉丁文的「*decorum*」，基於羅馬社會嚴格要求身分名位相當的規矩禮節，雖與「*prepon*」同義，卻暗示了更嚴格要求遵禮循俗守成的文化之義。對當今傳播學者而言，傳播行動必然涉及民情輿論、體裁文類、媒介屬性、專業倫理、文化習尚、法律法規等等。這些都可視為關乎「*prepon*」或「*decorum*」的揣摩、應用或延伸 (Hughes, 2002)。傳播行動當下該留意的「既有既知」面，尤其是關乎習尚成規的一面，一般而言較受重視，耕耘較多，有時幾視如理所當然的事實或結構。無怪乎 Bitzer (1968) 在其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一文中甚至如此描述何謂「語藝性的論述」：

語藝，即是切合或嘗試切合情勢的適切回應（fitting response）……。

情勢控制了語藝回應，猶如問題掌控了回答、疑難控制了解決辦法（同上引：10）。……

Bitzer (1968) 特別強調語藝行動係回應當務之急而發，而當務之急，涉及客觀外在的情勢。因而所謂「審時度勢」無他，無非是搞清楚此一「客觀現實」情勢。當然，到底有多大程度，能說有個不勞忖度、無庸贅言的「客觀現實」在召喚、敦促一個「最適切」的語藝行動，成為 Bitzer 此文備受爭議的焦點¹²。不過，這番爭議卻也揭露出人文理性精神中的「人文」向度，其實隱含了超越既定格局的無限可能性，遠非因循套招的工具理性所能望其項背，而唯不滯不凝的心靈始得而窺視之捕捉之。這於是必須正視另一個鮮被提及的古典語藝詞彙「*polutropos*」，其意表面上近似「懂得一個概念多種表達」（knowing many

12. 格於主題，此爭議在此沒法討論。但請參考 Vatz (1973)。

ways to express the same thing），無非靈活變通、適性隨機之意。在歷史中備受誤解，如今因緣際會正重獲青睞的古希臘智辯士們，尤其是罵名最慘（挨柏拉圖之罵）的 Gorgias，正是實踐且體現此「*polutropos*」概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魅惑」之術無他，不過因地制宜、隨機應機、就合當下需要，而予以戲劇呈現而已。但「*polutropos*」之於 Gorgias，可以淋漓盡致到能為閱聽眾重新界定真實、形塑現實、創造新的知覺經驗，而獲致嶄新視野願景的地步。這顯示注重特殊性且針對性十足的語藝（傳播行動），理當凜然以對每個獨到獨特的、無從複製、無可回逆的溝通傳播事件，且尊重事件中的同人（尤其是閱聽眾）的心智情緒，並對自己的溝通傳播專業別有高尚期許。顯然，「*polutropos*」要求的是不自羈於既定的章法成規而能大膽突破與靈動創新。

在亞里士多德《語藝學》中耕耘不多的「風格」，既忝列語藝五綱之一（the five canons），應該有藉之砥礪「*polutropos*」素養的深意。此一素養，在畢達哥拉斯哲學中，正是扣連一與多、存有與變化（one and many, Being and Becoming）的重要關鍵，是繽紛擾攘人間藉之巧妙維繫「正義」與「和諧」的行動樞紐。

不用說，以「*polutropos*」搭配「*prepon*」，才得而稍瞥「行動的最殊勝處」（Rostagni [1922/2002: 34] 之文）竅門所在，也才堪堪稍窺「時機」（*kairos*）之於古典語藝乃至當代傳播的深意。然而別說「*polutropos*」受到輕忽，其實「*kairos*」不也一樣？少了「時機」（*kairos*）的奠基或起碼烘托，所謂「*prepon*」或「*decorum*」畢竟缺少了一個能互為表裡、相互為用的概念，因而難免過度顧慮既有經驗習尚，以致失落了本該有之的靈活創新的意涵。其結果往往只淪為困於成規甚至汲汲營營的工具理性。在窮於因循套招中，恐怕連揣摩社會價值規範的人性意義都有所不能，又豈堪「人文」的美名？

「時機」（*kairos*）的雙面思維，當然不只適用於古典語藝，還可類推到廣泛的傳播行動乃至社會行動。其實 Berger (1992: 47) 討論流行文化的「類型」（genre），便提及一件作品（傳播行動的結晶）在創作當下，都徘徊在「習尚」（convention）與「創新」（invention）之間，而其「成功」與否（譬如是否叫好叫座），無非「審時度勢」，拿捏最恰當的分寸分際，以成就最接近所欲的成果。在數位匯流的今天，混搭搞笑風正盛，但分寸分際的拿捏從來沒法輕易說不再重要。其實不妨說，所謂「語藝素養」、「媒介素養」，或廣泛說「傳播素養」，都脫不開「時機」（*kairos*）一辭所內蘊的人文理性精神。這精神，彰顯在精準掌握每個傳播溝通行動所能成就的最佳可能性中。這精神，甚至涵括對

當今科技的嫻熟（請詳見 Enos [2002]、Eskin [2002] 兩篇），對任務特質的理解（請詳見 Eskin [2002]、Hill [2002] 乃至 Baumlín & Baumlín 有關莎劇哈姆雷特三篇 [2002]），對倫理與美學深意的思索（請詳見 Benedikt [2002]、Mason [2002] 兩篇）。

所謂「行動中最殊勝處即 *kairos*」，其意盡在於茲。而這應是本書以十五篇力作，所企圖揭示的傳播時機風貌。

參考書目

- 沈錦惠（2009a）。《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臺北：天空數位圖書。
- （2009b 年 7 月）。〈從電子口語反省媒介素養〉，「2009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新竹。
- 林照真（2011）。〈因為科技，新聞正處於改變的轉捩點上？〉，《傳播研究與實踐》，1（1）：25-34。
- 項國寧（2011）。〈新聞的本質與九大原則〉，《傳播研究與實踐》，1（1）：35-41。
- 游梓翔（2011）。〈從傳播研究角度重讀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傳播研究與實踐》，1（1）：239-254。
- 楊意菁（2011）。〈從「網友說」新聞探討公眾角色在新聞報導的變化〉，《傳播研究與實踐》，1（1）：43-53。
- 蘇鑰機（2011）。〈什麼是新聞〉，《傳播研究與實踐》，1（1）：1-24。
- Adam, B. (1994).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Barnes, B. (2000). *Understanding agency: Social theory and responsible action*. London: Sage.
- Baumlin, J. S. (2002). Ciceronian *decorum* and the temporalities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In P. Sipiora & J. S. Baumlí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38-164).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umlin, J. S., & Baumlín, T. F. (2002). *Chronos, Kairos, Aion*: Failures of *decorum*, right-timing, and revenge in Shakespeare's *Hamlet*. In P. Sipiora & J. S. Baumlí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65-18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uman, Z. (2007).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2006). *Liquid Fear*.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2005). *Liquid Lif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2003). *Liquid Love: On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Benedikt, A. F. (2002). 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Toward an ethics of *Kairo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226-23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erger, A. A. (1992). *Popular culture genres: Theories and tex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itzer, L.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 1-14.
- Critchley, S. (2009).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part 8: Temporality*. Retrieved May 10, 2011,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belief/2009/jul/27/heidegger-being-time-philosophy>
- Durkheim, E. (1982). *Th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and selected texts on sociology and its method* (W. D. Halls,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5)
- Enos, L. R. (2002). Inven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technographers of ancient Athens: A study of *Kairo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77-88).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Eskin, C. R. (2002). Hippocrates, *Kairos*, and writing in the science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97-113).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aonkar, D. P. (1996). The idea of rhetoric i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In A. G. Gross & W. M. Keith (Eds.), *Rhetorical hermeneutics: Inv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p. 258-295).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0). Rhetoric and its double: Reflections on the rhe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H. W. Simons (Ed.), *The rhetorical turn: 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pp. 341-3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oss, A. G., & Walzer, A. E. (Eds.). (2000). *Rereading Aristotle's rhetoric*.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ill, C. E. (2002). Changing times in composition classes: *Kairos*, resonance, and the pythagorean connection.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211-225).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ughes, J. J. (2002). *Kairos* and *Decorum*: Crassus Orator's speech de lege Servilia.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28-13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inneavy, J. L. (2002). *Kairo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rhetorical theory.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58-7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6). *Kairos*: 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 In J. D. Moss (Ed.), *Rhetoric and praxis: The contribution of classical rhetoric to practical reasoning* (pp. 79-105).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Kinneavy, J. L., & Eskin, C. R. (1994). *Kairos* in Aristotle's Rhetoric. *Written Communication*, 11, 131-142.
- Mason, G. (2002). In praise of *Kairos* in the arts: Critical time, East and West.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99-2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iller, C. (2002). Foreword.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xi-xii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arsons, T., & Shils, A. E. (200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
- Poulakos, J. (2002). *Kairos* in Gorgias' rhetorical composition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89-9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icoeur, P. (1991a). Narrative identity. *Philosophy Today*, 35(1), 73-81.

- (1991b).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P. Ricoeur,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II* (K. Blamey & J. B. Thompson, Trans.; pp. 144-167).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ostagni, A. (2002).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and sophistry (P. Sipiora, Tran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23-45).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 Roth G., & Wittich, C. (Eds.). (197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piora, P. (2002). *Kairos*: The rhetoric of time and tim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14-12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ipiora, P., & Baumlin, J. S. (Eds.). (2002).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mith, J. E. (2002). Time and qualitative time.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46-5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Thompson, R. (2002). Ralph Waldo Emerson and the American *Kairos*. In P. Sipiora & J. S. Baumlin (Eds.), *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 (pp. 187-198).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Vatz, R. E. (1973). 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6, 154-157.
- Virilio, P. (2007). *Speed and politics* (M. Polizzotti, Trans.).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 Wichelns, H. A. (1925).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 In A. M. Drummond (Ed.), *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ublic speaking in honor of James Albert Winans* (pp. 181-216). New York: Century.